

目 录

总 序	(伊朗)穆罕默德·贾瓦德·阿高杰里	1
编者叙语	姚继德	4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驻华大使给会议的贺信		
.....	(伊朗)贾瓦德·曼苏尔	1
在云南大学首届伊朗学国际会议上的致词		
.....	(伊朗)穆罕默德·贾瓦德·阿高杰里	4
在云南大学首届伊朗学国际会议上的欢迎词	吴 松	7
伊朗与中国关系的发展		
.....	(伊朗)穆罕默德·瓦尔兹扎德·霍拉桑尼 撰 白志所译	1 0
伊朗学的由来及其研究范围	姚继德	2 0
丝绸之路与中国—伊朗的文化交流	姚继德	2 9
伊朗上古历史发展特点刍议	黄民兴	3 7
略论中国与伊朗历史文化的共性	冀开运	5 0
哈菲兹的苏菲思想	白志所	6 7
波斯民族精神传承情结的历史解读	王 锋	7 7
对《元史》所载赛典赤几件事情的再认识	马 经	8 9
《经学系传谱》所记波斯文阿拉伯文书目初探		
.....	纳巨峰	1 1 2
从云南回族的他称“潘塞”和“帕西”看波斯文化之东渐		
.....	马超群	1 3 2
简论伊朗百年宪政的成就	吴 成	1 3 9
关于中国与伊朗关系的前景展望	马 平	1 4 7
对加强中伊两国学术交流的几点思考	杨经德	1 5 4

目 录

中国与伊朗：革命后社会发展进程的比照性解读	王 猛 161
1989 年以来中伊关系转变发展的动因分析	王恩学 刘清华 181
巴列维国王时期美国对伊朗的军售	范鸿达 198
美伊关系对伊朗中东地缘战略的影响	陈俊华 209
论当代日本伊朗非对称性依赖的关系	蔺焕萍 唐莉霞 225
中国伊朗学研究论著索引(1911~2007 年	李 颖 蔡奕文 胡 婷 金 杰 整理 237

总 序

总 序

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

伊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国家之一，伊朗文化连续几个世纪，对世界各国的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从信德河岸到尼罗河，从中国到欧洲都留下了伊朗文明的足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伊朗古老文明把亚洲、欧洲和非洲连接在一起，形成了古波斯文明圈。伊朗独特的地理位置，古老的波斯文明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对其他文明的形成、发展与交流起到了深远影响，波斯文明引起了各国专家学者的关注。伊中是两个伟大的文明古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为人类创造了灿烂的文明，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有着数千年历史的古丝绸之路，就是伊中两国友谊的最好见证。伊朗和中国曾是亚洲、乃至世界的强国，两国人民开拓的举世闻名的古丝绸之路，是传达两国人民友谊的信使。我们的祖先通过丝绸之路，不仅从事贸易活动，而且还进行文化、艺术、文明、思想、精神和社会的交流，伊斯兰教就是通过这条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并对中国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伊朗人民深受中国人民的热爱和尊重，在中国留下的波斯文明古迹就是最好的历史见证。随着历史的发展，丝绸之路沿线城市虽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时至今

中国伊朗学论集

日，伊斯兰教和古波斯留下的历史文化遗迹依然清晰可见。从这些历史文化遗迹中，我们可以看到波斯语在这些地区的发展及其对人们产生的巨大影响。

伊中两国的友好文化关系一直保持到了今天，不过，两国新一代人尚需要相互之间的全面了解和认识。两国在文化、政治、经济、科技等领域的全方位合作，有助于促进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在这方面，伊中两国的有关大学和研究机构肩负着重大使命，除加强相互之间的文化交流外，双方应规划长远目标，翻译大量书籍，互相介绍，互相吸收，取长补短，把伊中文化交流推向一个新的高度。毫无疑问，文化的交流发展，将有助于推动两国在工业、贸易、经济等领域的全面发展。

伊朗学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研究课题，世界各国热爱伊朗历史文化的专家学者们正在孜孜不倦地从各个角度对伊朗进行广泛研究。在伟大的中国，中国的伊朗学专家们用犀利优美的文笔在伊朗古典文学、现代文学、历史和文化诸领域里撰写和翻译了不少专著，丰富了两国的学术殿堂，巩固了伊中两国的文化关系。有鉴于此，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驻华大使馆文化处为了加快多年来已经开始的伊中文化合作，让更多的中国人民了解和认识伊朗文明与文化，与宁夏人民出版社合作出版伊朗学领域的系列学术专著，其中包括《元明文献中的忽鲁漠斯》、《伊朗学在欧洲和东亚》、《中国伊朗学论集》第一辑。

尊敬的读者，《中国伊朗学论集》一书是该丛书的第二本，该书是中国国内外伊朗学专家在 2007 年 3 月 15 日云南大学举行的题为“伊中文化交流的影响”国际研讨会上递交的论文，我们希望该论集是了解伊朗迈出的一步。尊敬的读者通过阅读这本论集将增加对伊朗，对伊中友好关系的进一步了解，



总 序

将见证两个文明古国在文化、学术、教育、艺术、经济和政治等各领域的长足发展。

在此，我要衷心感谢云南大学伊朗学研究中心主任，尊敬的姚继德博士为翻译、编辑该丛书付出的心血和努力。并对宁夏人民出版社为出版本丛书给予的真诚合作，表示衷心的感谢！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驻华大使馆文化参赞

穆罕默德·贾瓦德·阿高杰里博士

2008年5月6日于北京



中国伊朗学论集

编者叙语

中国和伊朗是世界上的两大文明古国，两国人民在 2000 多年前就共同开拓了古老的丝绸之路，借助这条文明通道，我们两国人民不仅相互借鉴过对方的璀璨文化，而且还为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对话做出过重要贡献。因此之故，汉学（Sinology）和伊朗学（Iranology）一直是世界东方学（Orientalism）中的两大显学，吸引着世界范围内的众多才俊之士竞相为之折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开展伊朗学的研究，具有推动世界不同文明之间的友好对话，促进世界和平与和谐的重要现实意义。

2007 年 3 月 14~16 日，正值云南大学伊朗研究中心（Centre for Iranian Studies of Yunnan University/ مرکز ایران شناس دانشگاه یون ناز）成立一周年之际，我们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驻华使馆文化处联合在昆明举办了主题为“中伊文化交流的影响”（تأثیرات متقابل فرهنگی ایران و چین）的“云南大学首届伊朗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The 1st 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Iranian Studies in Yunnan University/ نخستین همایش علمی بین المللی ایرانشناسی دانشگاه یون نا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驻华大使贾瓦德·曼苏尔博士（Dr.Javad Mansud）专门给会议发来贺信，文化参赞贾瓦德·阿高杰里博士（Dr.Javad Aghajari）、文化专员阿勒马西耶博士（Dr.M.

编者叙语

Rasoul Almasieh) 出席会议, 阿高杰里参赞在大会开幕式上作了热情洋溢的致辞, 云南大学校长吴松教授致欢迎辞, 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刘稚研究员主持了大会开幕式。共有来自伊朗马什哈德拉扎维研究中心 (Razawi Institute of Mashhad)、美国怀我明大学、中国北京、南京、银川、西安、重庆、厦门和昆明本地有关高校及社科研究机构的 40 余位伊朗研究专家学者出席会议, 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和人文学院世界史专业的师生旁听了专家们的研讨。本次会议会期共 3 天, 于 3 月 14 日上午在云南大学科学馆二楼国际报告厅开幕, 当天和次日进行了深入的专题研讨, 16 日组织与会的中外专家学者前往元代云南行省平章政事、祖籍波斯布哈拉的著名回回政治家赛典赤赡思丁后裔聚居的玉溪市通海县纳古镇考察参观, 受到当地领导和穆斯林群众的热情欢迎。本次国际学术会议的召开, 受到了中伊两国外交界、新闻界的高度重视, 云南电视台、昆明电视台等媒体, 伊朗通讯社、伊朗国家电视台等都及时报道了会议盛况。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本次会议共收到参会代表的 22 篇学术论文, 现由本中心汇编成册, 名为《中国伊朗学论集》第一辑, 在伊朗驻华使馆文化处的支持下, 交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以飨国内学术同道。文集共收录中伊两国参会代表的致辞、讲话和学术研究论文共 23 篇。内容极其丰富, 涉及了伊朗学的定义和研究范畴, 中国—伊朗关系史、丝绸之路与中伊文化交流史, 伊朗古代和近现代史, 中伊两国历史文化的共性比较, 伊朗的伊斯兰文化与政治, 在华的古代伊朗著名人物研究, 波斯语言文化在中国的影响, 古代波斯著名苏菲诗人思想研究, 美国、日本与伊朗的当代关系, 未来中伊关系发展前景的展望等, 是目前中国伊朗学研究的最新成果。本中心的四名硕士研究生李颖、蔡奕

中国伊朗学论集

文、胡婷、金杰在我的指导下，全面搜集汇编了近代以来中国伊朗学研究的分学科论著索引，分别按照波斯语教学与研究、文学、政治、文化、考古学、中国伊朗关系、经济、历史地理和宗教等九大类编排后附录在其中，旨在向中外伊朗学界系统展示中国学术界伊朗学研究的成果风貌。

今后，云南大学伊朗研究中心作为云南大学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驻华大使馆文化处联合共建的专门学术研究机构，我们将在本校开展中东研究的传统学术优势基础上，积极致力于推动中国学术界对中东重要国家伊朗的历史文化、现实问题和中伊友好关系史的全方位研究，共同推动新世纪不同文明之间的友好对话，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和谐事业。今后本中心还将继续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驻华使馆文化处长期合作，在国内外伊朗学界同行们的支持下，适时举办相关学术研讨会，继续编辑出版《中国伊朗学论集》的续辑，故诚盼国内外伊朗学界先进同仁，不吝赐教，宠锡鸿章，共襄斯举。

姚继德 博士

云南大学伊朗研究中心主任

2007年12月20日 于昆明素菲斋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驻华大使给会议的贺信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驻华大使

贾瓦德·曼苏尔 博士

2007年3月15日

尊敬的云南大学校长吴松阁下，
尊敬的云南大学伊朗研究中心主任姚继德阁下，
尊敬的各位先生女士：

今天的确是令人兴奋的一天，正值云南大学伊朗研究中心成立一周年之际，我们在此共同举办主题为“中国—伊朗文化交流的影响”的云南大学首届伊朗学国际学术研究会。在此我衷心感谢会务组对我的邀请，但由于与其他日程发生了冲突，我不能出席此次会议，在此表示歉意。希望在以后的机会里，能与大家欢聚一堂，听取各位专家学者关于加强伊中两国关系的意见和建议。

伊中两国同是文明古国，两国关系源远流长，两千年前伊中两个文明古国就通过海陆两条丝绸之路进行文化、科学和经济交流，伊中两国在思想、科技、伦理和社会各领域取得的丰硕成果为促进人类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两国在各领域的交流是积极的、卓越的。在历史的长河中，伊中两国在丝绸之路的文化、艺术和宗教交往中，互相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伊朗人起到了重要作用，功不可没。自伊斯兰进入中国的那一天，波斯语也来到了这个文明古国，在中国各地



中国伊朗学论丛

的清真寺都曾教授过波斯语。中国清代学者常志美编写的波斯语语法教程《求学之道》(Minhaj al-talb)，是在中国教授波斯语的第一部教材。这一点充分表明，在历史上中国穆斯林对学习波斯语的热忱。

在蒙古西侵时期，蒙古人虽然在军事上取得了胜利，但在文化上却被伊中文明征服。从表面上看蒙古人是胜利者，但文化领域却是失败者。在这一时期，伊中两国在文化、艺术和科技领域的交流和发展达到了顶峰。许多在医药、天文、建筑、石匠、香料等领域的波斯学者和专家来华，为促进中国的科学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两国艺术家在绘画、陶器工艺、细密画等领域相互之间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汲取了对方思想精华。波斯著名史诗家菲尔多西在自己的诗歌中多次赞美中国绘画艺术之优美。

一些著名波斯诗人，如萨迪的哲理与宗教思想传入中国后，对穆斯林的文化教育也产生了深远影响，萨迪的《果园》和《蔷薇园》数世纪以来一直是清真寺和穆斯林学校的必修课。云南、宁夏、甘肃、山东的济南等省份和城市的古老宗教建筑，以及这些地方穆斯林的日常用语和墓碑雕刻都具有浓厚的波斯色彩。在伊朗出土的文物中，也有许多是来自中国的艺术，如兰花、龙、凤凰等具有明显的中国艺术特色，这一切都体现了中两国文化交流之密切和广泛。在云南史上，祖籍波斯的赛典赤为云南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把云南发展成为当时最繁荣的省份之一，他的贡献也为加强伊中两国的关系产生了作用。

唐朝诗人李珣、元朝著名政治家赛典赤·赡思丁、中国伊斯兰教山东学派的创始人常志美等等，他们的祖籍都在波斯，是伊中两国文化交流与发展的历史见证。我们应当继承先辈的

优良传统，继续为促进伊中两个文明古国在各领域的发展做出自己就有的贡献，让先辈们为两国文明发展点燃的灯塔永放光芒。今天我们欢聚一堂，共同研讨伊中文化交流的影响，就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迈出的积极步伐。

今天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精神文明，更需要对安拉的虔诚信仰，宗教思想家、作家、艺术家和精英们应加强思想交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愿意为提高人类的宗教和文化水平，用天启价值来解决人类面临的诸多问题作出自己就有的努力。



中国伊朗学论丛

在云南大学首届伊朗学国际会议上的致词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驻华大使馆文化参赞

穆罕默德·贾瓦德·阿高杰里 博士

2007年3月15日

今天我很荣幸地参加这次学术会议，与各位专家、学者欢聚一堂。在此，我要对尊敬的云南大学校长吴松阁下、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刘稚教授、云南大学伊朗研究中心主任姚继德博士和其他有关负责人为召开这次学术会议作出的努力表示衷心的感谢！

各位来宾，今天是云南大学伊朗中心成立一周年，在成立中心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驻华使馆文化处与云南大学已经展开了高层次的合作。在此期间双方合作在云大召开了赛典赤国际学术研讨会议。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首届伊朗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把双方的合作关系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类似这样的合作和会议对促进云南大学与伊朗一些大学的关系发展将产生深远影响。

众所周知，伊朗和中国是亚洲两个文明古国，两国关系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自古以来，伊中两个文明古国的关系从未中断过。今天也如此，两国在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蒸蒸日上，这次学术研讨会的召开对加强伊中两国在文化科技等领域的关系发展，对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具有重大意义。

无疑，在历史的长河中促使伊中关系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是丝绸之路，因为伊中两国人民通过丝绸之路传递和平与友谊的信息。我们的祖先在丝绸之路上除了从事丝绸、药材等商品贸易外，还进行文化、艺术、思想的交流，对促进两国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波斯文化在中国占有一定的地位，这一点从中国人对波斯语和波斯文化的热爱程度可以看出。现在中国数所大学开设有波斯语教程。虽然时代在发展，思想在变化，但我们仍能在丝绸之路及周边城市看到波斯文化的足迹，这一点充分说明波斯语和波斯文化曾在中国兴盛过。在历史上，伊中两国关系早在安息王朝和萨珊王朝就交往密切，双方曾互派使节访问。中国曾把伊朗称作安息或波斯。

唐宋期间伊中关系发展迅速，这一时期是伊中文化发展的黄金时期，尤其到了元朝，两国文化交流达到了顶峰。一些波斯人在元朝担任国家重要职务，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波斯赛典赤曾来到云南，为云南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历史学家们认为，在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历史上，波斯人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当时来华的穆斯林大多从波斯湾希拉夫港经过海路来到中国，在波斯商人中有许多是诗人、文人骚客、艺术家，还有一些是政府使节、政治家，他们不仅把伊朗文化带到了中国，同时也将中国文化带回了伊朗，加深了两国人民之间的认识 and 了解。鉴于此，许多伊朗作家和诗人在自己的作品中都对古老的中国文化给予了高度赞扬。

伊中文化交流互相影响的话题太多了。毫无疑问，各位尊敬的专家学者将从不同角度对伊中两个文明古国在历史上相互产生的深远影响进行论述。我认为，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重要的是加强中国人民对当今伊朗的了解，在此领域伊中两国专家学者肩负着重要责任。我们有责任为两国互派老师和学生创造条件。与此同时，有责任向出席会议的专家学者提供第一



中国伊朗学论集.....

手资料，以便向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介绍真实的伊朗。第二手资料或多或少掺杂着个人的观点和倾向，采用这些资料很难了解真实的伊朗。我希望这次伊朗学学术研讨会能对进一步加深中国人民对伊朗的了解起到帮助性作用。

最后，我再次对校领导、会议有关负责人和从各地赶来出席会议的专家学者，表示衷心的感谢！谢谢大家！



在云南大学首届伊朗学 国际会议上的欢迎词

云南大学校长 吴 松

尊敬的阿高杰里参赞，尊敬的阿亚图拉霍拉桑尼教授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学者：

上午好！正值阳春三月，春暖花开，和风徐徐，鸟语花香之际，我校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驻华使馆文化处联合举办的“云南大学首届伊朗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今天在中国的春城昆明开幕了！在此，我谨代表云南大学，向伊朗驻华使馆文化参赞阿高杰里博士，向远道而来的伊朗拉扎维研究中心主任阿亚图拉霍拉桑尼教授，向国内各兄弟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向拨冗光临我们会议的各位领导表示衷心感谢！

云南大学具有 84 年的历史，是中国西部建立最早的综合性大学之一，始建于 1922 年 12 月。1937 年著名数学家熊庆来教授出任校长，云南大学迎来了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一批国际著名的学者如费孝通、楚图南等应邀到校执教，使学校逐步发展成为国内外影响较大的综合性大学。1946 年，英国《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把云南大学列为中国十五所世界著名大学之一，上世纪 80 年代《不列颠百科全书》修订本中仍然将云南大学列在中国著名大学行列。改革开放后，秉持着“会泽



中国伊朗学论丛

百家，致公天下”的精神，云南大学步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1996年，云南大学成为“九五”期间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的高校之一。目前，我校共有14个本科学院、7个研究院、3个公共教学部，研究生院、留学生院和职业与继续教育学院，有全日制在校本科学学生12742人，研究生7497人，各类成人教育学生19607人。有专职教学科研人员1475人，其中教授297人，副教授480人；65个本科专业涵盖文、史、哲、经、管、法、理、工8大学科门类；拥有民族学、生态学2个国家级重点学科和27个省级重点学科；有3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50个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4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和1个博士后企业工作站、151个硕士学位授权点和MPA、MBA、法律、工程等4个专业硕士授权点，成为了中国西部地区重要的人才培养基地。

我校历来秉持对外开放的办学方针，现与美国、加拿大、欧洲、澳洲、日本、东南亚和东亚等国家和地区的近百所大学和科研机构保持着长期的交流与合作关系。我校的国际关系研究院，其前身是1964年成立的东南亚研究所，是国内外知名的研究中东历史文化和国际关系的学术机构，经过几代著名学者专家40余年的不懈努力，我们在中东研究领域取得了国内公认的丰硕成果。为了适应中国对外开放的时代需要，2002年4月学校决定成立国际关系研究院，除继续保持东南亚和中东研究的优势外，还增设了东南亚研究所、伊朗研究中心、印度研究中心。从2001年开始，根据我校与伊朗德黑兰大学、菲尔多西大学和拉扎维大学共同签署的学术交流协议，互派了留学生和访问学者。2004年3月在我校成功召开了“首届赛典赤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截至目前，我校已有六名阿拉伯语专业的学生从伊朗菲尔多西大学毕业获得了硕士学位，德黑兰



大学接受了我校两名访问学者，一名阿拉伯语专业的青年教师正在德黑兰大学攻读硕士学位，菲尔多西大学历史系的一名青年教师下月即将前来我校国际关系研究院攻读世界史专业的博士学位。最可喜的是，在伊朗驻华使馆的倡议和帮助下，经中国政府有关部门批准，我校于 2005 年 3 月成立了云南大学伊朗研究中心，专门开展对伊朗历史文化和中—伊关系的全面研究，该中心是目前中国高校和科研院所开展伊朗研究的第三个重要机构。我们联合举办的本次伊朗学国际会议，正是我们双方积极开展中伊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合作项目。

各位专家学者，各位朋友，伊朗和中国都是世界上最为重要的文明古国，我们的文明历史都在 5000 年以上，都对人类社会的进步做出过独特的贡献。我们双方高瞻远瞩，能够在此举办探讨伊朗学与中伊文化交流的历史，对于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平等对话，推动和谐世界的构建，增进中伊两国人民在新世纪的传统友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此，我谨预祝大会取得圆满成功！祝各位专家学者在昆期间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谢谢大家！



中国伊朗学论集

伊朗与中国关系的发展

(伊朗)穆罕默德·瓦尔兹扎德·霍拉桑尼 撰

白志所 译^①

首先以一段圣训开始。先知穆罕默德（求主赐福他及其后裔）说：“你们当求知，即使远在中国。”这段圣训虽然在著名的圣训集中找不到出处，但在穆斯林中间广为流传，家喻户晓。此外，这段圣训符合穆圣重视知识、鼓励求知的精神。这段圣训向我们传达了以下信息：

① 著名学者赛义德·希伯·丁·沙赫勒斯塔尼在他的著作中写道：许多学者认为，“远到中国求知”的圣训，“求知”肯定不是寻求宗教知识，因为穆斯林已经信仰伊斯兰教，没有必要寻求其他宗教。穆圣要求穆斯林不远万里到中国求知，肯定是学习中国的科技知识。众所周知，造纸术是中国人发明的，后由穆斯林把这一技术带到了伊斯兰国家，并传到欧洲。

② 这段圣训说明在穆圣时期阿拉伯人对中国有所了解，关于中国的传说已经在阿拉伯半岛广泛流传。

③ 圣训说明，在阿拉伯人眼里，中国是距他们最遥远的地方，否则穆圣不会用“即使远在中国”来强调求知的重要性。

① 作者系伊朗一位著名宗教学者，曾任马什哈德市阿斯坦·古都斯拉扎维伊斯兰研究基金会发行的《灯》杂志主编，现任该基金会董事长。译者毕业于伊朗德黑兰大学哲学系获硕士学位，现供职于伊朗驻华使馆文化处。

④ 这段圣训包含最重要的一点，是对求知的重视和鼓励。穆圣是凭借知识和智慧把伊斯兰教传播开的，对知识给予了高度重视。关于重视知识的圣训和《古兰经》经文如汗牛充栋。穆圣教导我们，知识（无论是宗教知识还是社会科学知识）是人类接近安拉，是社会进步发展的工具，所以在求知的道路上要不畏险阻，不怕困难，即使是徒步到遥远的中国亦当求知。

⑤ 在这段圣训的鼓励下，穆斯林从未放弃对求知的热忱，在历史上许多学子背井离乡，踏上了求知的征途，也正是这种执著的求知热情，使阿拉伯人摆脱了愚昧和落后，创造了辉煌的文明。

⑥ 波斯著名诗人阿塔尔在《百鸟朝凤》一书中受这段圣训的启迪，关于中国吟诵了一段优美的诗歌：

凤凰啊！神奇怪异，
一天夜里张开双翼，
飞过中国的天际，
一根羽毛落在这片土地，
各国喧嚣嫉妒，
谁得到那根羽毛，就变成天才，
谁看见那根羽毛，满手手艺，
那根羽毛被珍藏在中国的画廊里，
“求知不怕远在中国”源于此。

我的中国缘

我对中国，尤其对中国穆斯林有着深厚的情感。50年前，我读到一本书，书名是《当代伊斯兰》，作者是美国人，欧扎



中国伊朗学 论集

智·努瓦赫兹把这本书译成阿拉伯语，黎巴嫩著名学者埃米尔·沙克布·阿尔斯兰对该书作了注释，该书着重介绍了伊斯兰各国的历史、发展状况及穆斯林在世界各国的分布，其中提到了安德鲁斯、塞浦路斯、意大利、阿尔及利亚、俄罗斯、印度次大陆、阿富汗、非洲，尤其提到了中国穆斯林的状况。我是从这本书中了解到中国穆斯林的。该书由买哈麦德·穆哈泽布译成波斯语，改名为《当代伊斯兰世界与穆斯林现状》。

该书第 143~242 页专门介绍了中国的伊斯兰教，其中一部分是著者阿尔斯兰在埃及开罗从一个中国代表团那里了解到的，有的是他从阿拉伯报纸杂志上读到的。这篇文章简单介绍了伊斯兰传入中国的历史、中国穆斯林著名学者及人口分布状况。

我对伊斯兰在世界各国的发展以及穆斯林的分布状况有着浓厚的兴趣。当我从这本书中读到介绍中国伊斯兰的状况时，心情非常激动。从那时起我就希望到中国，对中国的伊斯兰进行深入研究和了解。1979 年，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后，马什哈德阿斯坦古都斯拉扎维成立了伊斯兰研究基金会，对伊斯兰各领域展开广泛深入的研究。我曾担任数个研究部的主任，曾任《灯塔》（Mishka）杂志的主编。在工作中我特别重视中国伊斯兰教的发展。一方面大量收集相关资料，另一方面邀请有关专家学者著书、写作，撰写文章。短短几年内，我负责的《灯塔》杂志关于中国的伊斯兰教先后发表 10 余篇文章，刊登在《灯塔》杂志第 12 期至 81 期，作者大多为该基金会地理研究组专家。另外，还出版了两部书籍。这些文章和书籍对我本人，对伊朗人民了解中国的伊斯兰教起到了重要作用。

阿斯坦古都斯拉扎维伊斯兰研究基金会出版的两本书是：拉法伊勒·伊兹拉伊利著的《中国穆斯林——两种文化的对峙》，哈桑·特基扎德·图斯译，1989 年出版。《伊斯兰教之传

《灯塔》杂志刊登关于中国伊斯兰教文章一览表

序号	篇 名	著 / 译者	期刊号
1	《伊斯兰教在中国》	艾哈麦德·菲达伊	1 21、3
2	《中国穆斯林名著》	艾哈麦德·菲达伊	2 62、7
3	《伊斯兰教在中国传播状况》	艾哈麦德·菲达伊	3 9
4	《中国穆斯林风俗》	艾哈麦德·菲达伊	4 2
5	《赛典赤·赡思丁——一位对中国边疆建设有巨大贡献的穆斯林》	叶哈雅·林松著,穆罕默德·阿里·侯赛尼译	4 5
6	《中国伊斯兰研究》	努什拉尼·古尔德尼译	4 9
7	《中国回族》	马吉德·兰巴尼译	5 3
8	《中国穆斯林对中国文明的贡献》	白寿彝著,侯赛尼译	5 45、5
9	《北京穆斯林》	王建平著,伊朗驻华使馆文化处译	8 1

入中国及其发展》，列扎·穆拉扎德著，2003 年出版。

总之，关于中国穆斯林状况的波斯语文章和书籍如凤毛麟角，这也是伊朗人对中国了解甚少的原因之一。笔者在这里罗列这几篇文章和书籍，是想说明，伊朗人民和学者迫切希望了解中国人民，尤其是希望了解中国穆斯林的状况，现有的介绍中国的波斯书籍远远满足不了读者的需求。

下面作者根据现有的资料谈谈伊中两国的历史关系发展，以及波斯文化对中国穆斯林的影响。

首先，伊朗和中国是两个文明古国，两国关系源远流长，可追溯到公元前，陆地和海上丝绸之路是连接伊中两国的桥梁和纽带。陆地丝绸之路东起中国长安经过伊朗延伸至欧洲国家。海上丝绸之路则把波斯湾的希拉夫港和中国南海沿岸连接在一起。波斯和阿拉伯商人以及其他民族的商人多少个世纪以来，就是通过这两条丝绸之路与中国进行贸易和文化交流的。

《中国史》一书的作者在前言中写道：“数千年以来，伊

中国伊朗学论集

朗和中国的关系源远流长，可以大胆地说，至少有 2200 年以上的历史。伊朗的发展受中国的影响很深。”该书作者就公元前 200 年修建万里长城，防御蒙古的侵略写道：“中国修建万里长城改变了伊朗的命运，长城修建后，伊朗不断遭受外来侵略。”

其次是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关于伊斯兰教传入中国有许多说法。其中一种说法可以追溯到先知穆罕默德为圣之前，这显然是不正确的。最可信的一种说法是：第三任哈里法欧斯曼曾派代表到中国传播伊斯兰，并谒见中国皇帝。

虽然这一说法只能在中国的文献中找到，在伊斯兰国家的文献中没有任何依据，但与事实并不相悖。因为据历史记载，先知穆罕默德曾派特使向波斯、罗马帝国国王和埃及以及一些阿拉伯部落首领送去号召他们皈依伊斯兰教的信函。所以在哈里发时期，随着伊斯兰版图的扩大，穆斯林征服了波斯、沙姆和非洲的埃及等一些罗马帝国的殖民地，哈里发极有可能效仿穆圣，向中国和其他国家派遣使节，宣扬伊斯兰教。此外，穆斯林认为，伊斯兰是世界性宗教，穆斯林有责任把伊斯兰的召唤送到世界各个角落。

在伊斯兰文献中，关于伊斯兰进入中国最早的记载是伊本·艾希尔的《通史》。该书第三卷 36 页关于伊历 21 年发生的事件谈到了伊朗国王叶兹德吉尔德逃跑到木鹿城，寻求中国皇帝支援的事件。书中写道：

当叶兹德吉尔德和突厥国王逃到吉汗河时，派往中国的特使回来报告说：中国皇帝问我：“请你描述一下那些把你们逐出家园的人们情况，你们兵力强大，为何被比你们少数倍的人击败呢？这里肯定有原

因，我想大概是他们是些善良的人，是为了正义，而你们肯定腐败堕落，才落到如此地步。”我对皇帝说：“请陛下问，我一定如实回答。”皇帝问我：“他们信守诺言吗？”我说：“是的，他们信守诺言。”皇帝又问我：“在开战前，他们对你们说了什么？”我说：“他们提出三个条件要求我们选择其中一个。其一、要求我们信仰他们的宗教，如果我们接受，就把我们当作他们的兄弟对待。二、如果不接受他们的信仰，可以交纳人丁税，他们承诺保护我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三、如果前面两个条件都不接受，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战争。”皇帝又问：“他们的士兵服从将领吗？”我说：“在天下没有比他们更服从将领的士兵了。”皇帝问：“他们把哪些断为合法，又把哪些断为非法？”我如实告诉了他。皇帝问：“他们是否颠倒黑白，把合法的断为非法的，把非法的断为合法的？”我回答说：“没有。”皇帝听完这话对我说：“你描述这些人是常胜军，只要他们不颠倒黑白，不把合法与非法的混为一谈，这个民族就是常胜的民族。”

皇帝又问我他们的穿着，我如实告诉了他。又问他们骑什么马？我说，他们骑的是阿拉伯马，我还告诉他，他们除骑马外，还骑骆驼，上驼和下驼时，骆驼都会用前腿跪在地上。

最后中国皇帝给叶兹德基尔德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国君相救，理固然矣。然朕自贵大使之口得闻亚拉伯族为何等人。其风俗习惯，其信仰宗教，其首领之品格，皆甚详尽。人民如斯之忠信，首领如斯之才能，焉有不胜之理乎？尔其慎修德谨行，以博彼等

中国伊朗学论集

之欢也。”

从波斯国王特使与中国皇帝的对话可以看出，当时伊斯兰军队非常强大，就连中国皇帝也看出了伊斯兰教迅速传播的必然性。另一方面也说明，这是伊斯兰教首次传入中国，而且是波斯人把伊斯兰教的信息带入中国的。

三、在伊斯兰教传入波斯后，许多历史事件促使伊斯兰教逐渐进入中国。比如，711~714年古太白·本·穆斯林的大军曾抵达喀什。756年，中国皇帝向阿拔斯王朝哈里发曼苏尔借兵。871年，阿拉伯旅游家伊本·瓦哈卜来到广州，很长一段时间内，大量波斯人与阿拉伯人到中国经商等等。伊斯兰教在中国发展最迅速的时期是明朝，由于成吉思汗不信任中国人，便在军队中大量重用波斯人，并委于重任，这些波斯兵来华后，定居了下来，并在中国结婚，组建家庭，生儿育女，最终成为中国的一分子。

元朝（1367~1377年）是伊斯兰教在中国发展的顶峰，而到了满清政府（1644~1911年），中国伊斯兰教每况愈下，对中国穆斯林来说，这是一个悲痛时期。

四、波斯——伊斯兰文化对中国伊斯兰教的影响。这一点主要体现于至今仍在穆斯林中间沿用的波斯用语，如：“阿訇”、“吾师托”等，以及中国伊斯兰经堂教育采用的阿、波并重的教学等各个方面。尤其在经堂教育中，学生在掌握阿拉伯语的同时，还必须学习波斯语，所学习的课本也是阿语和波斯语，各占一半。如《白伊扎维》经注为阿拉伯语，《侯赛尼》经注则是波斯语。在教法方面，波斯语教材主要有三部：《四篇要道》、《穆希玛特》和《教法精选》。

五、中国穆斯林人口。许多专家学者对此分歧颇大，据

《伊斯兰新世界》一书介绍，学者们对中国穆斯林人口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有的说中国穆斯林人口有 2000 万，有的说 2500 万，有的说 3000 万，有的说 4000 万，还有 6000 万的说法。

介绍中国伊斯兰状况最全面的波斯语书籍要数穆拉扎德所著的《伊斯兰教之传入中国及其发展》。据该书介绍，中国有 56 个民族，其中有 10 个民族信仰伊斯兰教，人口 2000 多万。而有的书籍甚至认为中国穆斯林有 1.08 亿，所以在这里我希望中国穆斯林专家学者提供一个穆斯林人口的确切数字，供其他国家的学者们研究。

六、“圣裔”。关于中国穆斯林，我要谈的另一个问题是圣裔。《伊斯兰新世纪》第二卷第 146 页介绍，到中国最早的圣裔是伊本·赫姆泽。这一说法在其他伊斯兰典籍中没有记载，只有麦斯欧迪在《历代史记》中提到伊本·赫姆泽，但并不详细。

在中国最著名的圣裔应该是赛典赤·赡思丁。他是布哈拉人，随成吉思汗大军来到中国。由于他忠诚能干，功德显著，得到元朝皇帝重用。晚年被元朝廷派到云南，担任平章政事，对云南的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受到各族人民的尊敬。

赛典赤于 1279 年病逝，云南百姓为之“巷哭”。赛典赤的子孙后代继任，世守云南，并被封为滇阳侯。1368 年至 1399 年期间，明朝一位皇帝封赛典赤为咸阳王，并下令为赛典赤著书立传，在各学校教授。1405 年，另一部关于赛典赤的书籍付梓问世。

列扎·穆拉扎德在《伊斯兰教之传入中国及其发展》一书中关于赛典赤写道：“赛典赤·赡思丁 1211 年生于布哈拉，其父为麦加人。家谱专家认为，赛典赤系先知穆罕默德的第 31 世孙，其祖辈可追溯到雅哈亚·本·宰德·本·阿里·本·侯赛因，其祖父是贾法尔，是先知的第 23 世孙。”



中国伊朗学 论集

这里有一个问题值得商榷：赛典赤出生于伊历 7 世纪，与先知相隔最多 14 代。现在是伊历 15 世纪，与先知相隔约 35 代，所以赛典赤是先知第 31 世孙的说法明显有误。

最后，我希望赛典赤后裔到布哈拉去认真研究赛典赤的家谱，以确定赛典赤的家世。

阿亚图拉穆罕默德·瓦尔兹扎德·霍拉桑尼简介

阿亚图拉穆罕默德·瓦尔兹扎德·霍拉桑尼 (M o - h a m m a d V a e z z a d e h K h o r a s a n i 1925 ~) 是位学者，1925 年生于霍拉桑省会马什哈德的一位宗教世家。他在学完初级课程后，进入马什哈德宗教学府学习伊斯兰教知识，随后到伊拉克纳贾夫学习，毕业后回到故乡马什哈德。1949 年进入库姆宗教学府，师从大阿亚图拉布鲁杰迪、侯杰提和伊玛目霍梅尼等学者。他受到了当时的宗教领袖大阿亚图拉布鲁杰迪的重视，被委任从事一些学术性研究。1961 年，促进穆斯林团结的先驱大阿亚图拉布鲁杰迪去世，瓦尔兹扎德回到家乡马什哈德，并在马什哈德菲尔多西大学神学院教授圣训学、《古兰经》学等伊斯兰各科知识，一直到现在。他自幼受家学熏陶，后来在求学时又受大阿亚图拉布鲁杰迪的影响，特别重视伊斯兰各学派间的团结。1990 年伊朗伊斯兰革命领袖大阿亚图拉哈梅内伊任命他为伊斯兰学派世界亲近大会秘书长，从事伊斯兰学派团结的工作，直到 2001 年辞職在任职期间对促进伊斯兰世界学派间的团结作出了巨大贡献，曾先后举办数届伊斯兰团结大会，其中包括中国穆斯林代表在内的世界各国穆斯林代表出席了会

议，对促进伊斯兰教团结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此外，他还举办了纪念大阿亚图拉布鲁杰迪暨埃及艾资哈尔大学校长谢赫马哈穆德·舍勒图特研讨会，并再版了埃及伊斯兰学派亲近会出版的《伊斯兰论文集》、整理出版了《团结之声》、《团结的召唤》、《团结的佳音》、《伊斯兰教的团结》、《大阿亚图拉布鲁杰迪生平传》等数部颇具影响的书籍。

瓦尔兹扎德在担任伊斯兰学派世界亲近大会秘书期间，曾接受库姆宗教研究中心出版发行的《七层天》杂志的专访，全面论述了伊斯兰学派间加强团结的重要性，并提出了新的观点，对促进穆斯林之间的团结具有重要意义。这次对话引起了各界学者的不同凡响。

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后，瓦尔兹扎德一直与马什哈德市阿斯坦·古都斯拉扎维伊斯兰研究基金会保持着联系，向该基金会提供了许多学术性文章，并担任该基金会发行的《灯塔》杂志主编长达20年之久。截至目前，《灯塔》杂志已出版发行80期，叶哈雅·林松教授的《赛典赤·赡思丁——一位对中国边疆建设有巨大贡献的穆斯林》一文被译为波斯语后于1994年《灯塔》第45期上发表，这篇文章打开了现代伊朗学者认识赛典赤的大门。

瓦尔兹扎德现任马什哈德市阿斯坦·古都斯拉扎维伊斯兰研究基金会董事长，兼任该基金会《古兰经》研究组组长，现在他正在与数名学者联合编纂《古兰经大百科全书》。



中国伊朗学论集

伊朗学的由来及其研究范围

姚继德^①

伊朗学：东方学中的显学

“伊朗学”这一概念，最初是由西方人提出的，隶属在西人所谓的东方学（Orientalism）或研究东西交通史的学者们提出的欧亚学（Eurasian Studies）学科麾下。至于是西方的哪国的哪位学者率先提出的这一概念，我们目前已难细细深究。我们只知道东方学诞生在公元 14 世纪时的西方^②，主要包括亚述学、埃及学、伊朗学、犹太学、伊斯兰学、印度学（梵学）、佛学、汉学、藏学、蒙古学、突厥学、敦煌学等与亚非两大洲国家人民的文明历史有关的诸门分支学科。它可分为古典东方学（14 世纪~18 世纪末之前）、现代东方学（18 世纪末~“二战”结束）和当代东方学（1945 年至今）的三个时期。

那么何谓“东方学”呢？根据学术界截至目前的研究，在

① 作者系云南大学伊朗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伊朗德黑兰大学高级访问学者（2004~2005），本次国际学术会议组委会秘书长。

② 见美国学者爱德华·W·萨义德著，王宇根译《东方学》，第 61~62 页。在基督教西方，东方学的正式出现被认为是从 1312 年维也纳基督教公会决定巴黎、牛津、波洛尼亚、阿维农和萨拉曼卡等大学设立‘阿拉伯语、希腊语、希伯来语和古叙利亚语’系列教席开始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年 5 月版。

欧美的大百科辞书中，对诞生于西方的这门带有鲜明的前殖民主义色彩的学科一直没有给出权威的定义，我们可以查到的有以下三种：（一）前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编辑出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中的释义是：“东方学是历史上形成的、研究东方的历史、经济、语言、文学、艺术，以及物质和精神文化的古文物的各种学科的总称。”^①中国《辞海》中的释义是：“（东方学是）研究东方（亚洲、东北非洲）各国语言文字、社会历史、艺术、宗教以及其他物质、精神文化诸学科的总称。”^②（二）20世纪90年代沙特阿拉伯编辑出版的《全球大百科全书》中的释义则是：“（东方学是）外国学者特别是作家从事的关于东方文明尤其是伊斯兰和穆斯林的历史、信仰、教律、文化和文明等各个方面的学术研究。”^③

在上述的三种定义中，前两种基本一致，而后一种则强调了东方学的近东地域及伊斯兰各民族的特色，但都属于东方学的古典或传统的定义。然而在当代的西方学术界，东方学实际上已经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最具代表性的观点，莫过于美国文化学者爱德华·W·萨义德（Edward W.Said, 1935~2003）的看法。他在其《东方学》一书中认为，今天的东方学实际上包含了三大范畴：“一种学术研究学科，一种思维方式，一种权力话语方式。”且“带有早期西方殖民主义强烈而专横的政治色彩。”^④欧亚学则是近年来中国学术界提出的一门新的专门研究欧亚两洲各种文明之间交往融合关系的综合性交叉学科，其核

① 参见《苏联百科全书》“东方学”词条，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页。

② 参见《辞海》1979年版缩印本第48页“东方学”条，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

③ 转引自朱威烈《打破欧美“东方学”的霸权话语体系构建中国“东方学”》，载《文汇报》2002年11月4日。

④ 前引萨义德著作《东方学》，第3页。

中国伊朗学论集

心范畴与上述西方学术界传统的“东方学”较为接近，但又偏重在内陆欧亚地区，即由东部的汉文化圈，西部的东地中海文化圈（包括古巴比伦、古希腊、古罗马、拜占庭和以阿拉伯、波斯为代表的穆斯林文化），南部的印度文化圈和北部的突厥—蒙古文化圈所环绕而成的这一广袤的文化区域。该区域的文化形态兼具了游牧部族和农耕定居文明，涉及了汉文、古波斯文铭文、希腊文和拉丁文、亚美尼亚文、梵文和巴利文的佛教文献、中古伊朗语文以及阿拉伯穆斯林的诸多文献。^①

由于古老的波斯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伊朗学”一直是传统东方学中与汉学（Sinology）并驾齐驱的显学之一。伊朗学在英文中最初写作 Iranian Studies，但近年来伊朗的学者和西方的伊朗学家们开始在西文中普遍地使用 Iranology 一词，凡是从事这门学科研究的专家学者都可被称作 Iranologist（伊朗学家）。

伊朗学的研究范围

“伊朗学”是古典东方学中的一门古老而深奥的学问，它的研究范围也经历了一个由粗到细，由简渐繁的漫长历程。对于其研究范围，各国的学者们至今仍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此命题进行着热烈的讨论。比如在笔者曾经应邀参加的 2004 年 12 月 21 日举办的德黑兰第二届伊朗学国际研讨会开幕式上，素以学者著称的伊朗前总统赛义德·穆罕默德·哈塔米博士（Dr. Sayyed Mohammad Khatami）在致词中就指出：

伊朗学是一门研究伊朗这方土地上的文明、文化

①刘迎胜：《开展内陆欧亚学的研究——〈欧亚学刊〉发刊词》，刊《欧亚学刊》第一辑，1998 年 7 月出版，转引自 <http://www.eurasianhistory.com/da>

和历史诸领域的科学。……伊朗学实际上是学问的一门新的分支学科，它应当成为我们去研究和解释伊朗文明与文化的一种新颖的批判方法。伊朗学是一门‘科学的学科’，它已经超越了古代民族设定的模式，也远离了政治、殖民主义和西方式的种族原则。……在东方学和古典伊朗学中，东方和伊朗都是研究的对象，不是对话的伙伴。……伊朗学包含了文化的各个领域：艺术、社会、经济、政治、历史，以及多科性的科学。……伊朗学是一个综合而多维的概念，是一种有效的能够满足回答上述所有问题需要的理论方法。^①

其实早在 2002 年 6 月于德黑兰举办的伊朗首届伊朗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哈塔米总统在开幕式上也曾强调指出：“我们不能在今天的伊朗地理边界内来限制伊朗的文明，我们不能把它与伊朗的历史进程分隔开来。”“我强调要关注‘地理学上的伊朗’、‘历史学上的伊朗’和‘语言学上的伊朗’。伊朗学的研究需要使用‘多学科’、‘多国家’和‘多种学术’的理论方法。”不仅如此，在两次国际伊朗学大会上，哈塔米总统都十分鼓励伊朗的伊朗学家们要与世界各地的同人们进行广泛而密切的学术接触与交流。^②哈塔米博士在此已把伊朗学的时间和空间维度导向了世界，而非固守在单纯的地理学、历史学和语言学意义上的现今伊朗境内。哈塔米总统的这种开放心态，一方面是作为世界上一个文明大国领导人的博大胸襟的展

① 伊朗前总统哈塔米博士 (Dr. Sayyed Mohammad Khatami) 2004 年在德黑兰举行的第二届伊朗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致词，此据其致词的英文稿译出。

② 参见拙译《文明对话与伊朗学：哈塔米总统在第二届伊朗学国际会议开幕式上的致辞》，未刊稿。

中国伊朗学论集

现，另一方面则代表伊朗政府高层对新世纪世界范围内持续勃兴的新一波伊朗学研究高潮作出的积极回应。

事实上，自从古典的伊朗学在西方诞生以来，西方和伊朗的绝大多数伊朗学家们的研究重点，始终集中在古代波斯的语言、宗教、历史、文学、艺术、医药、天文、历法等几大领域里，这几大领域成为了伊朗学门下魅力永驻的核心范畴。就语言来看，上古时代的波斯帝国主要使用楔形字母的古波斯语（含阿维斯塔语 Avestan language），中古时代则使用帕拉维语（Pahlavi），公元 651 年萨珊王朝（Sasanian Dynasty）的最末一个政权被阿拉伯穆斯林军队征服后，波斯彻底伊斯兰化，开始使用阿拉伯文字母拼写的达里波斯语（Dari Persian）。韵律优美、语法较诸阿拉伯语简明、特别适合于诗歌创作使用的达里波斯语一直使用到了今天，成为伊朗法尔西等 13 个主要民族的共同国语。从宗教类别而言，波斯是西南亚地区诞生宗教最多的国度，如在前伊斯兰教时期，波斯本土诞生过琐罗亚斯德教（在中国文献中又叫做祆教、拜火教和明教，Zoroastrianism）、摩尼教（Manicheism），其影响甚巨，流传区达到了西亚、中亚、南亚大陆和东亚的中国。这两种宗教在上述区域传播过程中所遗留下来的各种古老文字抄书的经卷、壁画、摩岩画和寺院建筑，构成了东方学宝库中瑰丽璀璨的部分。不仅如此，古代的波斯还包容过许多宗教。如从印度大陆传入的佛教（Buddhism），从古代巴勒斯坦地区传入的犹太教（Judaism），罗马拜占庭时期传入的基督教（主要是基督教的聂斯脱里教派 Nestorian，唐时的中国文献称为景教），波斯萨珊王朝被阿拉伯穆斯林征服后皈依的伊斯兰教（Islam），尤其是在波斯境内繁荣兴盛起来的伊斯兰苏菲教团和思想，不仅丰富了伊斯兰教的思想宝库，而且使得伊斯兰教在西亚、中亚、南亚、北非和远

东地区的传播，如虎添翼。采用阿拉伯文字母拼写的达里波斯语，也成为了继闪含语系的阿拉伯语之外，将伊斯兰教向外传播的第二大语言，在伊斯兰教传播史上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因此，伊朗学家们甚至认为，探讨伊朗的宗教可以作为开启伊朗文明的一把锁钥。^①至于波斯帝国的历史，则是人类上古时代与希腊—罗马、印度、中国几大文明并驾齐驱的一大主支。居鲁士（Cyrus, B.C.600~B.C.529）、大流士（Darius, B.C.522~B.C.486）波斯诸大帝的威名远播遐迩，妇孺尽知，帝国文明的辉煌至今仍保存在设拉子（Shiraz）城郊的帝国故都波斯波利斯皇宫（Perspolis Palace）遗址高大巍峨的石柱、断垣和众多浮雕群像之中。它们既是历史学家们前仆后继进行考索的对象，更是考古学家们孜孜探求的瑰宝。波斯的诗歌在世界文学史上成为脍炙人口的绝唱，波斯的苏菲诗人则灿若星汉，永远驻留在世界文坛的广袤天空。还有波斯的天文历法，波斯的医学，波斯的细密画艺术，波斯的雕塑艺术，波斯风格的伊斯兰建筑艺术，波斯的造船和航海技术，波斯的音乐和舞蹈，波斯古老的金银钱币、琉璃，以及饮誉世界的波斯地毯织造工艺等等，可以说自从伊朗学诞生之日起，就一直是吸引历代伊朗学家们为之殚精竭虑、鞠躬尽瘁、竞相折腰，乃至至于奉献毕生的崇高事业。

但从古典东方学的角度来看，传统意义上的伊朗学，主要是指研究古代的波斯帝国（含现今的伊朗）历朝历代的政治、经济、语言、文学、宗教、历史、天文、历法、地理、数学、医药、考古、博物、音乐、舞蹈、建筑、纺织工艺、艺术、钱币、人种、民族、婚姻、家庭、农业、交通等所有文化领域的各类分支学科。今天我们在谈及伊朗学的研究范围时，许多学

① 参见伊朗学者哈桑赞德 Ol as san Z 《伊朗学自由》一文，收叶奕良主编《伊朗学在中国》（第二集），第14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中国伊朗学论集

者往往又增加了伊朗与其他国家的外交、政治、经济关系等国际关系的新内容，因此，我们今天所说的伊朗学，实际上是一门既继承传统的（或古典的）东方学下的古老学科，又跨越了自亘古至当代的时空维度，包含了所有与古代波斯文明和当代伊朗内政外交的综合性大学科。

伊朗学与文明对话的关系

当代伊朗学的再度兴起，既有着伊朗学自身经久不衰的传统魅力的历史惯性，更有冷战结束以来急速变化着的深刻的国际和中东政治文化的特殊时代背景。这种背景的一个最大特点，主要集中在国际关系领域出现的“文明冲突论”（Clash between Civilizations）与“文明对话论”（Dialogue between Civilizations）之间的对垒上。“文明冲突论”的始作俑者，是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者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他在美国出版的1993年夏季号《外交事务》杂志（Foreign Affairs, Summer, 1993）上发表了题为《文明的冲突》的文章，站在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上，以夸大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性的手法，推导出了文明之间的差异性必然导致并将主导未来的国际关系的理论假设，并试图作为他用以描绘冷战结束以后主宰不同国家、地区和民族宗教之间关系的最高圭臬。亨氏的“文明冲突论”出台伊始，立即遭到了全球自然和社会科学界的强烈批评。在批评的浪潮中，出现了许多富有理性的思考。“文明对话论”便是其中的最强音。它的倡导者，就是来自文明古国波斯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前总统赛义德·穆罕默德·哈塔米阁下。他于1998年出席联合国成员国首脑会议时，代表伊朗政府和人民在会议上提出了希望联合国把2001年确定为世界“文明对话年”的特别建议，赢得了与各国首脑和全世界舆论

的高度赞誉。该年度的联合国首脑会议欣然接受了伊朗的这项倡议，从此以后，“文明对话”的呼声逐渐压过了“文明冲突”谬论。在“文明对话论”的促动下，伊朗政府的内政和外交都进行了重大的调整。其中重振伊朗学的文化振兴战略，成为了实施这项战略调整的一个重要步骤。伊朗政府对伊朗学给予了特别的支持，就在哈塔米总统在联合国提出“文明对话”倡议的当年，在他的直接领导下成立了一个专门的伊朗学基金会（Foundation of Iranology）。该基金会由政府财政拨款，日常的工作则由前副总统哈比比博士（Dr.Habibi）主持。伊朗学基金会成立后，组织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学术研究工作。^①然而正当“文明冲突论”四面楚歌之际，2001年9月发生了震惊世界的9·11恐怖袭击事件。事件的发生本身与“文明冲突”无关，但却在美国新霸权主义的借题发挥和话语霸权支配下，仍然在短时间内给世人造成一种了“文明冲突”的假象。随着9·11事件的发生引发了国际学术界新一轮中东研究的热潮。由于伊朗在当前中东事务中举足轻重的特殊地位，使得伊朗学的研究广受世人关注。前述由伊朗政府于2002年6月和2004年12月在德黑兰举办的两次伊朗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规模空前，参会的国家多达30余个，学者专家达千余人。因此，在当前全球掀起的“文明对话”的热潮中，伊朗作为世界文明古国和“文明对话”的首倡国，伊朗学研究当代复兴和伊朗学国际学术会议的不断召开，必将有利于和谐世界的构建，有利于中东和平进程的推进，必将在世界范围内产生重要影响。

① 参见伊朗驻华使馆文化处2002年编印《哈塔米的思想及伊中关系的回顾》。

中国伊朗学论集

结 语

从上述对伊朗学由来及其研究范畴的回顾性评析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几点简短结论：（一）伊朗学是东方学和欧亚学门下一门共同的古老而深奥的学问，它包含了从古至今诞生在伊朗大地上的所有文明形态，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既富有理论性的探讨，充满着诗情画意，又颇具重大现实意义的多学科交叉并举的魅力无限的学问。（二）积极推动并不断开拓伊朗学研究的新领域，既是新世纪人类各大文明间开展平等对话的明显标志，也是构建和谐世界的必然要求，它必将通过世人对伊朗文明个案的研究、认识、理解和系统展示，来理性地看待地球村里他者的文明和文化，矫正单极、霸权和新帝国主义带给新世纪的狂躁和极端。我想，这应当成为我们开展新一轮伊朗学研究时，所有伊朗学研究者首先必须明了于心的神圣初衷。

2007年3月13日于昆明素菲斋

丝绸之路与中国—伊朗的文化交流

姚继德

众所周知，中国和伊朗都是亚洲古老的文明古国，两国人民不仅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过重要的贡献，而且还是世界范围内的两个伟大国家。伊朗位于亚洲大陆的西南部，自古以来都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枢纽要冲，国土面积 164.5 万平方公里，现有人口 7200 余万。有波斯、阿塞拜疆、库尔德、洛尔、阿夫肖尔、肖塞旺、巴赫蒂亚里、俾路支、吉拉克、嘎希高亦、阿拉伯、土耳其（阿扎利人）、土库曼等 13 种主要民族，主体民族为波斯人，占伊朗总人口的 66%，官方语言为波斯语，地方民族语言有库尔德语、土耳其语和阿拉伯语等。98.8% 以上的居民信奉伊斯兰教，伊斯兰教是国教，其中什叶派信徒占总人口的 91%。

伊朗在古代中国史书中被称为“安息国”，是一个具有 5 千年以上历史的文明古国。它的文明记载，文献中可考的纪年开始于铜器时代的公元前 5 世纪，相当于中国史前时期的夏代之前。伊朗这一名称，词源学上来源于其先民雅利安人的“雅利安”（Aryan）一词。公元前 6 世纪时，居住在今日伊朗法尔斯省的波斯人建立了自己的王朝——阿契美尼德王朝（Achemenid，公元前 550~公元前 330），这个王朝在公元前 640



中国伊朗学论集

年时出现了一位伟大的皇帝居鲁士 (Cyrus)，他开始向外扩张，最终建立了后来被中外史学家们所津津乐道的波斯帝国。波斯帝国共经历了阿契美尼德王朝、塞琉古王朝 (Seleucid，公元前 324~公元前 248)、帕提亚王朝 (Parthian，公元 248~公元 226)、萨珊王朝 (Sasanids，公元 226~公元 651) 等四大时期，历史横跨公元前 640 年到公元 651 年的一千余年，然后被阿拉伯人征服并彻底伊斯兰化，进入阿拉伯伊斯兰帝国的版图，之后又曾先后被突厥人和蒙古人征服过。由于古代的波斯帝国及其文明在世界历史上的影响深远巨大，所以伊朗在 1935 年前，一直叫做波斯，之后才改称今天的伊朗。伊朗一词在古代波斯语中是“光明”的意思，如果我们将它与古代波斯帝国灿烂的文明历史联系起来理解的话，伊朗的国名就蕴涵着“充满文明之光的国度”之义。

从人种学上来说，伊朗主体民族波斯人的祖先属于古代的雅利安人，他们与今天的欧洲白种人同属于印欧语系 (Indo-European) 的雅利安人种。由于伊朗位于亚洲东西部文化交流的中枢地区，同时又是世界两大文明——波斯文明和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的中心，因此中伊两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发生较早，而这种交往主要通过闻名于世的丝绸之路进行。在中国与伊朗 2500 多年的友好关系史上，著名的丝绸之路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因此，在讨论中伊友谊和友好交往历史前，我们必须首先要了解著名的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 (The silk road) 是人类历史上沟通东亚中国与南亚、西亚、非洲和欧洲大陆的主要交通动脉，公元 1877 年由德国地理学家和考古学家李希赫芬 (F.Von Richthofen,

1877~1921) 首先提出了这一命名^①。李希赫芬之所以选择使用“丝绸”一词来称呼它，纯粹是因为丝绸是在这条通道上流通最广泛和最主要的商品，并且具有某种比喻和象征的意味。其中的“丝绸”一词，已经不是中外商业史上流通商品“丝绸”(Silk) 的狭义概念，而是一个文化象征符号 (Cultural symbol)。它的使用很符合华夏文化中我们的祖先以象形和会意两种主要方法创制情趣盎然的方块汉字的思维方式，这就是德国学者李希赫芬提出这一概念后，能够很快在中国和世界流行的主要原因。自从丝绸之路开通以来，丝绸之路上流通的不仅仅是丝绸、瓷器、香药、茶叶等主要中外商品，还传播着波斯的祆教 (又称拜火教、琐罗亚斯德教 Deyn-e-Zartoshti) 和摩尼教 (Deyn-e-Mānavi)、印度佛教 (Buddhism)、大秦 (罗马帝国) 景教 (基督教涅斯托里派 Nestorian)、阿拉伯半岛上的伊斯兰教，还发生着古代各大帝国之间的战争，发生着西方殖民主义对东方的掠夺和殖民统治，以及伴随着这一切而发生的印刷术、造纸术、火药、指南针等中国四大文明的西传，泰西文明的东渐。为使朋友们对丝绸之路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在此，谨将个人对丝绸之路的定义、功能、路线结构、形成时间、使用的交通工具以及它在当今世界历史学中的学科地位等问题的几点思考，与大家做一简短交流。

首先，我们可以对丝绸之路作这么一个简明扼要的定义：丝绸之路是历史上沟通中国与外国的一个商贸文化交流和民族

① “丝绸之路”的概念系李希赫芬在1877年出版的《China: Ergebnisse Reisen und Entdeckungsreisen in Persien, 5 vols, Berlin, 1877》一书中率先提出。Hermann von Richthofen, Die alten Seidenstrassen China und Syrien, Beiträge zur alten Geographie Asien, 1877, 而被全世界学术界广泛使用至今。

中国伊朗学论集

迁徙的交通网络，其本质是一个交通网络（communication network）。丝绸之路至少有四大功能——中外商业贸易的通道，中外文化交流的通道（我们也可以称之为文明对话之路），中外外交通使的通道，古代各民族迁徙交融的走廊。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丝绸之路由如下四大互相衔接的网络组成——陆地网络两个：西北网络（连通北京、洛阳、开封、长安—河西走廊—新疆—中亚—西亚—欧洲各区域的网络）；西南网络（由蜀身毒道、交趾道、茶马道等组成，连通缅甸、老挝、越南、泰国、印度等东南亚中南半岛和南亚国家，中国南方的广西、广东、贵州、四川、云南、西藏、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尼泊尔、中亚、西亚各区域的网络）；陆海相连的东北亚网络（连接中国东北—黄海—渤海—朝鲜半岛—日本—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网络）；海洋网络（联接中国东南沿海各大港埠—北部湾—南中国海—南洋群岛—印度洋—波斯湾—阿拉伯—东非—北非—欧洲的网络）。这四大交通网络既各自成为独立的循环圈，但又如同首尾相接的四大链环，东、西、南、北、中，纵横交错，将整个东亚大陆（中国）与域外各个历史时期的世界紧密联系起来。其中的西亚波斯和阿拉伯地区，是从中国出发的丝绸之路的这四大网络的交汇中枢，丝绸之路由此向南进入北非地区，向西渡过今天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海峡进入欧罗巴（欧洲）大陆，把世界东部的亚洲与西部的欧洲、南部的非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还应该指出的是，丝绸之路的经济文化交流和民族迁徙不是单向的，而是一个双向的循环。

丝绸之路的形成时间至少开始于中国的先秦（即公元前 4 世纪）、两汉时期，其下限可至于明代（公元 16 世纪）。因为自明代以后，各条丝绸之路的干线基本固定，仅只有个别支线时兴时废而已。一般说来，陆路的形成早于海路，因为远洋海

船的制造和海上的远航需要稍后的指南针等科技的支持。值得注意的是，当前中国政府对中国西部 12 个省区正在实施的现代化开发建设，即西部大开发工程，以及在进入 21 世纪后的全球化进程背景下，中国与中亚、西亚、东南亚、南亚各国间联合兴建的欧亚铁路、公路等洲际国际交通干线的走向，基本上都是遵循着这四大网络的基本干道展开的。这是丝绸之路在全球化时代的复兴工程，是人类在新世纪重建古老的丝绸之路，焕发其青春活力，服务于丝路沿线国家和人民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举措。

古代丝绸之路上使用的交通工具可定为四类——马帮（如波斯湾—中亚经印度—缅甸进入中国西南部的西南网络）、骆驼（如中亚至中国西部的西北网络）和舟车（如由波斯湾—阿拉伯海经印度洋和东南亚至南中国海的海上丝路，以及从中国华北、东北地区前往俄罗斯远东、朝鲜半岛和琉球日本的东北亚网络）。

当前在世界范围内对丝绸之路的研究正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掀起高潮，它必将成为继甲骨学、瓷器学、敦煌学、蒙古学、藏学、红学（国际汉学界对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研究的简称）、龙学（世界汉学界对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著名文艺理论名著《文心雕龙》研究的简称）之后，国际汉学或东方学研究中的又一门独立的显学——丝路学。

总之，丝绸之路是历史上沟通中国与域外的一个庞大的商贸文化交流和民族迁徙交融的水陆交通网络，具有古代中外商业贸易、文化交流、外交通使和民族迁徙交融通道的四大功能。它由首尾相衔而又各自相对独立的四大海陆交通网络交织而成，使用的交通工具有马帮、骆驼、海舶和车辆，流通的主要商品是丝绸、瓷器（中国产）、香药（波斯、阿拉伯产）和

中国伊朗学论集

茶叶（中国产），形成的时间至少始于先秦（公元 4 世纪）两汉，而迄于明代（公元 16 世纪）。由于上古时期造船技术的局限，陆路的开通要早于海路的使用。丝绸之路曾经是世界古代主要文明之间成功实现和平友好对话的主要通道，因此我们今天开展丝绸之路的学术研究，可以以史为鉴，为新世纪人类不同文明之间的平等对话提供足够的历史智慧。

丝绸之路为中伊友谊架起了交流的桥梁。据中国史书的记载，公元前 2 世纪的中国西汉武帝时，张骞派其副使访问安息（即波斯），安息王令两万骑兵迎候，礼仪极为隆重。东汉末年，安息王的太子、佛教高僧安世高也曾携带梵文佛典来到汉地（中国）的长安、洛阳等地访问，并在中国生活了多年，学会了汉语，指导和帮助中国学者翻译印度的梵文佛经，为佛教后来在中国的迅速传播作出过重要贡献。在中国的南北朝时期，波斯派使节到中国北魏王朝友好访问达十多次。随着双方友好往来，汉文化传至西域（Central and Western Asia），西域文化东传中国，中国、伊朗等国的“丝绸之路”也全面畅通，为两国的经济及文化交流开辟了新的纪元。中国的丝绸、瓷器以及打井、炼铁、制漆、缣丝等工艺源源不断地传入伊朗等西亚国家，伊朗的物产如蚕豆、苜蓿、葡萄、胡桃、石榴等也源源不断地传入中国。到了唐代，两国官方和民间的友好往来进入了鼎盛时期。公元 651 年，波斯遭到阿拉伯人的外来入侵，波斯帝国萨珊王朝的最后一任国王伊嗣俟三世逃亡到大唐帝国请求支援，唐高宗李治册封他为都督后，欲派兵护送他回波斯复国，但尚未及启程回国，波斯国王就病殁长安。其子尼涅斯谋策复国未成，于唐中宗景龙年间返华，也客死于长安。当时，尼涅斯率领数千波斯人来到中国，其中有些人还在唐朝当上了将军、外交官、天文学家、医学家和学者。到了中国的宋

朝时期，由于西域一带频繁发生的战乱，陆上的丝绸之路几度中断。这时造船业开始发达，中国的罗盘针相继在航海中广泛使用，促进了世界航海技术的发展，许多波斯穆斯林商人经由海路来到中国广州、扬州和泉州等地经商，有的还在那里安家落户，当时的中国官方文书称他们作“蕃人”、“蕃商”或“胡蕃”，他们成为了今天中国回族穆斯林的先民之一。这条海上国际大通道，就是后来学术界誉称的海上丝绸之路或海上香料之路 (The Maritime Route)。据记载，中国发行钞票的方法在元朝传到了波斯，后来，波斯钞票上的图案还保留了中国汉字。元朝时，两国的史学家们还合编过闻名于世的史书《史集》 (Jāmi' al-Tawārikh)。波斯等国的西域音乐、舞蹈、诗歌在中国著名的都市西安、杭州、北京、扬州、泉州、广州等十分盛行。到了明代时，明成祖朱棣和波斯的沙哈鲁王子曾先后互派 300 人和 500 人的大型代表团互访；中国著名的回族穆斯林航海家、外交家郑和率领中国远洋船队七下西洋访问亚非各国时，其中就有 3 次访问了波斯湾的忽鲁谟斯国，忽鲁谟斯就是今天伊朗南部波斯湾最东端的霍尔木兹甘省 (Hormozgūn)，它的首府在波斯湾东端著名的国际贸易大港阿巴斯港 (波斯语叫做 Bandr 'Abbas)。当时，随同郑和访问的费信曾写纪行诗句描写当地的风俗及特产。公元 1516 年，波斯旅行家阿里·阿克巴尔撰写的《中国纪行》一书，后来，成为中、伊友好交往的珍贵史料和重要见证。据考证，多年来，两国植物的传播和移植就达几十种。波斯的祆教 (拜火教或琐罗亚斯德教 Zoroastrianism) 和摩尼教 (Manichaeism) 还曾经在中国西北地区流行过。

中国与伊朗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和文化交流历史至少已有 2500 余年。到了现代时期的 1920 年，当时的“中华民国”政

中国伊朗学论集

府根据国际惯例与伊朗政府正式签署了领事协定，两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1933年伊朗在上海设立领事馆，但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两国关系被迫处于停滞状态。1965年伊朗政府拒绝在封锁制裁新中国的问题上与美国合作，充分体现了伊朗政府和人民对中伊传统友谊的珍视。1971年8月16日，中伊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建交后的33年间，中伊两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得到了稳步发展。1985年以来，双方高层互访不断，两国政府在人权对话、反对霸权主义等许多重大国际政治问题上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建立了高度的政治互信。伊方领导人中先后有现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斯兰革命最高领袖阿亚图拉·哈梅内伊阁下，现任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暨前任总统哈希米·拉夫桑贾尼阁下，前任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霍贾特·伊斯兰·卡鲁比阁下等主要领导人都访问过中国，而前任总统穆罕默德·哈塔米阁下则于1999年11月和2000年6月两度访问中国。中国领导人先后有杨尚昆、江泽民、胡锦涛、万里、李鹏、乔石、李岚清、吴仪等访问过伊朗。两国高层的频繁互访，为新时期的中伊友谊奠定了坚实基础。毫无疑问，伊朗作为中东地区最有影响的大国，历来都是中国对外交往中的一个重要国家。目前两国在反对霸权主义，倡导并积极推动东西方文明对话，开展石油与天然气能源的开发利用方面，开展了密切的合作，特别是2004年10月，中伊双方签署了价值高达1000亿美元，时间长达25年的石油和天然气开发协议后，伊朗已经成为今后25年中向中国提供石油与天然气能源的主要中东国家。伊朗为中国提供的这批石油和天然气，对中国当前和今后25年中的现代化建设而言，至关重要，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伊朗上古历史发展特点刍议

黄民兴^①

伊朗是古代中东一个重要的国家，在政治和文化发展方面具有代表性，在国际关系领域扮演着关键角色。概而言之，伊朗上古历史的发展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伊朗地处西亚的地理边缘，是西亚与东亚、中亚和南亚沟通的桥梁。

伊朗（和阿富汗）地处西亚的东部边缘，其西边是经济发达的两河流域、列万持、埃及、小亚和欧洲，东边同样是经济发达的中国、印度和中亚，北面则是游牧民族分布的欧亚大草原。因此，伊朗作为农耕世界的一部分，是维系东西方农耕世界贸易和文化交往的重要通道。具体而言，这种桥梁作用反映在丝绸之路的贸易上，丝绸之路的三条商道经过伊朗，即北方的丝绸之路，从内沙布尔、雷伊、大不里士等城市通往君士坦丁堡、中欧和北欧；中间的一条经雷伊通往地中海东岸和非洲；南方的一条是经由波斯湾到达地中海东岸的海路。^②以上路线中，北方和中间的均属于陆上丝路的主干线“绿洲丝路”，

① 作者系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所长兼伊朗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

② 王新中、冀开运著《中东国家通史·伊朗卷》，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8页。

中国伊朗学 论集

南边的属于“海上丝路”。

丝绸之路在伊朗的东西两端均呈现分叉，在西边经两河流域抵达叙利亚，从此北联小亚、希腊，南接埃及，南北以大叙利亚为连接点形成一个口朝西的“Y”字型。^①在东边的分叉点是阿富汗，通往中亚、东亚和南亚，构成另一个口朝东的“Y”字型。东西两个“Y”字型加上中间的伊朗构成一个哑铃型，这个“金哑铃”反映出在欧亚非大陆的世界主要文明中心的分布和交往路线，成为文明创新和交往的大动脉。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将大叙利亚和包括阿富汗在内的中亚列为欧亚两大对世界宗教（三大一神教和大乘佛教）的产生发挥过重大作用的“交通环岛区”，^②而这两个拥有东西方“文化混合体”的地区恰好位于伊朗的东西两端。

当然，在伊朗之北的欧亚大草原另有一条与“绿洲丝路”平行、连接中国和小亚的“草原丝路”，主要的经营者是游牧民族。而伊朗也与北方（尤其是近邻的高加索、里海地区）的各游牧民族和部落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形成一种微妙的互动。

第二，伊朗的文明兴起早而发展晚。

在中东，伊朗是文明最早萌芽的地区之一。伊朗旧石器时代中期的遗址有贝希斯敦等，他说其中的莫斯特文化以石片工艺为主要特征，而伊朗的贝希斯敦人、伊拉克的沙尼达尔人以及巴勒斯坦的斯胡尔人都属于尼安德特类型的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以巴拉多斯特遗址的石叶文化为代表。

① 黄民兴《论中东上古文明交往的阶段和特征》，刊《西北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② [英] 汤因比著，刘北成、郭小凌译《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69~371页。

伊朗的新石器时代始于公元前 8000 年，主要分为三个文化群：西伊朗中部克尔曼沙赫文化群、西北部雷扎耶潮文化群和西南部的胡齐斯坦文化群，其中西部的中段和南段是伊朗农耕、畜牧和制陶业最早出现的地区。著名遗址有甘吉达雷（公元前 7500~公元前 6600 年），该遗址被认为是西亚最早驯化山羊的地方和最早出现制陶术的地方之一。

公元前 6 千纪中期，伊朗一些地区进入了铜石并用时代（公元前 5500~公元前 3500 年），如希阿尔克遗址和雅亚遗址。在这一时期，伊朗的农耕聚落数量迅速增加，形成了一些中心聚落。到公元前 3500~公元前 2500 年，伊朗高原进入了早期青铜器时代，出现了早期城市文明和原始象形文字，重要的原始城市包括苏萨、希阿尔克、雅亚和班布尔。然而，从全新世晚期（距今 4500 年前）起，伊朗大部分地区逐渐变成了干旱的亚热带沙漠气候，早期城市文明的发展由此受阻，加上土地资源的不足、地力耗竭和城市内部的不稳定，最终导致了人口和文化中心向大河平原转移，许多早期城市面积急剧缩小，文明陷于停滞。^①

相比之下，在自然条件优越的相邻的两河流域和东北非的埃及，当地的农业革命完成之后，较为迅速地向文明演进，进入早期国家，成为中东的两大文明中心。尤其是两河流域，它成为西亚的政治中心，其文化影响辐射到西亚的广大地区，包括邻近的伊朗埃兰地区，这里发展出了伊朗最早的国家。正是在两河流域的影响下，埃兰产生了自己的楔形文字，其官职、人名和神名也多借自两河流域，并有类似于两河的塔庙式建筑。

^① 参见 4 2 页注②，第一章。

第三，伊朗的帝国历史具有跳跃性，它最早建立了地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大帝国。

埃兰是伊朗古代最早的强国，位于两河流域地区的苏萨平原，埃兰人的语言接近古达罗毗荼语。^①它参与了西亚列强的争霸斗争，但不具有明显的优势，直到米底、尤其是波斯的崛起为止。与埃兰不同，米底人和波斯人是来自欧亚大草原的印欧语系民族，它们对伊朗此后的历史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公元前 2000 年前期，雅利安人从欧亚大草原进入伊朗，包括米底人、波斯人、西梅利亚人和西徐亚人。实际上，伊朗人即雅利安人的异译，伊朗意即雅利安人的国家。^②在伊朗的雅利安社会此后逐渐进入铁器时代，其社会政治制度演变为首邦制。米底人和波斯人既受伊朗西部原有居民文化的影响，也与两河流域的亚述有贸易交往和文化交往，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加快。例如，埃兰人帮助波斯人创制了古波斯楔形文字、司法和历法。

米底和波斯最初依附于乌拉尔图、马纳、亚述和埃兰等国。公元前 7 世纪，米底王国建立，它成为伊朗的第一个帝国，曾与新巴比伦联手灭了亚述。米底的建国加速了古代伊朗境内各民族及其文化的融合过程，但它立国时间并不长。

公元前 700 年，波斯人首领阿契美尼斯建立了波斯王国（阿契美尼德王朝），这是一个令世界感到震惊的国家。公元前 559 年，居鲁士二世（公元前 559~公元前 530 年）成为波斯国王，并于公元前 550 年消灭米底。在仅仅 10 余年中，这位居

① 刘文鹏主编《古代西亚北非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98 页。

② И. М. 季亚可诺夫《世界古代史》，第 1 卷，第 331 页引自刘文鹏前引书，第 402 页。

鲁士大帝就征服了两河流域和小亚，粉碎了吕底亚、新巴比伦和埃及的联军，一举奠定了波斯帝国的基础。其子冈比西斯占领了叙利亚、埃及全境。此后，大流士又御驾亲征，到公元前513年先后征服了印度河流域、中亚、爱琴海诸岛、马其顿和色雷斯，讨伐了黑海北岸的西徐亚人。至此，大流士时代的波斯人建立了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地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大帝国，其疆域西北达巴尔干半岛的多瑙河，西南到非洲的尼罗河，东北自锡尔河以南，东南至印度河流域，面积约500万平方公里，生活着众多的民族。西方学者将这个稳定的庞大帝国称为 Pax Achaemenica（“阿契美尼德和平”）^①或 Pax Persia（“波斯和平”，二者相对于 Pax Romanum，即“罗马和平”^②，日本学者谢世辉则称之为“大帝国”。^③

波斯帝国是在铁器时代建立起来的帝国，它的崛起速度是惊人的。而其所建立的中央集权体制也备受称道，学界认为它已形成了“一整套的维系和管理帝国的比较成熟的制度”，^④如行省制度、赋税制度、铸币制度、驿道、邮政和烽火制度、军事制度、情报体系、宗教政策、对被征服地区的政策等。这种中央集权继承于亚述，并对后来中东各帝国的政治体制产生了

① “ThePersiaInstitute”<http://i/rsesthi.stanford.edu/Conferences/hoefer.pdf>.

② “EastWest.Thefirstencounter:A differentinterpretation”
<http://www.iranian.com/Books/2006/September/Eas>

③ 指下列“安定的、版图广大”的帝国：波斯帝国、印度的孔雀王朝、中国的秦、汉帝国以及罗马帝国等，其重要维持原因之一是拥有全国性的交通网。见谢世辉：《世界历史的变革——向欧洲中心论挑战》，蒋立峰译，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页。

④ 吴于廑、刘家和主编《世界史·古代史编》（上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92页。

中国伊朗学论集

影响，如塞琉古帝国和帕提亚帝国。^①

第四，上古的伊朗诸帝国拥有强大的综合国力，它们与西面的欧洲帝国持续对抗，奠定了中东上古后期东西方对峙的大格局。

在希腊化帝国之后，在波斯相继出现的各帝国（帕提亚和萨珊）均拥有雄厚的国力，足以与西面的罗马帝国（早期的罗马帝国和后期的拜占庭帝国）相对抗，从而维持了本地区的均势。

帕提亚（公元前 247~公元 226 年，中国古称安息）国家由帕奈人建立，全盛时其领土包括了东起印度河、西至幼发拉底河、北迄亚美尼亚和阿姆河的辽阔地域。帕提亚军队原由骑兵组成，进入波斯后采纳塞琉古军队的战术，实行雇佣军制，设立了轻装步兵、重装步兵和骑兵。但在与罗马军队交战后，又根据波斯军队的模式进行了改革，组建了由骑马射手和重装骑兵组成的骑兵部队和步兵，装备了锋利的驼骨箭。改革后的帕提亚军队具有强大的突破力和防守能力。在与罗马人的战斗中，帕提亚军队以少胜多，屡战屡胜，显示了赫赫威力。

公元前 2 世纪，罗马势力开始进入小亚细亚，并逐步侵占列万特地区，兵锋所向直指亚美尼亚。公元前 53 年，帕提亚军队在卡雷大败罗马军队，杀死罗马前三头之一的克拉苏，4 万罗马军队几乎全军覆灭。据传帕提亚王曾以黄金塞满克拉苏的口腔，嘲笑道：“遂汝所欲！”公元前 36 年，帕提亚再次大

① 黄民兴《关于上古中东帝国的几个问题》，刊《西北大学学报》2000 年第 4 期。至于国外学者有关波斯帝国的新观点，见 Dmitry V. Sh *East Against the West: The First Encounter: The Life of Themistocles*, translated from the Russian by Ludmila Prednaya, Publish America, 2005.

败罗马后三头之一的安敦尼。帕提亚的胜利使所向无敌的罗马帝国受到遏制，其势力始终被限制在底格里斯河以西。

萨珊帝国时期，曾与罗马帝国之间爆发了九次战争，主要争夺亚美尼亚及地中海和黑海商路，双方互有胜负。公元 259 年，萨珊军队攻占安条克，俘罗马皇帝瓦勒里安，占领小亚细亚的卡帕多细亚。

伊朗人与罗马人对西亚的主导和争夺对于本地区的国际关系和社会、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五，伊朗与伊拉克历史非同寻常的密切关系，与此相联系的是伊朗东西部不同的发展道路。

伊朗在社会发展上可以分为东西两个部分。其西部受到两河流域的强烈影响，发展较快，而东部与中亚的联系密切，发展相对迟缓。

在雅利安人进入伊朗以后，到达伊朗东部的是阿维斯陀语雅利安人（南伊朗人）。当时东伊朗原住民的文化已经衰落，文明逐渐萎缩，表现为公元前 2000 年即已开始的许多著名的古代居民点（甚至城市）数量减少、规模缩小和技术衰退。因而东伊朗的雅利安部落受当地的土著文化影响较小，与周围的外部文化交往（如印度）也较少，从而更多地保存和发展了纯正的雅利安文化。同时，上述状况也使东部的雅利安人长期处于酋邦阶段，未能像西部那样建立起强大的王国。然而，东部雅利安人在宗教领域取得了重大成就，即从传统雅利安多神宗教中发展出了祆教，公元前 7 世纪以后，祆教在西部伊朗也得到传播，成为体现米底人和波斯人文化特色与民族认同的宗教。^①事实上，在伊朗的东方，阿富汗也是祆教早期活动的重要地区，而

① 王新中、冀开运前引书，第 47 页，55 ~ 58 页。

中国伊朗学论集

且是琐罗亚斯德可能的诞生地之一，当地盛行祆教甚至早于伊朗西部。^①

在西面，两河流域的历史早于波斯，前者很早即与埃兰和米底有着密切的来往，而这一时期伊拉克一直是西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在波斯帝国兴起后，伊拉克开始成为波斯国家的组成部分，在波斯帝国、帕提亚和萨珊帝国（某种程度上包括马其顿人建立的塞琉古帝国）时期均是如此。而且颇有趣味的是，伊拉克在这一时期仍然保持其西亚政治中心之一的地位（尽管不是权力中心），因为巴比伦及其邻近的塞琉西亚、泰西封一直是这些帝国的首都之一或唯一的首都。因此，以往向波斯输出文化的伊拉克开始接受波斯文化，而在谈论伊拉克时，人们多半将其视为波斯的一部分。在阿拔斯王朝以后的伊斯兰时代仍然如此，从白益王朝、塞尔柱王朝、白羊王朝到黑羊王朝，伊拉克与波斯重新处于一个政权的统治下，只是这次首都不再位于伊拉克境内了。直到被奥斯曼征服为止，伊拉克才永远脱离了伊朗的版图。

第六，上古伊朗拥有发达而独特的宗教，对中东和地中海宗教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为融会了土著文化的雅利安文化，古代伊朗拥有发达而独特的文化，这尤其体现在其民族宗教——祆教以及其他二元神教上。

有趣的是，波斯及长期处于波斯政治统治和文化熏染下的



① 先知的诞生地有西部说和东部（包括阿富汗西部）说，元文琪认为东部更为合理，而河中也有可能。参见元文琪著《二元神论——古波斯宗教神话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7~101页；晏真著、《祆教史》，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0页。

伊拉克成为世界最知名的二元神教的大本营，如祆教、诺斯替教、摩尼教。更有趣的是，从地理上看，波斯和伊拉克恰好处于中东（此时一神教犹太教已经在巴勒斯坦兴起）的东端，邻近以多神教为特征、与波斯同属雅利安人的印度。这一现象值得探讨。^①

就祆教而言，其在许多方面都不同于中东传统宗教：（1）主张善恶二元论。善神阿胡拉·马兹达代表光明、正义、男性，恶神阿里曼代表黑暗、邪恶、女性。但也有人提出“佐而文”的观念，认为它是永恒的时间和命运之神，是善恶二神之父。（2）强调个人的主观能动性。祆教提出命运决定人的物质状况，而行为决定人的精神状况；在善恶之争中，人有自由选择的意志，能协助善神取得胜利。（3）反对偶像崇拜。在火庙中没有偶像。（4）主张灵魂转世和末日审判。在祆教教义中，人死后将接受审判，善者进天堂，恶者入地狱，但在末日降临时他们均须通过最后审判，无论善恶灵魂均可复活，进入光明王国。不过，复活不需要肉体，因为创世者无所不能。（5）主张千年王国。祆教认为，善与恶斗争的历程即世界创造和劫灭的过程，分为四个阶段，每个阶段为一千年。第一阶段为静止阶段；第二阶段为善神马兹达创造物质世界的时期；第三阶段为马兹达战胜恶魔、琐罗亚斯德诞生的时期；第四阶段，琐罗亚斯德指定儿子为救世主，后者指引人类进入“光明、公正和真理”的王国。（6）具有精英主义和等级主义的倾向。祆教提出了一套仪式，高度重视洁净，类似观念的传播促进了社会的分化。教义也重视秩序、稳定、合法性和和谐，火庙根据种性而划分为三类，分别供祭司、贵族和农民使用。

① 黄民兴《试析上古中东宗教发展的特点》，刊《晋都学刊》2006年第3期。

同时，祆教中也存在一元论倾向，如有关“佐而文”的观念，以及认为人类最终将要进入“光明、正义和真理的王国”的观点，它实质上可说是一种神学上的一元论。波斯也因此成为中东一神教的发源地之一，其主张的神创论、世界末日、最后审判、救世主和千年王国等思想，以及某些礼仪和习俗（如波斯的米特拉教仪式中包括了使用面包和酒，而米特拉的诞辰也是12月25日），这些都给孕育中的基督教——中东第一种世界宗教提供了养料。

根据多数学者的看法，祆教产生于公元前1000年以前。在此后东西方文明融合的希腊化时期，在波斯和两河流域产生了其他二元神教（诺斯替教、摩尼教），它们也与祆教有多方面的类似，而诺斯替教也对基督教的起源产生了影响。

随着基督教的兴起，中东政治格局的东西对立也反映在文化上，即基督教世界的罗马帝国和祆教及其他东方宗教影响下的伊朗。罗马人在统一了基督教信条以后，对非正统的基督教派进行压制，包括中东受到地方文化影响的教派如叙利亚的景教。萨珊帝国对祆教的坚持，其实意味着中东传统文化对以基督教为代表的希腊文化的抗拒（尽管基督教大量吸取了中东宗教的内容）。^①但与罗马不同，正式奉祆教为国教的萨珊帝国早期曾对基督教会进行镇压，但它逐渐开始承认宗教社团的自治，也接收了一些非正统的基督教派如景教。在伊拉克，帝国以宗教容忍换取其他宗教信徒的纳税和政治支持，这一政策为后来的阿拉伯帝国所继承。西方学者莫罗尼（M.G.Morony）指出：“这种多社团的存在对伊斯兰社会的形成至关重要，它成

① 黄民兴《从希腊化时期的西亚北非历史看文明对话》，刊《中东研究》2006年第2期。

为区分穆斯林社会与希腊化社会最重要的方面。”^①

第七，上古伊朗的社会政治带有浓厚的氏族社会特点。

这可能与伊朗邻近游牧世界并受其影响有关，像进入伊朗的雅利安人、帕奈人等均为游牧民族，他们在伊朗建立了自己的王朝和统治。上述影响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

① 社会习俗中存在浓厚的母系社会遗风。这在埃兰、波斯帝国、帕提亚和萨珊帝国时期均有表现。埃兰实行母系继承原则，财产继承不分性别，社会内部通行兄妹结婚。近亲通婚的习俗在以后的伊朗社会中仍然存在，如帕提亚国王可与同胞姐妹结婚。^②祆教认可这种习俗，它主张男子可与姐妹、女儿、甚至母亲结婚。

② 王位继承制有兄终弟及的情况，且继承一事在很大程度上由教俗贵族决定。这是政治制度上母系氏族制残余的表现。例如，帕提亚国王的王位一般为世袭，但有时也实行兄终弟及之制，且贵族委员会和智者及麻葛（祆教祭司）可参与决定王位人选。

③ 传统贵族在国家事务中始终发挥重大作用。一般而言，早期国家受氏族社会影响较大，因而传统的氏族贵族、宗教贵族位高权重，而随着中央集权的发展，新兴的军事贵族和行政官僚在帝国政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但在上古伊朗，尽管波斯帝国时期中央集权有很大的发展，但历朝历代传统贵族的地位都十分显赫，对王权构成明显制约（这与同为印欧民族的赫梯十分接近）。

早在米底国家中，国内各部落之间、部落贵族与王权之间

① M. G. Morony, *Iraq after Muslim's Conquest*, Prin.

② 黄民兴著《中东国家通史·伊拉克卷》，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56页。

中国伊朗学 论 集

的矛盾就极为尖锐。到波斯帝国时期，王权依然受到贵族的限制。如与大流士一起参与政变的六大贵族最初曾享有种种特权，可以参与讨论军国大事，出任国王顾问，获得大量封地和免税特权，并随时拜见国王。当然大流士随后也对他们的特权进行了种种限制。^①

在帕提亚社会中，贵族地位显赫，据传国内有七大贵族（这可能只是根据波斯帝国情况的附会），有据可查的著名贵族有苏伦、凯伦、古依、米赫兰四家，主要分布在波斯本土。他们均拥有自己的军队、宫廷和嫔妃。中小贵族也拥有相当的实力。同时，军队主要由贵族在战时征召，来源于农民和奴隶，一些大贵族甚至拥有 1 万甲士。但是，依赖贵族征兵不能保证军队的忠诚和长期作战的需要，因此帝国后期重新采用了募兵制。

在萨珊帝国，国王在理论上是“诸王之王”和“神的苗裔”，实际上仍受制于教俗贵族。御前会议的权力仅次于国王，其成员由王室成员、高级祭司和大贵族代表组成，他们有权选择王位继承人或从形式上确认国王指定的继承人，有几位国王在位仅四五年即被废黜。而萨珊骑兵也由贵族组成。此外，祆教祭司掌握了司法大权，同样对王权形成制约。这种局面直到胡斯洛（531~579 年）改革后方开始改变。

第八，伊朗在伊斯兰时代的早期创造了独特的伊斯兰化模式。

上古时代结束后，伊朗进入了伊斯兰时代，成为穆斯林社会。我们可以把西亚北非和中亚、南亚地区的伊斯兰化概括为

^①Amelie ~~Amelie~~ *Ancient History of the Near East, C.3000-330BC*, London and New York, 1995, p.687.

两种模式，即“新月地带模式”和“波斯模式”。

“新月地带模式”涉及两河流域、大叙利亚和北非地区，其主要特点是较为彻底的阿拉伯化。在这些地区，大批阿拉伯移民迁入，与土著居民融合，其结果是当地人口逐渐阿拉伯化，主体人口最终成为阿拉伯人，使用阿拉伯语，包括基督教徒在内。

波斯及其以西的中亚、南亚（以及巴尔干、热带非洲、东南亚及其他地区）走上了另一条道路，即“波斯模式”。在这里，尽管也存在阿拉伯移民和土著居民的伊斯兰化，但后者并未阿拉伯化，仍保持民族的主体性和原有的民族语言，只是采纳了阿拉伯字母和一些词汇（中国的回族甚至采纳了汉族的方块字）。非但如此，大批波斯人进入国家机关和军队，阿拉伯帝国的行政机构、行省划分、货币、税收、贵族服饰等均出现波斯化倾向，波斯语成为财政簿记的用语之一。波斯人还以自己的民族文化影响阿拉伯人，此即“舒欧比”运动。在运动中，不少波斯知识分子大力翻译波斯古籍，宣扬波斯的礼仪、典章、思想文化，主张穆斯林各民族平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正是在波斯和其他民族的宗教和文化的影响下，阿拔斯王朝不再是一个阿拉伯帝国，而发展成为真正的伊斯兰帝国，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成为融合了阿拉伯、拜占庭、波斯、中亚、印度及其他文化在内的所有穆斯林民族的共同文化和财富。

总之，上古伊朗的历史具有鲜明的特色，它为伊朗以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略论中国与伊朗历史文化的共性

冀开运^①

中国是东亚的文明古国，伊朗是西亚的文明古国。两国在地区地缘政治中的战略地位几乎完全相同。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侯赛因·尼扎姆曾说：“伊朗是中东的中国。正如同远东没有中国便没有政治意义，中东没有伊朗便不会在世界政治中发挥重要作用。”^②在遥远的古代，中伊两个文明强国通过丝绸之路在文化上相互欣赏、相互影响。^③在近代，中伊两国都沦为半殖民地。在现代，中伊两国的现代化具有很多共性。这两位亚洲巨人在历史、文化、民族性格具有很多相同、相似的东西。这就是伊朗人民和中国人民如此友好，如此容易理解，

① 作者系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博士，德黑兰大学高级访问学者（2004~2005），主要从事伊朗历史与国际关系研究。

② Hossein Nasr and Great Britain in Iran, p. 6, Tehran, Iran, 1975.

③ 学术史回顾：学术界对中伊友好交往及相互影响的研究相当深入、细致，法籍伊朗裔历史学家阿里·冯扎海里在《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耿升译，中华书局1993年版）中认为中国文化和伊朗文化之间具有选择性的相似性。余建华在《当代中伊关系与伊朗对华政策动因》（见《西亚非洲》1998年第4期）中指出，中伊在近代史上有共同的经历和命运。彭树智在《文明交往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58页）认为，伊朗有和中国一样的古老文化，因此，伊朗形成了接受中国物质文明并将它西传的重要基础，但几乎没有学者对中国与伊朗历史文化的共性进行系统而全面地探讨。

如此容易相互尊重的深层原因。

一、中国、伊朗都是历史悠久，一脉相传的国家

中国的历史经历了考古学意义上完整的时代，从旧石器时代开始，经过新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到铁器时代。中国早期历史从部族时代开始，经过封邦建国时代、诸侯时代，进入统一帝国时代。

秦汉时期是中华民族形成的关键萌芽时期，秦汉帝国的重要性如波斯帝国对伊朗的重要性一样。今日伊朗人称中国人为“秦人”，中国的主体民族为汉族，秦汉帝国时形成的华夏文化历经战争和灾难的考验，顽强地生存，历久弥新。“中国”是中华民族大家园的统称，而且形成了强大的民族内聚力。中国文化的核心代代相传、生生不息。^①

伊朗的历史也从旧石器时代开始，在伊朗的克尔曼沙赫省发现手斧（距今13万~20万年前），在锡斯坦—卑路支斯坦省发现砾石砍砸器。^②伊朗新石器时代始于公元前8000年，结束于公元前3500年（包括铜石并用时代）。其后伊朗历史进入城邦与列国时代。公元前2850年，以乌尔米耶湖为中心产生了阿拉塔王国。公元前17世纪，胡里人建立了以哈布尔河流域为中心的米坦尼王国。埃兰地区成为伊朗最早出现文明的地方，以苏萨为中心的平原地区是埃兰文化的中心地区。埃兰地区的历史从公元前2700~公元前6世纪中期。^③公元前2000年代末期，雅利安人进入伊朗，其中最著名的是西伊朗人，他们

① 周时奋著《中国历史十一讲》（上册），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第120页。

② 彭树智主编《中东国家通史·伊朗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3页。

③ 李铁匠著《伊朗古代历史与文化》，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页。

中国伊朗学论集

是米底人、波斯人和安息人的祖先。公元前 727 年，戴奥凯斯建立米底王国。公元前 585 年，米底已经成为囊括西亚半壁河山的帝国。它标志着伊朗由城邦小国分立向地域王国和统一帝国的过渡，加速了古代伊朗境内不同民族及其文化的融合过程，对伊朗民族和文化的形成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公元前 700 年，阿契美尼斯以安尚为中心，建立波斯王国。居鲁士二世（公元前 559~公元前 530 年）创建波斯帝国。波斯成为古代伊朗的通用称呼，波斯人成为伊朗的主体民族，波斯文化成为伊朗的主体文化。不管伊朗后来经历了多少艰难曲折、血雨腥风，以波斯人为载体的波斯文化始终存在，历久弥新。尽管波斯文化后来吸纳了其他民族的文化，但内核文化一脉相传，延续至今。^①

今天，伊朗和中国民族结构相同，都形成以一个多数民族为主，与其他少数民族共处的中央集权制国家。

二、中伊两国在历史上都是文明中心，其文明光芒辐射周边

中华文明的核心地区是黄河流域的中部，那里是夏、商、周时代青铜器文化的舞台。春秋时期，长江流域的楚国在公元前 9 世纪接受了北方的方块文字，并将其普及到整个长江流域。方块字在中华民族的大融合中显示了强大的沟通同化功能。春秋五霸、战国七雄在混战中完成局部统一，百家争鸣中形成中华文明的基本内核。公元前 221 年，秦国统一六国，中华民族的核心也由此凝成。秦帝国的三公九卿制，郡县制，以法治国、度、量、衡的统一，国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与波斯

^① 张晖《伊朗古代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刊《辽宁大学学报》2002 年第 5 期。

帝国有很大相同之处。西汉东汉时，中华文明通过丝绸之路影响到中亚、西亚诸国。大唐帝国时，中华文明波及中南半岛，伸延到朝鲜半岛，伸入中亚大地，辐射到蒙古高原。

伊朗文明也同样如此。米底帝国占据西亚半壁河山。阿契美尼德家族建立的波斯帝国，它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地跨欧亚非的大帝国，其疆域西北达巴尔干半岛的多瑙河，西南到非洲的尼罗河，东北自锡尔河以南，东南至印度河流域，面积约500万平方公里。^①祆教关于智慧和几个世界的观点对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及米利都学派有重要影响，祆教的末世论观念被犹太教、基督教所吸收。^②波斯人发明的“坎儿井”技术由中亚传入中国新疆，具有波斯风格的挂毯传到阿尔泰山北麓。安息帝国的香料、纺织品出口到罗马帝国，其铁甲骑兵及其所用的运动战、反击战战术也传到罗马帝国。安息帝国的影响曾北达伏尔加河流域。

三、中国、伊朗两国的文化边界都大于国家边界，两国文化边界接壤，所以文化上相互影响

在中国历史上，中华文化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为中心，在吸收周围各民族文化的同时，具备强大的辐射力和影响力。因为朝鲜和越南在历史上与中国交往密切，中华文化对两国的文字、语言、政治制度、军事制度、经济制度及民族心理产生了深远影响。日本则通过主动学习，效法隋唐帝国，进行大化革新，由奴隶制社会过渡为封建社会。日本的文字及文化心理与中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随着近现代华人华侨进入东南亚各国，中华文化在今日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都有巨大影响。

① 于卫青著《波斯帝国》，西安：三秦出版社2001年版，第2~3页。

② 龚方震、晏可佳著《祆教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中国伊朗学论集

伊朗自古以来是西亚的帝国和强国，是文化和文明的中心。伊朗历史上的帝国及地方王朝，在吸纳周围各民族文化的同时，大力弘扬、发展和传播伊朗文化，因此伊朗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在伊朗处于强大帝国时，两河流域、河中地区及印度河流域都属于伊朗，伊朗文化自然在这些地区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今日伊朗的国界小于历史上其帝国时代的国界，而伊朗的文化边界远远大于今日国界。今天，除伊朗使用波斯语之外，阿富汗、塔吉克斯坦仍在用波斯语。伊朗文化对今天的伊拉克、巴林、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土库曼斯坦都有影响。据 2004 年 10 月 9 日《德黑兰时报》报道，在克什米尔首府举行为期三天的“在伊斯兰传播中波斯语的作用”的专题讨论会，克什米尔大学副校长瓦希德教授认为在伊斯兰教传入克什米尔的过程中，波斯语起关键作用。在克什米尔波斯语和伊斯兰教二者密不可分，今天克什米尔的穆斯林甚至非穆斯林都接受了波斯语，波斯语丰富了克什米尔的语言、艺术、文学。伊朗驻印度大使馆的文化参赞贾拉勒·塔姆拉赫说，波斯文学深受印度文学影响，反过来，波斯文化丰富了印度的文化遗产和文化价值观。在克什米尔波斯语处于活跃状态，这是一个无人否认的历史事实。由此可见，伊朗的文化边界已达到南亚次大陆。^①

中国的文化边界西达中亚，伊朗的文化边界东抵中亚，中伊两国的文化边界在中亚接壤。所以中伊两国的文化双向互动影响和交流源远流长，生生不息，波澜壮阔。

四、中伊两国都产生了本土宗教，并接受外来宗教，再传之他方

中国本土孕育出道教，道教的开山祖是老子李耳，著有

^① 《德黑兰时报》(Tehran Times, 2004, 10, 9)。

《道德经》。后经庄子发扬光大。在百家争鸣之中，《道德经》号称老庄之学。原始道教形成于东汉晚期。魏晋以来，士大夫加入和改造民间道教，经东晋和南北朝，形成了系统的理论与修炼方法。^①

祆教的创立者是伊朗人的第一位伟大先知琐罗亚斯德，他于公元前 11 世纪出生于伊朗东部的锡斯坦。^②他在《伽泰》（意为“神歌”）中以诗体形式宣扬了祆教的基本教义——善恶二元论，这是祆教最基本、最核心的教义，即在世界出现之前，就已存在善恶两大本原。随后，善界神主马兹达创造了包括他的 6 大从神在内的宇宙间的一切善物，马兹达是光明与生命的源泉，是智慧、善良、真诚与创造的象征；恶界之首阿赫里·曼则孕育了宇宙间所有恶的事物，是黑暗和死亡的渊薮，是愚昧、邪恶、虚伪与破坏的代表。善恶两界势不两立，长期斗争，最终善必将胜恶。祆教在创立之后实际上被称为马兹达教，传入中国后被称为拜火教。祆教的经典为《阿维斯陀》，通过祭司以口传方式代代相传。祆教从东伊朗传到西伊朗，米底人和波斯人接受了祆教，并视之为自己的文化特色和民族认同的宗教。后来成为阿契美尼德家族建立的波斯帝国的官方宗教。安息帝国时，伊朗东部祆教文化与西部祆教文化进一步结合。萨珊王朝时，祆教上升为帝国的国教。国家的文化、教育和司法大权由祭司掌握，祆教祭司阶层与国家行政机构平等，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教阶制和经济制度，祆教祭司成为特权阶层。^③

① 周时奋著《中国历史十一讲》（上册），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16 页。

② 元文琪著《二元神论：古波斯宗教神话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97 页。

③ 孙培良著《萨珊朝伊朗》，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 页。

中国伊朗学论集

阿拉伯人征服伊朗后，伊朗开始了缓慢的伊斯兰化过程。在阿拔斯王朝统治的最初 100 年间（750~847 年），祆教教徒在伊朗国内已成为少数派，伊斯兰教成为波斯人中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它全面地改变了伊朗的文化面貌。伊朗人主动以阿拉伯语为语言工具，以伊斯兰教为指导，以波斯文化为基础，弘扬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成为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主力军。波斯的许多诗人、哲学家和科学家成为伊斯兰文化史上的享有世界声誉的历史伟人。波斯人以自己的文明、勤奋和智慧，理解和完善伊斯兰教，以自己的博大胸怀和雄心壮志传播和推广伊斯兰教。波斯人以波斯语为工具在中亚、南亚及中国境内广泛地传播伊斯兰教。从某种程度上讲，伊斯兰教是由阿拉伯人创立的，但伊斯兰教是由波斯人发扬光大的。

而中国除了产生本土宗教道教之外，也接受外来宗教佛教，并把佛教传之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原始佛教来源于印度，佛教进入中国后，开始了本土化过程，即民族化和中国化过程，它对中华的民族心理和文学、艺术、建筑风格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它并未取代原有的儒学思想，只是补充了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并与儒家思想融合，产生了宋明理学^①。中国化的佛教随后又越出国门，东传至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对朝鲜民族和大和民族产生了巨大影响。

五、中伊两国在军事上被游牧民族征服，但在文化上征服了游牧民族

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华文明是在中原农耕世界与周边游牧世界的相互交往中形成的。中国早期历史是游牧部落不断改为

^① 周时奇著《中国历史十一讲》（上册），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18~223 页。

农耕村落的历史。公元 311 年，西晋灭亡，东晋建立，北方进入五胡十六国朝代。建立十六国政权的胡人通过通婚混血、移风易俗、思维方式的统一实现汉化，即转变为汉族。北魏历代皇帝推行汉化政策，其中孝文帝的汉化措施有：改变服饰，改说汉语，违者罢官降爵，禁止归葬，改姓氏，建门阀制度，鼓励通婚^①。公元 916 年，契丹国建立，后称辽国，辽国推行汉化政策。公元 1115 年，完颜阿骨打建立金国，金国从军事上灭亡了北宋，但在文化上向北宋学习。公元 1013 年，李元昊称帝，立国号为“大夏”史称“西夏”。这是一个半汉化的国家政权。公元 1141 年最有趣的是宋金议和，宋金以淮河、大散关为界，宋承认金的宗主国地位而称臣，每年输银、绢各 25 万两、匹。和局已定，金定都今日的北京。金主身穿汉式冕服，亲自祭祀孔子，孔子的第四十九世孙也被封以公爵。政治上宋臣服于金，文化上金归服于汉^②。蒙古族军队消灭南宋，但蒙元皇帝忽必烈被迫采用一些汉化政策。建立大清帝国的满族人在文化上与心智上实行汉化，在组织上保持本民族的特色，即在保持满族的形式下加快文化精神上汉化^③。到 1911 年年底清朝灭亡，满族已成为高度汉化的民族。中国今天的满族已经不懂满语，完全讲起汉语，完全对自己原有的文化很陌生。

在中国历史上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交往是双向互动的，农耕民族确实也吸纳了游牧民族的一些文化，但因为农耕民族的文化是强势文化，强势文化必然同化弱势文化，所以，游牧

① 周时奋著《中国历史十一讲》（上册），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98~201 页。

② 周时奋著《中国历史十一讲》（下册），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29 页。

③ 周时奋著《中国历史十一讲》（下册），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54 页。

中国伊朗学论集

民族在军事上大获全胜之后，在文化上则虚心向被征服者学习，最后在文化上成为与被征服者一样的民族。

无独有偶，西亚文明古国伊朗也大同小异。伊朗的历史换个角度看也是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相互交往的历史。雅利安人进入伊朗，就是属于世界历史上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的第一次大冲击，并由此改变了伊朗的语言、民族和宗教。波斯帝国的建立与存在，生成和培养了具有发达文化底蕴的波斯文明及波斯民族，并在以后的历史风云中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马其顿亚历山大帝国在征服伊朗以后，在伊朗希腊化的同时，马其顿人也不得不实行一些波斯化政策。安息帝国由北伊朗部落帕提亚人所建。帕提亚人在保留一些游牧氏族制度残余的同时，接受了波斯帝国的王权观念和行省制。阿拉伯人对古伊朗的征服属于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第二次冲击。倭马亚王朝时，伊朗所有官方文书一律使用阿拉伯语，币制完成阿拉伯化。但同时，阿拉伯语吸收了波斯语的大量词汇，清真寺建筑大量借鉴学习波斯建筑。在伊朗完成伊斯兰化以后，阿拔斯王朝从政治体制到经济制度，从思想文化到日常生活无不受波斯的影响。阿拉伯帝国采纳了萨珊王朝的行省制和税法，波斯头衔、波斯老婆、波斯歌曲、波斯思想在阿拔斯王朝逐渐占了上风。哈里发首先采用波斯式高帽子，其臣民竞相效尤。在阿拔斯王朝后期，伊朗地方王朝兴起，萨法维王朝、萨曼王朝极力赞助和支持波斯文化的复兴，倡导波斯传统，推广达里波斯语。萨曼王朝时产生了“波斯诗歌之义”鲁达基（850~940年）及伟大诗人菲尔多西（940~1020年）。

突厥人是进入伊朗的第三批游牧民族。但突厥人是在接受伊斯兰教和波斯文化之后才登上伊朗历史舞台的。伊朗的第一个突厥人王朝加兹尼王朝（962~1186年）在其首都加兹尼保持

和发展波斯文化。第二个突厥人王朝古尔王朝（1150~1206年）把波斯语和波斯文化传到了印度。塞尔柱王朝（1055~1194年）的疆域包括河中地区、伊朗和美索不达米亚。因为塞尔柱人文化落后，他们不得不借助于波斯人进行统治。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两朝首相、波斯人尼札木·莫克尔（1018~1092年），他不仅在政治上权倾朝野，管理有方，而且在文化上著书立说，各垂青史。其著作《治民要术》在波斯文学史和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第四个突厥人王朝是花刺子模王朝（1138~1231年）。花刺子模人也是波斯化和伊斯兰化的突厥人。

蒙古人是进入伊朗的第四批游牧民族。旭烈兀以阿塞拜疆为军事、政治中心，以马腊格及大不里士为都建立了蒙古人对伊朗和西亚广大地区的统治。1260~1295年的35年间，伊利汗国的蒙古统治者在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方面仍然以蒙古人的传统为主，对伊斯兰文化和伊朗文化持排斥态度。从1295到1335年的40年间，蒙古人不但实现了伊斯兰化，而且关心波斯文化，促进了伊朗科学与文化的发展。蒙古人改信伊斯兰教，接受伊斯兰国家传统的土地国有制和军事采邑制度，鼓励蒙古人从事农业和手工业，鼓励农民垦荒，重视水利建设，吸纳伊朗人参与汗国的税务和行政管理，改革赋税征收制度，统一度量衡与货币，完善驿传制度，保护交通安全，采取伊斯兰教教法制度。蒙古人到此主动同化于被征服者的先进宗教与制度文明。^①

1265~1405年帖木儿率领突厥化的蒙古军队再次征服伊朗。他们所到之处，毁灭城市，屠杀居民，抢劫财宝。其所作所为，对伊朗文明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但值得注意的是帖木

^① 《波斯》拉施特著，余大钧译《史集》，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78页，第346~348页。

中国伊朗学论集

儿是高举伊斯兰圣战的旗帜征战的。帖木儿的四子沙哈鲁(1409~1447年)建立哈烈国,统治河中、东伊朗和西阿富汗。沙哈鲁父子热爱波斯文学,是学者和艺术家的保护者。由此说明波斯文化征服了征服者的子孙。

在统治伊朗的二百多年间,蒙古人由于人数较少和文化相对落后,基本上已被突厥化、伊斯兰化和波斯化。帖木儿时代的蒙古人,其政治和宗教信仰是蒙古—阿拉伯式的,法律体系是突厥—成吉思汗式的,文化则是突厥—波斯式的。伊朗文化在这一时期劫后余生,但很快发扬光大,硕果累累,仿佛火中凤凰,再生之后,愈加光辉伟大。这一阶段,伊朗出现了享有世界声誉的诗人萨迪和哈菲兹,历史学家拉施特和志费尼,细密画大师毕扎德。^①

萨法维王朝(1502~1722年)的建立标志着以波斯人、阿塞拜疆人、土库曼人和库尔德人为主体的伊朗多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这一共同体以伊斯兰教什叶派教义为纽带,以融合了各种文化的波斯文化为基础,把各民族联合在伊朗这一统一的民族国家之内。

六、中国、伊朗两国进入近代之后几乎同时沦为半殖民地,两国人民面临着反帝、反封建的共同任务

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以后历经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腐败无能的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中国仅仅维持了表面上的独立与统一,国家主权支离破碎,人民生活水深火热。几乎所有的帝国主义国家都

^① 张鸿年著《波斯文学史》,北京:昆仑出版社2003年版,第214页。

在中国有势力范围，都在中国人民身上敲骨吸髓。中国之所以没有完全沦为殖民地，首先在于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其次在于中国幅员辽阔，任何一个单独的帝国主义难以吞并中国；最后在于帝国主义在压迫和掠夺中国的过程中互相牵制。一部中国近代史是一部中国人民的斗争史和屈辱史。

1813年10月25日伊俄签订《古利斯坦条约》，标志着伊朗近代史的开端。欧洲列强通过与伊朗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使伊朗逐渐丧失了领土主权、司法主权、海关主权及经济主权。伊朗近代的恺加王朝腐朽不堪，不能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伊朗国王在人民心目中已成为出国享乐、卖国求荣、专制残暴的独夫民贼。

因为中伊两国人民历史命运相同，所以中伊两国都能理解对方的民族屈辱感及民族自豪感。事实上，伊朗的巴布教徒起义（1848~1852年）和中国的太平天国起义（1851~1864年）都打击了共同的敌人——本国的封建统治阶级和殖民主义者。在客观效果上，中伊两国人民在反殖反帝的斗争中相互声援。

七、在近代史上，从地缘政治上看，英俄成为中伊人民的共同敌人

俄罗斯帝国的领土扩张是沿着周边向四周扩张，不断蚕食别国领土，通过战争和条约侵占中伊两国的大片领土，成为中伊两国人民的凶恶敌人。

俄国吞并中亚和西伯利亚以后，在地理上成为中国的邻国。俄国利用清朝的软弱无能和愚昧无知，割占了中国东北和西北大片领土，是危害中华民族利益的最凶恶的敌人。

英国是西欧弹丸岛国，通过海洋扩张建立海外庞大的殖民地。英国首先对中国发动了第一次侵略战争，迫使中国在1842

中国伊朗学论集

年8月29日签订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1843年签订了《虎门条约》。这成为中华民族奇耻大辱的开端。

无独有偶，英俄两国同时也是伊朗近代史上最凶恶的敌人。俄国通过两次伊俄战争，迫使伊朗签订了《古利斯坦条约》和《土库曼恰依条件》，伊朗因此失去高加索地区的属国和领土。1861年以前，中亚的布哈拉、木鹿等地诸汗仍臣服于伊朗宫廷。但沙皇俄国从1839年起就开始向中亚渗透，先攻占咸海以北、里海以东的地区，后开始进犯东西土耳其斯坦以及阿姆河和锡尔河的河谷地区。1860~1864年，俄国吞并了撒马尔罕；1865年攫取塔什干；1866年夺取布哈拉；1870年俄军攻占了布哈拉的其余地方。截至1875年，俄国吞并了历史上曾臣服于伊朗的土耳其斯坦和阿姆河以东地区。

英国把印度次大陆变成自己的殖民地，并通过驻印度总督控制阿富汗的对外关系。早在1788年1月18日，英国驻巴士拉领事从赞德王朝国王贾法尔·汗·赞德（1785~1789年）那里获得一项敕令，根据这项敕令，与伊朗通商的英国公民将得到大力协助和良好的待遇。他们可以免缴关税、过境税及其他捐税，还可自由出入国境，货币流通也不受任何限制。英国人据此垄断了波斯湾及伊朗南部诸港口的贸易，英国势力开始渗透到波斯湾。1801年，英国与伊朗签署了通商条约。据此条约，两国商人可以在彼此的国土上自由经商，英国和印度商人可侨居伊朗各地，并豁免各种捐税。1819年，伊朗法尔斯省总督哈桑·阿里·米尔扎·法尔曼法尔第与英国舰队司令布鲁斯上校（Captain Bruce）签署协议，一旦伊朗不能确保波斯湾安全时，将由英国政府担当此任。从此，英军在镇压海湾海盗的过程中名正言顺地进入波斯湾。1820年1月8日，英国外交代表威廉·格兰特·恺尔爵士（Sir William Grant Keir）同波斯湾沿岸地

区的 11 位酋长缔结休战条约，各酋长保证不再从事海上掠夺。巴林岛的酋长也在其中。1851 年伊英签订条约，英国和东印度拥有的海军有权稽查伊朗臣民的商船，以制止奴隶的贩运。伊朗保证不准官方船只运载奴隶。从此英国控制了波斯湾。一贯臣服了伊朗中央政府的巴林酋长见风使舵，投靠了大英帝国，在其驻地升起大英帝国的国旗。1861 年 5 月 31 日，英国正式将巴林群岛置于自己庇护之下，伊朗永远失了巴林群岛。从此以后，英国从伊朗南方、俄国从北方夹攻伊朗。

英国通过印欧电报局、波斯帝国银行、英波石油公司压迫剥削伊朗，俄国通过哥萨克师、波斯信贷银行干涉伊朗内政，吸吮伊朗的血汗。英俄在 1907 年达成瓜分伊朗的协定。俄军镇压了伊朗的立宪革命。苏军英军南北夹击，迫使礼萨·汗国王逊位。英美勾结颠覆了摩萨台政府。可以说，伊朗近代史是一部伊朗与英俄两大敌人斗争的历史。

八、中伊两国的现代化都是“外源型”、“被动型”、“后发型”的现代化，面临着如何处理传统和现代化关系的重大问题

中伊两国的近代史同时包括四个过程。1. 自身衰败的过程，指封建王朝腐朽、腐败的过程。2. 半殖民地化的过程，指在强大的外来政治、经济、军事渗透下，中伊两国原有的进程被打断，被逐步纳入以西方资本主义为中心的世界经济新体系之中，沦为依附性的半殖民地，主权的丧失与变形。但半殖民地过程同时也是外来资本主义因素引入中伊两国，影响中伊两国向资本主义方向演变的过程。3. 革命化过程，指中伊两国内部产生反西方侵略与拯救民族危亡的强烈回应。4. 现代化过程，指在世界变革浪潮的推动下，内部民族主义兴起，出现经

中国伊朗学论集

济增长、制度革新和文化革命，从而引起中伊两国传统农业社会向适应现代工业世界的新的社会经济体制缓慢转换的过程。

因为中伊两国都是第三世界国家，其现代化无疑属于外源性现代化。中国在 19 世纪后期，启动现代化进程：兴办现代工业，建立民主共和体制，废除科举制，实行新学制，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发展铁路、公路、航空等现代交通运输与通信事业，移风易俗。由于新的资本主义因素与商业化的缓慢增长，鸦片战争后不到百年，中国开放 105 个通商口岸城市（1930 年）；全国城镇人口从 2000 万人增至 5760 万人（1949 年），出现新兴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①

伊朗的半殖民地地位激发了伊朗人民自强自立、救亡图存的强烈愿望，富国强兵的现代化改革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而师从西方、赶上西方、战胜西方成为富国强兵的必然选择；半殖民地地位不仅决定伊朗现代化的必然性和必要性，还决定了伊朗现代化发展之初为西方化模式；半殖民地地位决定了伊朗的现代化是被迫的被动的外源型的后发型的现代化。

伊朗王储阿拔斯·米尔扎长期充当对俄战争的伊军统帅，军中经常雇用英国军事专家，所以他对欧洲新文明及欧洲军政情况很了解，是伊朗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上层统治者。他以欧洲人为教官改革军队，开办军工厂和呢料制造厂，派伊朗人去英国和俄国学习，首次将铅印技术介绍推广到伊朗。1818 年，他在大不里士建立了一座新的铅字印刷所，1824 年在德黑兰出版了第一套用铅字印刷的书籍。

1848 年阿米尔·卡比尔出任伊朗首相，开始建立高效、分工明确的官僚机构；取消冗长乏味的官员称呼；严禁官员受



① 罗荣渠著《现代化新论》，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版，第 490 ~ 495 页。

贿；设立专门财政机构，制定合理的税收制度；促进伊朗国内贸易发展，鼓励国内工匠仿制国外产品；派遣伊朗学生去欧洲学艺；在伦敦、圣彼得堡和伊斯坦布尔建立公使馆；在欧洲教官的帮助下，按照欧洲模式组建正规部队，聘请欧洲教师来伊教学。^①

1851年德黑兰出版了向民众传递重大新闻的日报——《事件报道》，这家报纸由英国人掌管，1860年更名为《伊朗国家日报》。1857年伊朗出现了第一条电报线路。1873年纳赛尔丁国王第一次出访欧洲时购买了一整套印刷厂的设备带回伊朗，伊朗的报刊出版事业开始发展。

1875年，伊朗聘请了一名奥地利人做顾问，依照欧洲的新型方式建立了现代伊朗邮政制度。1877年伊朗从欧洲引进铸币厂的设备，并聘请德国顾问和法国专家管理该厂。1884年伊朗出现了第一条铁路。除了伊朗官办的铸币厂、火药制造厂、枪械制造厂等军用企业之外，一些达官显贵开始兴办民用企业，1880年建立煤气灯制造厂，1899年创建了制糖厂。虽然一些工厂因为外商竞争、资金缺乏、管理无能而倒闭，但伊朗毕竟产生了现代企业。

随着新式技术专科学校的创立，伊朗学生出国留学、伊朗官员出访欧洲以及伊朗商人去欧洲经商，欧洲的科技渐渐传到伊朗，伊朗兴起了学习外语的浪潮，有关几何学、地理学、自然科学、医学、军事学等新兴学科的译著纷纷出现。随着外国习俗在伊朗的盛行，一些城市上层人士喜欢穿西服，系领带，吃西餐；烟草、罂粟、土豆，非本土的植物和花卉在伊朗推广种植。与此同时，伊朗封建王朝成立内政部、司法部、教育

^① 《伊朗》阿巴斯·艾克巴尔·奥希梯扬尼著，叶奕良译《伊朗通史》，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第890页。

中国伊朗学论集

部、邮电部，促进了行政机构的专业化分工，也提倡西方化，司法世俗化。

由此可见，伊朗现代化开始于军事现代化。伊朗现代化的领导力量为：开明的上层统治者、出国留洋的知识分子和企业家。伊朗的现代化从物质层面开始，渐渐深入到制度层面及价值观层面。这与中国现代化发生、发展几乎一模一样。

结 论

我们从中伊两国历史文化的八大共性中可以看出：中国和伊朗这两个伟大的民族，都具有历史的自豪感、历史的自信心。我们两个伟大的民族都有近代史上的耻辱感，都有在现代化中强国富民的紧迫感，都面临着弘扬传统文化，同时借鉴、吸收西方先进文化的选择性。因此，我们两国完全可以相互理解、互相借鉴、相互支持，共同促进两个文明古国重新崛起，重新强大，重新创造一个和谐的、公平的、正义的新世界。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 2004 年度项目新时期中国与伊朗关系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哈菲兹的苏菲思想

白志所^①

哈菲兹是 14 世纪伊朗伟大的抒情诗人和苏菲诗人，他与费尔多西、莫拉维、萨迪被称为古典诗坛的四大支柱。600 多年来，哈菲兹的名字超越国界，赢得了广泛的世界声誉。哈菲兹的诗歌也得到了世界范围的高度赞誉和认可。歌德、尼采、拜伦、普希金、屠格涅夫等人都对哈菲兹的诗歌赞誉有加。恩格斯甚至通过哈菲兹的诗歌来学习优美的波斯语。爱默生也曾在 19 世纪亲自翻译过哈菲兹的诗歌。哈菲兹诗歌的成功之处在于，他将他的哲学和神秘的灵性体验用诗歌的形式完美地表达出来，而丝毫不显晦涩、生硬。因为这些诗歌都是从他的内心、从他的灵魂深处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的。

哈菲兹生平简介

哈菲兹（1320~1389），波斯著名诗人，全名是沙姆斯·丁·穆罕默德·哈菲兹，因他能背诵《古兰经》（据说他能用 14 种方法诵读《古兰经》），赢得了“哈菲兹”的称号，即“熟背

^① 作者系云南曲靖市人，毕业于伊朗德黑兰大学哲学，系获硕士学位，曾长期任职于伊朗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现供职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驻华使馆文化处。



中国伊朗学论集

《古兰经》的人”。除了能够背诵《古兰经》外，哈菲兹还能熟背萨迪、阿塔尔、尼扎米、毛拉维等著名诗人的诗歌。

哈菲兹在公元 1320 年左右出生于伊朗中部城市伊斯法罕。他的父亲白哈伊·丁是一个商人，在哈菲兹出生后不久即破产。哈菲兹年幼时，全家移居到伊朗南部城市设拉子。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那里度过。他幼年丧父，家境艰难，勤奋好学。一边努力工作，一边求学。据说他做过抄写员、布料店和面包店的学徒。他把一半工资交给母亲，另一半用来求学。他学习法学、数学、书法、天文学等各种课程，后研读宗教和阿拉伯文学。

哈菲兹 21 岁那年，送面包时遇见一位美丽的姑娘，叫沙赫·纳巴特（甘蔗枝），便对她一见钟情，爱上了她，并与她结婚，生儿育女。他的诗集中，有数首诗是写给他的这位心上人的。

他 23 岁时因在抒情诗和劝诫诗方面显示出才华，引起王公贵族的注意，被国王艾布·伊斯哈格召入宫廷。伊斯哈格国王酷爱诗歌，把哈菲兹视为知音，哈菲兹也因此著名，并作诗歌颂国王。在他 33 岁时，穆巴利兹·丁·穆罕默德占领设拉子，哈菲兹被迫离开他教授《古兰经》的学校，流落他乡。哈菲兹这一时期的诗歌充满了对当时王朝的不满和抨击。

哈菲兹 38 岁时，沙赫·舒贾尔夺取了其父亲穆巴利兹·丁国王的地位，哈菲兹被再次召回宫廷，恢复原职。在经历了一番周折后，哈菲兹汲取了教训，不再咏诗歌颂国王，开始创作伦理和苏菲诗歌。

哈菲兹虽然感觉自己地位显赫，出入宫廷，但在言论上没有自由，伴君如伴虎，随时都得小心谨慎。他 48 岁时，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哈菲兹离开了设拉子，来到了伊斯法罕。哈菲兹在这一时期创作的诗歌，充满了对亲人，尤其对他

的心上人沙赫·纳巴特和他的老师阿塔尔·设拉兹的思念。他 52 岁时，再次被舒贾尔国王召回宫廷，一边创作诗歌，一边教授《古兰经》和宗教知识。

哈菲兹 69 岁去世，被安葬在设拉子郊外的莫萨拉附近。现在，当地已修建成哈菲兹陵园，并设有哈菲兹图书馆。

哈菲兹的诗歌主要以抒情诗为主，共有 500 首，四行诗有 42 首，创作时间前后 50 年。哈菲兹没有专门写作诗歌，他创作诗歌是属于一种爱好，只有在灵感涌现时才将诗歌朗诵或吟唱出来。尤其在晚年，他创作诗歌是为了表达自己对人生的感悟。哈菲兹没有想到整理自己的诗作，他的诗歌是在他去世数年后由别人汇编的，称为《哈菲兹诗集》。哈菲兹的抒情诗以苏菲思想为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存在单一论 (w a h d a t a l- w o j u d)

存在单一论是苏菲思想的核心，这一思想的创始人是穆哈伊·丁。苏菲学者对存在单一论提出了不同观点。大致有以下三种观点：

(一) 存在单一，指宇宙真正的绝对的存在只有安拉。安拉是无限的，他不受时空的限制，他的能力、知识也是无限的，除安拉之外的所有事物，无论有多伟大，都是有限的和相对的。当我们把事物作比较时，就会发现，这物比那物大，比如海洋比河流大，这都体现了事物的局限性。我们可以在有限的事物之间进行各种比较，因为这些事物之间有某些共性和相连的关系，但我们不能把有限的事物与绝对无限的安拉作比较，不能说安拉比某物大，因为在安拉与事物之间没有任何共性和关联，在二者之间比较没有任何意义。有人问伊玛目萨迪格：“安拉至大的意思是不是说安拉大于万物？”伊玛目回答

中国伊朗学论集

说：“不对，安拉至大是指安拉超越一切想象和描述。”所以在苏菲眼里，除安拉之处的一切存在是藐小的，甚至不能把它称作存在，他们所看到的存在只是安拉，除他之外的一切仿佛不存在。

(二) 存在单一不是说宇宙间只有安拉存在，除他之外的一切都不存在，而是说万物都是真实的存在，安拉存在，万物也存在，这种存在都是真实的。安拉与万物在存在方面唯一的区别是强弱和等级之分，即安拉的存在是必然的，万物的存在是可能的，安拉的存在是自立的、无求的，而万物的存在是有求的，安拉的存在是绝对完美的，而万物的存在是残缺的。哲学家持此观点。

(三) 苏菲思想，即存在是绝对单一的，既没有多样性，也没有强弱之分，存在只有一个，那就是安拉，除安拉之外的一切都不存在，宇宙只是显现、影子，犹如在镜子里的影像，它本身是不存在的。比如，当你照镜子时，镜子里的只是你的图像，真实的存在是镜子外边的你。宇宙也是如此，它本身是不存在的，而是安拉的“显现”和迹象。

在阿拉伯蒙昧时代有一句诗说：“除安拉之外，万物皆虚，但凡恩泽都会消失。”穆圣称赞这句诗说：“这是阿拉伯人最美妙的一句诗。”“万物皆虚”正是苏菲世界观的核心。哈菲兹说：

没有任何一道视线，
不是被你面颊的光辉点燃；
没有任何一双眼睛，
不包含你门前泥土的恩典。



这句诗的意思是：我们所看到的都是主的光的反射，宇宙万物都是来自主的恩德。正如阿里说：“我每看一物，都看到安拉在那物的前面、后面，同它在一起。”

哈菲兹说：

这世界作坊，
不会给你带来收获；
拿酒来吧，世上的一切，
都无任何价值可说。

与情人交往的荣耀，
是心灵的唯一向往；
除此外，人的心灵，
还有什么价值可讲。

不付出心血而得到（情人），
那称得上福星高照；
而你要去天堂花园，
却不能靠恭顺和祈祷。

诗人认为，这个世界只是过眼烟云，世间的一切空虚缥缈，没有任何价值。人生在世，只有虔诚地倾向安拉，用心去爱主，生命才有价值和意义。即使是后世的天堂乐园，也要通过对主的爱去获取，而不是拘泥于身体的祈祷。这首诗既体现了诗人的“存在单一论”，认为宇宙间只有安拉是真实的存在，除他之外的一切都是空虚的，同时也表达了苏菲对安拉的爱和追求，以及从爱主中得到的精神享受和乐趣。



中国伊朗学论集

你的美丽容貌，
不只是我眼睛倾慕的地方；
那月亮和太阳，
也把它当做明镜观赏。

在这首诗里，哈菲兹认为，包括月亮和太阳在内的宇宙万物都是一面镜子，反映了安拉的完美和伟大。镜子本身没有价值，只有当它照射时才体现出自身的作用。在哈菲兹看来，宇宙的一切是面镜子，如果你只关注镜子的本身，是没有任何价值的，宇宙存在的价值是它反射了安拉的美和大能。

二、宇宙是安拉的“显现” (T a j a l l a)

关于安拉创造宇宙这一问题，教义学家认为安拉是宇宙万物的直接创造者和作用者，而哲学家们认为，安拉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但不是直接的，安拉首先创造了第一理性，第一理性又创造了第二理性，第二理性创造了第三理性……一直派生到活动理智，活动理智创造了世界。但苏菲认为，宇宙只是安拉的“显现”，只是安拉的“命令”。哲学家认为，万物的生存与发展都遵循着因果规律。但苏菲则否认因果关系，他们认为，承认因果关系，就等于承认某一事物的产生有多个创造者，是属于举伴安拉。

有些苏菲对 Tajalla (显现) 的理解不深入，甚至误入歧途，总以为自己看到万物就像看到了真主，以为自己达到了“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而事实上那只是他自己的一种幻觉。哈菲兹对这种肤浅的苏菲提出了批评：

当你那明媚的形象，

在酒杯的明镜中映现，
阿里夫的欲望油然而生——
他看到了杯中的笑颜。

诗歌中“你那明媚的形象”指安拉的完美；“酒杯”指宇宙万物，或指苏菲的心灵；阿里夫即苏菲修道的人。意思是，当安拉（的迹象）在宇宙或在苏菲的心灵显现时，阿里夫感到无比高兴，以为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而事实是：

当你那迷人的姿影
在这明镜中一闪，
多少美好的憧憬，
在心儿的镜中涌现。

宇宙的明镜映现了安拉的完美和伟大，但每个人因思想和理解的不同，在这一明镜中看到的也不同，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看法去表述安拉。

哈菲兹紧接着说：

这美酒的情影，
这佳人的婉容——
萨吉啊！是你把光辉
投撒到杯中。

诗歌中，“萨吉”为隐喻手法，指安拉。意思是，宇宙万物形形色色，绚丽多姿，这一切都是从安拉那里流溢的一点点光辉。



中国伊朗学论集

三、爱的旋律

“爱”是苏菲思想的核心，它既是宇宙万物产生的源泉，也是通向真理，获得两世幸福的唯一途径。苏菲认为，宇宙源于安拉的爱。这一思想出自于一段“库德西圣训”，安拉启示穆圣说：“我是一个隐藏的宝库，所以我想被知道，于是我创造了万物，于是我被知道。”在苏菲眼里，爱超越理智和知识，爱是心灵的革命，是崇高的追求，是存在的价值，是苏菲超脱物质，精神攀升的阶梯。有了爱，宇宙才有生机，生命才有活力。哈菲兹说：

自从你的灵魂降生之日起，
你美的光辉就闪现在大地，
人们懂得了爱情为何物，
它的火焰燃遍了寰宇。

诗歌的意思是，当你创造宇宙时，就表现了对宇宙的爱，随即爱的火焰燃遍了整个宇宙，万物都在追求你，热爱你。

宇宙万物都在用不同的方法向安拉表达自己的爱。
那爱情的歌手，
演奏的曲调何等动听！
他描绘的每幅画面，
形象逼真，异彩纷呈。

但愿在这个世界，
不要缺乏恋人的呻吟声；



那是悦耳的声音啊，
它能震撼人的心灵！

四、宇宙的完美

安拉是完美的，他创造的宇宙也必然完美无瑕，宇宙完美的意思正如安萨里所说：“不可能有比这个宇宙更完美的宇宙了。”也就是说，安拉用最完美的方式创造了宇宙，绝不能够从宇宙的创造中找到丝毫瑕疵。宇宙既然是显现安拉的镜子，就不允许有一点残缺。宇宙里的繁星、彩虹、日月、细雨、花草、树木无不像一面镜子一样反映着安拉的完美与大能，哪怕是美丽鲜花枝干上带着的刺也有它存在的奥妙和哲理。哈菲兹赞美道：

假如大地刮起秋风，
哈菲兹，请你莫悲伤；
“哪儿有无刺的蔷薇？”
只要你仔细想一想。

不管我是荆棘还是鲜花，
不过是为装点草场；
我遵循主宰者的意志，
身不由己地发育成长。

五、人的孤寂

苏菲的人生是孤独和寂寞的，首先苏菲追求的是对安拉的爱和精神的升华，而世间的物质与精神格格不入。要想达到“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就必须放弃物质的追求和享受。其



中国伊朗学论丛

次，人从安拉那里来，在这个世界上只是作一次短暂的旅行，最终还要回到安拉那里，那才是真正的家，永恒的住宅。再次，人的精神受躯体的约束，就好比一只鸟关在牢笼里一样，随时期望砸破牢笼，回到自己的故乡。

哈菲兹在描述对安拉的向往与思念之情时说：

假如每个人的心，
都维系在一个地方，
那我的心愿
就在法路赫的身上。（法路赫意指安拉）

哈菲兹的抒情诗洋溢着诗情画意，包含了丰富的哲理，苏菲思想在他的诗歌里表现得淋漓尽致，这里所介绍的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哈菲兹的诗歌被公认为苏菲诗歌，但他本人却没有像传统的苏菲一样，穿着苏菲服装，追随某个苏菲派别，师承某位大师或“穆尔什德”。他的思想来自于《古兰经》和他对人生的感悟，非常真实感人。哈菲兹的诗歌被称为“未见的喉舌”，许多人每遇重大事件，如就业、前途、婚嫁等等，就会用哈菲兹的诗文占卦。可以说，哈菲兹的诗已成为伊朗人民生活的一部分。

参考资料

- [1] 穆塔赫和菲兹的苏菲思想 [M]. 伊朗：萨穆拉出版社，2000.
- [2] 邢秉顺译. 哈菲兹抒情诗全集 [M].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1.
- [3] 网站：<http://www.farhangsara.com/fha>

波斯民族精神传承情结的历史解读

王 锋^①

由于伊美关系的紧张局势，德黑兰这个词早已充斥世界各大媒体。在国际新闻报道中，伊朗也一直是一个炙手可热的词汇。而美国在波斯湾新一轮的军事集结，似乎表明美国在中东的注意力已从伊拉克转移到了伊朗。面对强硬的美国，面对联合国安理会第 1737 号决议，伊朗不仅断然拒绝，而且硬触敏感雷区，宣布掌握铀浓缩技术，以石油大动脉霍尔木兹海峡为重点在波斯湾海域和边境地区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接连宣告掌握了新式尖端武器。那么，伊朗缘何如此强硬？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有哲人说：“性格决定命运。”没有波斯民族的性格，也就没有伊朗独特的历史轨迹。要了解波斯的民族性格，或许我们只能从波斯的伊朗—伊朗的波斯，这交相辉映的民族精神传承中，找到答案。

一、波斯文明的内核与伊斯兰的精神气质

当我们沿着伊朗历史发展的大河溯流而上，就会发现在伊朗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国家是埃兰人在公元前 2500 年建立的

^① 作者系宁夏大学回族研究中心教授，伊朗德黑兰大学访问学者。



中国伊朗学论集

爱兰王国，后于公元前 639 年被亚述人所灭。公元前 9 世纪以后米底人兴起，建立了米底亚帝国，建都赫格玛塔纳（今伊朗西部的哈马丹）。公元前 700~公元前 650 年，居鲁士在伊朗建立了第一个波斯大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大流士一世继位后（公元前 521~公元前 485 年），波斯成为埃及等古老文明的终结者，并成为一个建立在不同信仰、风俗和贸易之上的强盛帝国，当时包括 70 个民族，5000 万人口，占有近 70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公元 3~7 世纪萨珊王朝统治时期，居民中的大多数信奉琐罗亚斯德教。公元 7 世纪阿拉伯人统治波斯（伊朗）后，随着伊斯兰教的传播，琐罗亚斯德教在本土逐渐衰落，但在印度的波斯移民帕西族（Parsiism）中迄今仍很盛行。该教有关世界末日、终世判决等内容均对犹太教和基督教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伍麦叶王朝统治时期（661~750 年），伊斯兰教仅在波斯封建上层和城市居民中传播，农村居民大多数仍信仰琐罗亚斯德教。公元 750 年，阿拉伯贵族阿布·阿拔斯建立阿拔斯王（750~1258 年）后，大批阿拉伯人随之移居伊朗，与波斯人通婚，开始在城市兴建清真寺和宗教学校，并由教法官和传教士主持各地的司法和教务，从而加速了伊朗伊斯兰化的进程。到 12 世纪时，伊斯兰教已成为伊朗占统治地位的宗教。而伊朗的科学文化也成为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源流之一。1502 年，阿塞拜疆萨法教团首领伊斯玛仪一世在伊朗大不里士创建萨法维王朝（1502~1736），立什叶派为国教，奉行十二伊玛目派教义，以什叶派教法为基础，全面实行政教合一制，并以行政手段推行该派教义，建立宗教院校和清真寺，鼓励宗教研究并赋予什叶派阿亚图拉以宗教特权。至此，伊朗什叶派穆斯林的生存空间逐渐从上层传教士公开转向不同阶层的人民，从城市推向乡村。在戈壁滩上、黄土路边甚至是寺院土窑之

中，什叶派就像燎原之火在整个伊朗高原迅速传播。与此同时，为了抵制逊尼派的势力，该王朝确立了什叶派的宗教节日、圣地及宗教礼仪，并完善了十二伊玛目派教义和教法，从而使马什哈德、库姆、大布里士、伊斯法罕、色拉子、图斯等城市逐渐成为什叶派的宗教及学术文化中心。

从那时迄今，什叶派一直被定为伊朗的国教。进入当代以来，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后，什叶派开始全面复兴，尤其在行政、立法、司法、教育和文化等领域，实行“全盘伊斯兰化”。1989年7月通过修改后的新宪法规定：以伊斯兰教什叶派的十二伊玛目教义为立国准则。伊斯兰信仰、伊斯兰体制、教规、共和国和最高领袖的绝对权利不容更改。宪法在总纲中明确规定：“只有一个真主，只承认他的统治并顺从他的意志。”宪法第一条规定了“伊朗政权形式为伊斯兰共和国，这是伊朗人民基于以《古兰经》公正治国的古老信念”。宪法还规定了民众信仰的基础：“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是以宗教信仰为基础的。”并明确确立了什叶派教士阶层的统治地位：“教士依据《古兰经》和安拉（真主）的传统发挥永恒的领导作用。”

宗教对伊朗历史发展的影响，还突出地表现于清真寺在伊朗穆斯林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上。在历史上，清真寺是伊斯兰文化的象征，是广大穆斯林向真主表奉忠心的圣堂和精神依托之所在。伊朗的清真寺，它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更是超越了时空的跨度，以其独特的风格和形式，承载了伊朗穆斯林民族的所有辉煌和苦难，寄托了他们所有美好的希望和心愿。正唯如此，它名副其实地成为伊朗人民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及社会的中心。无论在历史还是在现实中，伊朗人民的生活都和清真寺紧密相连。因此，在伊朗凡有穆斯林聚居之地，必有清真寺建筑。

中国伊朗学论集

以上事实说明，伊朗作为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和传统与现代并存的伊斯兰国家，千百年来，在伊朗人民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宗教是一个基础性的和相当活跃的因素，它对伊朗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的日常生活都产生着深远的影响。伊斯兰教显然已成为伊朗维护其民族群体凝聚力的精神支柱和纽带。尤其什叶派思想已在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占主导地位，对人们的文化风尚、伦理道德、生活方式和习俗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切实际上已经包容了一个民族发展的主要历史特点与民族精神的形成，以及这个民族特有的生存方式、社会结构和生命力所在。由此可以说，伊朗人民的民族精神不是抽象的精神框架，也不是捉摸不定的幽灵，她是活生生的具体支撑历史有机体的民族魂魄，也就是说，伊朗民族精神不但有其共时性结构，而且有其历时性结构。正因如此，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在它的身上重新崛起的力量从未消失过。我们可以从公元前 521~公元前 485 年在位执政的大流士一世的陵墓碑文中看出：

我，大流士，伟大的王，诸王之王，各藩属国的王中之王，阿契美尼德族维什塔什卜之子，承神圣阿胡拉的恩典，靠波斯军队征服了这些国家。这些国家害怕我，给我送来了王冠，它们是：胡齐斯坦、米底、巴比伦、阿拉伯、亚述、埃及、亚美尼亚、卡帕杜基亚、萨尔德、希腊、萨卡提、帕尔特、扎尔卡、赫拉特、巴赫塔尔、索格特、花刺子模、鲁赫吉、岗达尔、萨尔、马那……长期以来统治着一个辽阔无边的世界……大流士祈求阿胡拉和诸神保佑，使这个国家、这片土地不受仇恨、敌人、谎言和干旱之害。

人们也可以从今天的伊朗国徽中发现，由四弯新月、一把宝剑和一本《古兰经》组成的圆形图案。图案中的新月象征伊斯兰教；《古兰经》位于顶端，象征伊斯兰教高于一切，是共和国行为准则的依据；宝剑象征刚毅与力量，有如巨刃摩天，力斩“恶魔”。四弯新月和《古兰经》组成阿拉伯文的“安拉”（真主），寄托了他们所有美好的希望和心愿；而整个图案呈圆形，象征地球，表示“安拉”的伊斯兰思想遍及全球。国旗呈长方形，自上而下由绿、白、红三个平行的横长条组成。白色横条正中，镶嵌着红色的伊朗国徽图案。白色与绿色、红色交接处，分别用阿拉伯文写着“真主伟大”，上下各 11 句，共 22 句。这是为纪念伊斯兰革命胜利日——1979 年 2 月 11 日，伊斯兰教太阳历为 11 月 22 日。国旗上的绿色代表农业，象征生命和希望；白色象征神圣与纯洁；红色表示伊朗有丰富的矿产资源。与国徽、国旗中所表现的一样，波斯民族的认同中也同时包容着东方和西方的内容。在历史上，由于波斯帝国的历史文化积淀，以及伊斯兰教思想精神的熏陶，伊朗呈现出一种波斯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交相辉映的独特现象。这种特性决定了伊朗在伊斯兰世界与西方世界，伊斯兰世界与基督教世界，伊斯兰世界与东方世界之间维系着一种微妙的桥梁关系。尽管这种作用有时是以制衡的形式体现出来的。如在冷战初期，伊朗“借美制苏”，迫使苏联从伊朗撤军。当苏联于 1979 年 12 月 27 日入侵并占领阿富汗时，伊玛姆霍梅尼从苏联入侵阿富汗这一事实中认识到：有关超级大国所带来的危险不亚于美国，从而提出“不要西方，也不要东方，只要伊斯兰”的外交政策，大力向外输出革命，企图担当伊斯兰世界的领袖，并声称要切除以色列这个“伊斯兰世界的毒瘤”，彻底排挤美苏势力的影响。这种极端的外交政策使伊朗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一度出现紧

中国伊朗学论集

张，以至爆发了八年的两伊战争。冷战结束后，伊朗传统的制衡外交政策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但是，伊朗作为世界第二大产油国，随着世界能源消费的不断增加而日益凸显其重要性。据联合国《2006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伊朗未开发的石油估计有1258亿桶，居世界第二位。伊朗天然气储量也很可观，拥有26.6万亿立方米天然气，约占世界总储量的16%，仅次于俄罗斯，居世界第二位。伊朗还是世界铜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估计储量约9亿吨，占世界铜储藏量的15%，仅次于智利，居世界第二位。特别是近年来，由于石油价格上涨等原因，经济发展一直保持6%以上的增长速度，预计今后几年伊朗经济增长率将达8%。目前伊朗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前十名国家之一，其GDP达到1660亿美元，是亚洲第八经济强国。

二、伊朗和美国：旧怨未泯 又添新仇

事实上，今天处于交恶的美国和伊朗在1979年以前曾经有过一段非常密切的双边关系，从1941年至1979年长达38年里，美伊两国这一段时间内由“淡漠”到“亲密”再到“仇视”的关系发展过程，说明了国与国双边关系的发展变化无不取决于对国家利益的追逐和国家实力的较量。特别是自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后，两国于1980年4月断绝外交关系以来，长期处于相互敌对的紧张状态。美国不仅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全面制裁，而且还对伊朗实行禁运，在波斯湾部署了大量军队和武器装备，对伊朗形成强大的威慑。尤其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以来，随着驻伊拉克美军伤亡不断增加，布什政府面临着空前强大的压力，在因伊拉克局势导致共和党失去参众两院控制权后，不得不在日前推出对伊新政策，并把伊拉克局势

恶化的一部分原因归咎于伊朗。进入 2007 年，美国不仅接连向设在波斯湾的巴林海军基地增派航空母舰，而且美战舰群集结剑指伊朗，驻伊拉克美军还袭击了伊朗驻伊拉克埃尔比勒的领事馆，逮捕其外交人员，使业已紧张的美国—伊朗关系呈现出剑拔弩张的态势。为了以牙还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伊朗政府对此予以强烈驳斥，称被抓捕的伊朗外交人员的行为完全符合外交准则，美军的行动破坏了《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并要求美军立刻释放被捕的外交人员。伊朗伊斯兰议会也通过一项法律修订案，根据修订后的法律议案，对因美国的敌意而受伤害的伊朗公民，伊朗法院可以判决美国支付伊朗公民惩罚性赔偿金；并且在核问题上频频作出强硬之举：先是重启核燃料研究，接着又重启铀浓缩活动，对于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不仅断然拒绝，而且硬触敏感雷区——宣布掌握铀浓缩技术，以石油大动脉霍尔木兹海峡为重点在波斯湾海域和边境地区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接连宣告掌握了新式尖端武器。尤其今年 2 月 19 日，在距联合国安理会为伊朗规定的期限只有两天的时候，伊朗在 30 个省当中的 16 个省举行了近一年来规模最大代号为“庄严”的军事演习。对此，美国总统布什在接受采访时说，伊朗支持恐怖组织，威胁以色列，干扰伊拉克民主进程，是美国可能面临的来自单个国家的最严峻的挑战。布什表示，有关伊朗核问题的冲突可以和平解决。但是，他一再重申，如果伊朗在伊拉克煽动暴力活动，美国将予以坚决回击。这些都预示着布什政府从强硬政策后退，但智库美国发展中心下属的国家安全和国际政策研究所副主任约瑟夫·奇林乔指出：“多数（鹰派人物）还留在政府高层，留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内，可能包括总统本人。”他认为在布什政府高级官员的眼中，推翻伊朗现政权的想法是不可更改的，没有迹象表

中国伊朗学论集

明美国政府正在寻求其他解决方法。“伊朗核问题只是个理由，美国更深层次的打算是利用军事力量彻底改造中东”，拔掉伊朗“这颗钉子”。伊朗外交部对此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布什政府逮捕伊外交人员，并与反政府武装相互勾结，在伊朗边境地区制造爆炸和流血事件。伊朗声称，美国违背国际法准则的行为，终将多行不义必自毙。

事实上，美国在波斯湾新一轮的军事集结，似乎表明美国在中东的注意力已从伊拉克转移到了伊朗，美国向那里增派包括航母在内的舰只意在威慑，而美国抓捕伊朗外交官，明显在告诫伊朗不要在伊拉克“以身试法”。赖斯甚至公开对外透露，本次袭击伊朗领馆得到了布什总统的批准，这足以说明美国对伊朗的忍耐已到了极限。笔者认为，伊朗遭受来自美国及其盟国对其核设施进行军事打击只是时间问题，实际意义上的美伊之战业已打响，动武可能性在增大。

三、伊朗凭什么可以说不

打破美国和西方强权势力，孤立、制裁和袭击，对伊朗来说，核问题首先关系的是国家的尊严和权利，也是伊朗多年来梦寐以求的重要国策。伊朗大学生民意调查中心对该国 1019 名 18 周岁以上的公民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约 85% 的伊朗民众支持政府发展核计划。85.4% 的伊朗人认为，当前解决伊朗核问题的最佳方法是继续进行核活动。与此同时，84.3% 的受访者赞同政府和平开发核技术，即便是在联合国安理会制裁的情况下。这项调查还显示，有 12.7% 的受访者认为，德黑兰应该向西方作出让步。伊朗曾多次声称和平开发核能是“伊朗人民的意愿”，并拒绝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作出妥协。目前伊朗的对外政策从总体上来看，为了突破美国

的包围和封锁，其外交政策的轴心虽是根据伊斯兰革命的原则，同周边国家及其他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并将消除危机作为自己外交政策的出发点。但同时又把同俄罗斯、中国、印度，中东、中亚、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关系视其外交政策的轴心和重中之重。近年来，伊朗几乎同所有周边的伊斯兰国家之间在文化、科技、经济、政治等各个领域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并积极地发展同它们的多边和双边合作。从伊朗目前的外交走向的态势看，伊朗无视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指责与威胁，正逐渐加入“亚洲人”的圈子。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伊朗与他的宿敌伊拉克，化干戈为玉帛、不计前嫌，主动改善关系，在政坛传为佳话。就此我们可以从美联社巴格达 2 月 1 日电文中看出：伊拉克政府发言人阿里达巴格今天说“伊拉克愿意与伊朗保持良好关系。任何针对多国部队的袭击都是在与伊拉克政府作对。但我们同时也希望与邻国，特别是与伊朗，保持良好的关系。两国的边界线很长，我们有共同的地区利益，希望我们的关系不要受其他事件的影响。”在巴勒斯坦和黎巴嫩问题上，伊朗长期以来不惜重金，甚至不顾美国和西方舆论的强烈反对及断交、制裁的威胁，全力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起义斗争和黎巴嫩伊斯兰真主党的活动，以此凝聚伊斯兰世界。尤其 2005 年 10 月 26 日，伊朗总统内贾德公开声明：“犹太政权的建立是世界压迫者反对伊斯兰世界的举动——正如伊玛姆霍梅尼所说，以色列必须被从地图上抹掉。”此言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美国副总统切尼表示：“伊朗的领导人不是在玩政治，而是在用伊朗的宗教影响来支持这个国家想扩张的野心。”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援引阿塞菲的话说：“美国把那些为解放自己家园而斗争的人称为‘恐怖分子’，而恰恰是它自己在支持以色列的恐怖主义行为。所有穆斯林国家都谴责美国

中国伊朗学论集

的这一做法。”阿塞菲强调，中东危机不可能在片面支持以色列一方的情况下得以解决。伊朗和其他穆斯林国家都有义务和责任支持为争取基本权利而战的巴勒斯坦人民。他指出：“伊朗向受压迫的巴勒斯坦人民和黎巴嫩抵抗运动提供的人道主义和精神支持不需要得到美国的批准。”

伊朗缘何如此强硬？从历史上看，伊朗曾是多少叱咤风云帝王统治的摇篮，既有征战掠夺的记录，又有被异族统治和蹂躏的经历，但波斯文明从未被同化。对伊朗人来说，更引以为骄傲的是它曾建立过第一个横跨亚、非、欧的波斯帝国，创立了影响巨大的琐罗亚斯德教和摩尼教，有过居鲁士、大流士、阿尔大希尔、霍斯劳、琐罗亚斯德和摩尼这样的伟大人物。

我们可以从公元前4世纪成书的波斯古经《阿维斯塔》[用金汁书写在12000张牛皮上的诗歌、传说和民间故事（典籍）]中，了解到波斯文明成长的足迹。阿契美尼德人利用埃兰文字、阿拉米文字创造了波斯楔形文字，他们还吸收了巴比伦的天文学、医学，腓尼基的航海技术，以及乌拉尔地区民族的建筑艺术。如今在波斯波利斯，这座气势宏伟的古波斯宫殿建筑群，虽然那些巍峨的建筑遗址和精美的浮雕艺术经过2000多年风雨的琢蚀，但巨石和高柱所承载的古代文明的印痕，依然向后人讲述着昔日的辉煌和说不尽的典故。

因此，伊朗人强烈希望民族振兴。从地缘政治上看，由于近邻的印度、巴基斯坦和以色列都拥有核武器，伊朗不满美欧核霸权以及在拥有核问题上的双重标准，伊朗人更视拥有和掌握核技术为国家地位的象征。从战略安全上看，伊朗人经过8年两伊战争，目睹了发生在家门口的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再加上美国在其周边建立军事基地，美军舰队在领海出没，伊朗人深感安全环境险恶，坚信自己的核开发是

合法的，符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所有规定。因此，伊朗不愿在核问题一隅被美国逼死，它会凭借自己的影响和力量在中东这个大棋盘上与美国博弈。

其实，除了经济盾牌和军事盾牌外，把握在伊朗手中的王牌还很多。伊朗媒体曾评论说，美国推翻萨达姆政权，实际上帮伊朗铲除了宿敌，与其说是美国在伊拉克取得胜利，倒不如说是伊朗取得了胜利。不仅如此，伊朗更有多张王牌在手：可以动员其在阿富汗、黎巴嫩、巴勒斯坦和伊拉克的势力对抗美国；以非对称方式在美国本土和全世界打击美国利益；利用产油大国地位和雄踞巴士拉湾的战略位置随时掐断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线；波斯文明的内核、伊斯兰的精神气质，以及独特的政治地缘，更增强了伊朗外交的国际资本。

此外，伊朗政府不久前宣布，拨款 700 万美元援助 7 个国家，即塔吉克斯坦 250 万美元，伊拉克 200 万美元，尼日尔、几内亚和马里各 150 万美元，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各 50 万美元。而对东边的邻国阿富汗，伊朗曾向其提供了 4 亿美元的经济重建资金，巴基斯坦和阿塞拜疆在支持西方和保持中立上都会有自己的选择。由此可见，伊朗与本地区及邻国关系的恢复和改善，极大地动摇了美国经济封锁、围追堵截的基础，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动摇作用将会更加明显。不管美国愿不愿意，承认不承认，它对伊朗的继续制裁和大兵压境换来的只能是更加被动和尴尬。

很显然，布什要想真的知道德黑兰为什么敢“玩心跳”，首先要明白的是，伊朗并非是一个被“教士们”劫持的国家，而是一个有着强烈的历史荣誉感和民族自尊心，经历了 8 年残酷战争洗礼，向着现代化转型的国家。内贾德作为这片土地上成长起来的政治家，对于他来说，核问题在伊朗国内不只关乎



中国伊朗学论集

民族自豪感，也关系到民族的生死存亡。因此，在伊朗人眼里，几乎每一个美国人都是间谍；而在美国人眼里，似乎每个伊朗人都是恐怖主义分子，这几乎已经成为伊朗人和美国人的共识。在德黑兰，令人难以忍受的是看到一些上了年纪、不修边幅、邋里邋遢的妇女和儿童在地铁口、在人行道上伸手乞讨的情景。但当我同这些一贫如洗的乞丐们交谈时，在他们的脸上却找不到凶恶和仇恨的神情。他们似乎是沉醉于自己的艰难处境，明亮的眼睛里闪烁着希望的光芒。在其他国家这种极度反差的画面是没有的。这是伊朗之谜的一种。

伊朗人不仅仅在生与死中恪守伊斯兰教义，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如此。我在周围看到的一切证实了自己长时间以来，所持有的对伊朗人性格的认识。相信“只有一个真主，只承认他的统治并顺从他的意志”、相信“基于《古兰经》公正治国的古老信念”是伊朗人的典型特征。这种性格特征在今天美国“先发制人”威慑情势下显得尤为突出。当你从“阿舒拉”等重要宗教节日的悲壮场面哀思中看到伊朗人独特的民族精神气质，你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伊朗人敢于在“圣战”之中大无畏牺牲自己的生命了。因此，我们先由此神往德黑兰，是为了感受她丰厚的波斯伊斯兰文化和现代化气息，这样的都市，出现伟大时一定气宇轩昂；蒙受灾难时一定众志成城、悲情漫漫；处于改革与开放时，一定步履艰难；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时，则树欲静而风不止。它本身没有太大的主调，但它却充满了重新崛起的力量！

对《元史》所载赛典赤几件事情的再认识

马 经^①

杨怀中先生在1983年写的一篇评述赛典赤的文章中总结说：赛典赤“从朝廷到地方，各个方面都说他好，都敬仰他、怀念他，没有说他不好的”^②。像这样的人物，莫说在云南历史上，就是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查遍有关史书，的确没有一个人不说他好，也没有一个人说他不好。杨先生说的确实是事实。可是人无完人，这个道理谁都知道，赛典赤也不是完人，要说赛典赤一点缺点都没有，也不符合事实。人人都说他好，是因为人们深知他一生做了那么多好事太不容易，而深深地敬重他、珍视他，希望他以一个完美的形象永远活在人们心中。人同此心，这种心理是可以理解的。正如毛泽东曾经说过的：“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当然这里说的只做好事不做坏事，只能是就主观愿望或就大事而言，因为很难免好心也有办坏事的时候。因此一生当中，尤其是对于做了很多事情的人来说，要想一个错误不犯，一点坏事不做，是不可能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样的人

^① 作者系云南民族大学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② 杨怀中：《赛典赤·赡思丁和他的家族》，收其《回族史论稿》，宁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中国伊朗学论集

物，历史上并不少，似赛典赤这样为开发云南作出过重大贡献者也不乏其人，如诸葛亮，杨先生文中所引近人怀念赛典赤的诗句就说：“遗爱南中谁最永，武侯而后有咸阳”。然而能受到这样爱戴和好评的仅赛典赤一人。其原因古今前辈已有许多论说，只是思来想去，未觉透彻。近细读数则有关赛典赤碑传谱牒文献，如：赵子元《赛平章德政碑》，安南王《祭咸阳王忠惠公文》，王臣《咸阳王庙铭》，明太祖《御制祭咸阳王忠惠赛公文》、《御制诗》，明成祖《敕赐元平章政事赛典赤·瞻思丁祭文》，范承勋《新建报功祠碑记》、《沅咸阳王忠惠公抚滇绩序》，蒋伊《增建咸阳王陵前亭后堂记》，袁文揆《咸阳王墓志铭》，袁嘉谷《重修咸阳王陵记》等以及赛典赤家族谱牒资料，如《马氏家乘》（巍山），《咸阳家乘》（大理），《赛氏总族牒》、《赛氏谱牒》（石屏），《赛典赤家谱》（昆明），《咸阳世家宗谱》（南京，木刻板封面）、《（郑氏）家谱首序》（南京），《沙氏宗谱》（大理），《郑和家谱》（玉溪），李至刚《故马公墓志铭》（昆阳），夏光南《郑和太公墓志铭跋》（昆阳），《郑刘太君墓碑》（昆阳），《皇明敕封世袭锦衣卫纳永阶之墓碑》（河西，今通海纳家营），《合氏宗谱》（河西，今通海），马注《瞻思丁公莹碑总序》（昆明），任士林《平章政事赛典赤荣禄公世美之碑》，《重修清净寺碑记》（西安），《非幻庵香火圣象记》（南京），李昭祥《龙江船厂志》（南京），傅为宁《甸百亩合揆进士墓志》（峨山），《甸百亩村代香书馆碑记》（峨山），《大白邑清真寺功德碑》（峨山），《下回村清真寺碑记》（通海），马安礼《滇南回回总掌教马公墓志》等。发现这些出自不同渠道、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人物、不同文化水准、甚至不同国度的碑传谱牒中所不约而同、异口同声称赞的事迹，其中蕴含之深

意，与元史选载事迹的意图惊人的相似。^①想到其绝非巧合，因有所思，遂有所省。感觉赛典赤备受敬仰的深层原因并不完全在于其业绩的大小多少或其事迹与别人有多大的不同。他的一生并没有特别惊天动地、气吞山河的壮烈事迹，然在其看似平稳若定的事业中却蕴含着非同寻常的思想境界和水平，所以更令人难以忘怀。兹引《元史·列传第十二·赛典赤·赡思丁》记载的几件史事为例，略抒蠡见。

其一，史载：“十一年，帝谓赛典赤曰：‘云南朕尝亲临，比因委任失宜，使远人不安，欲选谨厚者抚治之，无如卿者。’赛典赤拜受命，退朝即访求知云南地理者，画其山川城郭、驿舍军屯、夷险远近为图以进，帝大悦，遂拜平章政事行省云南，赐钞五十万缗，金宝无算。”

忽必烈欲委赛典赤到云南的情况，赵子元《赛平章德政碑》这样记载：“至元甲戌，帝乃叹曰：‘云南胜地，极在遐荒。自朕亲临，率兵归附，迄今役属二十余年。抚恤之心虽切于己，而下民之志亦尚未安。今欲得人，以革其弊。’”赵子元时曾任大理提举令等职，亲历赛典赤建省治滇活动，所述可与《元史》互见。元初，蒙古贵族视巩固云南作为其夹击南宋和绝其生路的重大战略，故曾不遗余力地加强对云南的统治和经营。公元1253年忽必烈率军十万攻克大理后，为争夺皇位，急班师北返，留兀良合台继续平定大理各部。兀良合台统治云南的四年多时间里，“八籍民户，四籍民田”，大肆搜刮钱粮以充军饷，签发

① 详见所列文献。

中国伊朗学 论集

大批云南各少数民族青壮年组成“爨焚军”，从征南宋，大片圈占田地放牧牲畜，大量掳掠少数民族人口充当奴隶。在蒙古统治者所划分的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人中，云南各族人民被视同南人，为最低一等。云南各族人民不堪蒙古贵族的压迫和奴役，于1264年爆发了以舍利畏为首的三十万人的大起义。原大理各部也时常起来反抗。南宋王朝更不断派人来云南各地策反。忽必烈靠起用大理旧主段实暂时镇压了舍利畏起义后，为了加强对云南政权的控制和对各族人民的统治，一方面封其第五子为云南王，统辖云南事务，一方面又设立“大理等处行六部”和“大理等处宣慰都元帅府”分别管理云南行政和军事，使之互相牵制。结果居然发生了忽必烈的儿子云南王在与地方军政长官争夺权力的矛盾冲突中被毒死的事。忽必烈一面设法削弱争相膨胀的地方势力，急把滇东三十七部从大理各部中划出来，分为南、北、中三路，设达鲁花赤监管。一面急寻能够控制云南局势的人选。可见忽必烈找赛典赤谈话时，云南政局已陷入危机四伏，一触即发的状态，各族人民为此备受扰攘，苦不堪言，必须要找一个非常谨厚者去抚治，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素以谨厚著称的赛典赤此时年事已高，已赋闲在家休养。但忽必烈挑来选去，终觉除赛典赤外，别无更合适的人选。忽必烈以非常诚恳的态度检讨自己用人上的不当，以商量的口气征求赛典赤的意见。赛典赤深知忽必烈的心思，立即着手准备，离京前已把云南的大概形势及自己的初步想法向忽必烈作了汇报，深得忽必烈赞赏，授予他便宜行事的特别权力，实际上等于钦差大臣，可以皇帝之名义行使权力。以云南当时局势的敏感度言，如此授权的风险不言而喻。这既表明忽必烈对他的信任，“赛典赤忧国爱民，朕洞知之”并非虚言，同时也反映出云南局势已到了非动用朝廷重臣和授予重权不能收拾

的地步。后来发生的事情也证明了这一点。赛典赤以近古稀之年受命到云南，是深知这使命的重大，实为临危受命。赛典赤在云南六年所做的事情，证明了忽必烈以谨厚之人抚治云南的抉择的正确，当然也正是这个抉择才使后人得以从他在云南的事迹中领略到其中蕴含的非同寻常的政治境界。

其二，史载：“时宗王脱忽鲁方镇云南，惑于左右之言，以赛典赤至，必夺其权，具甲兵以为备。赛典赤闻之，乃遣其子纳速刺丁先至王所，请曰：‘天子以云南守者非人，致诸国背叛，故命臣来安集之，且戒以至境即加抚循，今未敢专，愿王遣一人来共议。’王闻，遽骂其下曰：‘吾几为汝辈所误。’明日，遣亲臣撒满、位哈乃等至，赛典赤问以何礼见，对曰：‘吾等与纳速刺丁偕来，视犹兄弟也，请用子礼见。’皆以名马为贄，拜跪甚恭，观者大骇。乃设宴陈所锡金宝饮器，酒罢，尽以与之，二人大喜过望。明日来谢，语之曰：‘二君虽为宗王亲臣，未有名爵，不可以议国事，欲各授君行省断事官，以未见王，未敢擅授。’令一人还，先禀王，王大悦。由是政令一听赛典赤所为。”

身为宗王的脱忽鲁居然准备以武力抗拒皇帝钦差的朝廷命官。可见云南政局之乱，已完全失去了章法。对这样的事，当然可拟以造反罪论处，至少可以欲行造反罪进行要挟以便于笼络控制。“云南守者非人”，宗王自然首当其冲，难辞其咎，“必夺其权”也是情理中事。可脱忽鲁“具甲兵以为备”，就把问题的性质严重化了。这么大的事，以“惑于左右之言”来推

中国伊朗学 论集

脱，也是说不过去的。不过接下来的事，出人意料。从赛典赤的两次“未敢”，可以看到什么叫“谨厚”：脱忽鲁没有办好云南的事，有失职之过；又准备武力抗拒，有不忠之举。赛典赤不追究不说，要给予抚慰也不说了，竟然还主动提出抚慰的事，不敢自己说了算，得与脱忽鲁“共议”，一起来办。从云南发生的一系列反叛事件，以忽必烈的精明和丰富的经验，对赛典赤到云南可能遇到的麻烦不难预料，故有“戒以至境即加抚循”的嘱咐。对此严重过失行为和罪错的“抚循”，意同招安、善后，实际与招降纳叛无异。只要迷途知返，接受处理，可以既往不咎，也就算皇恩浩荡，谢天谢地了，哪还有奢望参与决定“抚循”大计的。居然有这么好的事，因此脱忽鲁才会“遽骂”其下“吾几为汝辈所误”。对脱忽鲁派来议事的亲臣撒满、位哈乃，自然要以礼相待，但因不知他们“名爵”，故有“问以何礼见”。又因没有名爵不可以议国事，须授予相应的官职，赛典赤又因尚未征求脱忽鲁的意见，再次表示“未敢擅授”。至此，脱忽鲁才“大悦”，疑虑冰消雪融。这件事，从脱忽鲁剑拔弩张“具甲兵以为备”，到撒满、位哈乃面对忠厚长者自“请用子礼见”，至最后令脱忽鲁五体投地，“政令一听赛典赤所为”。这戏剧性的变化既在情理之中，又太出乎人们的预料，所以当撒满、位哈乃恭恭敬敬向赛典赤行拜跪之礼时，“观者大骇”。不可能的事就这样发生了，能不令人吃惊？今人恐怕很难再体会到这四个字所表达的意思了。后人自然容易以之与一般的施舍恩惠、收揽人心之类相提并论，故难以细心去体味其中的深意。赛典赤之所以这样做，不是把脱忽鲁等一批云南官员的是非得失孤立起来看，而是把他们放在云南历史与现实情况当中，设身处地的想问题，体察他们的处境和难处，了解他们的思想和心情。赛典赤对他们的尊重和信任，绝

不是故作姿态，而是建立在充分理解的基础上的，是完全合乎情理的。

其三，史载：“十二年，奏：‘云南诸夷未附者尚多，今拟宣慰司兼行元帅府事，并听行省节制。’又奏：‘哈刺章云南壤地均也，而州县皆以万户、千户主之，宜改置令长。’并从之。十三年，以所改云南郡县上闻。云南俗无礼仪，男女往往自相配偶，亲死则火之，不为丧祭；无梗稻桑麻；子弟不知读书。赛典赤教之拜跪之节，婚姻行媒，死者为之棺槨奠祭，教民播种，为陂池以备水旱，创建孔子庙、明伦堂，购经史，授学田，由是文风稍兴。云南民以贝代钱，是时初行钞法，民不便之。赛典赤为闻于朝，许仍其俗。又患山路险远，盗贼出没，为行者病，相地置镇，每镇设土酋吏一人，百夫长一人，往来者或值劫掠，则罪及之。”

与秦汉封建制一道建立的郡县制，至元代时虽然已经历了一千多年，但在如云南这样的边远民族地方，经常发生名不副实、有名无实、名存实亡的情况。这既有制度设计本身不适应这些地方的实际情况方面的原因，也有推行不力的原因。两者往往互相交织纠缠在一起，时间既久，互为诟病，因果难断，陷人于无所适从的境地。这也是云南郡县历千多年来仍区划不清、权责不明、甚至疆域不稳、诸夷叛服不常的根本原因。这种情况到元初也没有改变，反而有愈甚的情形。故元代行省制度的推行，在云南照样面临着同郡县制一样的命运。

按元初的制度，省一级地方行政机构是既设行省又封宗

中国伊朗学 论集

王，王政与省政并存，权限不清，以实力相逐。这很容易产生矛盾。有了矛盾，必然政出多门，行省制度的作用无从发挥。这类问题，在赛典赤到云南前，在其他地方已经发生。而在云南这样的地方，各个少数民族地区往往自成体系，行省制度本来就不容易推行，若照此下去，省政很可能又流于形式，行省制度终将名存实亡。有鉴于此，赛典赤决定首先解决省政与王权的关系问题。也正是鉴于云南的特殊情况，忽必烈特授予了赛典赤“便宜行事”的权力。宗王脱忽鲁“以赛典赤至，必夺其权”，也许是闻到了一点风声了。正因为有所预见，解决省政与王政关系这件事，开场就做得有板有眼。这不是省长与宗王的个人权力问题，只要能出于公心，本着兴利除弊的宗旨，抛开个人权力地位的计较，就能达成共识。这就是赛典赤到云南后做成的第一件事。有了这样的基础，才能办好其他事情。所以接下来赛典赤办的许多事，都有条不紊，顺理成章。

“云南诸夷未附者尚多”，这是云南的内政问题。云南从一定程度上讲，就是由诸夷构成的，诸夷安，云南安，诸夷乱，云南乱。诸夷未附，很多事都谈不上，行省制度更无从说起。当时管诸夷事务的机构为宣慰司，隶属军事系统，以宣慰司管民族地方事务，虽然意味着对付诸夷未附或叛服不常一直被看成是军事部门的事，是要靠武力镇压和战争来解决的事。但宣慰司多接触民族事务，是对各少数民族的事有较多了解和发言权的部门。在云南，民族事务是首要大政，但处理像诸夷未附这样属于民族工作重中之重事务的大权却掌握在元帅府手里，对民族地区事务接触较多的宣慰司实际上没有充分的发言权。云南的事办不好，出了那么多的问题，这是根子之一。无论实行什么制度，都有一个怎么处理诸夷的问题在里面，这是历代云南治乱的关键所在，行省制度也不例外。赛典赤看到了这个

关键，把解决这个问题列为行省制度建设的首要任务。为此，他提出了“宣慰司兼行元帅府事，并听行省节制”的方案。这是一个一举两得的方案。后人评价这个方案多从民政与军政关系及其统一的意义这个角度设论，而不太注意它在民族地区治理制度方面的意义。从郡县制和行省制推行到云南，官方史志中保存的有关云南地方政治的记载，都是以郡县制度和行省制度为主，说明这是官方关注的重点。民族、边疆制度在云南地方制度体系中被边缘化。这种倾向的导向作用对云南政治史的研究是产生了很大影响的。自古至今，人们常常自觉不自觉地忽视这个方面。

事实上，云南自秦汉设置边郡制度始，至唐宋时设置边州，几经沧桑，虽建立起了全省性的基本统一政权，但并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制度体系，郡治中心也不大固定。从西汉设置郡县到南诏崛起洱海地区，历八百五十年左右，郡县制度中心在滇池南岸地区，实际控制范围不出滇池周围地区。东晋以后，随着中心的转移，实际控制范围移至洱海周围地区。因此，郡县制度在云南虽不断发展却难以巩固，边郡（边州）的疆域也不固定，郡县制的作用范围很有限。造成这种状态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比如地处偏僻、民族众多、交通困难、经济文化落后、政治基础薄弱、社会发展长期处于落后状态等。其中民族众多是一个主要的因素。因为在所有这些与上述政治制度有密切关系的因素中，人是首要的因素。而人都是有民族属性的人。所以民族众多因素是云南所有的政治制度设计中必须重点考虑的因素。蜀汉诸葛亮似乎考虑到了一点，但云南不是他的重点，故涉及不多。赛典赤把诸夷问题作为行省的第一要务，是第一个比较全面系统考虑这个因素而取得很大成功的人物。元灭大理段氏后的最初一二十年，实行的是军事性或准军事性

中国伊朗学 论 集

的统治，以宣慰司兼行元帅府事，当然有军政统一的重要意义。但赛典赤上报朝廷要“宣慰司兼行元帅府事，并听行省节制”的方案，只讲了一个理由，就是“云南诸夷未附者尚多”。当然还有别的理由可讲，但他认为这是最充分的理由。至于他怎么阐述这个理由，史书里没有详细记载。朝廷可能在两种情况下接受了他的方案：一个是被他说服，一个是出于对他的信任，也有可能两者都有一点。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朝廷里没有反对的意见，要做到这一点也不容易。因为要真正懂得这个问题不太容易。在赛典赤之前和之后，云南历史上因这个问题处理不当而酿出的恶果不少。每当这种时候，人们会更加怀念他。

正是因为始终处处注意到云南少数民族众多这个特殊情况，赛典赤在创建云南行省制度的各个方面，基本都能做到宽严适当、进退自如、张弛有度、处变有方。当然，作为行省首任平章政事，他的基本目标任务是要把云南建成一个名副其实的行省。所以除设立宣慰司、宣抚司的少数民族地方外，赛典赤结合云南具体情况，改定云南诸路名号，省会设在昆明，称中庆路，行省之下，设路府州县等与内地相同的各级行政组织和各种专门机构，如云南诸路规措所、云南银场提举司、云南行省儒学提举司、中庆路榷税官、大理路白盐榷税官、云南行省铨校官等，这些机构也都比照内地设立。这是保证云南行省与全国一体化的基本体制。云南建省除了具有与内地一样的完善地方行政制度的意义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意义是要使云南地方行政体制主流化。从把云南地方行政纳入与全国一致化进程的意义上说，云南建省的实质在于主流化。而云南地方行政主流化的重点和难点，在于边疆民族地区。这样一来，在云南建省问题上，就出现了一方面要强调地方（边疆）性、民族性、

特殊性，另一方面又要强调一体化、主流化、一般（普适）性的矛盾。怎么解决这个矛盾，处理好这个关系，是最能体现政治水平的问题。理论上可以想出不少道理、办法，可一接触到实际，就不那么容易了。对这个矛盾关系，赛典赤怎么处置，这段文字中所提到的几件事也颇值得注意。

其一，关于哈刺章（云南）置令长事。云南原有州县，元军攻占云南后，又设万户所、千户所、百户所等“主之”，这些机构属军事系统，带有军事统治性质，与原郡县制度重叠冲突不说，且将关系到新设行省的行政区划、机构设置、职官管理及相关政策法规能否统一。秦汉以来，郡县制在云南虽推行了一千多年，但比之内地，成效甚少。不少地方初即有名无实，继则名存实亡。至唐宋时，中原封建文明已达鼎盛，而云南多半还停留在原始社会和奴隶制社会。郡县制推行不力，是云南社会发展缓慢，经济文化落后，生活水平低下的主要社会政治原因。因此行省制度的创建，对于云南社会发展来说，便有了完全不同于内地的意义，是千年不遇的关键时期，机遇稍纵即逝，形势艰难严峻。弄不好，就会同郡县制度一样，成为又一个千年之憾。因此不能再有任何的姑息迁就，这是云南政治的重大原则问题，是不能含糊的。只要在行省辖区内，就须与全省、全国一致，这是设置行省的根本目的和意义之所在。所谓“云南壤地均也”，意在进一步强调全省各地都必须一致，才能保证云南与全国一致。即都应纳入行省管辖之内，按新制度要求统一设置相应的路、府、州、县和统一的机构、职官，不能例外。这也是确保云南全省的一般性与云南边疆、多民族特殊性相统一的基本保证，作为基本原则问题，少数民族地区亦不能例外。只有与全国基本同步，云南社会发展才有根本保证。这是千年郡县史留给云南的最宝贵的经验。对此，赛典赤

中国伊朗学 论集

予以了高度重视，把建立行省制度放在云南所有事情的首位。前面已成功取得宗王谅解，是第一步。废户所置令长，是第二步。这一步的实质是要把全省的行政权从手握重兵，战功卓著，实力强盛，又控制了地方财政的户所长官手里收归省府统一掌管。鉴于云南政权久难统一，各地方权力机构争权夺利，完全以实力相逐的实际，朝廷耍起了平衡各股势力，使其互相抑制的手腕。后来事实证明，这是朝廷的基本策略，赛典赤之后，旧病复发，朝廷只得又捡起这治标之法。此是后话。赛典赤此举，虽有扩大行省势力的可能，但一来行省为中央派出机构，可以代表中央行使对地方的控制权，二来可以限制宗王势力的恶性膨胀，三来赛典赤志向远大，胆识过人，忠诚可靠，可放手一试。因此朝廷同意置令长以收户所权力的方案。赛典赤在取得朝廷初步同意后，把军事统治时期所设的万户府、千户所、百户所改为路、府、州、县。路设总管，府设知府，州设知州，县设县令或县尹。但少数民族地区可设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区划亦可沿袭大理国时期形成的土酋辖地设置。各级土官亦可从原土酋长中选任。对土官的管理和要求也可以适当放宽。这一切都可以灵活，其中心和目的就是要确立行省的统一管辖，服从行省的统一领导，保证行省制度在全省的顺利推行，彻底结束地方分裂割据的历史，把云南真正置于中央政府的有效控制之下，维护西南边疆领土、主权的统一、完整和稳定。赛典赤在云南行省建设的重大历史转折关头作出了英明的决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是关键的一步。可见这件事的意义不限于一时一地一事。其深远意义非对云南政治、历史有深思熟虑是体悟不到的。所以赛典赤之后，朝廷和云南宗王，大理段氏等地方势力还是作出了一些令人遗憾的事。朝廷虽然“并从之”，同意依赛典赤的意见办，赛典赤去世后，又

下令“尽守赛典赤成规，不得辄改”，并为此先后任命其子孙连续主政或参政云南：长子纳速剌丁先后当任过云南行省左丞、右丞、平章政事，三子忽辛任过云南行省右丞，五子马速忽任过云南行省平章政事。孙辈中，忽先任过云南行省平章政事，沙的任过云南行省左丞，沙的查尔丁任过云南行省右丞，伯杭任过中庆路达鲁花赤。法忽鲁丁任过姚安路达鲁花赤……尽管委派其诸多子孙到云南继承其未竟事业，但朝廷和云南宗王们终未能完全坚守赛典赤制定的基本方针和原则。赛典赤逝世后不久，不仅蒙古宗王、军事统帅、地方行政长官及原大理段氏势力又陷入了争权夺利的激烈争斗中，而且朝廷也随之又陷入了企图利用各股势力互相抑制而养痍遗患的恶性循环中。忽必烈从1267年封其五子忽哥赤统辖云贵地区起，开始用封宗王和培植其他势力的办法来控制云南。既封宗王，又设立“大理等处行六部”和“大理等处宣慰都元帅府”分别掌控云南行政和军事，使之互相牵制。赛典赤逝世后，为防云南局势失控，1280年封其孙也先帖木儿为云南王，1285年下令“事不议于云南王也先帖木儿者毋辄行”。（《元史·世祖纪·十》）1290年又封皇长孙甘麻剌为梁王，位在云南王之上，列诸王中第一等。这些宗王皆以代表皇帝的身份“君临”云南，使他们与大理段氏和行省及宗王之间互相限制。结果事与愿违，各势力争斗的最后结果，是段氏与宗王渐成“平分秋色”之势力。元朝后期，形成了梁王专制滇东，段氏割据滇西的分裂局面，在几乎断送行省大业之前也断送了自己。从这是非成败的对比当中，也许更有助于人们进一步认识云南推行行省制为何比前之郡县制能够取得巨大成功的奥秘所在。

其二，关于移风易俗传播先进文化的几件事。男女自相配偶，常有人解释为少数民族婚恋自由。从其未受到封建礼教束



中国伊朗学 论 集

缚的角度讲，有开放、自由、人性的一面。从人类礼仪伦常制度演进的角度讲，有粗浅、朴素、原始的一面。不可完全等同于建立在现代伦理文明基础上的婚恋自由。火葬也一样。从卫生防疫方面看，确有防止瘟疫、传染病传播的作用，古人选择火葬，可能有基于经验科学的因素，也有基于各种各样原始宗教鬼神观念的因素，但可以肯定和唯物主义、无神论无关。从中原汉族、儒家礼仪文明观念看，有原始的一面。赛典赤以为少数民族的这种婚丧风俗是未知婚丧礼仪文明，与未知中原农耕文明、文教进步一样。所以他把教少数民族跪拜尊长、婚姻行媒、为死者举行棺槨奠祭等视同教他们兴修水利、改进稻桑种植技术、办学读书，皆纳入传播中原先进文化和技术之列。在云南传播中原先进文化，有利于行省的建设，是云南行省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有重要意义的。所以赛典赤积极倡导中原文化。但他并不认为少数民族必须接受中原文化。在文化上，他采取了十分宽容的态度。首先，他倡导的东西，至少是他认为对国家、对行省建设和少数民族都有利的。其次，必须是少数民族能够并且愿意接受，否则宁可暂时放弃。如钞法一项。在宋代基础上形成的元代钞法，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方便的钞法，在云南推行，对云南政权的巩固、稳定，对云南各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发展进步，对云南行省制度的推行，都是有利的。但云南一些少数民族却认为不方便，他们习惯以贝代钱。虽然新钞法已经推行了一段时间，赛典赤还是把这个情况上报朝廷，要求朝廷准许继续以贝代钱。由此可以看出赛典赤对先进与落后，方便与不方便的判断，不是站在自身的角度看问题，不是以自己的观念强加于人。哪怕是国家的利益，国家的意志，在少数落后民族的意愿面前，该让步的还得让步。在这件事情上，国家和新钞法代表了文明、进步、大

局、真理和强大无比的一方，云南少数民族百姓和他们的贝币处于原始、落后、局部、谬误和弱小无助的一方。这是文明强大的一方向落后弱小一方的让步。赛典赤在这件事情的处置上，达到了很高的政治文明境界，在封建专制时代是极不容易的。

其三，关于置镇保护行人。云南山路险远、盗贼出没给行人带来的不便，不言而喻，历代也不乏关注，留下很多记载。但它对云南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造成的长期深远影响，却缺乏足够的认识。所以历史上在解决山路险远、盗贼出没和保护行人安全方面，虽断断续续有些零星举措，但时兴时废，实际效果甚微。盗贼出没与山路险远有关，而解决山路险远问题客观上有极大难度，朝野上下皆以为无奈，没人愿在这个事情上劳神费力。云南的高山峡谷不仅令人望而却步，而且挡住了人们的眼光，使他们看不到隐藏在高山峡谷里面的历史和未来。赛典赤到云南赴任前，对云南山川夷险形势已作过认真研究，研究结果曾让忽必烈看了“大悦”。待到任不久，这个问题果然就摆到了面前。这件事，按历代前任的惯例，就是摆在一边“冰冻保鲜”，作拖延处理，以便必要时或方便时作点修修补补。因为推掉是不可能的，完全推开不管，很快就会“腐烂变质”，危及其他部位以至“全身”。但赛典赤没有再按惯例对待这事。他把此类事与行省建设结合起来，纳入到行省建设的整体和全局中统一规措，下大力从几个方面加以解决。其中主要的，一个就是“相地置镇”，另一个是驿传系统的多功能化建设。

“相地置镇”，这种专为对付“山路险远，盗贼出没”，保护行人安全的镇，设在盗贼经常出没的附近地方，每镇设土酋吏一人，百夫长一人，以捉拿盗贼，保护行人安全和道路畅通为主要任务，发生行人遭劫掠案件要承担相应罪责。这种规模

中国伊朗学 论丛

的镇，显然既不同于单纯军事性质的哨卡卫所，也不同于一般的市镇城防，要长期维持下去发挥作用，是非常困难的。赛典赤设了多少这样的镇，怎样解决维持的困难，因无具体明确的记载，后人多不了解，也不去追究。然而这是一件功在当时，利在千秋的历史大事，研究价值自不待言。这件事如前所说它关乎云南经济、政治、文教等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赛典赤也是把它纳入到全省建设的全局中来做的，它不是一件孤立的事，不能孤立地看。事实上，如果把它放在整个行省建设过程当中，结合其他一些史志材料来看，这件事的大体脉络和效果还是比较清楚的。比如与驿传系统的建设结合起来看，或者从“山路险远，盗贼出没”之地各族百姓的口碑中去看，都能找到答案。

交通贸易网络的建设是赛典赤在兴建行省这一历史大业中的一项载诸史册和口碑的重要业绩。就元初云南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整体水平而言，建立一个全省性的商贸网络，是行省建设的经济基础。交通和贸易又是互为网络、相互依存和相互促进的。元代云南的商贸网络与交通网络，基本上是同步建立和同步发展的。云南古代的交通线路最早的是各部族交往中形成的原始通道。以后随着云南与周围地区交往的增多，这些交通线也就逐渐向四周延伸。其中有些线路由于沟通了某些大的地区、国家或战略要地的联系而著称于世。如形成于公元前四世纪或更早的蜀身毒道。而有些线路因未有这样的作用而未能著名，然而它另有的其他作用却被忽视了。譬如较小的区域与区域之间或区域内各地之间的联系和沟通。这种情况正是在元代赛典赤入滇之后改变的。

赛典赤自入滇建省之始，为了固省会、安四方，即在全省广设营、屯、卫、所，驻兵镇守。为了通达边情、便利信使往

来、物资供应和军队征调，又广开驿路、遍设驿站，形成了驿传网络。据《新纂云南通志》记载，赛典赤等在云南大规模开驿路，不仅为云南驿传之始，且多有因地制宜之创举，因而虽时有个别的兴废，终得以巩固并逐渐兴盛。^①

据《永乐大典》所记，元时以昆明为中心而通向各地的交通干线主要的有五条：一条向北经武定、会川、德昌、建昌等地达成都。一条向东到曲靖后分为两路，东路经普安、普定等地，到达湖南省的定远府（今贵州惠水）；北路经乌蒙达叙州，再由水路到重庆。一条向南经澄江、临安等地达越南河内。一条向西经楚雄、大理等地达缅甸。东、北方向的三条路线都通向元大都。西南方向的两条路线都通到国外。这就在云南与西南、中原和东南亚之间构成了一个干线交通网络。

以上道路，除少数是在唐宋旧道的基础上进行拓展或改进外，大多是新辟的。新辟线路主要是为密切省内各地间的联系。特别是省内各地之间新辟路网之密，联系之便，比前代有了根本的变化。这其中站赤的建置功不可没。赛典赤把建置站赤与“相地置镇”结合起来，赋予其“民用”功能，使之互相配合依存，以便利来往行人，颇与前代不同。因赛典赤等赴滇之使命，从根本上说，在于把云南纳入与内地一体化建置中，着眼于长远。而其手头可作治本之用的人力与财力又极为缺乏。如何从根本上确保交通网的安全畅通，实为难题。故于站赤建置上，多方经营谋划，突破前代之制，使之与民用交通相结合。驻站军士亦准随之逐步“民化”：与周围土著攀亲结友；家属子女，均以站为家。驿站不仅供官方使用，亦越来越多的为过往旅人、客商提供各种服务和安全保卫。此外，还把站赤

① 《新纂云南通志》卷56交通卷1，第2页。

中国伊朗学 论 集

建设与屯垦也结合起来，使屯政的兴旺与驿站的发达相促进。驿站民用，站户兼业，与当时以色目人为主体的驻屯军“探马赤”的“随处入社”、寓兵于农一样，均为长远之计，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马注的《瞻思丁公莹碑总序》就曾把这两件事合为一件来看待：“置驿镇以便往来。”这反映了时人的看法，也符合历史事实。

从现今回回后裔的分布情况来推断，元时充当站户之色目人中，有不少回回。如史籍所称“屯聚牧养”的探马赤军士，即是分布于全省各交通沿线要地的回回人村镇的开拓者。从这些回回人口及其后代来看，他们与当地农民一样的劳动生活，但又不同于普通的农民。按照元制，“随处入社，与编民等”的蒙古人、色目人，悉属蒙古军籍，称“军户”，他们具有一身而二任的特点。男子服兵役实际上是终身制的。有战事则上马出征。平时除务农外，还须练兵习武。故其组织状况、阅历见识、社会关系乃至经济来源、文化观念与土著农民都有所不同。另外，这些站户、军户中，虽散落于各地，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初期多是军事上、政治上的，以后便转化为经济文化方面的联系。这种联系，从其后裔中的回回人保持至今的一些习惯还可以看到。如伊斯兰教之圣纪节，各地不统一在一天，而是相互错开，这样各地的穆斯林就可以相互走访，互贺圣纪。并借此互相邀约，探亲访友，来往交流，互通有无。每年圣纪前后，各地四出“贺节”的回回来往于途，络绎不绝。盛时延续数月之久。这种互相远出“贺节”的活动，既是宗教上互相交流和学习的需要，也是民间生活的需要。它之所以得以形成和兴盛，正是源于赛典赤为解决山路险远、盗贼出没而“相地置镇”和兴建驿传网络的爱民之举。始于赛典赤的这种交通网络建设，经不断发展完善，不但为来往商旅行人

提供了安全和便利，而且促进了各族更多群众来往交流，使之能够互相保持了长期稳定的联系，通过这种联系，使他们能够获得各种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信息。这些信息又成了推动他们外出旅行经商、拜师学艺、探亲寻友的动力，从而进一步促进了各民族的经济、社会发展。赛典赤始建的这类镇、站也许成为他们途中最初的安全食宿之所。镇站的驻户们也可能靠他们取得许多生活物资的供应。以后各族客商深入安南、缅甸，均靠这些驿道上的镇站提供安全便利。也正因为有这些商旅的来来往往，镇站驿传网络便成了商业文化网络，有的逐渐发展成为商业重镇，驿站镇所兼作了人马客栈。此前云南虽有几条古道，但荒于管理和维护。另有一些自然形成的乡间便道，更处于原始状态，治安亦无保障。来往商旅，视之畏途。加之民族隔阂，地区封锁、通行亦不易。故军事、政治意义多，而经济文化意义少，故难以兴旺发达。经元代赛典赤开始规措置治，才使驿政大兴，云南交通始有根本改变。元代交通驿传网络的开发及以后的兴旺发达与赛典赤的周全经划关系甚大。

其四，史载：“有土吏数辈，怨赛典赤不已用，至京师诬其专僭数事。帝顾侍臣曰：‘赛典赤忧国爱民，朕洞知之，此辈何敢诬告！’即命械送赛典赤处治之。既至，脱其械，且谕之曰：‘若曹不知上以便宣命我，故诉我专僭，我今不汝罪，且命汝以官，能竭忠自贖乎？’皆叩头拜谢曰：‘某有死罪，平章既生之而又官之，誓以死报。’”

土吏因怨贖思丁没用他们，至京师告状。一告贖思丁没用他们，二告贖思丁专僭。所告“不已用”，这是事实。专僭，

中国伊斯兰学论集

史志虽载不详，但不外行省及路、府、州、县的区域划分、机构设置、职官任用等体制改革事项。建新制，必然要动旧制。即要改忽必烈和兀良合台平云南之初在原大理国区划基础上建立的由大理、鄯阐、北路、中路、南路五总管府及万户、千户、百户构成的军事管制体系为行省及相应的路、府、州、县体系。这些在大理国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军事管辖系统，大多沿袭大理国旧制，其统辖区域、机构、人员基本依旧，大小职官仍由各部族首领、贵族担任。许多部族族属不同、风俗各异、语言不通、区划不清、隶属不明、政令不一、赋役不均、矛盾百出。因而经常发生“远人不安”，“叛服不常”的事。再加之“委任失宜”，云南地方整个长期陷入内外交困、问题成堆、积重难返的境地。云南由于郡县基础薄弱，作为行省制度基础的郡县体系还极不完善，还有大量系统全面的制度变革和创新任务须从头做起。因此云南建省面临的困难比之内地要艰难百倍，在云南历史上堪称一场深刻的社会大变革，必然要大量涉及原辖区地方、机构及人事关系和利益。加之事情千头万绪，一时安排不到或照顾不周的事在所难免。发生几个土吏上京告状的事，按说是情理之中，预料之内的事，本不足为奇，朝廷稍作解释安抚即可打发。可出人预料的是，此事不仅被忽必烈亲口定性为诬告罪，而且千里迢迢把罪犯械送回云南交赛典赤处理。这异乎寻常之举，耐人寻味。

元朝虽把臣民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但因蒙古人口仅占少数，又不熟悉汉地事务，统治汉地所需要的高深思想文化一时也掌握不了，因此管理国家的事务，要大量依靠色目人和汉人。在各级统治机构中，蒙古人虽占据主要职位，但主要起监督作用。在蒙古政权前期，实行蒙古、汉官两套制度。汉官制度从太宗三年（公元1231年）时即开始实行：

“幸云中，始立中书省，改侍从官名，以耶律楚材为中书令，黏合重山为左丞相，镇海为右丞相。”^①忽必烈即位以后，居于北方的各大汗国日益脱离蒙古大汗的控制，忽必烈的实际统治主要是蒙古本土和中原地区，这样便需要更多的汉人和南人担任各级官吏，而蒙古人则需要更多地负起监督的职责，防止汉人、南人和色目人专权：“遂命刘秉忠、许衡酌古今之宜，定内外之官。其总政务者曰中书省，秉兵柄者曰枢密院，司黜陟者曰御史台。体统既立，其次在内者，则有寺、有监、有卫、有府。在外者，则有行省、有行台、有宣慰司、有廉访司。其牧民者，则曰路、曰府、曰州、曰县。官有常职，位有常员，其长则蒙古人为之，而汉人、南人贰焉。”^②这是元代的基本定制。可见，即便忽必烈对赛典赤个人非常信任，授其“便宜行事”即专断之权，但其基本制度并未改变，宗王们仍要照章行事。赛典赤初到云南时，宗王敢“具甲兵以为备”，与其所负职责有关。赛典赤则反复以“未敢专”以取得蒙古宗王的谅解。土吏因为赛典赤“不己用”而到京师告状，若以朝廷的土官制度为法律依据，这个理由本来也还是可以成立的。但他们却不告赛典赤的“不己用”，而是告他“专僭数事”。从人事纠纷扯到政治事件上去，小事变大事。当时能“数辈”相约，千里迢迢上京告状，并把状情传递入宫，说明告状者非等闲之辈。有“数事”可告，说明他们与云南上层人士有联系，有获取云南高层政情内幕的渠道。告“专僭”，说明他们不仅熟悉有关制度规定，且抓得着要害。“数辈”，人多势众，说明有代表性，不是个别人的问题。从元史记载这寥寥数语中，透露出这个事情及其背景的复杂性。可见这件事本身及忽必烈对此

① 《元史》卷2 《太宗纪》。

② 《元史》卷85 《百官志序》。

中国伊朗学论集

事的处理都有异乎寻常之处。第一，向身边侍臣宣称赛典赤忧国爱民，自己对赛典赤非常了解，无可怀疑，表明对赛典赤绝对信任。实际上以这种非正式的方式公开宣布赛典赤有“便宜行事”之权，即在行省职权范围内的事，不必事事征求朝廷和宗王的意见，可以独立行事，不属于“专僭”。第二，既将土吏告状事钦定为诬告，又将告状土吏送交赛典赤处理。一来避免此事节外生枝，并杜绝将来再以此类事情干扰、为难赛典赤的改革大计。二来朝廷定性，实际上已经把这件事情处理了，不再给赛典赤留下任何为难。如果朝廷没个定性便交赛典赤处治，肯定不好办。在赛典赤看来，这些土吏不知道皇帝给了自己便宜行事之权，情有可原。上京告状，总比动辄聚众造反，割据一方，祸害百姓要好得多，仍可教育挽救。因此，依赛典赤的本性，只会从轻，但这种事，背景特殊，处理轻了会有姑息迁就之嫌和养痍示弱之患。在这件事的处理上，忽必烈与赛典赤之间长期建立起来的信任和默契起了很大作用，处理是十分得当的。基于对云南情况特殊性的了解，忽必烈授予赛典赤的便宜行事之权，确属特别授权，非一般行省平章政事的职权可比。因为赛典赤在云南要做的许多事，是开创性的，没有成例可循，故忽必烈授其专权，并非虚言。赛典赤在云南行省建设中的举措，多有独创。土吏告状一事，也正好反映了这样一个情况。结合历代民间谱牒及碑传文献记载看，赛典赤在云南所做的创建行省诸事，可大体知道土吏所告之“专僭数事”何指，其中当然会涉及比较敏感的“去冗官”之事。想必大体不出忽必烈事先预料，所以虽定为诬告罪，还是命押送回云南交赛典赤处治。当然忽必烈定了有罪，赛典赤不能推翻，只能做“有罪辩护”，即无知犯罪，按照“春秋决狱”的“原心论罪”原则，即可从宽发落：“今不汝罪”“且命汝以官”。土吏们

死里逃生，喜出望外，当然乐意戴罪立功，结局是皆大欢喜的。如果他们有后台和支持者，这个结局也是理想的。忽必烈和赛典赤对几个土吏的处理，表明改革势在必行，谁也不能阻碍，同时也会妥善处理类似问题。这几个土吏也代表了一大批土官衙门里面临去留安置问题的官吏人员。安排他们继续做官，一是土吏有土吏的道理，他们的作用和利益不能忽视。二是所委之官，已不是旧制原官，而是新设之官。即由原来的土吏变为行省地方机构的官，不但职位变了，级别、权限等也有了变化。这里还有一点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赛典赤对几个土吏的处理，不可仅视为一般安抚和收揽人心之举。这篇文章，忽必烈作了前半，又交给赛典赤去作后半，合起来天衣无缝，一场孕育中的可能阻碍改革的风暴就此平息了。



中国伊斯兰学论集

《经学系传谱》所记 波斯文阿拉伯文书目初探

纳巨峰^①

一、导 言

经堂教育是中国回回伊斯兰学问传承的重要渠道，经堂教育用书是中国回回伊斯兰知识体系的重要表现。经堂教育用书可以分为两类：正式教材与参阅教材。关于中国回回经堂教育用书，民国庞士谦阿匄的《中国回教寺院教育之沿革及课本》（1937年），^②是国内学界最早也是最重要的一篇文章。他研究了传统回文大学14种18门课本，其中有6种是波斯文；对教材类别、著者、汉文译本均有准确、权威的描述，并标写出书名及著者人名的原文。此后王静斋阿匄的《发扬伊斯兰文化之必要》（1939年），^③把中国回教文化之学科分为正课8类13种，附课5种，其中波斯文有6种。不过有好几门学科著者

① 作者系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② 庞士谦《中国回教寺院教育之沿革及课本》，刊《禹贡》第七卷第四期，1937年；转引自白寿彝《中国伊斯兰史存稿》，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66至374页。

③ 王静斋《发扬伊斯兰文化之必要》，《回民言论》创刊号，1939年；转引自李兴华、冯今源编《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选编》下册，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20至928页。

未给出教材名称。以上两文的经堂书目我们可以把它看作山东学派的。关于云南学派的经堂用书，白莲父先生撰写的《云南回教教育社会状况》（1937年），^①列举有29种经堂教材，波斯文教材有7种；先贤马复初、马致本两位大学者予以改进的阿拉伯文波斯文教材共有20种之多。纳忠教授发表的《清代云南回族人与伊斯兰文化》（1957年），^②介绍了部分教材的著者，称赞了先贤马致本编写阿拉伯文波斯文教材的贡献。关于陕西学派研究较多，比较重要的是冯增烈先生发表的《明清时期陕西伊斯兰教的经堂教育》（1981年），^③该文按经堂传统的“八大尔林”，将经堂用书分为八类24门课程，分类较为权威清晰，对教学体系的设计理念有充分的阐释。丁克家、杨万宝、杨怀中先生的《中国穆斯林经堂教育典籍》（1995年），^④把经堂用书分为赛拜嘎经典，参阅经典两大类，前者有20种，后者有73种，共计93种书，该文最大的优点是传统教材与当代教材并举，搜罗甚丰；此外对经堂正式教材有最为详细、专业的介绍，还披露了苏菲各门宦使用的教材，令人耳目一新。此外，专门对经堂基础课作综合研究的是于广增阿訇的《回族穆斯林经堂教育及其基础课初探》及《经堂教育基础课的沿革》（1986年）。^⑤

①白莲父《云南回教教育社会状况》，刊《月华》第九卷第十三期，1937年。转引自李兴华、冯今源上书第1063至1066页。白莲父，即云南著名社会活动家、实业家、学者白亮诚先生。

②纳忠《清代云南回族人与伊斯兰文化》，载《云南日报》1957年3月14日、28日4月12日，后收入《清代中国伊斯兰教论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4至133页，题页和内容稍有改动。

③冯增烈《明清时期陕西伊斯兰教的经堂教育》，收《清代中国伊斯兰教论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17至251页。

④丁克家、杨万宝、杨怀中《中国穆斯林经堂教育及其基础课初探》、《经堂教育基础课的沿革》，刊《中国穆斯林》1986年第2~3期。

⑤丁克家、杨万宝、杨怀中《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典籍》，杨怀中、余振贵主编《伊斯兰与中国文化》第七章，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0至382页。



中国伊斯兰学论集

西方学者也曾研究传统中国常用的阿拉伯文波斯文典籍，其中有不少是经堂用书。^①先贤刘介廉的采辑经书目备受关注，最好的文章是澳洲学者 D.D.莱斯利和 M.瓦塞尔两先生合撰的《刘智所使用的阿拉伯文波斯文资料》（1982 年）；^②明末清初回回的汉文译述，近年也受到西方学者的更多重视，在文献学方面所作的杰出研究是，澳洲学者 D.D.莱斯利的《伊斯兰汉籍考》（1981 年）。^③

《经学系传谱》是一部研究明末清初中国伊斯兰教寺院经堂教育最珍贵的史料。该书是胡太师五传弟子、经学大师舍蕴善主持，弟子赵灿执笔撰写的。^④成书年代是康熙三十六年（1697 年），后于康熙五十三年（1714 年）增著。该手稿写成后一直未予刊印，仅有四个手抄本流传于世。中国学者杨永昌和马继祖两先生根据其中一个手抄本，共同完成了该手稿的整理本并公之于世（1989 年）。^⑤最近该手稿的影印本收入周燮藩教授主编的《清真大典》第二十册，^⑥使人终得窥其全豹：原

① 晚清民国时代西方人和日本人在云南、甘肃、北京、内蒙、新疆曾记录当时中国穆斯林使用的经堂用书，相应地有不少学者投身其中，主要研究成果有日本佐口透先生的《中国伊斯兰教的经典》（1950 年）等论著，遗憾的是笔者均未能收集到。

② Leslie, Donald D., *Arabic and Persian Sources Used by Liu Chih*,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26.1~2 (1982): 78~104. 利·瓦塞尔撰，王东平、邵红英译《刘智所使用的阿拉伯文波斯文资料》，载《回族研究》1998 年第 4 期，第 10~28 页。

③ Leslie, Donald D. *Islamic Literature in Chinese*, L. Books, Authors and Associates, Canberra, 1981. 另见（英）《伊斯兰汉籍考》，北京，1994 年。D. 莱斯利先生，中文名李渡南，本文称其中文名。

④ 杨永昌《经学系传谱》及舍起灵简介，收《中国伊斯兰教研究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430 至 441 页。

⑤ 赵灿著，杨永昌、马继祖标注《经学系传谱》（整理本），青海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文中所引页码均为整理本。少量据影印本的则标明。

⑥ 真回破衲舍蕴善主持，裕心贫者赵灿撰《经学系传谱》（手稿影印本），收周燮藩主编《清真大典》第二十册，合肥：黄山书社 2005 年版，第 2 至 105 页。

手稿正文 179 叶，附页（系传图表）28 页，计 207 页。该书记载了陕西胡太师中兴经堂教育以来，冯门一脉共七传弟子的传承网络体系，及二十八位著名学者的小传。时间跨度大约 150 年，约从 1570 年至 1720 年。^①本文所要探讨的正是记录在《经学系传谱》中当时我国经堂教育所使用的书目，距今恰好 310 年。该书目主要记载在第七个叙《蕴善先生授学较徒法》部分；其次散记在各地学者的纪事里。

二、教学体系

根据《经学系传谱》第 19~20 页的记载，我绘制出 1570 年~1720 年经堂教育教学体系。该图表附于文后。

图表说明：

- 1) 上述教学体系根据《(舍) 蕴善先生授学较徒法》编制；
- 2) 阿拉伯数字表示该门课的书目编号；
- 3) 罗马数字表示教学的不同阶段；
- 4) P: 波斯文, A: 阿拉伯文; 未标的为文种不确定；
- 5) 第 9、10 两门课是二选一的自选课。

从教学体系来看，以舍蕴善为代表的经堂教育可以分为两个过程 11 个阶段，第一个过程即第一表所示，主要是语言教学。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波斯文的语言教学放在第 1 和第 6 个阶段，而中间第 2 至第 5 四个阶段，又设计为阿拉

① 按：真回破衲痴《经学系传谱序》“吾太师祖胡老先生……后年及半百，崇延名师，谄习诗书……适遇西来异人……继归秦中……昼夜钻研……数年，乃深明正一心诚意之学……”。另据冯增烈《重修胡太师祖佳城记碑叙》，刊《中国穆斯林》1981 年第 2 期胡太师祖明嘉靖元年生，明万历丁酉年卒，”即 1522~15 胡太师祖年及半百而学中国诗书，后得天房学者指点，又钻研经籍数年，其开堂授徒当在 1574 年前后，方便起见，本文暂定为 1570 年。另据冯增烈《经学系传谱宗谱叙》，赵灿增著《经学系传谱》时记为康熙五十三年即 1714 年，方便起见，本文将下限暂定为 1720 年。

中国伊朗学论集

伯文的语言教学。综合前人的研究，我们还发现另一个有趣的现象，即阿拉伯文的语言教学在词法阶段（第2阶段）主要是借助于波斯文来进行教学的。上述教学体系的设计到底有什么意义，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第三个发现是波斯文的语言教学，入门阶段采用的是初级法学著作，正式的文法书却只有一本；而第四个发现是第一个过程重点是放在阿拉伯文的语言教学上：第2阶段是句法，第3阶段是句法和逻辑，第4阶段是中级文法，第5阶段是高级文法和高级修辞。值得注意的是，阿拉伯文的语言教学虽然完整而循序渐进，然而却没有阅读教材。

第二个过程如第二表所示，主要是专业教学阶段。第7阶段使用的教材与第1阶段完全一样，但教学重点显然是在波斯文的语言方面，第8阶段正式进入专业教学，第14~16门为修道学著作，之后再重新教学第13门波斯文法课。^①大概教学至此，波斯文法能娴熟掌握，可以钻研大部头的深奥的苏菲理学了。第9阶段17~18门为波斯文苏菲理学著作，第19~20门是关于认一论的经典著作，前者为波斯文，后者为阿拉伯文，第21门是阿拉伯文诗文。第10阶段是法学教学，大概文本多为阿拉伯文的。可惜没有提到具体的书名。最后一个阶段是《古兰经注》，看来经堂教育的设计，其最终指向是古兰经的解读。

从第二过程的课程设计来看，我们发现专业阶段，波斯文课程的比重占绝对优势，同时苏菲、修道著作的比重超过了法学，第三个特点是圣训没有列入专业课的教学。我国经堂教育为何如此设计，其中的深意，值得我们去深入探讨。

^① 参见《经学系传谱》（影印本）第19页。

三、初步的分析、比较与结论

下面我们将本文所列 23 种经堂教育书目与民国及当代的几份同类书目作一比较，看看会有什么发现。

1. 庞士谦书目，该书分为 14 门计 18 种课程，语言阶段没有提到本文第 1~3 门，第 8 门，第 10 门，第 13 门；专业阶段，没有提及第 14~15 门，第 17 门，第 21 门。总计 10 门课没有列入。书目相同的有第 4~7 门，第 9 门，第 11~12 门，第 16 门，第 18 门，第 20 门，第 23 门，总计 11 门。

2. 白莲父书目，该书目共列有 29 种教材。在语言阶段，波斯语言教材均提及，但有所改进；阿拉伯语言教材第 4~7 门，第 9~10 门没有提及；相同的是第 11~12 门，类似的是第 8 门；专业阶段有 5 门课没有提及：第 14~15 门，第 17~18 门，第 21 门。与本文书目差异稍大。相同的有第 16 门，第 19~20 门，第 23 门。

3. 冯增烈书目，该书目分为八类 24 种教材，该书目与本文书目最为接近，语言阶段没有提及的是第 3 门，第 10 门，类似的是第 8 门；专业阶段没有提及的是第 14~15 门，第 17 门，第 21 门，共计 4 门。

4. 丁克家、杨万宝书目，该书目较为庞大，正式教材分为 14 部 20 种教材，参阅教材 73 种，计 93 种书目。语言阶段第 1~3 种列为参阅教材，第 10 种没有提及；专业教材有四种没有提及，即第 14~15 门，第 17 门，第 21 门。

上述本文书目与其他四种书目比较后，我们发现这些书目不完全一样，这些差别，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目前可以指出的是《经学系传谱》时代的书目，有五门课是以后的经堂教育没有采用的，即语言阶段的第 10 门课，专业阶段的第



中国伊朗学论集

14 门, 第 15 门, 第 17 门和第 21 门。

初步结论

1. 在回回经堂教育中波斯文与阿拉伯文的地位是相伯仲的, 而且阿拉伯文基础阶段的教学是借助于波斯文的; 可以假定明末万历以来, 对回回人而言, 波斯文是第一外语, 阿拉伯文是第二外语。

2. 波斯文著作并不少于阿拉伯文著作, 然而没有发现有什叶派的; ①绝大多数著作均属正统的哈乃斐法学派的经典。②

3. 不少波斯文著作是正统的苏菲派的经典; 苏菲学理在回回经堂教育中, 尤其是在舍氏经学中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4. 早期回回汉文译述以选译经堂教材为主, 其中尤以波斯文本的为多; 道光以后情况才有变化。

四、书目

本书目之体例, 系据《经学系传谱》记载之顺序, 逐一考订。每一书名, 先列出赵灿所记的外文书名及中文书名, ③其后所列为笔者增补的外文全名, 中文译名, 以及文本情况。二者之间以“。即”隔开。

1. 四篇, 波斯文本

法学初阶, 全书以问答体裁阐明最基本的教律知识, 共分为四章, 故名。本书有同书名的波斯文修订本(云南马云从, 回历 1288 年)及其阿拉伯文汉文译本(云南马云从, 约 1983

① 参见庞士谦前揭文第 369 页。

② 参见马凤撰《建修胡太师祖佳城记》, 转引自白寿彝主编《回族人物志》明代卷, 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第 404~407 页; 文中三处提法均补, 名, 说阿补·哈尼法数百年不及之道, 至我太祖承统发明而不堕矣。

③ 本文所考每一书之波斯文阿拉伯文书名, 系根据手稿影印本辨认而出; 少量书写模糊或缺失而为笔者所补的均注明。

年)。^①马致本在书后跋文中写到：“《四篇要道》一经在中国果然是著名的，历代学者从古到今辗转相陈...因此我才把它同《天方分信篇》合为一册……”据此可以断言该修订本的原本正是本文第1书。从波斯文书名笔者想到明末清初苏州张君时《四篇要道译解》（顺治十年，1653年），^②而民国十年的汉文译本《吐哈雷凡速》，^③封面署有“四篇要道”字样；将两书对勘，发现两者标题、内容基本一致；并参校马云从译本，可以认为《四篇要道译解》所据之原本正是本文第1书。^④汉文全译本较多，各地各时皆有，可见本书对回回社会影响之深。

2. چهار فصل 母兴麻忒。即《回回要务》，波斯文本

法学初阶，讲授最基本的教律知识，篇幅是第1书的两倍。本书有同书名的波斯文改编本（云南马致本，回历？年）及其阿拉伯文汉文译本（云南马云从，1984年）。^⑤马致本在书后跋文中写到：“本书果然是为学者们所欢迎的……因此我对它曾加以增减……我更改它的次序，只为了使读者容易学习……”据此可以断言此改编本的原本正是本文第2书。马云从译本封面署有“教款捷要”字样，笔者将清初济宁马忠卿《教款捷要》（康熙十七年，1678年）^⑥找出，其书后《不得已》

① 马致本修订，马云从译《分信篇四篇要道合璧》（阿汉对照），民间刊本，约1983年《分信篇》即先贤马致本所著的《伊玛尼篇》（波斯文），两书合为一册。该译本第34页是马致本致教师的一封信，时间署为回历1288年。

② 张君时译注《四篇要道译解》，参见周燮藩主编《清真大典》第16册，黄山书社2005年版，第276至335页。

③ 《吐哈雷凡速》，参见周燮藩主编《清真大典》第15册，黄山书社2005年版，第502至507页。

④ 《四篇要道译解》有译有注，详细的补注约占五分之四，皆为注者自己的见解。

⑤ 马致本改编，马云从译《教款捷要》（阿汉对照），民间刊本，1984年重印。

⑥ 马忠卿译注《教款捷要》，参见周燮藩主编《清真大典》第15册，黄山书社2005年版，第193至248页。

中国伊朗学论丛

云：“予不得已将母兴妈忒以汉文注解以便家君观览，苦集之由实本乎此。”另有汉译本《穆信玛台》（山东王国华、马毓贵、韩宏魁，民国十九年）。①将两书对勘，发现两者标题、内容大同小异；并参校马云从译本，可以认为《教款捷要》所据之原本正是本文第2书。②李渡南书编号15怀疑《教款捷要》不是译本，误；并提到《经文母习妈台》的原文是阿拉伯文，误。③汉文全译本较多，各地各时皆有，仅次于第1书。

3. 闾特。即 عمدة الاسلام 《清真玉柱》，波斯文本

法学进阶，主要论述回回五功，篇幅是第2书的3倍。该书书名被提及四次，前三次译名一致，后一次写为“闾谟特”。从原文拼写并结合译音及语境来看，四次提及的应为同一本书。④本书有同书名的波斯文修订本（云南马致本，回历？年）及其阿拉伯文汉文译本（云南马云从，1985年）。⑤马致本在书后跋文中写到：“当我发现本书对莘莘学子极其有益，而为中国全体穆斯林学者所欢迎……不过我对它略加增删……”据此可以断言该修订本的原本正是本文第3书。汉译本较多，有《汉译耳木代》（经堂语译本，民国十年）；⑥有《欧母戴》（青州丁蕴辉译，王静斋校补，民国二十五年）⑦

① 王国华、马毓贵、韩宏魁译《穆信玛台》，参见周燮藩主编《清真大典》第15册，黄山书社2005年版，第433至441页；据译者自序该译本重新编排了原书次序。

② 不过译者有增删，参见《教款捷要》之译注者自序：“凡注释之间有增而补之者…有减而略之者…”。

③ 参见李渡南书第26页。

④ 《经学系传谱》整理本第19页20页59页及85页。

⑤ 马致本修订，马云从译《清真玉柱》（阿汉对照），民间刊本，约1985年。以上三书均系马云从阿訇惠赐，特此致谢。

⑥ 《汉译耳木代》（经堂语），参见周燮藩主编《清真大典》第15册，黄山书社2005年版，第509至529页。

⑦ 丁蕴辉译《欧母戴》，参见周燮藩主编《清真大典》第15册，黄山书社2005年版，第531至561页；王静斋校补一事集藏经书《

以上三书均为基本的法学著作，同时又作为学习波斯文的入门教材。值得指出的是，云南马致本编订的三个波斯文改编本，更利于波斯语的入门学习。^①

4~6. 塞而夫三种。即 *زنجان* ، *صرف* ، *معزى* ，（木尔兹）、（赞查尼）

《经学系传谱》仅记为“塞而夫三种”，后两种书名为笔者所补。《塞而夫》既是第4书名，也是三书的总称。三种均为阿拉伯文词法书。第4书是用波斯文来讲解阿拉伯文词汇的类别、构成及其派生法则，为全书总纲；^②第5书讲动词七种类型的变位规律；第6书讲单词中字母及音符的变化规律。上述三书的作者及成书年代无从考定。金占祥、丁士仁均指出上述三书是用波斯文来讲解阿拉伯文词法的；^③于广增认为第4书为中国学者所撰。

7. 米斯巴哈 *مصباح*。意为“语法明灯”，阿拉伯文本

阿拉伯文句法书。庞士谦认为是据语法学家阿卜杜·嘎西尔（卒于回历471年）的著作改编。^④其全名是 *عبد القاهر بن عبد الرحمن* 阿卜杜·嘎西尔·本·阿卜杜·拉赫曼。

以上四本书，为《连五本》中的卷一、二、三、五。
اساس العلوم （艾塞苏勒欧鲁密）通称《连五本》，一般认为是中

① 参见丁克家、杨万宝、杨怀中前揭文第376页。可参见白莲父前揭文，致本先正所著书目部分。

② 参见于广增前揭文，可参看杨惠云主编《中国回族大辞典》，《连五本》词条，上海辞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491页。

③ 金占祥《试论经堂教育的继承和发展》，刊《伊斯兰》1993年第3~6期。丁士仁《20世纪河州经堂教育的两次重大突破》刊《回族研究》2006年第4期。笔者翻阅马良骏阿訇修订的《连五本》前三卷，确有不少波斯语词汇，具体情况尚需进一步的研究。

④ 参见庞士谦前揭文第370页。

中国伊朗学 论 集

世纪印度旁遮普人穆罕默德·海亚特所汇编。^①4~6 三本书，皆有波斯文注释。近代学者同心虎嵩山阿訇开始将《连五本》的波斯文部分改写成阿文，并加汉文注释，其阿文修订本名为《阿文教科》两册（1935~39 年），又名《文学基础》；^②张家川马良骏阿訇的修订本名为《阿语基础注解》（回历 1359 年），将原书改成小儿锦注释。^③1950 年代河州马天明阿訇将原书的波斯文部分改译成小儿锦，其子马希庆阿訇在 1980 年代又将小儿锦部分改写成汉文。^④直接将《连五本》汉译的学者是天津杨敬修，书名为《中阿初婚》四卷（1911 年）。^⑤

8. وظائف 怀昨倚夫。意为“服务、职位”，阿拉伯文本

阿拉伯文逻辑书，《经学系传谱》云“此经系 منطق（满推格），由此可解苏菲理学”。满推格，即逻辑学。《天方性理·采辑经书目》第 18 种书，名为《斡咱一福》，意译为《六十虞》。“斡咱一福”与“怀昨倚夫”两词是同名异译；同书目第 19 种书《闪洗叶》/《名理真宗》，第 20 种书《叶撒五枝》/《名理解》，二者皆为逻辑书；仔细观察会发现刘介廉书目是按类别排列的，该书目第 18~20 恰好是一类，而其前后是别的类。故可以确定刘介廉使用的《斡咱一福》正是本文第 8 书。^⑥冯增

① 参看杨惠云主编《中国回族大辞典》，《连五本》词条，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9 页；穆丁克家、杨万宝、杨怀申前揭文第 347 页。

② 参见冶正纲《宁夏伊赫瓦尼著名经学家虎嵩山》，收《清代中国伊斯兰教论集》，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308 至 325 页；易见刚《一个伊斯兰经学大师的追求》第三部分，以及《虎嵩山大阿訇归真五十周年纪念专集》，含库尔文，2005 集上两文均系虎嵩山先生惠赐，特此致谢。

③ 马良骏《阿语基础注解》，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收藏。

④ 参见丁士仁前揭文。

⑤ 参见余振贵、杨怀申主编《中国伊斯兰文献著译提要》，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94 页。

⑥ “名理”一词显然是指逻辑学。李渡南和瓦塞尔推测第 20 种书《叶撒五枝》/《名理解》是蒙古法典的五段亚撒，误。于广增已指出《伊萨乌机》是形式逻辑入门，参见王东平、邵红英译文第 18 页。

烈提到“逻辑学是讲授《满图格》的66个推理法则”，于广增提到《吾祖一夫》الوظائف使用了66个条目那么《六十篇》的内容可以推测是讲60个推理法则。^①

9. 骚乌。即 ضوء المصباح 意为“明灯之光”，阿拉伯文本

中级阿拉伯文法书，即注解第7书 مصباح (米斯巴哈) 的。于广增和丁克家等确认庞士谦的看法，本书作者是中亚花刺子模学者穆团勒吉 أبو الفتح ناصر المطرزي (回历538~610年)。^②

10. 太蒲碎尔。意为“开导、启发”，阿拉伯文本

《经学系传谱》第20页云“……或接《骚乌》或接《太蒲碎尔》，之后接《满偶》并《默阿呢白呀》，盖此数经专论字义文风，凡习之者能通天房之文义矣”，据此，本书同第9书一样是一本中级阿拉伯文文法书。《经学系传谱》第85页记载舍蕴善投学马永安处，“接《太蒲碎尔》日讲一章，约五叶。读不旬日，后文不解自明。遂窃阅《骚乌》，竟自能悉义”。据此推测第10书当有70~100页，其内容、难度与第9书相当。

《天方典礼·采辑经书目》第7种书，名为《特卜绥尔》，意译为《大观经》。“特卜绥尔”与“太蒲碎尔”两词是同名异译；然其前两书《密迹索德》、《勒瓦一合》是苏菲著作，其后的《胡托卜》是修道书，故《特卜绥尔》当为苏菲修道书。李渡南和瓦塞尔认为它与第4种书《特福西尔白索义尔》/《大观真经注》有清楚的联系，^③二者类别不同，故误。因此

① 参见冯增烈前揭文第232页，参见于广增前揭第1文第6页《经学系传谱》是否将66个法则误写为60个？另参见丁克家万宝、杨怀中前揭文第368页。文中提到《吾祖一夫》专讲逻辑概念、判断、界说与推理等。

② 参见庞士谦前揭文第371页；参见于广增前揭文；参见丁克家万宝、杨怀中前揭文第347页。

③ 参见王东平、邵红英译文第20页。

中国伊朗学 论集

《特卜绥尔》与《太蒲碎尔》两者是同名异书。

11. **ملا** 满俩。即 **ملا جامی**，《语法大全》，阿拉伯文本

高级阿拉伯文法书，乃为语法巨著。纳忠、于广增和丁克家等认同庞士谦的看法，本书作者是波斯大学者查密 **عبد الرحمن الجامی** (回历 817~897 年)。本书是对埃及学者伊本·哈吉卜 (1175~1249 年) 所著《卡费叶》/ **معانی بیان** 的诠释。^①据丁克家等人的研究，《满俩》全文分 10 个部分 120 讲，约有 35 万字，成书于回历 897 年 9 月 11 日。^②

12. **سعيد الدين** 默阿呢白呀/木阿呢白央。阿拉伯文本

高级阿拉伯文修辞书，乃为修辞学巨著。纳忠、于广增和丁克家等认同庞士谦的看法，本书作者是中亚学者赛尔顿丁 **منهاج** (回历 712~791 年/1312~1389 年)。^③据丁克家等人的研究，本书是讲解阿拉伯文修辞学的三大分支，约有 25 万字，成书于 14 世纪中叶。^④云南马新三阿訇有汉文译本《伯雅尼》。^⑤

13. **منهاج** 米纳哈迟。即 **منهاج الطلب** 意为“道路、门径”，

《学习门径》，波斯文本

波斯文文法书，系胡太师四传弟子、经学大师济宁常蕴华所著，被伊朗学者确定为世界上最古老的独立地用波斯文写成的波斯文文法书。成书年代是回历 1070 年 5 月/西历 1660 年，

① 于广增、丁克家等将查密生卒年写为 (1397~1477 年)，换成回历为 800~882 年；而成书年代是回历 897 年。参见于广增前揭文，参见丁克家、杨万宝、杨怀中前揭文第 347 页。

② 参见丁克家、杨万宝、杨怀中前揭文第 347~350 页

③ 马坚《注者赛尔顿丁小传》，见其译著《教典诠释》，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印本，1988 年，第 8~9 页。赛尔顿丁生年采用马坚说，至于卒年庞士谦文说是第 8 世纪，后说歿于 972 年，显然是 792 年的排印之误。

④ 具体内容参见丁克家、杨万宝、杨怀中前揭文第 350~353 页。

⑤ 参见纳国昌《经学传习七十年》，载《云南穆斯林人物志》，昆明，2001 年，第 300 页。蒙纳先生惠赐大作，特此致谢。

即清初顺治十六年。^①1981年伊斯法罕出版了伊朗学者谢里亚特博士的校勘本以志纪念。刘迎胜老师曾写专文研究，并译注了《米纳哈志》动词分类部分。^②中国学者编写的波斯文文法书尚有：先贤云南马致本的《古文仙法》^③和同心虎嵩山阿匄的《波文之源》。^④

14. حقائق 哈噶倚格

书名为 حقیقه 的复数，意为“真理”。该书名仅出现了两次。《经学系传谱》第113页译写为“哈噶以格”，显然是同名异写。此处著者翻译、讨论了该书《谎言篇》中的一则圣训。牛街《冈志》也记录了《翰格依格》上的两则圣训。^⑤“翰格依格”与“哈噶倚格”两词是同名异译；就本书的排列位置而言，其内容当与后两书同类，其文本当与前后书同文。据此可以推测第14种书是波斯文本的修道书。

15. ارشاد، 以而舍特。意为“指导、忠告”，波斯文本

该书名在《经学系传谱》中仅出现了一次。《天方典礼·采辑经书目》第30种书，名为《一而沙德》，意译为《指迷集》。“一而沙德”与“以而舍特”两词是同名异译；据此可以推测刘介廉使用的《一而沙德》很有可能是本文第15书。^⑥

① 穆罕默德·本·哈克目著，谢里亚特博士校刊《学习门径——最古老的波斯文文法书》，伊斯法罕：回历太阳历1360年 (Majma' al-Lab, kuhmantari dasht-i-risā Muhammad b. māsāl—Hizkīl, ba Kushish-i Duktu Muhammad S. J. al-risā 'ta Islāh). ② 谢刘迎胜老师惠允复印此书。

③ 刘迎胜：《米诺哈志的作者及其波斯文动词分类原则初探》，刊《中亚学刊》第三辑，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58~283页。

④ 参见纳忠前揭文第131页。

⑤ 参见《虎嵩山大阿匄归真五十周年纪念专集》，舍库尔文，2005年。

⑥ 参见刘东声、刘盛林注释《北京牛街志书——《冈志》》，北京出版社1991年版，第80~81页。

⑦ 前已述及刘介廉书目是按类别排列的，但第24种书《探秘台》/《醒世录》与第30种书《一而沙德》/《指迷集》同类，中间被几本史书隔开。极有可能是刊刻之误。

中国伊朗学 论集

李渡南认为《指世书》就是《指迷集》，为《一而沙德》的译本。^①民国天津穆楚帆、穆子清从波斯文本编译的《汉译伊雷沙德》（1934年），^②可以初步推测该书有可能是本文第15书的译本。从其内容提要来看，它应当是波斯文本的修道书，而不是教律书。^③从其书目位置来看，其文本也当为波斯文。

16. خطب 呼退步/呵退蒲。意为“演说、讲话”，波斯文本

波斯文修道书，为40段圣训的波斯文注解，庞士谦指出圣训原文编选者是摩索可的法官伊本·我德安 ابن ودعان (? ~ 回历594年)；后被译成波斯文，并用波斯文注解^④。本书有同书名的阿拉伯文译本《至圣宝谕》（云南马致本）。^⑤其内容趋重于道学方面，中有传述不真确的圣训。天津李廷相汉译为《圣谕详解》（1923年）。《天方典礼·采辑经书目》第8种书，名为《胡托卜》，意译为《圣谕》。“胡托卜”与“呼退步”两词是同名异译；可以确定刘介廉使用的《胡托卜》正是本文第16书。李渡南和瓦塞尔提出一种可能：其作者是伊本·努巴泰（回历335~374年），^⑥误。因其书是演讲集，而不是圣训。注意《圣谕》在书目的位置，刘介廉把它归入苏菲修道书一类，而不是圣训；否则其位置当在《宝命真经》后。这一点从该书内容方面可以得到印证。^⑦

① 参见（英）李渡南著，杨大业译《伊斯兰汉籍考》第24种书，北京，1994年，第33页。

② 参见余振贵、杨怀中前揭书第162页。

③ 丁克家等也将《一而沙德》/《指迷集》归入伦理道德类。参见丁克家、杨万宝、杨怀中前揭文第345页。

④ 参见庞士谦前揭文第373页。

⑤ 参见马恩信《苏菲派的历史及其对哲学和中国门宦制的影响》，收《中国伊斯兰教研究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页；另参见白莲父前揭文第1065页。

⑥ 参见王东平、邵红英译文第20页。

⑦ 参见马恩信前揭文第2页；另参看该书汉译本的提要，余振贵、杨怀中先生前揭书第35页。

17. مقصد 每格塞特/默格索特。波斯文本

波斯文苏菲理学著作，《经学系传谱》第90页记载：经学大师舍蕴善在沈阳开学期间将《默格索特》汉译为《归真必要》；《天方性理·采辑经书目》第6种书，名为《默格索德》，意译为《研真经》。很显然“默格索德”与“默格索特”两词是同名异译；可以认定刘介廉使用的《默格索德》正是本文第17书。李渡南和瓦塞尔提到《研真萃语》分8个部分，2+44页，译者舍蕴善；《归真必要》分5个部分，7+77页，译者破衲痴；后一译本又名《默考索台该凯索》，著者 Azīz b. Muhammad an-Nasafi。他俩还指出刘介廉的《研真经》与袁国祚提到的《归真必要》的波斯原本有别。^①《中国回族大辞典》提到《研真经》原名《默格索德》，系天方名贤欧裁尔著，舍蕴善译为汉文，高永德进行纂注，分4卷8门44章。^②我们知道破衲痴是舍蕴善的道号^③，故李渡南和瓦塞尔之说有误。《研真萃语》^④、《归真必要》和《研真经》，是舍蕴善汉译本的不同版本，因使用了不同的汉文译名和译者署名，易使人产生误解。《研真萃语》是否是《归真必要》的精粹，有待勘同。可以肯定袁国祚见到了舍译的《归真必要》，而刘介廉使用的《默格索德》与舍蕴善所译《归真必要》之原本是同一书。

李渡南和瓦塞尔的研究认为，本书著者是 عزيز بن محمد النسفی。^⑤欧裁尔是否著者的号？或者舍译本将“阿齐兹”误认为

① 参见王东平、邵红英译文第15~16页。

② 参见杨惠云主编《中国回族大辞典》，《研真经》词条，上海辞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767页。

③ 《经学系传谱·舍蕴善先生纪事》第91页记载：初，先生道号破衲痴……”

④ 李渡南书拼写为《研真脆语》，误。“脆”当为“萃”或“粹”。参见李渡南书第33页。

⑤ 参见王东平、邵红英译文第15页。

中国伊朗学 论集

“欧栽尔عزيز”，后者仅比前者少一圆点。其后有大理马复初的阿拉伯文译本，和汉文译本《汉译道行究竟》（同治九年，1870年）。^①据日本学者松本耿郎的研究，译者所据原本是 Aziz Nasafi 的 Maqsad-e aqsa。^②

18. 米而撒特/米而撒德。波斯文本

波斯文苏菲理学名著，乃理学炼性入道之经。《经学系传谱》第34页：胡太师再传弟子冯伯庵先生在云南蒙化首见此经，并开始在回回经堂里传讲。《经学系传谱》还记载了三传弟子马明龙先生、四传弟子常蕴华先生、五传弟子舍蕴善先生继续研究、传讲此经。此外还提到辰州舍蕴善将其译为《推原正达》。《天方性理·采辑经书目》第7种书，名为《密迹索德》，意译为《道行推原经》。很显然“密迹索德”与“米而撒德”两词是同名异译；且两个意译书名较为接近；故李渡南和瓦塞尔认定刘介廉使用的《默格索德》正是本文第18书。^③他俩提到的巴黎藏本《推原正达》当为《推原正达》之误。^④学者们一致认为本书的另一译本是江宁伍子先的《归真要道》（康熙十七年，1678年）；我推测还有第三个译本：武昌马明龙译述的《认己醒悟》（顺治十八年，1661年）。^⑤不过此点尚需勘同。

本书著者是波斯学者阿卜杜拉·艾布伯克尔 عبد الله ابو بكر،

① 刘仲泉提到《默格索德》汉译曰《道行究竟》，参见刘东声、刘盛林注释前揭文第64页。

② 参见〔日〕松本耿郎《马复初和平哲学的发展》，收《文明对话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银川，2005年，第123页；该文由孙俊萍译为汉文。

③ 参见王东平、邵红英译文第16页。

④ “达”乃“达”之繁体，与“迹”字误认；另参见〔英〕李渡南书，13a书，第30页。

⑤ 《经学系传谱·马明龙先生纪事》载：马明龙先生钻研《米而撒德》而难悉其义，后得西域学者极料理传授《富而辨》而成。

成书年代是回历 620 年/西历 1223 年。^①

19. 勒默阿忒。即 اشعت النعمات，波斯文本

波斯文认一论名著，声名最著，旨义深奥。李渡南和丁克家等确认庞士谦的看法，本书作者是波斯大学者查密 الجامي عبد الرحمن (回历 817~897 年)。本书是著者对伊拉克学者法赫鲁丁·易卜拉欣 (?~回历 688 年/西历 1289 年) 编撰的《勒默阿忒》的波斯文注释^②；而《勒默阿忒》则是对安德鲁斯大学者伊本·阿拉比 (1165~1240 年) 的名著《智慧的珠宝》/Fusus al-Hikam 所作的概要。^③本文第 19 书的写成年代是回历 886 年/西历 1481 年。《天方性理·采辑经书目》第 5 种书，名为《额史尔》，意译为《费隐经》。很显然“额史尔”译自“اشعت”。学者们一致确认刘介廉使用的《额史尔》正是本文第 19 书。辰州舍蕴善汉译为《昭元秘诀》^④，署名破衲痴；近年云南阮斌译为《光辉的射线》。

20. 厄噶一特。即 العقائد النسفية 阿拉伯文本

阿拉伯文认一论名著。马坚和丁克家等确认庞士谦的看法，本书著者是中亚学者奈赛斐人 ابو حفص عمر بن محمد النسفي (回历 461~537 年)，最著名的注释本是中亚学者赛尔顿丁 سعيد الدين (回历 712~791 年/1312~1389 年) 所作。^⑤赛尔顿丁的注释本全

① 参见庞士谦前揭文第 373 页；另参见王东平红英译文第 16 页。

② 参见庞士谦前揭文第 374 页；另参见李渡南书第 28 书，28a 书，第 42~43 页；另参见丁克家、杨万宝、杨怀中前揭文第 360~361 页。

③ 《波斯》贾米著，阮斌译《光辉的射线》，商务印书馆 2001 年版，第 2~4 页；关于伊本·阿拉比，可参见《英》希提著，马坚译《阿拉伯通史》，商务印书馆 1979 年版，第 702~703 页。

④ 《经学系传谱》第 90 页记载。

⑤ 参见马坚《著者奈赛斐氏小传》，见其译著《教典诠释》，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印本，1988 年，第 7 页；庞士谦前揭文第 372 页；另参见杨万宝、杨怀中前揭文第 353 页。

中国伊朗学论丛

书约 25 万字，共 18 章。《天方典礼·采辑经书目》第 33 种书，名为《设理合·而嘎一德》，意译为《教典释难》。“而嘎一德”与“厄噶一特”两词是同名异译；“设理合”是指对《而嘎一德》的注释。李渡南和瓦塞尔推测刘介廉使用的《教典释难》可能是赛尔顿丁的注释本；^①其实这可以确认了。天津杨敬修汉译为《教心经注》（1924 年），云南马坚汉译为《教典诠释》（1945 年）。^②

21. 母噶麻忒 مقامات 阿拉伯文本

书名是 مقام 的复数。意为“品级、等级”。据《经学系传谱》记载：默克国进贡缠头叟曾传授胡太师此经，后者于京师购之。^③麦加学者传经，其文本当为阿拉伯文；能于北京请购此经，说明胡太师之前《母噶麻忒》已流传中国；不过胡太师却认为是回回经堂里首讲此经之人。著者又云：此经乃西域诗文中如千狐所萃之裘者也，乃品位进级之经。共 50 章，约七八万言。^④王静斋阿文述及经堂附课最著称者，为哈勒赞伊氏所辑《模格玛台》，内容统计 50 篇，集阿文之精华。^⑤美国学者希提评价说：哈利利的《麦嘎麻特》在七百多年内，被认为是阿拉伯文学宝藏中仅次于《古兰经》的著作。^⑥据此本文第 21 书的著者可以确认就是 خليل بن علي محمد كسام (回历 446~516 年)，成书年代是 1110 年。^⑦

① 参见王东平、邵红英译文第 24 页。

② 赛尔顿丁著，马坚译《教典诠释》（1948 年），初译教义学大经（1945 年）。

③ 参见《经学系传谱》第 26~28 页。

④ 参见《经学系传谱》第 51 页。

⑤ 参见王静斋前揭文第 925 页。

⑥ 〔美〕希提著，马坚译《阿拉伯通史》，商务印书馆 1979 年版，第 477 页。

⑦ 〔黎巴嫩〕汉纳·法胡里著，郑傅浩译《阿拉伯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449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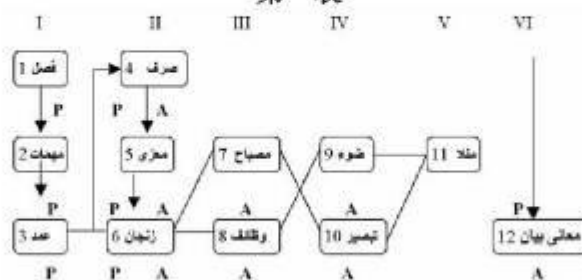
22. 费格 诸“费格”。即各类“费格”

各种教律经，主要当为阿拉伯文的法学著作。《经学系传谱》未列举具体书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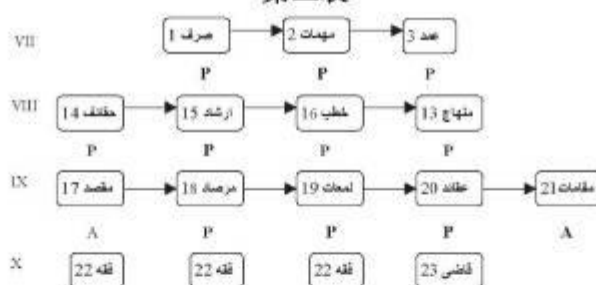
23. 噶遂 噶遂。即 تفسير القاضي，阿拉伯文本

著名的《古兰经》注，阿拉伯文注解。庞士谦认为本书著者系波斯学者法官阿卜杜拉·本欧麦尔 عبد الله بن عمر (? ~ 回历 791 年)，沙斐尔法学派。^①本书又名《白达维经注》。^②《天方性理·采辑经书目》第 2 种书，名为《特福西尔噶最》，意译为《噶最真经注》。很显然“噶最”与“噶遂”两词是同名异译；可以认定刘介廉使用的《噶最真经注》正是本文第 23 书。

第一表



第二表



经堂教育教学体系 1 6 9 7 Q 5 7 0 ~ 1 7 2 0

① 参见庞士谦前揭文第 3 7 2 页。

② 参见白寿彝著《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 9 9 2 年版，第 4 0 2 页。

中国伊朗学论集

从云南回族的他称“潘塞”和“帕西” 看波斯文化之东渐

马超群^①

云南回族现有 60 余万人，在国境外，还有不少人定居缅甸和泰国北部。侨居缅甸的云南穆斯林自称“回族”或“回民”，但缅甸的主体民族——缅族人称他们为“潘塞”（Panthei，英文译为 Panthay）。缅甸的掸族人称居住缅甸掸郡的云南穆斯林为“潘西”（Pan-hse 或 Panthee）。在中国境内，西双版纳傣族兄弟称回族穆斯林为“帕西”（Pashi）。

近百余年，海外学者研究旅居缅甸的云南穆斯林——“潘塞”（Panthay）问题的人较多，有些人还将“潘塞”一词的词义扩大，用以称呼整个云南回族。在海外学者的研究论著中长期争议不休的是“潘塞”（Panthei, Panthay）一词的语源问题。有人认为“潘塞”可能起源于缅语对缅甸穆斯林的泛称“Pathi”或“Passi”一词；用人推测，Panthay 可能起源于 Farsi 一词；也有些人则认为“潘塞”起源于汉语的“本地”或“白旗”或“叛贼”……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是个历史的悬案。

为什么海外学者对“潘塞”一词的词源问题长期争议而无

^① 作者系云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原系主任、教授。

结果，因为他们都是孤立的、单纯从 Panthay 一词的读音上去揣摩推测其来源，没有做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我认为要解决 Panthay、Panhse 和 Parshi 的词源问题，必须借助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语言学和文化学科的理论 and 知识，拓宽视野，将云南回族史、云南对外贸易史、东南亚国家各民族史、伊斯兰教在南亚次大陆和缅甸的传播史、波斯文化与印度文化的关系史和印度文化、掸、傣文化的关系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才能找到线索，得出明确的结论。本人近年来就是根据这一思路，不断地进行探索，于 2003 年曾写成《云南回族的他称——“潘塞”、“潘洗”和“帕西”辨析》一文，发表于《回族研究》杂志（2003 年第 3 期）上，对争议不休的问题，一一做了澄清，这里不再赘述。现本文要论述的问题是：缅语 Panthei，掸语 Panhse、Pathi 和傣语 Parshi 是同一名词的不同读音，其词义都指穆斯林；三者均起源于印度早就出现的 Parsi 一词；而印度的 Parsi 一词说到底又起源于波斯语的“法而西”（Farsi）一词。为此，我们要理清这个问题的来龙去脉，必须从波斯的历史和波斯文化的东渐说起。

波斯（今伊朗）是西南亚的文明古国之一。波斯人属欧罗巴人种印度地中海类型，语言属印欧语系伊朗语族。波斯于公元前 550 年开始建国，历经古代的阿黑明德王朝和后来的萨珊王朝。在古代及中世纪前期，波斯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盛行琐罗亚斯德教（拜火教、祆教）。公元 7 世纪中，波斯被新兴的阿拉伯帝国征服，萨珊王朝亡，整个波斯成为阿拉伯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此大多数波斯人皈依伊斯兰教，古波斯文化的精髓遂大量融入伊斯兰文化体系中，促成中世纪阿拉伯文明的高度繁荣。

在 8 至 10 世纪间，一部分坚持信仰琐罗亚斯德教的波斯

中国伊朗学论集

人，不愿改信伊斯兰教而移居印度西海岸古吉拉特邦一带。这些波斯移民在印度被称为“帕西人” (Parsi)，至今共有 10 万人左右，仍信琐罗亚斯德教，主要从事工商业，操古吉拉特语。虽然这些“帕西”人并非穆斯林，但这是我们在印度历史上最早见到的“帕西” (Parsi) 一词，按《大英百科全书》的解释：“‘帕西’ (Parsi) 一词，其意为波斯人 (Persians)，乃逃避穆斯林的宗教压迫而移居印度的波斯琐罗亚斯德教教徒之后裔。”可见，自中世纪起在印度出现的“帕西” (Parsi) 一词是“波斯人”之意。也就是说，“帕西” (Parsi) 一词最早出现在中世纪的印度，是印度人对波斯人的称呼。后来，随着伊斯兰教在南亚次大陆的广泛传播，在印度民间流行的语言中，“帕西”一词的词义逐渐扩大了范围。

从中世纪中期起，伊斯兰教逐步传入印度（历史上的印度包括今天的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在内），印度历史进入穆斯林统治时期。在 11~12 世纪间，中亚伊斯兰化的突厥人所建立的伽色尼王朝（962~1186 年）和后来的廓尔王朝（1152~1206 年）相继向南扩张势力，先统治印度西北部，后又扩大到印度北部的朱木拿河和恒河流域。1206 年，阿富汗廓尔王朝驻德里的总督库特布乌丁宣布独立，自任苏丹，定都德里，史称德里苏丹国（1206~1526 年），这是一个统治印度的穆斯林中央政权，统治北印度 320 年。16 世纪，中亚伊斯兰文化的蒙古——突厥人又南下，取代德里苏丹的统治，即印度史上的莫卧儿帝国（1526~1857 年）。在帝国的繁荣昌盛时期，南亚次大陆的大部分地区都归入其版图，帝国的统治维持到 19 世纪中期结束，伊斯兰政权在印度的统治长达七八个世纪之久。其间，中亚各族穆斯林不断迁居印度。外来的穆斯林非但没有被印度人同化，反而同化了一部分印度人，使他们皈依伊斯兰

教，伊斯兰教在印度得到广泛的传播，成为南亚次大陆的第二大宗教，穆斯林人数仅次于印度教徒。随着伊斯兰教的传播，阿拉伯、波斯伊斯兰文化对印度的历史和文化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伊斯兰文化体系中，波斯文化对印度文化的影响极大，特别是波斯语、波斯文学及造型艺术的影响最引人注目。

波斯语亦称法尔西语 (Farsi)。公元 7 世纪起，波斯成为阿拉伯帝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后，波斯人迅速伊斯兰化，中古波斯语 (巴列维语) 逐步被废弃，在阿拉伯语同中古波斯语的碰撞与交融中，新波斯语应运而生。新波斯语是在中古波斯语的基础上，由当时通行于伊朗南部的法尔斯地区的一种方言演变而来，采用 28 个阿拉伯字母。加上 4 个波斯字母拼写，并大量吸收阿拉伯语词汇。新波斯语 (Farsi) 产生后，在弘扬伊斯兰过程中，成为阿拉伯语的重要补充。公元 10 世纪左右，地跨亚、非、欧的伊斯兰大帝国在语言上及文化上开始分化为讲波斯语的东部地区和讲阿拉伯语的西部地区，波斯语成为东部穆斯林世界通行的语言。随后，波斯语在伊斯兰教对南亚次大陆及中国的传播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南亚次大陆尤其如此。

伊斯兰教在南亚次大陆的传播过程中，波斯语不仅是阿拉伯语的重要补充，而且从德里苏丹到莫卧儿帝国时期，统治集团上层人物多为南下的波斯人或波斯化的突厥人以及伊斯兰化的蒙古—突厥人，波斯语成为宫廷用语，处于官方用语的地位。不仅穆斯林使用波斯语，一些受过教育的有文化的印度教徒也以波斯语作为交际工具。在中世纪中、后期印度文坛上，不仅存在着印度本土传统的古典文学——梵语 (Sanskrit) 文学，还出现了一种新的文学——波斯语文学。

印度的波斯语文学是印度穆斯林 (含外来人和本地人) 用波斯语创作的文学，“它既具有波斯文学的风格，又带有印度



中国伊朗学论集

文学的色彩”。从 11 世纪伽色尼王朝军队征服印度北部时起，就有许多波斯和中亚诗人、作家进入该地，在当时的伊斯兰文化中心拉合尔进行文学创作活动，为印度波斯语文学奠定了基础。13 世纪初德里苏丹政权建立后，印度政治中心和伊斯兰文化中心从拉合尔转移至德里，印度的波斯语文学进一步发展。诗人阿布·穆法黑尔·奥斯曼·穆赫塔利写有 8 部诗集，其中最著名的是他模仿波斯诗人菲尔多西的《列王记》写成的《帝王志》。此时期最负盛名的诗人是阿密尔·霍斯陆，他用多种诗体写诗，后人搜集整理出 12 万联，其中最有价值者是他的叙事诗和抒情诗，他依照波斯诗人内扎米的创作模式也写有 5 部长篇叙事诗，即《圣光普照》、《西琳与霍斯陆》、《马杰农与蕾利》、《亚历山大宝鉴》和《八重天堂》。此外，他又以波斯诗人萨迪为榜样，把自己的抒情诗编写为 5 部诗集，即《青春赠礼》、《中途之旅》、《和谐乐章》、《诗中精粹》和《完美巅峰》。其诗歌反映了印度穆斯林的思想感情，抒情诗中还有浓厚的苏菲派色彩。

在十六七世纪莫卧儿帝国的兴盛时代，印度的波斯语文学亦更繁荣，涌现出许多诗人，如巴布尔、拜拉姆·汗、克扎里·麦什哈迪、卡西姆·卡希、费济、努鲁丁·朱胡里、穆赫辛·法尼和女诗人马赫菲·泽卜尼斯等，波斯文学作品颇为丰硕。《剑桥伊斯兰教史》评论说：“大莫卧儿帝国时代，印度成为波斯文学的第二故乡。”此语并非夸大其词，而是说得恰如其分。

除此之外，波斯语文学在印度的流行还促使一种新的语言——乌尔都语 (Urdu) 的诞生。乌尔都语是在印度本土语言——印度语基础上，是吸收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许多因素而形成的。乌尔都文字是由波斯和阿拉伯字母改造而成，又大量

吸收波斯语、阿拉伯语和土耳其语词汇，从波斯语中吸收许多成语和构词手段，它是印度北方民间语言同阿拉伯语、波斯语相结合的产物。乌尔都语是今日巴基斯坦国语，也是北方印度穆斯林使用的主要语言。

在造型艺术方面，波斯文化对印度的影响也十分明显。在德里苏丹，特别是在大莫卧儿帝国时代，到处可见宏伟的建筑和花园，尤其是清真寺和陵墓的建造充分表现出此时期辉煌的艺术成就，其杰出的代表是“泰姬·玛哈尔陵”，这座举世闻名的建筑正是印度艺术与阿拉伯—波斯艺术相结合的结晶。此外，曾流行于印度的波斯绘画风格也一直影响着印度的绘画。

除伊斯兰教思想的传播外，我们从语言、文学和艺术中清晰地看出阿拉伯—波斯文化对印度文化的影响是何等广泛和深远，印度人对波斯人是如此的熟悉，以致人们越来越习惯于将称呼波斯人 (Persians) 的名称和“帕西” (Parsi) 一词同广大的穆斯林联系在一起，在印度民间流行的语言中，“帕西”遂约定俗成地成为穆斯林的代名词。后来，“帕西”作为穆斯林的代名词，随南亚、东南亚地区间的文化交流，从印度传入缅甸，进而传入西双版纳。

缅甸自蒲甘王朝 (1044~1287 年) 伊始已成为一个上座部佛教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但自 15~16 世纪起，伊斯兰教也开始传入，靠近印度的阿拉干是缅甸穆斯林的主要居住区。买难点穆斯林部分来自西亚，更多的是祖籍在印度，于是信仰佛教的缅甸族人也按印度民间的习惯，用“帕西”一词称呼缅甸穆斯林，只不过缅甸语发音较重，缅甸语中没有“S”这个音，“S”读作“TH”，故缅甸族人将“帕西” (Parsi) 读成“潘塞” (Panthe) 英文译写为 (Panthay)。19 世纪中期起，随着下缅甸的开发，更多的印度穆斯林涌入缅甸，同时杜文秀起义失败

中国伊朗学 论集

后，云南回族穆斯林进入缅甸谋生者也日益增多，缅族人同样以“帕西”（潘塞）一词称呼侨居缅甸的云南回族穆斯林。在《汉缅大词典》中，明确注明“回族”一词缅语读作“Panthay”（潘塞）或“Panthee”（帕西）。侨居缅甸的云南回族穆斯林除分布在大小城镇外，不少人定居缅甸掸邦。掸族与中国傣族的族源和语言均相同，同样笃信上座部佛教，同样受印度文化的影响，掸族人也称居住缅甸掸邦的云南回族穆斯林为“潘西”（Panhse, Pathee）。由此可见，缅语的“潘塞”，掸语的“潘西”和西双版纳傣语的“帕西”就是同一个名词，都是外来语，都源于印度民间称呼波斯人的“帕西”（Parsi）。本来，在波斯语中，“波斯”一词就读作“法尔西”（Farsi），只不过是印度人将它异读为“帕尔西”（Parsi）罢了。这就是云南回族穆斯林的他称——“潘塞”、“潘西”和“帕西”的由来。由此可清晰地看到波斯文化的东渐和波斯文化在南亚次大陆和东南亚各民族文化中留下的历史痕迹。

2007年3月12日整理定稿

简论伊朗百年宪政的成就

吴 成^①

2006年年底，为了使伊朗宪政运动中取得的成功不致因国王的去世而付诸东流，仓促通过了《基本法》，次年10月，又通过了《基本法补充条款》。这是20世纪的伊朗宪政运动取得的重要成果。迄今为止，伊朗宪政运动整整过去了一百年。在这一百年中，伊朗人民在20世纪的社会变革大潮中，也取得了巨大的引人注目的成就。本文旨在通过《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看伊朗百年宪政的重要成就。

一、从君主立宪到伊斯兰共和

20世纪初的第三世界，在西方殖民主义侵略下，可谓遍体鳞伤。然而，不管民族大小，他们都不愿屈从于帝国主义的淫威，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精英们根据自己的不同国情，尝试着通过不同的政治模式变革，以拯救民族于危难。鉴于当时崛起的大国分属于共和制和君主立宪制，第三世界国家也在这两种制度之间进行选择。如，中国辛亥革命、菲律宾资产阶级革命、土耳其资产阶级革命选择了共和制，伊朗的立宪运动则选

^① 作者系河南师范大学青少年问题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伊朗伊斯兰革命史研究。

中国伊朗学论集

择了君主立宪制。

伊朗立宪运动选择了君主立宪制不是偶然的，它是伊朗的社会发展与政治思潮的产物。立宪运动前的伊朗，在与西方的交往中，一些思想家产生了学习西方的思潮。如文化革新思想家米尔扎·法哈里·阿克胡扎德就说：“我们必须做到在与欧洲建立贸易往来和接受欧洲的各种产品之前，首先必须接受欧洲思想。”^①再看看“三权分立”理论的诞生地法国，这一政治理论给法国带来了什么呢？首先是法国大革命和它的三次高潮，法兰西共和国建立，接着是拿破仑战争和拿破仑帝国的建立，再以后是波旁王朝的复辟、七月革命和“七月王朝”的建立、1848年欧洲革命中的二月革命和六月起义、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建立、1852年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建立、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如果说这还不够的话，普法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两次灭顶之灾更是法国人永远的伤痛。与法国相比，英国的君主立宪制使其成为日不落帝国，主宰世界达两个多世纪。加之，卡扎尔王朝统治者希望通过政治变革以维护其长期统治的愿望，君主立宪制自然成不了伊朗立宪运动的选择。

然而，有了君主立宪制宪法，并不等于就建立了君主立宪制度。就伊朗的政治实践来看，直到巴勒维王朝灭亡，伊朗也没有建立起真正的君主立宪制。我们可以从伊朗最后一个国王巴勒维的话中得出这一结论。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巴勒维国王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从根本上说，在我们家里，国王是三权——行政、立法和司法——之首。”^②

① 王泽社《略论伊朗近代早期三大启蒙知识分子》，刊《中东研究》2006年第2期，第12~18页。

② 《伊朗》费雷敦·胡伟达著，周仲贤译《伊朗国王倒台始末记》，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4页。

直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前夕，虽然伊朗在政治上取得的成就仅限于理论，但经济上取得的成就则是巨大的。仅以“白色革命”的成果为例，从1963年到1977年，伊朗出现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1965年伊朗人均收入300美元，1977年上升为2200美元^①。国民生产增长率逐年提高，1963~1966年均为8.8%，1967~1971年为11.8%^②，1972~1973年为14%，1974~1975年为30%^③。1963~1977年，伊朗发电量增长了31倍；电视机增长了10倍。全国小学生人数1958/59年度为22.691万人，1960/61年度约为143.16万，1974/1975年度，达到了411.9万^④。在生产力的高速发展面前，由于政治专制，导致腐败盛行，连巴勒维自己也不得不承认：“长期以来，说谎，敲诈勒索，贪污成为常事。这些确实已成为我们官僚主义的痼疾。”^⑤所以，伊朗伊斯兰革命所要解决的是伊朗的政治制度怎样去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问题。

霍梅尼的伊斯兰政府理论突出的伊斯兰宗教学者在未来制度建设中的作用。其理论产生的背景是第三世界大多数国家在模仿西方制度建设中出现了一系列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后，开始对民族文化的思考。而在伊斯兰共和国的实践中，实行的则是伊斯兰共和制。依照《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伊朗的政体是伊斯兰共和国政体制”（第一条）^⑥。“统管伊朗伊斯兰

① 《伊朗》费雷敦·胡伟达著，周仲贤译《伊朗国王倒台始末记》，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2页。

② 《世界经济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年版，第790页。

③ 赵伟明《评伊朗现代化》，刊《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增）1989年第12期，第36~41页。

④ 梁子勤译《二十世纪六十一七十年代的伊朗》，载《东南亚资料》1983年第1期，第23~24页。

⑤ 《伊朗》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著《对历史的回答》，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126页。

⑥ 引用版本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斯兰文化联络局翻译出版社1997年版。

中国伊朗学论集

共和国的最主要权力机构是：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机构。这三个机构均由人民的领袖根据以后的法律原则所领导。这三个机构相互间是独立的。”（第五十七条）由此我们可知，它是指精神领袖与三权分立相结合的政治体制。这一体制介于君主立宪制和共和制之间。与共和制相比，它多了一个精神领袖；与君主立宪制相比，其精神领袖是通过一定的民主程序产生的，不是带有家庭利益的，可以世袭的君主。在激烈的社会转型期，这一制度通过奇里斯马式的精神领袖既可以避免在“自由名义”下的混乱，实现政治转型的平稳过渡，也可以避免家族的世袭统治，为伊朗的政治制度和平发展奠定了基础。伊朗伊斯兰共和制是伊朗由制度模仿到制度创新的结晶。

然而，我们也要看到，任何一种制度都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加以完善的，伊朗的伊斯兰共和制亦不例外。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将面临怎样处理好精神领袖与民选总统的关系这样的问题。

二、注重文化建设

伊朗百年宪政的另一突出成果是把重视文化建设明确写进宪法。如，宪法明确规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有责任做到：“正确地利用新闻和群众团体的报刊等工具在各方面提高公民的觉悟水平”；“通过建立调研中心和鼓励调查研究的方法来加强科学、技术、文化和伊斯兰的各个领域里的调查研究和创造精神”；“所有人民参加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民族命运的决定”（第三条）；“任何个人、组织或官员无权利用自由来稍微损害伊朗的政治、文化、经济、军事的独立……”（第九条）；“所有穆斯林都属于一个社团，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有责任把伊朗的总政策置于各伊斯兰民族的

联合和团结的基础上，致力于实现伊斯兰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统一”（第十一条）；保证公民享有“文化权利”（第二十条）；“有关特别重要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问题的立法，可能采取公民投票的方式”（第五十九条）；在总统誓词里有“作出一切努力保卫国家的边界和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独立”（第一百二十一条）；“不得签订可能导致外国控制国家自然、经济和文化资源及军队和其他部门的条约”（第一百五十三条）。整部宪法，十一处提到“文化”，足见其对文化的重视。

这种对文化的重视不是作秀，从宪法对国旗的规定和国旗所反映的文化底蕴中，我们可以看到伊朗新宪法对文化的重视是建立在其文化发达到了一定的水平之上的。宪法明文规定：“伊朗国旗为白、绿、红三色，印有伊斯兰共和国特殊标志和‘伟大的真主’的口号”（第十八条）。同时，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国旗所反映出来的文化意蕴则是其他民族所达不到的。白、绿、红三个长方形代表着政治现代化发展方向的三权分立，而交叉部位的花边则表明三权不是绝对的。两行花边分别用十一句“真主伟大”的波斯文书写，以此纪念伊斯兰革命胜利日，公历为1979年2月11日和伊朗历为11月22日。中间为伊朗国徽，它由四弯新月、一把宝剑和一本《古兰经》组成。新月象征宗教；《古兰经》象征信仰高于一切；宝剑象征力量。它们又组成了波斯语单词“安拉”。整个圆形图案象征地球，表示安拉的思想普照全球。

重视文化与重视宗教信仰是相辅相成的。不能促使文化发展的宗教不可能有发展前途，而每一种发达的文化都有一定强烈的精神蕴涵其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三世界迎来了民族独立的高潮，一系列民族国家宣告独立。然而，这些国家中的



中国伊朗学论丛

很大一部分国家在现代化之路上并不顺畅，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一系列问题，如，为什么同样的投入，与西方发展国家相比，取得的收益是不一样？为什么社会财富增加了，人们没有得到相对的幸福感，反而变得更为紧张、痛苦了？在一种什么样的价值观下人们才能使自己生产得更幸福？在民族竞争中，怎样彰显自身民族以维护民族利益？随着人们对这些问题的深层思考，文化和时代精神这些东西自然也就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在以宗教为背景的文化中，宗教也就成了人们特别关注的焦点问题。这就使得文化打上了传统信仰的烙印。这也使得第三世界国家在发展中由模仿进一步发展到文化选择。

这一现象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是以另一种形式表现出来的。看一看西欧宗教观在 19 世纪的变化，我们自然也就可以看到。在启蒙思想影响下，圣西门等一批思想家在年轻时，不信宗教。到了晚年，圣西门开始宣扬人道教，为此，其弟子孔德与其分道扬镳。然而，当孔德到了晚年，又致力于“人道教”的建立。还有另一个社会学家涂尔干，也是如此。在其背后，有尼采对当时社会的批判。他曾说过这么一句名言：“上帝死掉了，这班不敬者也同死掉了。”^①尼采的话包含了这样的意思，在文艺复兴及以后的启蒙运动中，思想家们通过对人的理性追求而否定了上帝。在否定上帝的过程中，他们以平等、自由、博爱等口号来调动人们参与社会变革的积极性。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资本家把人变成附属于大机器的工具，他们看到的只是物质财富和金钱的增加而忽视人的全面发展。鉴于此，尼采说当初那些许下诺言的人，“这班不敬者也同死掉了”。遗憾的是我们只领悟了他那句话的前半句，

① 《德》尼采著，徐梵澄译《苏鲁支语录》，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6页。

而忽略了后半句。这样，我们也就忽略了一个时代，一个在大机器生产面前人的自我丢失的时代。正是对社会现实的强烈责任感，尼采提出“重新估计一切价值”，并希望由能够摆脱物欲的“超人”来拯救这个社会。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西方没有找到拯救社会的“超人”，而是由马克斯·韦伯发现了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必然联系，从而为 20 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揭开了新的一页。

一个国家在文化背景下的发展，将不再把经济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唯一指标，而是强调社会中人的发展，在社会发展中怎样去保护人的尊严、人的自由，从而调动人参与社会活动的积极性，进而使社会得到全面的发展。

同时，我们还要看到，重视文化不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的个别现象，整个发展中国家的宪法与发达国家宪法相比，都比较重视文化建设。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不管是 1982 年版还是 2003 年版，谈及文化都是 25 处。这反映了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有着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在注重制度建设的同时，亦重视反映民族价值观的文化选择。美国、英国、法国等宪法中则没有提及文化。

三、明确将“可持续发展”理念写入宪法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以国家大法的形式确定下来。其第五十条明确规定：“在伊斯兰共和国内，保护当代和下一代拥有其生活成长的生态环境是全民的公职。因此，严禁污染环境和严重破坏环境的经济和非经济项目得以实施。”该条款所包含的思想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它要求我们今天的发展既要满足现代人的需求，又要考虑子孙后代的利益，不要以

中国伊朗学论集

牺牲其利益为代价，人类不但要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界的关系。

在西方数千年的文明史中，文艺复兴之后，人们可以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社会了。随着西方工业化而来的是殖民主义在全球的扩张，原来以“重农抑末”为主要标志的民族开始探寻民族的发展了，但是，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发展与经济增长仍是同义词。面对工业化带来的能源危机、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温室效应、生物多样性减少，一些学者开始注意到了单纯追求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灾难。尽管美国人卡逊早在 1962 年就出版了他的《寂静的春天》一书，指出滥施化肥、农药给生态平衡带来了严重破坏，但引起国际社会对环境问题重视则是十年以后的事了。1972 年，罗马俱乐部通过一年的研究，出版了《增长的极限》，得出了零增长的悲观结论。同年，联合国在瑞典召开“人类环境会议”，发表“人类环境宣言”，呼吁各国必须采取共同行动，保护环境、拯救地球、它标志着人类社会已经认识到，保护地球，保护环境就等于在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1987 年，联合国指定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经过长期研究，发布长篇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首次对可持续发展进行界定，使“可持续发展观”成了人们的普遍观念。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中，及时地将代表人类社会发展方向“可持续发展观”写入宪法，足见其前瞻性和进步性。

总之，《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代表了伊朗百年宪政的最高成就，它所确立的伊朗伊斯兰共和政体符合伊朗的国情，是伊朗民众的理性选择；它所确立的文化原则代表了这一时期第三世界社会变革的发展方向，是符合世界历史发展潮流的；它的“可持续发展”原则，既有利于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也有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这也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

关于中国与伊朗关系的前景展望

马 平^①

当今世界很不安宁，尤其是中东地区冲突不断，且愈演愈烈。美国深陷于伊拉克战争的泥沼尚未抽身，又以“伊核”问题、支持“哈马斯”恐怖主义组织等为由，向伊朗政府和人民发出战争恐吓。爱好和平的中国人民密切关注事态发展。作为中国穆斯林群体，为伊朗局势与伊朗人民的命运深感担忧。本文从中东局势现状引发开来，尝试着分析今后一个时期中国与伊朗关系的前景。

一、中伊关系源远流长

在中国与世界各国尤其亚洲各国中，中国与伊朗数关系最好的国家之一。在有历史记载的——如中国自唐、宋、元、明、清、民国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漫长历史时期中，中国与伊朗两国之间，从未发生过任何冲突或战争。两国之间有的只是悠久的经济、文化交往史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2000多年前，著名的“丝绸之路”就开通东欧亚大陆，沟通中国与波斯来往。

^① 作者系宁夏社会科学院回族伊斯兰教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中国伊朗学论集

二、伊朗面临战争压力

美国与伊朗本是“曾经的亲密”国家，“在1979年以前原本保持着非常密切的双边关系”，“伊朗是美国十分倚重的地区盟友，而美国则是伊朗独立、安全的重要保证”^①，但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后，因为伊朗不再听命于美国，所以美伊两国关系迅速交恶，成为势不两立、相互极端仇视的国家。美国出于一己利益，一意孤行，意欲军事打击伊朗。28年来，伊朗始终笼罩在美国各种封锁、制裁乃至发动战争的阴影之下，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在一些专家认为，石油仍将是这次战争的真正目的。因为人所共知的是，美国的中东计划，就是控制中东的石油。因为，在全世界所有的石油储量中，沙特阿拉伯、伊拉克、伊朗以及其他几个海湾小国所占的比率是65%。沙特阿拉伯是美国的盟友，自不待言。伊拉克是世界石油储量的第二大国，仅居沙特阿拉伯之后，占世界石油总储量的12%。如今，美军驻扎在伊拉克，美国、英国将从伊拉克战争中直接受益。假若美国下一步再控制了伊朗，在今天全球能源日趋紧张的情况下，就意味着占据更多的世界石油份额，以及更多的国际政治掌控力、话语权。

美国长期干涉中东、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的事务，与其盟友以色列一道发动了多次战争——如几次中东战争、黎巴嫩战争，尚未结束的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通常美国及其盟友的此类战争，是为了加强美国对中东产油国家的影响力，从而控制着世界的经济命脉。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动的几次战

① 范鸿达著《美国与伊朗：曾经的亲密》，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争，美国与多数石油输出国一样成为最大受益方。

美国在中东最大的利益就是石油、能源，其外交政策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此。美国想获取能源，想改变中东格局，所以入侵了伊拉克。在伊拉克，美国并没有达到目的，因此想通过其他途径来挽回败局。在我们看来，由于真主党、哈马斯背后有伊朗的支持，因此针对伊朗的战争其实已在黎巴嫩、巴勒斯坦打响，黎以冲突、巴以冲突其实是美国对伊朗战争的预演，尤其是以色列想通过打击真主党来阻止什叶派掌控黎巴嫩政权。因为如果真主党成为黎巴嫩第一大党，伊朗就会将黎巴嫩视为同盟。美国和以色列想把整个中东地区的石油控制在自己手中，因此他们要阻止伊朗通过真主党来控制黎巴嫩。

美国人真诚地相信，美国发展模式是被上帝挑选出来的最佳模式，世界其他国家应以美国的政治体制、价值观为标本来决策行事。他们不认为其他国家应该有属于自己的、彼此各异的发展模式。这种信念已演变成另一种形式的原教旨主义。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是对当今世界的一个威胁相比较，美国的这种“基督教原教旨主义”才是对当今世界的最大威胁。

因此，如果“用美国式价值观改变全世界”的意识形态在美国占上风，美国政府就会和以色列一起进攻伊朗，那对全世界而言都将是一场可怕的灾难，因为届时将引起全世界穆斯林的普遍不满，许多伊斯兰国家可能都会加入到抵抗美国的行列中。

美国通过伊拉克战争打败了萨达姆政府，但并没有控制住伊拉克的局势。如果进攻伊朗，美军可能也会重创或摧毁伊朗政府。尽管如此，美国仍要比在伊拉克付出更多的代价，如死伤人数，而且依然不可能真正控制住伊朗。

无论世界格局如何错综复杂，世界形势如何风云变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一个常识：帝国主义的本质就是

中国伊朗学论集

战争。战争，是美国经济的催化剂，是美国“可持续发展”的原动力，是美籍犹太人金融寡头和大企业寡头们的命脉，是历届美国政府的基本国策。战争，甚至是一部分极端主义思想的美国人的生活方式。试想，假若没有战争，美国甚至无法生存，很多美国人也无法生存。

我们从美国经济的发展特点就可以看出，长期以来美国用于国家防务的预算很高，这就带动了如电子、生化、高新技术等很多行业的发展。美国许许多多大小公司都可从与战争有关的生意中获益。所以，美国政府及一些美国人的理念是：战争可以刺激经济增长、可以刺激 GDP 增长。美国的历史证明，正是战争维持了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正是战争使美国成长为一个超级大国，一个“伟大的”帝国。

美国政府及一些美国人的另一个理念是：如果一个国家因战争被破坏，就需要重建，而重建就意味着无限商机。美国现在的工业和经济增长越来越依靠这些战争重建国家为基础支柱，是战争重建创造了美国人的劳动就业增长。

因此美国政府对于伊朗的战争威胁是永恒的，区别在于时间。布什政府将通过外交制裁、贸易制裁、金融制裁、军事制裁来对付伊朗。伊朗人民永远不要对美国政府抱有任何幻想。

伊朗政府和伊朗人民似乎下定决心要像当年中国那样发展核武器，而且伊朗人的核计划似乎已接近西方国家无法阻止的阶段；伊朗国家领导人对二战反犹行为的否认；布什政府将近年来美国在伊拉克乃至整个中东的诸多不顺利归咎于伊朗；布什总统本人目前的困境。以上多种因素，相信是美国人对伊动武的原因。

美国有充足的军费预算，在 2006 年超过 4500 亿美元，相当于其他 190 个国家的军费总和。所以美国完全有能力发动对

伊朗的军事打击。现代战争其实不仅是战略与战术的抗衡武器与装备的抗衡，更重要的是经济与财富的抗衡。在这些方面，美伊之间的优劣态势非常明显。

从长远观察，美国可能会因为无休止的战争而导致最终衰落。但在一个时期内，美国却呈现频繁发动战争，刺激经济增长的态势。相反，伊朗的经济发展将因战争而倒退若干年。

而且战争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而言，蒙受最大牺牲、最大损失的是普通老百姓。

三、中伊关系面临考验

法国总统希拉克 2006 年 10 月 26 日在北京大学作题为《中法关系的前景》的演讲时曾说过：“明天中国将是世界强国，甚至可以说是世界第一大强国。”希拉克总统是一位对中国人民十分友好、对中国文化十分喜爱的西方政要。但是其他的西方政要可能出于对中国的偏见，则十分害怕中国的崛起。其中，害怕中国崛起、阻止中国成为世界强国的主要西方国家就是美国。

多少年来，全球各地出现一种危险的论调——“中国威胁论”，并正在不断地蔓延滋长，西方以及追随西方的少数国家，不断地拿此说事。我们认为，除了控制石油输出国家，如上述沙特阿拉伯、伊拉克、伊朗等国家以外，美国还试图控制石油输入国家，如中国——这类未来美国“潜在的竞争对手”国家，甚至于如日本这类传统意义上美国的“盟国”，也是美国政府试图控制的“竞争对手”国家。随着中国等亚洲大国的崛起，整个亚洲国家对中东石油的需求量明显增加，这恰恰是美国担心的，因此它就更更要牢牢抓住伊拉克、伊朗不放，以进一步控制中东石油，进而遏制中国的发展。近些年来诸多事实



中国伊朗学论集

充分证明，中国这样的国家，现在正不断地成为“中国威胁论”的受害国。

在石油的输出与输入上，中国与伊朗有共同的利益，在两国的经济技术合作上，中国与伊朗有共同的利益。因此，这些共同的利益，注定了中国与伊朗两国政府和人民在某种程度上承受来自共同方向的压力。因而中国人民需要与伊朗人民联手维护共同的利益。

国际政治的常识告诉我们，当今伊朗是一个不容小视的国家，它决定着中东局势乃至世界局势的发展走向。法国外交部长布拉齐说：“伊朗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伟大的人民和伟大的文明，值得尊敬，是地区稳定的因素。”“伊朗对于中东地区的稳定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与伊朗保持接触是解决黎巴嫩危机的重要途径之一。”

我们对中伊关系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从长远看，无论世界风云如何变幻，中国人民与伊朗人民的友谊长期共存。而在可以预见的一个时期内，我们的预见是：

1. 在互惠互利原则下，中国与伊朗的经济贸易往来将持续增长，科技文化教育方面的交流也将进一步扩大。

2. 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被很多人认为是打着“反恐”的旗号满足其政治诉求和经济目标。所以，与阿富汗战争相比，联合国安理会没有投票表决，法国、德国、意大利等欧盟国家也不赞成。假若美国发动对伊朗的侵略战争，作为安理会五大国的中国，必定不会投赞成票。

3. 中国人民尤其是中国穆斯林将会站在伊朗人民一边，支持伊朗人民抗击西方打压、在核不扩散前提下和平利用核能的合法权利。但对伊朗的发展核武器计划，中国政府的态度是明确的。

4. 中伊关系可能进入一个困难时期。在“反对恐怖主义”“防止核扩散”等敏感问题上，中国政府及中国人民将承受西方巨大的压力。中国出于和平发展的良好愿望，无意与西方大国形成直接对抗。因此，中国将在一些涉及中国与美国、中国与伊朗、美国与伊朗关系的问题上，做出自己独立的选择。

5. 中国与美国有着某种共同的战略利益，同时，中国与伊朗也有着某种共同的战略利益，在涉及中国国家利益的重大问题上，中国或伊朗做出自己的选择，都应当给予充分理解。

6. 无论人类历史如何发展，无论世事如何变化，中国人民永远是伊朗人民忠实的朋友，中国穆斯林也将永远与伊朗穆斯林心心相印。

中国伊朗学论集

对加强中伊两国学术交流的几点思考

杨经德^①

中伊友谊源远流长

中国和伊朗是友好国家，两国都具有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两国人民间的友谊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就是中伊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丝绸之路是世界文明古国——中国、伊朗、印度、埃及、巴比伦等许多国家间、多种文明间进行交流、对话的重要纽带。在丝绸之路通过的地方，曾出现过波斯帝国、马其顿帝国、奥斯曼帝国等横跨亚、非、欧的世界大帝国；在丝绸之路的要冲上，诞生了至今仍影响亿万人思想的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古代世界许多重大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活动发生在这条通道上，许多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发明创造和思想意识形态首先通过这条通道传播到世界各地；作为丝绸之路上的两个具有举足轻重意义的重要连接点中国——伊朗，其间的各种思想、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人员的交流和互通更是独树一帜，可以说这条贯通亚、非、欧的远距离贸易路线，已远远超越了经

^① 作者系法学博士、西南政法大学兼职教授，曾在伊朗德黑兰大学从事过短期访问研究。

济贸易范围，形成世界性的经济、政治、文化、民族、宗教、思想等各种文明要素参与其中的多领域、全方位的交流、互动地带。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中伊两国人民以之为纽带，克服千难万险，跋涉千山万水，顽强地进行着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交往，这种平等的双向互动的交流丰富了两国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促进了彼此生产力的提高，开阔了彼此的视野，架起了相互理解的桥梁，建立和巩固了源远流长的友谊，为当代中伊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基础，它也因此为中伊文明、友谊交通史铸下了不朽的丰碑。

1971年中伊建交以来，特别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立后，中伊两国的传统友谊又有了新的发展，双方在各个领域的友好合作和交往更加深入、紧密，两国高层领导人互访频繁，这为新世纪中伊关系的巩固、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中伊之间进行文明对话和加强学术交流创造了极好的时代氛围，预示着中伊学术交流史上的又一个春天已经来临。

中伊间学术研究和交流亟待加强

中国与伊朗，是丝绸之路的缔造者。在陆地与海上丝绸之路间，两大文明至今已有 2109 年的对话与交往历史。这一交往无论是从思想文化，还是从科学技术方面，对各自的社会发展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有文字可考，自汉代以来中伊两国就已经有了相互交往的历史，司马迁在其所著的《史记·大宛列传》中记录“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数千里。……其属大小数百城，地方数千里，最为大国”，而且指出其民善于经商，“民商贾用车及船，行旁国或数千里”。随后，横贯伊朗境内的丝绸之路和穿越波斯湾的南海水道，进一步促进了中伊两国之间在政治、经济和文化诸多方面的交流，从此，中伊之

中国伊朗学论集

间的学术文化交流也一度进入了良性发展时期，尤其是到了唐宋时期（公元 618~1128 年）进入了繁荣时期。据史书记载，当时伊朗的商人、使者、僧人、传教士、艺术家和大批高级官员纷纷访问中国，有四五千伊朗人定居当时的唐都长安，随之而来的各种学术研究和文化交流互动也更进一步推动了两国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各个领域的合作和发展。如伊朗的数学、天文、历法、植物栽培技术、灌溉技术（特别是沙漠灌溉技术）、音乐舞蹈、宗教文化、文学著作等被大量引入中国，而中国的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火药、丝绸、陶瓷和冶炼、农业生产、水利灌溉等技术、文学艺术也被大量介绍到伊朗。“由此可见，中国丝绸外传，最初只是在经济上互通有无，作为商品交换，后来突破了经济范畴，与政治、外交、宗教、文化、艺术发生了密切的关系，并且带来了深远的影响。”^①可以说，历史上双方的学术交流和互动得益于以丝绸之路为纽带的经济、贸易往来和发展，而学术交流和互动反过来又有力的推动和促进了两个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使当时两个国家的人民受益匪浅。

历史证明，中伊之间的学术研究和交流是具有非常深厚的渊源和基础的。如何把这种良好的学术交流和互动传统继承发扬下去，使之更好地为中伊两国友谊和互信发展服务却是值得我们认真加以研究的。加强两国间的学术研究和文化交流合作符合两国的现实和未来发展需要，也完全符合两国人民间的友好交往愿望。然而笔者认为，或许是囿于思想意识形态和传统文化之间的差异，自近现代以来，两国间所进行的学术研究和交流互动至今仍呈现出点少、面窄、层次低的局面，要打

① 参见王锋《丝绸之路与中伊文化交流》一文，载高发元主编《首届赛典赤研究国际会议论文集》，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53 页。

破这种今不如昔的尴尬局面，笔者认为首先要解决好以下三方面的问题：

一是思想共识问题。一方面伊朗是一个奉伊斯兰教为国教的政教合一的传统伊斯兰国家，在其国家的政治生活、社会管理和大众生活中均把伊斯兰原则视为国家和个人的最高准则，特别是自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执行的是严格的伊斯兰法律制度（即沙里阿-Sharia），这是为伊朗宪法所确认和维护的国家根本制度。由于伊斯兰教或伊斯兰制度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它有别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因此国内学术界对开展伊朗学研究客观上存在着认识不全面和认识不够深入的问题，甚至在学术界还有一些人对现行的伊朗对外政策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担心或疑虑。他们认为伊朗伊斯兰革命的目的就是输出革命，就是输出伊斯兰精神，因此对深入开展伊朗学研究有着种种担心，这主要还是由于对伊斯兰教或伊朗的伊斯兰意识形态存有不应有的学术偏见所致。其实这些认识存在着极大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很多人对伊斯兰的基本原则和精神以及对伊朗的社会发展现状及其对外、对内政策缺乏准确的认知和了解，因而产生出伊朗学研究价值不大的判断，客观上也限制了双方间的学术交流和发展的，这是缺乏远见的。

另一方面，中国是一个奉行无神论的典型社会主义国家，其社会意识形态、国家制度、传统社会价值观念等方面与伊朗有着较大差异，致使伊朗的学术界也对研究中国问题存在着片面性认识。伊朗学术界有相当一部分人始终只把眼睛盯向欧美发达国家，而且更多的只是关心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如何利用中国牵制美国等西方国家，低估甚至忽视了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对未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巨大潜在影响力，他们对社会主义也心怀种种顾虑和担心，这也是两国间学术研究和交流未能深入开

中国伊朗学论集

展的主要制约因素之一。

新世纪人类文明走向的特点是世界文化的多元化和多元文化的世界化。各地区和各民族都在弘扬自己的优秀文化，使自己的文化逐渐走向世界。而 21 世纪的中伊文化呈现出来的显著特点仍然是多元化、开放性和创新精神。正如中国原国家主席江泽民 2000 年 6 月 22 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到访的前伊朗总统哈塔米会谈时指出：中国和伊朗都是亚洲重要的发展中国家，积极发展与伊朗的友好关系，加强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友好合作是中国政府的一贯政策。在世纪之交，两国领导人和政府需要高瞻远瞩，为建立面向 21 世纪长期稳定、内容广泛的中伊友好合作关系而共同努力。哈塔米总统也表示：伊朗和中国是两个文明古国，有许多共同点。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不仅是中国通向世界的贸易之路，而且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同伊朗以及其他国家人民之间的交流和友谊，在新的世纪，伊朗愿同中方共同努力，把两国友好合作关系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双方对近年来两国经贸合作表示满意。哈塔米总统还专门阐述了他关于文明对话的有关倡议。最后，双方一致认为，两国经贸合作互补性很强，中国政府鼓励有关公司企业积极参与伊朗的经济建设。双方应当积极探索符合当代特点和两国情况的新的全面合作方式，进一步加强合作，使两国各方面关系迈上一个新的台阶。应该说中伊两国领导人对两国关系未来发展的判断和定位是极为准确的，对未来中伊关系的发展取得了国家间的共识。

作为中伊双方之间的学术界也就应该摒弃疑虑和担心，在国家共识的指导之下，求同存异，互相尊重、理解和支持，开阔研究视野、拓展研究空间，取得学术上的共识：即加强学术互动，开展积极的合作和交流，为中伊关系的深入、持久发展建言献策，为中伊之间的官方和民间交流合作提供必要的理论

先导和舆论支持。

二是认识误区问题。时下，在学术界流行一种观点：认为学术就是学术，学术有学术的规范，学术不应该牵扯其他。笔者认为这是学术研究的一个误区，这种观点极力想把学术研究与现实关系割裂开来。然而，如果把学术研究看得太过清高，无异于是将其束之高阁，这不仅无用而且有害。于是乎，脱离了现实或不能为现实服务的学术研究将失去其生命力，这种学术研究不要也罢。

三是学术研究、交流的目的问题。中伊学术界的同人应该树立这样一种信念：中伊之间的学术研究和交流应该更多的关注双方现实和未来发展的需要问题，要积极为中伊传统友谊和双方的未来发展提供有见地的理论支持，为两种伟大文明间进行平等对话和长期互信合作创造有利条件。从国家和国际政治的层面来看，“中伊双方都主张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抵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单边主义，主张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充分发挥第三世界国家的作用，稳定石油价格，排除外来干涉，维持中东和海湾地区的和平和稳定，两国在人权、反恐领域具有共同的想法和共同的利益。”^①有了国家层面的这些大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基础的存在，中伊之间的学术研究和交流不仅应该有所作为，而且应该大有作为才是。

当前，中伊之间有两个最需要拓展的学术研究和交流领域，即国家制度的比较研究和法律制度的比较研究。这两个领域的研究为什么最需要拓展呢？笔者认为，一方面是因为在传统的中伊间学术研究和交流中这两个领域的涉猎者很少，而且可供利用的研究成果更是少之又少；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这两个

^① 参见冀开运《中伊关系的深度分析》一文，载《首届赛典奈研究国际会议论文集》第393页。

中国伊朗学论集.....

领域的问题对其他领域的研究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作用，它们是两个基础性的研究课题，其成果对其他领域的研究具有支撑性，因此其作用和意义不可低估；还有就是这两个领域的研究成果对中伊间无论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交流、沟通都极为重要。简单地说，制度文化作为两个国家传统文化的最高表征和精神内核，是一个国家或民族中最具精神象征的元素，如果对相互间的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都不熟悉或缺乏研究的话，那么实际上也就意味着不能彼此从对方获得相对准确的期望和诉求，也不能准确把握彼此间内心深处的话语，在这种情况下要想获得深层次的交流和沟通效果无异于画饼充饥。

最后，想表达的愿望是：这两个领域的研究也是笔者的志趣所在，希望能得到伊朗方面在相关研究领域有相同志趣爱好的专家、学者的回应，加强在这两个领域的研究合作和交流，以期为中伊间增进理解、加强互信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巩固传统友谊尽些绵薄之力。

中国与伊朗：革命后社会发展进程的 比照性解读

王 猛^①

所谓的“革命后社会”，即是指这种经过革命而建立起新社会制度的社会。从总体上看，革命后社会“必定有一个初步时期，然后进入革命后社会的发展时期。”自1979年以来，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走出了一条独特的渐进式发展之路，国家的党政、议行、政经、政法和政社一体化色彩，在经过巩固、改造、建设、整肃以及改革等五个阶段的发展中呈现消退趋势。^②中国和伊朗在20世纪都发生过疾风暴雨般的革命，也都在革命后的大约1/4世纪才得以开始纠偏与改革的国家常态化、现代化进程。美国高盛公司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将之概括为“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sus）”。^③另一方面，伊朗因为近似的文化、地理和现状而在革命后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借鉴了中国的许多做法。因此，从一种比照性的视角审视中伊两国1979年以来的社会发展和相互交往，既有利于深化对两国发展经验教训的理解与反思，也会对两国以后

① 作者系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教授。

② 参见王沪宁《革命后社会政治发展的比较分析》，载《复旦学报》1987年第4期，第77、8~81页。

③ 乔舒亚·库珀·雷默撰，李丽编译《“北京共识”提供新模式》，载《环球时报》2004年5月31日。

中国伊朗学论集

的交往方式、内容及发展趋势产生影响。

一、1949 ~ 1979：中国与巴列维伊朗

1949年后，分属东西方阵营的中伊两国在意识形态的油彩下互相对峙，双边交往变得陌生而困难。巴列维伊朗担心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及中苏结盟，担心中国对伊朗共产党（Tudeh）的支持，^①因而对中国的敌意持续增加：不承认新生的共和国政权，支持联合国的朝鲜问题决议并谴责中国为侵略者，支持敌视中国的“西藏提案”，在中印边界问题上诬蔑中国侵略，长期保持同台湾的“外交关系”，阻挠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等。^②另一方面，另起炉灶的中国外交在与中东国家的交往时自我设限，不仅以党派划线的指导思想没有占据意识形态的战略制高点，抛开中东国家上层而积极支持下层群众运动的斗争实践，更将致力于友好往来的外交努力化为乌有。因此，虽然中国多次表达了发展双边关系的愿望，支持伊朗1951年的石油国有化运动，并在1956年、1957年对伊朗水灾、地震的灾民进行过赠款救济，但中伊关系却始终没有改善的迹象，整个50年代的非官方双边贸易额仅有250万美元。^③

1963~1979年之间的东西方冷战相对缓和，美苏在中东地区的争夺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中伊两国制定内外政策的出发点都开始发生变化。为了遏制苏联的进攻和维护自身安全，逐渐放弃“世界革命”及“国际义务”口号的中国开始努力寻求

① Hashim S. H. *China's Foreign Policy in the Arab World 1955-1975: Three Case Studies*, London, 1981, P. 217.

②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第147页。

③ Mohamed Bin *China's Relations with Arabia and the Gulf, 1949-1999*, London, 2002, P. 276.

与美欧等西方大国缓和关系，寻求包括伊朗在内的众多发展中国家的支持。而同期的伊朗，既欲填补英国撤离海湾地区后所形成的权力真空，又对具有浓厚军事同盟色彩的苏印接近深感不安，担心苏印对伊朗施加“钳形运动”。^①对苏联扩张战略的共同担忧和拓展各自国际空间的相似愿望，促使中伊双方在中美关系渐趋正常化的背景下迅速走近：1965年伊朗不再反对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67年首次承认中国是一个拥有7亿人口与核力量的伟大国家，1969年则宣布支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席位。^②1971年8月16日，中伊两国在伊斯兰堡签署了建交联合公报。可见，只要始终坚持合理的利益诉求，不走极端和政治挂帅，中国在任何的相关地区都会找到适当的合作伙伴。事实上，伊朗之所以从1964年开始以积极的眼光看待中国，主要还是因为中国原子弹成功试爆的强大冲击以及停止支持伊朗亲苏政党“民族解放运动”的外交和解姿态。

六七十年代的中伊经贸关系发展迅速，即使在巴列维王朝垮台前夕的1978年也得到加强。60年代中伊非官方的双边贸易额达到了5288万美元，比50年代增长了20倍。^③以1971年双方的经贸额为基准（598万美元），1972、1973、1975、1978年分别增长了6、10、14、20倍。1973年以前的贸易主要由两国政府出面签订，而且以伊朗货币里亚尔结算。从1974年起中国开始以欧佩克的价格用硬通货购买伊朗石油，1976、

① 余建华《当代中伊关系与伊朗对华政策动因》，载《西亚非洲》1998年第4期，第44页。

② Mohamed Bin H. *China's Relations with Arabia and the Gulf, 1949-1999*, pp. 154~155.

③ Mohamed Bin H. *China's Relations with Arabia and the Gulf, 1949-1999*, p. 276.

中国伊朗学论集

1977 年的购买量分别达到 20 和 30 万桶。^①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中伊经贸关系乃至中国与整个中东地区的经贸关系,受到了国内外政治斗争的严重影响,经贸往来服务于外交需要,双边关系好时立即增加贸易量,关系恶化时就迅速地减少贸易量。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伊经贸关系为什么长期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

二、1979：从棋子到棋手的转折

1979 年以前的中国和伊朗,都只是东西方冷战棋盘上有分量的战略棋子角色,而凭借发轫于 1978 年的改革开放运动和伊斯兰革命,两国都实现了从棋子到棋手的角色转换。

在共和国前 30 年的实践和探索中,中国外交格局先后经历了“一边倒”、“反两霸”和“一条线”三个阶段,甚至与美国曾一度有过事实上的同盟关系。这种渐趋务实的自主外交政策,开创了一个堪与二战结束初期相媲美的国际战略地位:中国不仅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地位,提升了自己的国际影响力,而且为国内的改革开放赢得了必要而良好的外部环境。虽然在当时的美中苏大三角关系中,中国因力量弱小而处于明显弱势,并不能对美国和苏联的外交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但“中国正是以这样的方式在美苏对立的两极世界中逐渐成为国际舞台上一支公认的独立力量,最终取得了相对主动的战略地位,并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冷战的束缚。”^②近代中国第一次成了新欧亚大陆政治舞台上公认的“地

① Mohamed Bin Huwaidin, *China's Relations with 1949~1999*, P.158.

② 章百家《改变自己,影响世界——20 世纪中国外交基本线索刍议》刊《中国社会科学》2002 年第 1 期。

缘战略棋手”。瑞士学者卡普尔曾由衷感叹中国在世界政治中崛起的“迅速”和“史无前例”，他解释说，“所谓‘迅速’，意指中国在短短的30年内已在国际体系中心战略平衡中成为一个重要角色，且为世界所公认。所谓‘史无前例’，意指中国是唯一获得这种地位的发展中国家”。^①

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对现代伊朗的发展具有极为明显的转折意义。巴列维伊朗虽然经常充当外国势力在海湾的替代品，但仍在70年代奇迹般地发展为地区性军事和经济大国，民族信心和国际境遇达到了近代以来的新高度。而带有浓厚理想主义色彩的霍梅尼政权，对内谋求建立政教合一的新型神权体制，对外积极输出伊斯兰革命，试图在更广的范围内建立伊斯兰秩序。^②“这些思想主张一旦落实到国家政策上，必然会四面树敌。深受伊斯兰革命挑战的阿拉伯君主国和其他穆斯林国家、被霍梅尼视为非法存在的以色列、受到革命政权强烈谴责的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都对霍梅尼政权充满敌意。”^③因此，虽然伊朗在两伊战争期间基本完成了国家的制度化建设，但革命的狂热和战争的紧迫感掩盖了日趋严重的社会和经济危机，矫枉过正的国家宗教特性、偏激的经济和社会政策、高度垄断的政治权力和8年战争所形成的压力，使得伊朗的内外政策变得不可预料和非理性化，革命和政策的失误因之延迟至80年代末期才开始得到纠正。伊朗在伊斯兰的旗帜下经历了一个光荣孤立的10年，伊朗只属于自己的伊斯兰世界。

① 哈里什·卡普尔著、彭致斌译《觉醒中的巨人：一个外国人看中国前30年的外交政策》，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1页。

② 安维华、刘竞著《现代海湾国家政治体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70~274页。

③ 范鸿达《伊朗外交：宗教领袖与总统的作用》，刊《西亚非洲》2002年第5期，第30页。

中国伊朗学 论集

1979年前后中国外交的重点在于加强与西方国家的联系以推进现代化和抵御苏联扩张,不仅未能及时对非核心利益的伊朗政局变动做出回应,而且事实上以一种不太恰当的方式介入了敏感时期的伊朗内政,黎巴嫩的一份周报曾宣称中国与以色列、伊朗特工就伊斯兰革命在情报交换方面进行过长期合作。^①因此,虽然中国政府赞扬伊斯兰革命是一次符合伊朗人民意愿的反帝运动,并迅速承认了新生的伊斯兰政权,也在事后为1978年8月华国锋总理的德黑兰之行通过巴基斯坦中间人向伊朗表达了歉意,^②但作为访问巴列维伊朗的最后一位国家领导人,那次不适当地访问被伊朗新政府视为对巴列维国王的某种支持,加之新生的伊朗共和国对一切曾与巴列维政权关系密切的国家都心存疑虑,中伊两国在客观上处于相对冷淡状态。直到两伊战争后期的1985年,因为中国的严守中立、积极劝和立场以及伊朗在战争时期的艰难处境,中伊关系才得以逐步恢复和发展。但这显然是一种临时性、过渡性的外交安排和机遇。

总体上看,虽然中伊两国都从1979年开始逐步实现了从棋子到棋手的战略转变,但却明显使用(选择)了不同的实现手段。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第二代领导集体重新评估国际形势,对时代主题的认知也发生了从“革命与战争”到“和平与发展”的重大变化,将中国定位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与现代化的目标下,大幅度调整了外交政策,对外交往不再主张战略联合,逐步确立以“三不”——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

① Mohamed Bin HChim's *Relations with Arabia and the Gulf, 1949-1999*, P.160.

② *Peking Leader Apologizes for Official Visit to Shah*, Arab News (Jeddah), 30 July 1979. in P. RChim and the Middle East: the Quest for Influence, London, 1999, P.119.

第三国为原则的独立自主外交战略。^①这种注重实在利益和进步的做法使中国逐渐融入了国际社会的主流发展趋势，也为国际影响力的扩大争取到了坚实的基础。国民生产总值和外贸总额占世界总量比重分别已经由 1978 年的 1% 和 3.6% 提高到了 2004 年的 4% 和 8%，相应的世界排序也分别从第 10 位和 32 位上升到 2004 年的第 6 位和第 3 位。^②而在同期，虽然霍梅尼抱有改造伊朗甚至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崇高理想，但因为实现手段有限，伊朗因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被排除在所有重大的地区和国际事务之外，被看做是国际社会“体制外”的不合作者、破坏者，遭受了人力财力和脱离世界主流发展之外的双重巨大损失，其间产生的一些负面影响甚至成为伊朗正常发展的重大障碍。许多年以来，“面对外来影响时的无能为力在伊朗人的灵魂深处留下了深刻而持久的伤疤，它一直影响着伊朗精英们的思维……大部分人认为只要保持一种‘绝不屈服的傲气’（the arrogance of nonsubmission），伊朗就可以应付任何的外来压力……这夸大了伊朗的重要性，导致了对国家绝对正确的错位信仰，使得伊朗的决策者们不止一次地高估了伊朗的能力和潜力，也错估了对手的实力和动机。”在一些西方观察家的眼里，伊朗是一个古典现实主义的“理智行事者”，它的一些极端举动本质上是一种“故意冒险或对困难处境的机会主义反应”。^③

① 叶自成《中国实行大国外交战略势在必行》，刊《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 年第 1 期。

② 李峰主编《当代中国对外关系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93 页。

③ Anoushiravan Ehteshami, *The Foreign Policy of Iran*, in Raymond Hinnebusch and Anoushiravan Ehteshami, eds, *The Foreign Policy of Middle East States*, London, 2002, PP.284-285.

三、现代化模式：世界工厂与家庭手工作坊

现代化理论把近代社会的演进分为“早发内生型”与“后发外生型”两种。在“早发内生型”的社会里，国家的主要功能只是对社会结构变迁的过程予以保护，对结构变迁的结果予以确认。但作为“后发外生型”的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推进则必须依赖强大而有效的国家政权，有时甚至是一场革命来改变传统的社会结构。“国家的性质与作用因此成为现代化不同道路选择的决定性因素以及现代化能否成功的关键。”^①

南京国民政府不仅在政权基础方面存在着城市与乡村的严重疏离，并且一直面临着共产党、国民党地方军事实力派和日本三个方面的挑战，其行政权威实际上只限于沿海沿江等省和主要城市。而巴列维王朝的政权基础则面临着传统与现代的割裂，面临着世俗与宗教的对立甚至对抗。在不太严格的意义上，二者政权都属于一种粗陋的官僚——权威主义推动模式：官僚机器都拥有维持经济权力和提高经济增长的行政框架，都实行独裁统治的政治高压，都维护寡头垄断集团（四大家族和两千豪门）的官僚资本积累，都奉行军事官僚与技术官僚相结合的专家治国论等。当然，二者也因之具有基本相似的致命缺陷。南京国民政府的土地改革计划没有取得乡村权势集团的理解，也没有在遇到阻力时寻求下层贫苦农民的支持，在乡村传统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转型上的失败，不仅导致了它推动城市现代经济发展功能的丧失，而且实际上把乡村留给了自己的政治敌手，从而为政权覆灭埋下祸根。在伊朗方面，虽然凭借石油美元的推动而快速地实现着国家经济的现代化，但巴列维王

^① 陈明明《变革社会中的政治权威：1920-1979》，刊《理论学习月刊》1997年第2期。

朝在丧失传统社会基础的同时并未获得新的社会基础，不仅遭受打击的城市中产阶级、地主阶级开始从宗教传统中寻找精神力量，即便是受益于土地改革和经济繁荣的农民也没有成为王权的坚定支柱，白色革命“虽然拔掉了农民革命的引信，却捅了传统势力的马蜂窝。”^①因此，“巴列维王朝政治上的专制和腐败、白色革命及其后果、对西方国家的依赖等因素使群众性的革命获得了某种天然的合理性。革命后的政权即使比巴列维王朝还要糟糕，它也会比旧政权更易获得民众的支持，更不用说伊朗革命的领袖任务远不是旧制度的造反者，他们中的大多数道德高尚，有着崇高的政治和宗教理想，在普通民众中得到广泛的支持。”^②因此，伊朗 1979 年的革命基本类似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二者都在寻求、实际上也都自觉不自觉地走向了后现代化的另一种国家推动模式——精英政治动员主义。事实上，毛泽东和霍梅尼所具有的个人魅力、领导才能、浓厚的传统主义理想情结，都使他们本人及其周围的职业政治家精英集团成为各自国家社会变革的发动机、革命的灵魂和国家团结的象征。

因为在革命中与最广泛的无权阶层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新生政权必须满足无权阶层对社会平等和宗教信仰的要求，必须对已有的社会和经济体制进行变革，必须首先通过对社会财富的平等分配而非经济增长来确立政府权威。霍梅尼在 1979 年时这样说：“社会问题的解决和人们不幸的解除要求以信仰与道德为基础；仅仅得到物质力量和财富，征服自然和空间，在这个问题上不起作用……人在世上可以享受的幸福并不限于

① 李春放《论伊朗巴列维王朝的覆灭》，刊《世界历史》2002 年第 1 期。

② 东方晓主编《伊斯兰与冷战后的世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81 页。

中国伊朗学论集

这些，因为他的最终目标在于现世之外的另一个世界。”^①因此，伊朗领导人实际上坚持了一种信仰主义取向的发展观，他们首先关心社会正义而不是物质进步，遵循“社会正义第一，繁荣次之”的原则，强调伊斯兰精神价值的传播而非物质生活水准的提高。1984年的《伊斯兰消费法案》就试图建立一种“脱离浪费与自我满足的伊斯兰消费文化”；在对外政策方面，主张全世界被压迫者摆脱帝国主义和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束缚，革命初期处理国际关系问题时的政治意图明显优于经济考虑。虽然石油收入是伊朗最主要的外汇来源，但霍梅尼政权考虑石油出口问题的出发点仍主要是资源保护、经济独立及打击帝国主义能源供应等因素，而不是如何通过石油输出获取更多利益的经济因素，甚至曾一度根据国内的需求确定石油产量。^②由于两伊战争对经济的破坏、当政者的管理不善、石油价格下跌和美国遏制等因素，90年代的伊朗经济依然困难重重，人均收入仅为巴列维时期的1/3。^③

虽然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也都在20世纪的现代化浪潮中经历了基本相似的进程，但因为精英阶层对现代化推动模式在认识上的不同，更因为现实国情、地缘政治环境等方面的差异，中伊双方在全球化时代的发展呈现出较大的差距。始自1977年的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运动引发了中国社会类似于西方宗教改革和思想启蒙后的蓬勃活力，几乎没有意识形态束缚的当代中国正日益成为新的世界工厂，也正以坚定的和平发展步

① 〔德〕海因茨·沃尔夫冈·阿恩特著，唐宇华等译《经济发展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84页。

② 安维华《伊朗伊斯兰革命后的经济政策》，刊《世界经济》1995年第12期。

③ 金宜久、吴云贵《伊斯兰与国际热点》，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年版，第209页。

伐向世界大国的目标迈进。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却在纠正巴列维王朝的弊端时矫枉过正：调整革命后的社会进程时步履蹒跚，在公正与发展的平衡上摇摆不定，而且从根本上看，它似乎难以超脱的看待宗教对伊朗的影响，也因之难以真正客观的对西方式文明成果进行取舍。伊朗“从来没有使自己远离资本主义的世界秩序，甚至没有建立起一个真正独立的经济基础。”作为活跃而关键的地区和国际角色，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现在只是一个“有利可图的家庭手工作坊”。^①

对于中伊两国的革命及早期现代化实践，尽管可以提出许多假言判断以批评其弊端，但二者的历史合理性是不容忽视的。如果没有原来计划经济时代在软硬件方面的一批基础设施成果，如结束军阀混战和地方割据，确立中央政府至高无上的行政权威等，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的经济和社会成就。在这方面印度是一个具有可比性的反例。同样，针对巴列维王朝政治发展和经济发展之间的不平衡或严重脱节，霍梅尼政权采取了一系列的纠偏措施，严格遵循伊斯兰教义，明确宣布伊斯兰国家“站在弱者、农民和工人一边”，奉行抑富济贫的经济政策以谋求社会公正。从一种普世主义的观点看，伊朗共和国的建立表达了人类对西方式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反思，更代表了对未来发展道路的一种探索。“伊朗的 1979 年宪法和由此而建立起来的政治体制在很大程度上是伊朗大多数人的选择……客观上，伊朗的新政府比巴列维王朝拥有更广泛的政治合法性基础。几乎所有研究伊斯兰革命的文献都承认革命的发生有着不可避免的特性”。^②美国学者周锡瑞 (Joseph W. Esherick) 教授的一段话可以看做是对中伊两国革命的共同注解：“革命爆发

① Anoushiravan *The Foreign Policy of Iran*, pp 283, 284.

② 前引东方晓主编《伊斯兰与冷战后的世界》，第 281 页。

中国伊朗学 论 集

的直接原因并不在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而在于国家政权的脆弱。在这个意义上革命的成果的确是造成一个无比强大的国家政权，这个政权虽然也做了许多阻碍经济发展、破坏社会秩序稳定的错事，但它确实为后来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基础，甚至‘大跃进’这样的灾难中也有正确的东西。”^①

四、1979 ~ 2004：常态交往的跨越式发展

自建交以来，中伊双方借助军事、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紧密联系，使得超越意识形态界限的双边关系成为了一种可贵的传统。它是“实用主义超越意识形态的典型例证，无论是宗教方面还是世俗方面。商业利益，尤其是石油出口和武器交易决定着这两个国家的关系，从巴列维伊朗到霍梅尼激进的伊斯兰政权均是如此”^②。

中国对中东地区的武器销售在1979年后即由政治性质的礼物赠送变成了国家间正常的商品贸易，销售收入在80年代成为国家外汇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在高峰期的1984~1987年间，82亿美元的军火销售额占了同期中国出口总额的7%，虽然这一比例到1996年已经低于1%，^③但早期的军火销售却为中国外贸从90年代后期开始的爆炸性增长提供了初始动力。伊朗在1982~1991年间共购买了中国38亿美元的军火，是中

① 韩毓海、董正华《晚清以来的中国历史和现代化进程》，刊《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2期。

② Michael D. The Middle East and China, in Hannah Carter and Anoushiravan Ehteshami, eds, *The Middle East's Relations with Asia and Russia*, London, 2004, P. 50.

③ Daniel Byman, *China's Arms Sales: Motivations and Implications*, Rand, 1999, P. 29.

国在 80 年代的第二大武器买主。^①如果考虑到这一数字背后特殊的时代背景，我们就会更深刻的认识到，80 年代的中伊军火贸易，是一种必须，更是一种必然；它符合当时的地区形势和相关当事国的利益，既是中国在对外开放中获取较大经济利益的一个机遇，也是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与地区事务、维护自身利益的一个机遇。从中国方面看，以军火援助有着共同反霸立场的伊朗，这一行动本身就是在维护中国自身的战略利益，而坐视不救则有损自身的利益和形象；从伊朗方面来看，维护主权、政权的需要迫使它必须尽一切可能不计代价地寻求军火供应，“伊朗门事件”就是一个明证。所以，即使中国不作为，伊朗也一定会从其他途径寻找替代供给，区别也许只是代价的不同而已，在某种程度上，当时的情形类似于今天欧盟的对华军售禁令，作为与不作为已经没有本质上的意义差别，不作为的最大结果只是在不利己的情况下给潜在盟友增加了难度而已。事实上，中伊之间的军事联系因为互补性不强而缺少长期合作的坚实基础：当伊朗因为美国的制裁和苏联的拒绝供应而处境孤立时，中伊之间的军事联系就比较紧密，而一旦伊朗的军火供应渠道增多，例如可以方便地从欧洲和俄罗斯获取性能更佳的武器，中伊两国的军火贸易就急剧萎缩。在伊朗 1991~1997 年 58 亿美元的对外采购中，俄罗斯以 31 亿美元独占鳌头，而来自中国的数额只有 19 个亿。^②实际上，中伊 90 年代的军事合作政治动机明显多于经济考虑，合作过程一波三折坎坷多多，1995 年中国推迟向伊朗出售核反应堆时就明确要求美

① Mohamed Bin HChina's Relations with Arabia and the Gulf, 1949-1999, P.165.

② Mohamed Bin HChina's Relations with Arabia and the Gulf, 1949-1999, P.169.

中国伊朗学论集

国更慎重地处理台湾问题，而 1996 年达成的 45 亿美元武器供应协议也显然没有得到执行。^① 对于中国终止与伊朗在建造核电站工程中的合作，伊朗华语台评论说：“时至今日，伊朗根本不接受这是由于技术原因所致的辩解，而是认为，是美国和犹太复国主义政权所施加的压力，使得中国取消了伊朗从中国购买价值 17 亿美元的核反应堆的合同。”^②

中伊石油贸易最初基本上是双边关系的副产品，属于平衡国家间贸易逆差的弥补性行为。但从长远看，石油贸易正从双边关系中的副产品变成主打产品，而且有望成为中伊进一步深化合作的强大动力。从 1998 年到 2003 年中国从中东地区进口原油占总进口量的 50.9%，其中从伊朗进口的原油占 13.6%，年进口增长率为 16.5%，均排在第二位。2002~2004 年的双边贸易额分别是 37、50、70 亿美元，预计 2005 年将达到 100 亿美元。在 2004 年，中国与盛产石油的伊朗悄悄达成了多项能源合作协议：3 月份，珠海振戎公司与伊朗国家天然气出口公司签署为期 25 年的框架协议，计划从 2008 年起每年从伊朗进口 250 万吨液化天然气，2013 年以后的进口量将增加至每年 500 万吨；5 月份，中石油与伊朗石油天然气公司签约，从伊朗进口总值达数十亿美元的液化天然气，并同时获得伊朗相关石油区块的开发权；10 月份，根据两国政府签署的石油合作谅解备忘录，伊朗同意中石化集团作为主要开发商开发伊朗亚达瓦兰油田，而中石化将在今后 25 年内每年购买 1000 万吨伊朗液化天然气，合同总价值近千亿美元，几乎是中伊两国 2003

① Bate Gilchinese Arms Exports to Iran *China Daily* and the Middle East: the Quest for Influence, pp113, 119.

② 伊朗华语台：《发展伊中关系的潜力与障碍》，www.irib.ir/worldservice/wenhua/cnir.htm 32K 1998-1-2

年贸易额的 20 倍。因为中国已经和伊朗在石油和天然气领域签订了 100 多个长期的大型合作项目，有分析人士指出：一旦中伊签署的亚达瓦兰油田开发项目备忘录付诸实施，中国有可能在伊朗对外油气领域开发中赶上日本和欧洲等石油公司，成为伊朗油气领域最大的投资者之一。^①

虽然自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就一直是伊朗在寻找新经济和政治伙伴时锁定的目标之一，但因为顾虑与美国的关系，中国的态度总是摇摆不定，甚至还取消了已经签署的某些协议。1999 年“炸馆”事件的强烈刺激和中国经济入世后对石油进口的渴求，迫使中国在与伊朗合作时减少了对美国的顾虑。而另一方面，通过积极的多边石油外交，伊朗已经成功地把自已的利益和欧盟、日本、印度的能源需求捆绑在一起，中国再不加入将会面临在伊朗石油市场被边缘化的危险。因此，2004 年的中伊双方都很主动：2 月，两国的混合委员会在北京召开；4 月，伊朗举办了一个中国产品博览会，向伊朗及周边国家介绍中国产品；7 月，作为博鳌论坛在中东的唯一成员国，伊朗把论坛的能源分会开到了德黑兰；10 月，伊朗石油部长赞甘内公开表示给予中国最大的优先权，希望中国成为伊朗最大的石油出口地；11 月，中国外长李肇星访问伊朗，宣布中国政府反对将伊朗核问题提交安理会讨论。值得注意的是，中伊双方都同时走多元化路线以分散风险：中国与澳大利亚签署了长达 25 年的天然气巨额协议，而伊朗寻求的石油战略联盟目标也把美国副总统切尼的公司囊括在内，甚至提出美国可以占其核事业一半的股份。^② 所以，中伊之间的能源合作是双方在利益综合

① 吴海菱《与风险共舞》，刊《经济观察报》2004 年 11 月 13 日。

② 中新网 2005 年 3 月 16 日电：美国可占核份额一半以证伊朗无核武”，<http://www.phoenixtv.com/phoenixtv/7262274320050316/520277.shtml>。

中国伊朗学论集

权衡后的一次正常合作，彼此都是对方可靠但并非唯一的合作伙伴。就中伊关系的发展前景而言，未来的中伊合作应该还将局限于经济领域。因为大致从 1999 年下半年开始，中国就已明显确立了一项很正确的基本国策：中国在美国的巨大优势面前决不冒失；除非不可避免，决不投入与美对抗，也不将对外政策的根本建立在中短期内构建对美总体制衡的企图之上。^①而且，由于美国的势力范围具有“准入”的特点，中国在客观上已经和有可能继续从冷战后亚太地区安全安排的“现状”中受益。^②因此，中国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不可能将追求境外权势作为国家的战略目标，而是在经济外交和多边主义旗帜下坚定地实现着自己的利益诉求，只要美国政府方面不出现太严重的对华政策恶性变动，中伊关系肯定会在既有的框架内发展，彼此会成为联系更加密切的战略相关国家而不是政治同盟。

五、2005：中国之路的伊朗含义

自 1979 年以来，中国的革命后社会进程逐步常态化和现代化：国家身份认同从革命性向现状性转换、战略文化结构从冲突型向合作型过渡、安全利益重心从传统向非传统移位，总体上“表现出负责任的体系内大国、合作型战略文化和重视相互安全等重要特征。”^③作为一种相对成功的社会转型和发展模式，中国经验为伊朗自 1979 年以来的革命后社会发展进程提供了直接的借鉴范式，而伊朗在 2005 年“向东看”的战略势



① 时殷弘《中国的外部困难和新领导集体面临的挑战》，刊《战略与管理》2003 年第 3 期。

② 张蕴岭主编《未来 10～15 年中国在亚太地区面临的安全环境》，105～106 页。

③ 秦亚青《国家身份、战略文化和安全利益》，刊《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 年第 1 期。

头日渐明显，政治上也向中国走近。从必然的角度看，这是伊朗政府在革命后纠偏与改革的表现之一；从或然的角度看，它说明了中国经验在东方国家应对内外危机时的普世意义。

2005年的伊朗政治发展处于敏感而关键的转折关头：保守派相继控制了议会、地方和中央行政权力；宗教领袖哈梅内伊则有限扶持处于颓势的改革派，希望引导两派势力形成某种平衡以保持政局稳定；哈塔米总统选择以退却来保持现政权的伊斯兰特性，他在公开承认民主改革计划失败时解释说：“爆发动乱不符合我们国家的利益……向民主进军必须行进在伊斯兰共和国的道路上。”^①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伊朗要纠偏延续了1/4世纪的航向而不至于引起动乱，就必须进行一次具有革命意义的社会变革。内贾德的军方背景及其与宗教领袖的融洽关系，不仅意味着伊斯兰共和国的第二代政治精英开始主导国家政局，而且结束了哈塔米时期国家机构间冲突频仍的内耗局面，保守派议长阿德尔在大选后已经公开表示要与政府“在每一件事情上进行合作”^②。从宏观面看，伊朗地缘战略位置比较适中，既没小到被忽略也没有大到让别国担忧以至于恶意对立，只要保持合适的国家发展战略，伊朗应该有一条相对宽松的发展之路。但事实上，革命激情下的伊朗因处置不当的人质问题而自陷不义之地，更因与美国的全面对峙而遭受了数十年的孤立与遏制，所丧失的不仅是可能从美国获得的各种援助，而且包含正常的发展空间。因此，伊美关系的好坏是伊朗能否融入国际社会的关键，实现与美国关系的正常化应该是伊朗国

① 陈凡《迫于保守派压力，哈塔米承认伊朗民主改革失败》，刊《中国日报》2004年12月8日。

② 唐志超《内贾德时代的伊朗走向》，<http://www.china.org.cn/2005/Jun/899473.htm>。

中国伊朗学论丛

家战略的重点目标之一。和力促中日、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邓小平相比，伊朗国家领导人的主要困难在于如何引导精英阶层对伊朗国家利益的认识，更在于他是否愿意承受与美国实行和解的政治代价。1977年的邓小平曾经这样讲，只要下定决心，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一秒钟就可以签订。^①那么，实现与美国关系的正常化，哈梅内伊、拉夫桑贾尼、哈塔米和内贾德，谁有一秒钟签约的政治勇气和甘冒政治风险的心理准备？在伊朗国家处于十字路口的关头，如果说选举总统本质上是选择伊朗未来发展道路的话，那么拉氏就代表了一种正向的生产活动，而内贾德则意味着草根阶层渴望公平的一种寻租活动。

伊朗模仿了中国以点带面、借助外力的渐进式经济改革。从1993年的基什岛自由经济实验区开始，伊朗先后开辟了格士姆、恰卜哈尔、恩泽利港、克尔曼和萨尔赫斯等6个工商业自由贸易特区和23个经济特区，仅西阿塞拜疆省就有7个边境市场。对进入贸易和经济特区的投资人，伊朗不但免征15年的所得税和进出口关税，而且制定专门的保护外商投资法来降低投资风险。另一方面，伊朗期望借助外来的制度性动力来推动既有框架内的经济变革和发展，提高伊朗在国际领域的经济实力并促进经济繁荣，加之中国入世后对外贸易爆炸式增长的示范效应，伊朗从1996年至今共向世贸组织递交了22次入世申请。虽然世贸组织的接受申请仅仅意味着入世谈判的开始，但伊朗政府反应积极，不仅表示要向国际社会展示其健全的商业制度，而且还准备取缔一些弱小和不具备竞争力的公司以达到世贸组织要求。^②

① 李峰主编《当代中国对外关系概论》，第192页。

② 伊朗华语台：《不具备竞争力的公司将被取缔》<http://www.irib.ir/worldvice/chinese/news/05-05-30/05053024.htm>。

2005 年的伊朗，面临着美国软硬势力的围追堵截：军事压力因伊拉克局势的渐趋平稳而日益加大，周边国家“色彩革命”的民主化寒流更是冲击着神权体制的根本。因此，在安全形势严峻背景下的伊核问题就成了一个假问题，它的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是一项民心工程而非能源或安全工程。从理论上讲，拥有核武器虽然会增加某种程度的安全自信，但研发过程必然使伊朗陷入两难：为了安全它需要发展核武器，而发展核武器则必然面临着有核国家先发制人打击的更大安全风险。从过去数年的实际情况看，伊核危机的最大意义就是为伊朗参与国际社会提供了一个对话平台。伊朗政府凭借丰富的油气资源、扼控海湾的枢纽地位以及纵横捭阖的外交艺术，从一开始就将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虽然最终可能会失去一些并无实质意义的所谓权利，但却达到了追求计划中的非军事目标，而且因为掌握铀浓缩等先进技术已经内化为伊朗的国家共识，伊朗在反击美欧国家施压时拥有了更大的民意基础。外交方面，因为中国将“开放的地区主义”概念引入了上海合作组织，伊朗得以在 2005 年 7 月 5 日成为该组织的准成员国。作为欧亚大陆地理空间最大的国际组织，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在现阶段的稳定共识显然是吸引伊朗积极申请加入的一个重要原因。

六、余论

中伊两国的外交往来始于公元前 119 年，再次出使西域的张骞派副使访问伊朗（时称安息），《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初，汉使安息，安息王令将二万骑迎于东界。”从此，一条“丝绸之路”把两个国家联系在一起，并在唐、元、明时期达到高潮，这种密切联系不仅使彼此的经济文化交流得到保障，而且使欧洲和远东的易货贸易不致中断。近代以来的中伊两国



中国伊朗学论集

因同时遭受殖民主义的侵略而彼此疏远，真正独立自主的交往始于 20 世纪后半期。有赖于适当的空间距离和适中的建交时间，中伊双方都能较为客观地看待对方，而且从 60 年代中期开始，始终至少有一方坚持利益至上原则，双边交往也因之在很多情况下避免了意识形态化，在交往中双方都把对方当作寻求利益最大化时的一种选择，都把国家利益当作合作的出发点，也都在合作中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所以取得了从内容到形式两方面的收获。显然，这是一种相对成熟的双边往来：双方不仅都对合作时的收获感到满意，而且没有、也不会因为合作关系的中止或其他方面的因素影响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它反映了中伊两国革命后社会进程的逐步成熟。从这个意义上说，中伊两国应该能够将彼此的合作发展为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又一平台，也应该能够谱写出更加辉煌的新丝绸之路篇章。

1989 年以来中伊关系转变发展的动因分析

王恩学 刘清华^①

中国与伊朗关系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便是中伊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新中国成立后，中伊关系先后经历了巴列维王朝和伊斯兰共和国两个时期。中伊关系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1971 年中伊建交是两国关系发展的历史里程碑。在伊斯兰共和国时期，中伊关系又以 1989 年为界分为两个阶段。本文主要论述中伊关系在 1989 年转折并持续发展的历史与动因。

一、中伊关系的历史回顾（1949 ~ 1989）

从 1949 年到 1989 年，中伊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重要历史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到 60 年代初期。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社会制度不同，加上当时营垒分明的国际大环境，中伊关系长期处于对立状态。这个时期，伊朗的礼萨·巴列维国王奉行亲西方的反共政策，对新中国持不承认态度。在朝鲜战争期间，伊朗追随美国，诬蔑中国为“侵略者”。对于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问题，伊朗也持否定态度。不

^① 王恩学系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史专业博士研究生；刘清华系云南省冶金高等专科学校讲师。

中国伊朗学论集

仅如此，伊朗还于 1957 年同台湾建立了“外交关系”。1962 年中印边界战争爆发，伊朗政府发表声明称“在印度成为侵略的牺牲品时支持印度”。与之相对，新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实行“一边倒”的对外政策。中国在批评巴列维国王奉行亲美反华政策的同时，支持 1951 年伊朗“民族阵线”领袖、首相摩萨台领导的石油国有化运动。此后，中国曾多次表示与伊朗建立友好关系的愿望，但因巴列维国王重新控制政权后伊朗加入巴格达条约组织、与美国签订军事防务协定、同台湾保持“外交关系”、阻挠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等一系列行动，中国对伊朗主要持批评态度。在此期间，受双方政治关系的影响，中伊两国间的经贸和文化交往甚微。

第二个时期是从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到 70 年代末期。这是中伊关系由对立走向缓和与正常发展的时期。20 世纪 60 年代是世界格局大动荡、大分化、大组合的时期，社会主义阵营逐步解体，资本主义阵营开始分化，第三世界迅速崛起，这些变化客观上要求中伊两国适时调整对外关系。在伊朗方面，经过“白色革命”，伊朗的经济和军事实力都有所增强。同时，美苏关系开始缓和，伊朗外交的回旋余地缩小。伊朗逐渐改变其主要亲西方的外交政策，开始实行“独立民族政策”，重视全球外交，中国对伊朗的重要性开始为伊朗所认识。这一时期，伊朗虽然继续支持台湾当局，却同时表现出与中国改善关系的愿望。在中国方面，“两个拳头打人”的对外政策使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更加险恶。中苏间严重的军事对抗使中国不得不缓和与美国的的关系，同时更多地联合第二、第三世界国家，以抵抗当时最主要的敌人苏联。伊朗的中东大国地位和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为中国所看重。伊朗学者认为，“在中国看来，伊朗是美国的一个盟国，对苏联总是持以警惕和疑虑的态度，

可以视为中苏对抗中比较合适的一个朋友，以限制苏联在该地区的影响。”^①中国在继续对伊朗政府持批评态度的同时，停止了对伊朗亲苏政党“民族阵线”的支持。至 70 年代初，世界格局呈现出苏攻美守的战略态势。同为苏联邻国的中国和伊朗都感受到苏联越来越大的威胁。为了抗衡美苏尤其是后者在海湾和中东的影响，中国决定与中东各国建立友好关系。中国认为伊朗的政治、军事力量是该地区抵御超级大国支配，特别是制约苏联向海湾和南亚扩张的一个举足轻重的因素。而伊朗也正为伊拉克、印度与苏联的接近感到不安，认为这既是苏联向海湾扩张战略的一大步骤，也是向伊朗施压的一种“钳形运动”。这些对苏联的共同担忧促使中伊两国加速实现关系正常化。而此时，业已启动的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成为促使中伊建交的重要外部条件。在中美双方发表尼克松即将访华的公告一个月后，1971 年 8 月 16 日，中伊两国正式建交。中伊关系进入了一个友好稳定的发展时期，双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都有了较大的发展。政治外交方面，双边高层领导人进行了多次互访。伊朗在建立印度洋和平区、海湾政策以及超级大国在印度洋地位等问题上都得到了中国的支持。伊朗则给予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的行动以可贵的支持。经贸方面，中伊之间的贸易往来迅速增加。1972 年中伊贸易额达到 7040 万美元，是 1970 年的 7 倍。^②文化方面，中伊之间的体育、科技、卫生等代表团也多次互访。总之，这一时期是“中伊关系史上晴空万里、艳阳高照的时代”^③。

① Maryam Dastard: Iranian Relations and 'Encount
sent The Iran Journal International Affairs, Winter 1996.

② 参见《中东经济文摘》，1972 年 7 月 28 日，第 849 页。

③ 冀开运、黄焕萍著《二十世纪伊朗史》，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88 页。



中国伊朗学论集

第三个时期是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末。这是中伊关系一度冷淡，后转入继续发展的时期。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中伊国内形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1979 年 1 月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建立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实行政教合一的制度。在中国，随着 1978 年 12 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1979 年开始了内政外交的重大调整。从国内经济建设这一中心任务出发，中国奉行以反霸、维护世界和平为主要目标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1979 年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后，中国对伊朗新政权立即予以承认。但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霍梅尼新政权奉行“不要西方，不要东方，只要伊斯兰”的外交路线，加之“华国锋总理在此前六个月对伊朗的访问被霍梅尼认为是支持巴列维国王”^①，从而使中国与伊朗新政府的关系客观上受到影响，处于相对冷淡状态。直到两伊战争（1980~1988 年）后期，中伊关系才逐渐恢复和发展。1985 年 3 月，中伊两国政府代表在德黑兰签署《中国-伊朗部长级经济、贸易、科学和技术合作委员会议定书》，同年 6 月伊朗议长拉夫桑贾尼访华。不过，纵观这一时期，尽管中伊都做了很大努力，但双方交往的层次不高；双方经贸关系发展缓慢，且有反复波动。

二、中伊关系的全面发展（1989~2006）

1989 年是中伊关系史上的转折年。鉴于国内外形势的客观要求，在双方领导人的积极推动下，中伊关系自 1989 年以来迅速而健康地向前发展。

^① 彭树智主编，王新中、冀开运著《中东国家通史·伊朗卷》，商务印书馆 2002 年版，第 423 页。

（一）政治外交：高层互访频繁，政府全面合作

1989年5月伊朗总统哈梅内伊正式访华，拉开新时期中伊高层互访的序幕。1990年以来，伊朗总统、副总统、议长等和中国国家主席、人大委员长、国务院总理等进行了互访。双边政治外交关系在1989~1992年达到一个高潮。其间，双方领导人探讨了两国间扩大经济、科技、贸易、文化和体育等领域的友好交往与合作，并就共同关心的地区和全球问题交换了意见，从而增进了两国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使双边友好合作不断发展。2000年和2002年，哈塔米总统和江泽民主席又成功实现了互访，为新世纪中伊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特别是2002年4月江泽民主席对伊朗的访问，双方签署了《油气领域合作框架协议》、《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等系列文件，促进了两国关系的深入全面发展。近年来，中伊两国在国际问题上相互支持、配合。正如伊朗前总统拉夫桑贾尼所指出，伊中两国“在许多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一致和相似的立场是在国际舞台上加强和巩固双边合作的合适基础”^①。在阿富汗问题和伊拉克的重建问题上，中伊双方政策保持着高度一致。同时，中国支持伊朗加入上海合作组织的努力，使伊朗于2005年7月成为上海合作组织观察员，伊朗总统内贾德应邀参加了在中国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2006年峰会。

（二）经贸关系：交往领域不断扩大，合作水平日益提高

两伊战争结束后，中国就积极参与了伊朗战后经济重建，双边经贸关系持续发展。1990年两国将双边经贸支付方式改为现金支付，同年双边贸易总额达3.14亿美元。1993年，中伊贸易总额达7.127亿美元，创历史最高水平。1994年由于伊朗

^① 《人民日报》，1991年7月9日。

中国伊朗学 论 集

受经济状况恶化、外贸市场萎缩等因素的影响,双边贸易总额降至 4.473 亿美元。但随即两国有关部门积极采取措施,迅速扭转了这一不利局面。1995 年中伊贸易总额回升为 5.0446 亿美元,1996 年达 7.8074 亿美元。1999 年中伊贸易额为 13.48 亿美元,2000 年迅速攀升到 24.868 亿美元,2001 年又提高到 33.1 亿美元,^①2002 年增至 37.42 亿美元,2003 年两国贸易额超过 56 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截至 2004 年年底,两国间贸易总额超过 70 亿美元,比 2003 年增长 25%,更比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立初期两国的贸易总额增长了 35 倍。目前,伊朗已经成为中国在海湾、中东地区主要的贸易伙伴之一。

在此期间,中伊两国间的经济技术合作和劳务承包项目也稳步推进。到 1996 年 11 月,两国经合项目已达 45 个,合同总额为 26.65 亿美元,合作领域涉及电站、水利、渔业、采矿、化工、煤炭和有色金属冶炼等行业,大型合作项目包括德黑兰地铁、水泥生产线、浮法玻璃生产线和火力发电机组等,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德黑兰地铁项目,该合同总金额为 5.8 亿美元。^②2001 年,伊朗成为我国在西亚地区新签承包劳务合同最多的国家,合同金额达 3.3996 亿美元。截至 2004 年,伊朗成为中国最大的海外大型工程和劳务承包市场,正在执行的项目 120 多个,协议金额超过 60 亿美元,另有约数百个工程正在协商谈判中,涉及金额达到数百亿美元。^③此外,自 2004 年 10 月始,中国和伊朗又就伊朗亚达瓦兰油田开发和 1000 亿美元油气能

① 杨光、温伯友主编《中东非洲发展报告》(2002~2003), No. 6,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 第 269 页。

② 新华社 1996 年 11 月 10 日讯。

③ 《能源驱动中国征战伊朗大市场, 初始合作有些冷清》, <http://www.rednet.com.cn>, 2005 年 6 月 28 日。

源进口协议展开了谈判。^①目前，中国公司在伊朗承包的电站、铜厂、碱厂等项目，以及参与改建的炼油厂和通讯网络等也都已经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②特别是中方承建的德黑兰地铁项目，已成为两国经贸合作的一个典范。两国经贸合作的长足进展可以说是1989年以来中伊友好关系健康发展的最重要内容。

（三）文化交流：政府引领，官民互动

文化交流是中伊两国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伊两国都拥有博大精深的古代文明，是文化底蕴深厚的国家。当西方有学者提出“文明冲突论”观点，并把某些国际上的冲突归纳入这一冲突范畴时，哈塔米总统提出了“文明对话”的主张，中国官方和学术界对此均十分赞赏。中国认为，不同文明间应该交流、借鉴，互相促进，而不应置于“冲突”的概念中。中伊两国在这方面做出了榜样，两国建交30多年来，双方在文化、教育、卫生、体育、艺术等领域的友好交流与合作，成效显著。

1989年5月伊朗总统哈梅内伊访华期间，中伊两个古老城市——西安和伊斯法罕正式结为友好城市。1990年1月北京大学成立了伊朗文化研究所，旨在建立两国学者之间的广泛联系，促进学术交流。1991年和1993年，中伊又签订了一些文化协定。1997年，在中国举办了“伊朗文化周”。1999年，在伊朗举办了“中国文化周”。1997年，叶奕良先生翻译的《伊朗通史》（上、下册）由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中国学者张鸿年、元文琪等翻译出版了《波斯经典文库》丛书共18卷（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年6月在天津南开大学举办了伊朗文化

① 参见《中国有望从伊朗购买1000亿美元油气》载《东方早报》2005年12月17日。

② 《伊朗将进一步拓展与中国的文化合作关系》，伊通社2005年6月15日

中国伊朗学论集

与艺术展。此外，两国的文教、艺术和体育代表团经常进行友好互访，并有学者访问和留学生交换培养等项目。这种交流对促进两国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起了积极推动作用。

三、1989年以来中伊关系转变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

1989年，不论在世界范围内，还是在中国和伊朗国内，形势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东欧国家和苏联先后出现政局动荡和政权更迭，以冷战为标志的两极格局已开始崩溃，美国独霸的局面已初见端倪。中国在美国对抗苏联的全球战略中的制衡作用大为降低，美苏中大三角失去了存在的基础。由于镇压动乱，中国遭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制裁，在国际上一度陷入孤立境地。对伊朗而言，亦不能借助美苏对抗的大局“游刃有余”。是年6月，伊朗最高领袖霍梅尼去世，哈梅内伊和拉夫桑贾尼分别继任伊朗最高领袖和总统，伊朗外交战略转变为以缓和为主调，开始减少对外政策中的意识形态色彩。此时，中伊对外关系的调整出现了高度契合，促进了中伊关系于1989年实现转变并持续发展。具体看来，推动中伊关系转变发展的主要因素有美国因素、地缘因素、能源因素及伊核因素。

(一) 美国因素

美国因素是1989年中国和伊朗关系改善发展的首要因素，也是此后两国关系持续稳定发展的一个战略因素。东欧、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先后解体后，美国一家独大，原先为对抗苏联的国际“统一战线”的基础不复存在，美国为了维护世界单极格局，在压制昔日盟友的同时，开始“制造”新的敌人。

伊斯兰革命胜利后的伊朗早就是美国的死敌，长期遭受美国的外交孤立和经济制裁。冷战中，由于顾忌主要敌人苏联，美国尚不敢轻易“动”伊朗。现在，美国可以秋后算账。由于

长期囿于意识形态及“革命输出”造成的负面影响，伊朗在国际上一直比较孤立。当苏联这张“平衡”美国的牌消逝后，伊朗需要借助新的大国力量以保护自身利益。同样，由于苏联的衰落和崩溃，中美为抗衡苏联而建立的“战略联盟”瞬间坍塌，中国逐渐突出为美国“最大的敌人”。借口中国 1989 年的“六四”风波，美国带领西方国家制裁中国，重启遏制中国的长期战略。中国在政治外交上也陷入困境。同时，因国内“左”的思想开始回潮，中国的改革开放也面临“后退”的危险。为了打开政治外交局面，中国需要加强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抗衡美国的战略需要，拉近了中国和伊朗的关系。

冷战终结后不久，美国学者就抛出了“文明冲突论”，并危言耸听地提出中国与伊斯兰世界的联合。巴基斯坦、伊朗和中国的密切关系是合作的核心，90 年代初杨尚昆主席对伊朗和巴基斯坦的访问、拉夫桑贾尼对巴基斯坦和中国的访问使这一点明朗化了。^①作为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的“核心国家”，伊朗和中国首当其冲地成为美国的打压对象。处于弱势的伊朗和中国为了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反对美国的“文化霸权”，需要联合对敌。中国和伊朗都主张“文明对话”，认为不同文明间应该互相交流、借鉴、促进，而不应人为推动“自我实现的预言”的实现。

“9·11”事件后，美国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基于“反恐”的正义事业，中国和伊朗都对此给予了不同程度的支持。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的消除，客观上有利于中国和伊朗的边境安全。但是，美国借助阿富汗战争实现了在阿富汗、吉尔吉斯和乌兹别克斯坦的驻军，并将驻在这些国家的基地军事化、长期化。

① (美) 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67 页。

中国伊朗学论集

由此，美国军事力量不仅进入了俄罗斯的后院，也直逼中国西北边疆，更对伊朗构成直接威胁。2003 年伊拉克战争后，美国对中东的控制进一步加强，伊朗成为美国军事力量合围下的“孤岛”。随后，美国分别通过在中东地区推行“民主改造”，在中亚诸国促动“颜色革命”，试图将富含油气资源，地缘政治意义重大的中东和中亚打造成一个新的战略板块，对中国和伊朗的国防安全以及中国的能源安全构成了实质性威胁。此外，冷战终结后，美国的全球战略重心不断东移，亚洲的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在美国全球战略中越来越重要。美国不断加强在中国周边地区的军事力量，现在业已形成从中亚到西亚（阿富汗），到东南亚，再到东北亚的对中国的军事包围圈，战略上中国面临着美国巨大的军事压力。如此，美国现实的威胁及打压，成为中国和伊朗加强关系、共同对敌的客观基础。

需要指出的是，中伊关系发展中美国因素的动力作用主要指其在战略上对中伊关系的黏合作用。在具体的国际问题中，美国因素有时并不利于中伊关系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伊核问题上。

（二）地缘因素

中国和伊朗关系的转变和维系，地缘关系的演化是另一个重要的促进因素。中国和伊朗并不接壤，但由于两国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它们的命运通过中亚、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等地区和国家有机地连接起来，从而产生了休戚与共的关系。1989 年后，阿富汗和中亚局势的变化成为促使中伊两国加强关系的重要因素。

首先，确保阿富汗问题朝着符合中伊战略利益的方向发展成为密切中伊关系的纽带。苏军于 1989 年从阿富汗撤出后，塔利班在巴基斯坦和美国等国际力量的支持下异军突起，阿富

汗转而成宗教极端势力和国际恐怖主义势力的温床，不但直接威胁中国和伊朗的边境安全。而且通过中亚各国，汇成“三股势力”，继续“传染”到中国和伊朗的边境地区。在塔利班政权时期，伊朗担心与自己有教派和政治矛盾的塔利班在边境从事毒品贸易和对什叶派穆斯林的迫害。同时，在伊朗驻留的大量阿富汗难民，也影响到伊朗自身的安全稳定。中国则担心塔利班支持下的新疆分离主义势力从事“越境恐怖主义”活动，危及中国西北的稳定和安全。因此，联手打击极端势力、恐怖主义和边界毒品贸易，加强安全合作，促进阿富汗问题朝着有利于地区稳定的方向演变，成为中伊两国加强合作的动力。中国和伊朗都积极参加了解决阿富汗问题的历次“6+2”国际会议^①，促进了本国和地区的安全与稳定。2001年阿富汗战争后，中伊在阿富汗问题上的合作又增加了美国因素。现阶段，阿富汗毒品泛滥成灾，作为邻国的中国和伊朗深受其害。在防止阿富汗毒品入境问题上，中国和伊朗既有合作，也存在一定的利益冲突。但是根除阿富汗的毒源，符合中伊共同利益，需要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

其次，中亚成为促进中伊关系发展的另一因素。地缘战略方面：1991年苏联解体后，中亚各国因其地缘政治因素和丰富的自然资源而成为大国争夺的对象。伊朗是唯一接近阿富汗、伊拉克、海湾和中亚地区的国家，具有地缘优势。伊朗对于里海和中亚的能源开发有重大影响，在中亚有着重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但在国力上，伊朗与美欧等不可同日而语。面对美国和欧盟咄咄逼人的攻势，伊朗需要联合其他国际力量。与中亚

^① 在联合国框架下，由阿富汗的六个邻国巴基斯坦、伊朗、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中国以及美国和俄罗斯组成的负责解决阿富汗问题的国际会议。

中国伊朗学 论 集

同样有着密切地缘关系的中国，就成为伊朗借重的一支主要力量。同时，随着里海—中亚地区在国际地缘政治、能源、安全方面重要性的提升，美国在中东、中亚驻军的增加，伊朗作为“地缘政治支轴国家”，其战略意义对俄中印欧（盟）等大国也越来越重要。因此，中国要在中亚发挥大国影响，需要加强与伊朗的双边关系。地缘经济方面：广袤的中亚地区是一个巨大市场，中国和伊朗的商品在这里都很受欢迎。近来，随着中国能源需求的急剧扩大，中亚地区在中国的能源战略中越来越重要。维护中亚地区的稳定便成为中伊两国与中亚各国进行正常经贸关系的共同需要。地缘安全方面：中亚各国独立后，该地区跨民族的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思潮重新活跃。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在中亚地区的突出表现是危害中亚各国及俄罗斯、中国等相邻国家的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三股势力，而这三股势力又以建立“东突厥斯坦国”为口号。一些国际极端势力酝酿在中亚的费尔干纳盆地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然后将影响扩大到整个中亚，并进一步作为支持俄罗斯车臣和中国新疆民族分裂分子的基地。对中国而言，以“东突”组织为代表的民族分裂势力对中国安全的威胁最甚。中国新疆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日益同阿富汗和中亚的极端势力结为一体，对新疆的安全与稳定的威胁增大。20世纪90年代，新疆发生的多次恐怖爆炸事件就是最好的证明。作为世界现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的旗手，伊朗已经停止了“革命输出”。但作为伊斯兰大国，伊朗在其近邻中亚地区仍有重大的影响力。一方面，中国需要借重伊朗在反对宗教极端势力方面的“正面”影响。另一方面，伊朗在防范和抑制由美国和土耳其背后支持的泛突厥主义方面，与中国有利益上的契合。因此，共同维护中亚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是维系和加强中

伊合作的长期动力。

此外，在促进印巴两国关系改善方面，中伊两国有着共同的地缘利益，维护南亚地区安全与稳定也是中伊两国关系发展的长期促进因素。

（三）能源因素

中伊两国在能源，特别是在石油上的战略依存关系，成为两国关系越来越突出的推动力。

1989年，中国经过十年的改革开放，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对能源尤其是石油的需求急剧增加。1993年，中国成为成品油净进口国，1996年成为原油净进口国。中国的国外石油供应主要依靠中东地区。1990年，中东石油占中国石油进口总量的39%。到2000年，中东石油占中国石油进口总量的53.6%。^①目前，中国从中东进口的石油每天不到100万桶，2010年将可能达到300万~400万桶，2020年有可能超过500万~600万桶。^②至2003年，中国石油净进口量达到9110万吨，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进口国和消费国。为保障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国家的能源安全，中国已经积极行动，扩大石油进口渠道，从俄罗斯、中亚、非洲和南美等地增加石油的进口。但“无论中国做什么，绝大多数石油需求将来自中东地区”^③。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中国未来的石油安全问题实质上也是一个中东石油问题。获得长期稳定的海湾石油供应，将是中国中东战略的核心问题。而中国的中东石油供应主要来自沙特、伊朗和阿曼三国。

截至2004年1月1日，伊朗石油探明储量估算为1258亿

① 冀开运《中伊关系的深度分析》，收高发元主编《首届赛典赤研究国际会议论文集》，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94页。

② 吴磊《中国石油安全面临的挑战与对策》，刊《西亚非洲》2003年第4期。

③ MEED, Vol. 41, No. 44, 31 Oct. 1997, p. 1~2.

中国伊朗学论集

桶，占全球总量的 9.94%，居世界第三位。^①伊朗的天然气探明储量为 812.3 亿立方米，占世界的 15.3%，居世界第二位。^②同时，伊朗扼世界石油运输要道霍尔木兹海峡的有利地位，对中国能源的稳定供应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原油是中国自伊朗进口的第一大商品。自 1995 年起，中国开始较大规模增加从伊朗进口原油。2000 年自伊朗的原油进口猛增至 700 万吨，价值 14.64 亿美元，占我国自伊进口总额的 83%，占当年我国原油进口总值的 10%。2002 年，中国从伊朗进口原油 1110.70 万吨，价值 20.40 亿美元，占当年我国原油进口总量的 15.76%。这一年伊朗成为我国第一大原油供应国。加强同伊朗的关系，保障能源稳定供应，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及其大国战略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对伊朗而言，石油收入一直是其国民收入、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主要资金来源，是伊朗经济的命脉。伊朗石油出口收入一般占外汇收入的 80% 左右，占政府预算收入的 40%~50%，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0%~20%。保障石油出口的稳定持续增长、实现石油出口的多元化，对伊朗的生存与发展同样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同时，石油还一直是伊朗外交的重要筹码。在二战结束前后，伊朗利用石油开展“第三国外交”，引入美国力量，减轻了英国和苏联对其国家利益的侵犯。1973 年，伊朗又同其他中东国家一道，再次拿起石油武器，沉重打击了以色列和美国等西方国家。近些年，伊朗利用其丰富的油气资源，积极开展大国平衡外交，先后与欧盟诸国、日本、印度等签订了多项油气合作协议，几乎将除美国以外的所有大国都拉进了伊朗的油气合作市场，形成“利益捆绑”，有效地抵制了美国的经济制裁和在核问题上对其的打压。中国不仅是一个现实和潜在的石油消费大国，

① *Oil & Gas Journal*, No. 3, 2004, p. 24.

② 吴磊著《中国石油安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66 页。

而且也是一个正在崛起的世界大国，发展同中国的能源合作，不仅有巨大的经济利益，而且可以利用中国的影响提升伊朗的国际地位，牵制美国对伊朗的敌视政策。正是中伊双方在能源方面相互迫切的需求，推动了两国关系的快速发展。

④ 伊核因素

伊朗的核研发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1957 年 3 月，美国与伊朗签署了关于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美国承诺帮助伊朗发展核能核电技术。^①伊朗核计划正式启动。美国是当时伊朗核计划最主要的支持者，是第一个向伊朗提供核反应堆的国家，也是提供核反应堆数量最多的国家。至巴列维倒台时，美国共向伊朗出售了 8 个反应堆。因此可以说美国是伊朗核问题的始作俑者。

1979 年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后，美国终止了与伊朗的所有核合作，并联合西方国家对伊朗实施核遏制。伊朗于 1984 年恢复核计划后，曾向德国、阿根廷、中国、苏联、巴西和法国寻求帮助。在美国的压力下，德法巴三国未能与伊朗进行核合作，阿根廷也被迫于 1992 年中止了与伊朗签署的有关建设处理铀矿石设施的协议。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给予伊朗宝贵的支持。80 年代中期，伊朗开始与中国进行一些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伊朗同中国于 1990 年达成了一项帮助伊朗培训技术人员的协议。^②1991 年 1 月，中国和伊朗在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的基础上签署了一份帮助伊朗在伊斯法罕核研究中心建立一个 27 千瓦的实验性反应堆的协议。^③1992 年 9 月 10 日，伊朗

① “IAEA Increases Pressure on Iran’s Nuclear Diplomacy”, No. 72, August 2003.

② 顾国良《美国对伊政策——伊朗核与导弹问题》，刊《美国研究》2006 年第 1 期，第 10 页。

③ Mohammad Shahraini’s, “Nuclear Program Pays off in Iran”, Al-Nasr News, February 10, 2003.

中国伊朗学论集

总统拉夫桑贾尼和中国总理李鹏在北京签署了《和平利用核能协定》，中国的前提是“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1993年2月21日，中国核工业总公司在德黑兰和伊朗签署了在伊斯法罕附近建设两座30万千瓦核电站的协议。^①在此期间的中伊核合作既得益于中伊两国友好关系的大环境，反过来也促进和丰富了两国关系。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中国与伊朗的核合作，是以和平利用核能为基础、以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为前提的。

中国与伊朗的核合作一直遭到美国的反对。在1992年中美关系尚未实现好转前，美国因素对中伊核合作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随着伊朗核计划在中国、俄罗斯的帮助下得以恢复和发展，以及中美正常关系的恢复，美国对中国的压力越来越大。在中美关系仍居于中国对外关系的首位时，中伊核合作不可避免地受到美国的阻挠。正是在美国的压力下，中国政府于1997年终止了与伊朗的所有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②1998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向国会提交的报告证实：中国已停止了同伊朗的所有核合作项目。^③在伊核问题于2003年凸显后，美国一直主张将其提交联合国安理会，并在安理会框架下对伊朗实施制裁。因此，美国经常借此阻挠中伊关系的正常发展，特别是在中伊能源合作方面，希望迫使伊朗在核问题上就范。对中伊两国而言，一方面，伊朗在核问题上实施“借力外交”，有意加强与中国的关系以抗衡美欧特别是美国的压力与威胁。另一方面，中国作为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的成员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解决伊核问题时必须考虑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大局，

① 殷罡等《伊朗核问题的由来与态势》，刊《亚非纵横》2006年第2期，第8页。

② 顾国良《美国对伊政策——伊朗核与导弹问题》，刊《美国研究》2006年第1期，第10页。

③ 殷罡等《伊朗核问题的由来与态势》，刊《亚非纵横》2006年第2期，第8页。

与国际社会保持一致，有时不可避免的要做出不利于伊朗的政策选择，^①从而使中伊关系受到一定程度的伤害。

事实上，在伊核问题上，中国既面临中美关系与中伊关系的取舍，又面临支持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和反对伊朗发展核武的两难困境，中国在伊核问题上的政策选择十分困难。在伊核危机进一步升级的情况下，必将对中伊政治关系及能源领域的合作产生一定冲击。不过，伊核问题对中国能源供应的影响尚不足以达到不可承受的程度。随着中国节能纲要的实施，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石油管道的建成运营，以及中国从俄罗斯原油进口量的增加，中国将大大增强抗击能源安全风险的能力。伊核问题亦不会对中伊关系的大局产生大的影响，毕竟伊美敌对关系决定了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有利于伊朗的战略利益。

四、结语

1989 年成为中伊关系的转折年，是国际环境和双方现实需要决定的。中伊与美国战略上的对立促使两国在“战略上联合”；阿富汗及中亚地缘政治的演化为中伊在具体地区事务中的合作提供了持续动力；石油在两国经济与安全中日益突出的战略意义使得两国更加接近。正是在战略、安全以及经济上的共同诉求推动了中伊关系在 1989 年的转变并得以持续发展。核合作在历史上对中伊关系的发展起到过推动作用，当今的伊核问题对中伊关系的影响比较复杂，既有积极一面，也有负面影响。中国目前正处于平稳发展期，需要包括伊朗在外交、能源等方面的支持。同时，在伊核问题上，中国也要在负责任大国和具体国家利益之间做出恰当的选择，特别要考虑其对中美关系以及国家统一的影响。

^① 在 2006 年中，中国对安理会关于伊核问题的 1696 号和 1737 号决议都投了赞成票。

中国伊朗学论集

巴列维国王时期美国对伊朗的军售

范鸿达^①

1941 年登基的巴列维国王非常重视军事建设。^②伊朗的历史经历对他这一思想的形成影响非常大,诚如他所言:“我们绝对独立的政策使我们有必要拥有军事实力。伊朗整个古代和现代历史都清楚地表明有这种需要。当我们的武装力量软弱时,我们的国家就遭到蹂躏;当我们强大时,我们的国家就免遭外国侵略。军事力量常常成为我们生存的唯一保证。”在巴列维国王看来,要确保自己的安全,就必须有一支强大的军队;而军队的强大主要源于武器的先进与充足,于是,随着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巴列维王国内政治地位的不断稳固,他对大量先进武器的诉求就凸现出来,并一直持续到他的倒台。巴列维国王的武器诉求对象国主要是美国,针对这一时期的美伊武器交易情况,目前国内还缺乏较为系统的研究,本文拟就这一问题做一番探讨。



① 作者系厦门大学公共管理事务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美国—伊朗关系研究。

② 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 (1919 ~ 1980), 伊朗巴列维王朝的最后一任国王, 1941 年登基, 1979 年被伊朗伊斯兰革命赶下台并流亡海外, 1980 年客死埃及。

一、巴列维国王对美国武器的诉求

鉴于二战后美国在世界上的超级大国地位和美伊间相对友好的关系，伊朗巴列维国王实施了倾向于美国的政策，在军事建设方面尤其如此，多年以来巴列维一直希望能从美国获得大量的先进武器。事实上，二战后美国对伊朗的军事建设还是给予了一定的关注的，二战时期美国派往伊朗的军事顾问团并没有随着战争的结束而撤离伊朗，而是继续在那里帮助伊朗改组军队。杜鲁门总统也曾在 1949 年 7 月 25 日的国会特别咨文中专门提到“有必要再提供一定数量的装备……以加强伊朗保卫国家独立的能力”。在 1955 年之后的十年中，美国对伊朗的很多援助都流向了军方。但是巴列维国王强烈的军事建设思想与美国对伊朗军队作用的定位有些出入。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总统都认为伊朗没有建设一支足以抵御苏联侵略的军队的能力和必要，在这个问题上伊朗应该依赖美国的保护，毕竟，如果苏联侵略伊朗的话，将会导致一场范围宽泛的战争，美国卷入其中的可能性非常大。在当时的美国看来，伊朗军队建设的首要任务是拥有一支可以维护国内稳定、阻止国内共产主义势力颠覆的小型军队，而不是谋求与苏联的注定无法取胜的武器竞赛。特别是艾森豪威尔总统，他坚持认为伊朗当时最迫切解决的是其内部问题，国王不应该把注意力过多的放在军事层面上，这样很容易对伊朗的总体发展产生不利影响。特别是在 1959 年 3 月，美伊签署了一项双边防御条约，该条约明确宣布要支持伊朗的独立和完整，继续向伊朗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在伊朗面临侵略时迅速给予援助等。此条约的签署使得当时的美国更不希望伊朗建设规模庞大、代价高昂的军队。实际上，艾森豪威尔总统更关心国王在伊朗国内的地位，国务卿赫脱

中国伊朗学论集

(Christian Herter) 警告说, 伊朗经济的恶化 (通货膨胀严重, 收支失衡) 是由国王过多的军事项目造成的, 他建议美国削减对伊朗的军事和经济援助, 以迫使国王重估他的军费支出。

1961 年富有改革热情的肯尼迪进驻白宫对渴求大量美式武器的巴列维国王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在肯尼迪政府时期, 伊朗从美国获得的军事援助和武器非常有限。在 1962 年访美期间, 肯尼迪政府竟然劝说国王把他的军队从 20 万减少到 15 万人, 建议国王要根据现实需要而不是根据政治需要来改进武器系统, 而且还要降低对伊朗的援助力度。这让期望获得大量美式武器的巴列维颇为不满。

肯尼迪在 1963 年 11 月被暗杀以及其后林登·约翰逊出任总统, 使国王看到了获得美国武器的希望。针对当时美国对伊朗军售方面的限制, 国王表达了自己的不解: “难道这是因为我们已经成功地创造了一个正在发展的国家, 已经开始了一场社会革命, 我们就不再重要了吗?” 他带有嘲弄性质的问道, “为什么美国人会认为我正在制造麻烦……而且是在我已经着手做美国人希望我做的事情的时候?”^①在国王的一再请求下, 约翰逊政府在 1964 年与伊朗达成了美伊军售协议, 协议规定在此后 4 年中, 美国预计每年向伊朗出售 5000 万美元的武器, 两年后增加到 1 亿美元。1966 年 5 月 23 日, 约翰逊政府再次批准一项新的军售计划: 在四年内向伊朗出售 2000 万美元的武器装备。1968 年 5 月 1 日, 约翰逊总统又正式批准了对伊朗军售的 6 年计划, 这一计划规定在 1968~1973 财政年度, 美国向伊朗提供高达 6000 万美元的购买武器贷款, 而且提议在 1968 财政年度给伊朗 750~1000 万美元的购买武器贷款。但总

① E. A. B. *Persian Kingship in Transition*, New York, 1968

体而言，在约翰逊总统时期，伊朗从美国获得的武器还是很有有限的，这也让巴列维国王感到非常不满。不过这种状况随着尼克松的上台以及尼克松主义的出炉而大有改观。

二、尼克松主义的出台及其对巴列维国王的影响

当 1969 年尼克松出任美国新一届总统后，美国的伊朗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这与美国全球战略调整息息相关。尼克松上台时，美国正处于内外交困之中：深陷越战泥潭而不能自拔；经济下滑、经济危机严重；国内外反对武装干涉外国的呼声日益高涨；苏联军事实力获得大幅度提升并使美国感到深受威胁；力量的衰落还使得美国同欧日关系发生了一些不利于美国的变化等。总而言之，美国拥有全球绝对优势的日子已经逝去，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全球战略自然需要调整，正是在这一大的背景下，尼克松主义应运而生。尼克松主义的主旨是“美国在履行其条约义务和维持其对盟国的核保护伞的可靠性的同时，从此以后将不再为制止侵略提供美国的人员。然而，美国将向任何面临侵略的盟国提供军事装备和经济援助。”

在这一新战略中，伊朗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到 70 年代初期，波斯湾的石油已经成为西方国家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资源，当时波斯湾地区生产世界 33% 的石油，西欧需求的一半、日本需求的几乎全部都来自这一地区。不过这一地区长期处于动荡之中，这不仅会影响到西方国家的石油输入，而且还会给苏联提供涉入本地区事务的机会，这对于美国的全球遏苏战略十分不利。在美国军事力量不能直接卷入波斯湾事务的情况下，尼克松等美国决策者把伊朗国王看做是维护波斯湾稳定以及西方在此利益的地区领导者。这时华盛顿也已经接受了伊朗国王对本地区威胁的评估，认为主要威胁来自当地的激进力量



中国伊朗学论集

而不再是苏联，因此，先前被美国看做是用来延缓苏联进攻、为美国赢得时间准备报复的伊朗，现在则成为反对苏联在本地区傀儡国家的有力保障。另一方面，随着伊朗石油收入的激增以及国内政局的稳定，巴列维国王地区称霸的欲望日趋浓烈，美国新战略的出台以及对伊朗作用新的定位进一步坚定了国王担当“地区警察”的念头。这样，美伊一拍即合，大大促进了美国对伊朗的军售。

事实上，这一时期巴列维国王向美国购买大量先进武器的目的是想尽可能的摆脱对美国保护的依附，他在 1969 年 7 月的一次采访中感慨到：“如果伊拉克明天进攻我们，将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在回忆了 1965 年的印巴战争后国王说：“当巴基斯坦被迫呼吁在巴基斯坦国土上距离拉合尔仅仅几英里的地方划分停火线时，中央条约组织做了些什么？和巴基斯坦签有双边条约的美国又做了些什么？我们不能把我们自己的防御寄托在别人身上，这就是我们正加强军事建设的原因。”数月之后，国王又提到另外一个威胁，这一威胁“来自虚弱的政府，虚弱的国家，腐败的国家，在那里，颠覆分子将会获得积极活动的自由空间”，他认为在海湾阿拉伯国家“中世纪”体制下的“内战和混乱”也会危及到本地区的和平。这时伊朗面临的最大麻烦仍然来自伊拉克。1969 年 4 月，巴格达突然宣布要对构成两伊边界的整条阿拉伯河实施主权，伊拉克警告说除非伊朗接受这一现实，否则它将对伊朗的船只给予强制禁运。因为此前两伊共同对阿拉伯河实施管辖，所以伊朗当然对伊拉克的上述举动给以强烈谴责，两国互不相让，有一段时间事实上已经处于了战争状态。

国王地区称霸的抱负、伊朗受到的即时威胁以及尼克松政府对伊朗的倚重，这些因素促使国王更加注重伊朗的军事建

设。国王平时比较留意世界军事、武器动态，以致美国国防部的一位官员说国王“比我们派去和他谈判的大多数人知道更多的新式武器的发展状况”。国王将所有重要的决定都纳入自己的掌握之中，包括今后的购买计划，他对军事的关注越来越超越对经济和国内社会问题的关注。国王扩大伊朗军事力量的计划尽人皆知，伊朗的政府官员和军事将领对他大力购买先进武器的做法也只能顺从。上述因素连同即将出台的尼克松对伊军售新政策，这一切都为伊朗大规模的向美国购买武器打开了方便之门。

三、尼克松政府及其后美国对伊朗的军售

1972年5月，尼克松总统对伊朗进行了访问。访问期间，尼克松向巴列维国王承诺，美国将不限数量的向伊朗出售他所需要的任何常规武器，并且同意向伊朗派遣军事培训技术人员，帮助伊朗人掌握使用及维护进口的美式武器。这让国王欣喜不已：美国的武器库终于向他敞开了大门。

这一时期，伊朗石油收入的激增也为国王提供了购买武器的财力基础。1973年1月，在白色革命开启十周年之际，国王宣布将把伊朗的石油资源收为国有，其管理权要从先前的国际财团转移到伊朗国家石油公司。在7月31日完成接管伊朗石油管辖权后，国王又于当年的12月在德黑兰主持召开了欧佩克部长会议，决定把每桶石油的价格从5.032美元提高到11.651美元。国王这样做一是出于经济目的，二是出于维护国家独立和安全的考虑，就像国王在1969年5月所言，“我不能把我国的未来建立在（别人的）承诺之上”，只有最大限度地利用本国资源，加强自身的军事实力，促进本国的经济发展，才能更有效地保障自己的利益。的确，石油提价给伊朗带来了

中国伊朗学 论 集

丰厚的收入，在 1964 年，伊朗石油年收入还仅有 4.82 亿美元，可是到 1973 年，年收入达到 44 亿美元，当 1974 年欧佩克提升油价后，伊朗每年的石油收入就激增到 214 亿美元了。伊朗石油收入的迅速增加有增产的因素，但更主要的是提高油价的结果，伊朗方面认为，美国进口石油花费的增加，将会促使其向伊朗出售更多的武器。

面对油价骤升前景，美国财政部建议白宫向巴列维国王施加强大压力，要求他取消涨价决定，并且设法降低油价，这招致国王的严厉指责，他说没有人能够指示他如何做。尼克松和基辛格也拒绝了财政部长威廉姆·西蒙 (William Simon) 和其他人以削减军售来压制伊朗石油政策的建议，在他们看来，国王毕竟是在向美国购买武器，美国从中也获益匪浅。尽管如此，由于石油动荡，华盛顿对伊朗的军售政策在美国国内还是遭到一些批评。不过国王极力为他的武器购买计划辩护，1973 年阿以进行的“十月战争”为国王提供了现实的佐证，心怀忧虑的国王针对这场战争发问到：“以色列和世界的其他地方难道就不对倾泻到它身上并几乎捣毁它的大量武器感到惊讶吗？”他认为如果伊朗也遭受到像以色列一样的境遇，“我将没有任何机会”保全自己。助理国务卿约瑟夫·希斯克 (Joseph Sisco) 认同国王的这一观点，他说国王有充足的理由为自己担忧：与苏联有漫长的边界；莫斯科与叙利亚、伊拉克等伊朗的对手保持紧密联系；伊拉克对科威特的主权威胁；苏印友好条约的签订；苏联海军在波斯湾和印度洋活动的不断增强等。

不过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中东分委员会主席李·汉米尔顿 (Lee Hamilton) 认为美国向伊朗提供大量武器是不合适的，“你不必为敲碎一个坚果而非要一个大锤子”，“自 1965 年以来，我们对伊朗和沙特的武器销售和帮助大约是苏联在波斯湾

地区活动的 6 倍”。他暗示美国向伊朗大肆出售武器主要是基于吸收石油美元而非伊朗合理需要的考虑。汉米尔顿的见解遭到希斯克的反对，希斯克认为军售并不是能源危机或者较小的边界摩擦而促成的，而是出于让盟国在没有美国直接涉入的情况下能保护自己的考虑。他继续解释说，如果需要伊朗和沙特承担维护波斯湾地区稳定的主要责任，它们自身的安全是其前提条件，也就是说通过向它们出售武器从而增强这两个国家的防御能力是无可厚非的。希斯克坚持认为，美国向伊朗大量出售武器，弥补进口石油的花费只是一个次要因素。

1973 年 9 月，基辛格被任命为国务卿，这进一步巩固了美国政府中亲近伊朗国王势力的地位，使得对伊军售更加易于进行。美国各部门也逐渐明白，与白宫路线相左的意见肯定不受上层欢迎，因此，他们有时也不得不迎合白宫的意见，于是，便出现了美国对伊军售的繁荣局面。在当时的德黑兰，就像在 1971~1973 年任美国军事援助顾问团 (MAAG) 团长的威廉姆森 (Ellis Williamson) 将军所说的那样，那是一个推销员实现自己梦想的地方，MAAG 总部每周要接待 35 个左右的团体来访者，而这还不是全部的来访者，他们都积极向伊朗推销各式武器。但是不管是美国销售商还是伊朗主管官员，他们都常低估武器维护问题和培训伊朗人掌握这些装备的费用，此外，价格增长以及能否按期交货问题也常引起麻烦，这就导致交易双方产生摩擦：当伊朗人不能很好的操作购买的美式装备时，他们就会有被欺骗的感觉，而且当美国人建议他们不要操之过急时，他们又会产生侮辱感，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今后两国关系的发展。

因为水门事件，尼克松在 1974 年 8 月初被迫辞职，杰拉尔德·福特于 8 月 9 日继任为美国第 38 任总统。福特上台后基



中国伊朗学论集

本沿用了尼克松时期的内外政策，也就是“没有尼克松的尼克松政策”。在外交方面，福特曾明确表示，尼克松时期的外交政策“是最为成功的”，他并不打算对其加以改变。为了保证政策的连续性，福特让基辛格仍然担任国务卿这一要职。在福特总统时期，美国继续支持伊朗的军事建设，在他担任总统的1975、1976两年，美国对伊的军售高达42亿多美元（见表1）。

表1 1953~1978年间美国对伊朗的武器出口
单位：美元

年 度	金 额	年 度	金 额
1953~1954	104,000,000	1974	4,32
1955~1968	505,412,000	1975	2,44
1969	235,821,000	1976	1,794,4
1970	131,929,000	1977	5,713,7
1971	363,884,000	1978	2,586,8
1972	472,611,000	合计	20,852,651
1973	2,171,355,000		

到1975年，美国大约有2万名军事人员在伊朗工作，到1976年7月，这一数字则达到2.4万，虽然国务院声称人员的增加将会很快停止下来，但是其官员私下却认为，如果不增加在伊朗的美国技术人员，伊朗的军队运作将陷于停顿。虽然卡特政府一再标榜人权和限制武器出口，但是从表1中可以看出，那时美国对屡屡侵犯人权的伊朗的武器出口并没有减弱。

四、美国对伊朗军售评价

巴列维从美国等西方国家大肆购买先进的武器，增强了伊朗的国防能力，提升了伊朗的地区和国际地位，使得它成为海湾地区无可争议的第一军事大国。但是伊朗的收入是有限的，它在军事上过多的花费势必影响到诸如经济、教育、卫生

等民生行业的投资，从而直接影响到民众的生活质量，这不可避免地会招致民众的不满，并推动了巴列维王朝走向覆灭。

另外，在伊朗的为数众多的美国军事等方面的顾问也是一个容易招致伊朗民众怨声载道的问题。美国人相对优越的生活条件和伊朗人的如下认识——美国人抢走了伊朗人的工作机会，导致了反美情绪的增加。伊朗人的反美情绪是可以理解的，在伊朗工作的大多数美国技术人员和他们的家属都生活在与伊朗人隔离的地方，他们享受到的很多待遇都是伊朗人所无法企及的。单单贝尔直升机公司在伊朗就有 1700 名雇员，他们在伊斯法罕 (Isfahan) 的工作基地有 45 英亩之多，公司还出台了一些措施刺激他们以及 6000 名家眷的优惠条件，包括 3 倍的工资，职位的提升，免税等。反对国王的伊朗作家巴拉哈尼 (Reza Barahani) 后来为他在来美国之前的极端反美情绪做了解释，他说这是因为当时伊朗人仅仅可以看到美国人在为国王而不是为伊朗服务。

总而言之，美伊间高额的武器交易虽然加强了伊朗的国防能力，但是却恶化了巴列维统治的内部统治，为其政权的合法性带来很大的挑战，并加速了巴列维王朝的覆灭进程，同时也使得美国在伊朗的形象深受损害，在伊朗人眼中，美国与巴列维靠得越来越紧，它实际上扮演了国王专制独裁统治的帮凶，这也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及其后的伊朗人强烈的反美情绪埋下伏笔。

参考文献

- [1] 《伊朗 巴列维王朝历史的回答》，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6 版。
- [2] Barr *Parted with Good Intentions: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and Ira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 [3] Jame *Reforming Iran during the Kennedy Years*. Diplomatic History.

中国伊朗学论集

- W i n t e r , 1 9 9 1 .
- [4] S i m h a t , N a y e f H . *Middle powers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lessons from Irano-U.S. relations, 1962-77*. *Policy Studies Journal*, N o . 1 , 2 0 0 0 .
- [5] F R U S , 1 9 6 4 ~ 1 9 6 8 , V o l . 2 2 .
- [6] 杨生茂主编《美国外交政策史》(1 7 7 5 ~ 1 9 8 9) , 人民出版社 1 9 9 1 年版。
- [7] 丹德威尔著《论美苏关系——1 9 4 7 至尼克松辛格时期》, 世界知识出版社 1 9 8 4 版。
- [8] S h a h r a m C h u b i n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Iran* .
Berkeley, 1 9 7 4 .
- [9] R u h o l l a h a r ' s *Foreign Policy, 1941-1973*. C h a r l o t t e s v i l l e , 1 9 7
- [1 0] *New York Times*, F e b r u a r y 2 4 , 1 9 7 4 .
- [1 1] 迈克尔·多伊尔主编《福特言论集》, 上海人民出版社 1 9 7 5 年版。
- [1 2] D . P . *Iran Between East and West* E d i t o r i a l R e s e a r c h R e p o r t s ,
4 , J a n u a r y 2 6 , 1 9 7 9 .
- [1 3] A l e x a n d e r *Foreign Policy Under Carter, Testing Multiple Advocacy, Decision Making*. W e s t v i e w P r e s s , 1 9 9 0 .

美伊关系对伊朗中东地缘战略的影响

陈俊华^①

一、当前伊美关系的现状与特点

自 1978 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后，伊美关系发生巨大嬗变。此前伊朗借助“第三国战略”成功地与美国结成战略盟国，双方的关系也由此达到顶峰。此后由于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革命、伊朗学生占领美国使馆及扣押人质事件，美伊断交并迅即演变为全面敌对状态。虽然在温和务实的哈塔米政府“文明对话”的外交政策下，伊美两国出现过短暂的缓和友好气氛，但是很快又由于 2005 年新当选的内贾得新政府在核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双方关系愈加紧张起来。

目前美伊两国的关系总体上可以概括为：全面敌对，针锋相对。具体来说表现为：美国对伊朗实行的“遏制”加“触变”的对外政策，其政策核心就是对伊朗实行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威慑；而伊朗对美国也是毫不示弱，挑战美国的权威，多方位抗击美国的打压。具体表现为以下特征：

① 作者系西南大学地理科学学院西亚研究所副教授、博士。

中国伊朗学论集

1. 政治方面, 美国运用“自由和民主”的栅栏对伊朗进行政治孤立, 打压伊朗的政治生存空间, 而伊朗则反唇相讥, 攻击美国推行霸权主义。

推进美式民主、价值观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 一直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9·11”事件后, 美国认定, 中东伊斯兰国家的宗教极端主义是反美反西方的国际恐怖主义的重要源头, 美国指责伊朗推行独裁政治, 践踏人权, 认为伊朗试图利用“伊斯兰革命”来改造、控制中东国家。这与美国在中东极力推行的价值观和“民主”制度相悖, 更不符合美国的中东利益。美国视伊朗为威胁其地区利益、尤其是能源战略安全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大本营和扩散源, 视伊朗为眼中钉, 欲拔之而后快。布什总统在 2002 年 1 月的《2002 年国情咨文》中将伊朗与伊拉克、朝鲜一起列为“邪恶轴心”国家, 指控伊朗“猖狂地力图获得武器并输出恐怖, 同时不是经过选举上台的少数人在压制伊朗人民争取自由的愿望”。^①2003 年 4 月 30 日, 美国国务院《2002 年度全球恐怖主义报告》把伊朗列为支持恐怖主义的 7 个国家之一, 认为伊朗是除伊拉克之外支持恐怖主义“最活跃”的国家。针锋相对地, 德黑兰把美国定位为“大撒旦”, 把美国看作是伊朗和伊斯兰的敌人, 是世界上所有邪恶和伊朗遭受灾难的主要根源, 是一切“堕落之源”, 公开宣称对抗美国是伊朗、乃至伊斯兰和穆斯林的使命。

布什政府在推行对伊朗遏制政策的同时, 还积极鼓励和支持伊朗国内改革派通过政治变革来改变伊朗的现政权。2003 年 6 月, 伊朗学生和其他人士在德黑兰等城市以及在欧洲等地举行了一系列反政府示威。对此, 美国总统布什赞扬说, 抗议活

^① 《美国总统布什 2002 年国情咨文》(2002 年 1 月 29 日), 载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编《国际形势年鉴 2003》,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第 1 版, 第 387 页。

动“代表伊朗民众争取实现自由伊朗的开始，具有积极意义”。美国参议院还通过了由堪萨斯州的共和党参议员萨姆·布朗贝克提出的一项“伊朗民主议案”，要求政府加强资助在美设立的伊朗反对派电视、广播频道，进行反伊政府政治宣传，呼吁举行由国际监督的公民投票，“使伊朗人民能够和平地改变他们的政府制度”。^①然而伊朗国内局势并没有按照布什政府所希望的那样发展。2005年6月25日，持强硬、保守立场的德黑兰市长艾哈迈迪·内贾德以绝对优势赢得伊朗总统大选，保守派的获胜反映了伊朗公众在美国的打压政策下民族主义和反美情绪的上涨。内贾德政府执政以来，坚持推行强硬政策，特别是2004年以来伊朗在核问题上的强硬态度，再次使美伊关系趋向紧张。

2. 经济方面，美国试图通过经济制裁削弱伊朗的经济实力，伊朗则大打石油牌，多方面拓展经贸关系。

对伊朗实行经济封锁是美国“双重遏制”战略的核心内容。自1995年5月开始，克林顿总统签署了对伊朗的“贸易禁令”，美国停止与伊朗进行贸易、中止在伊朗的新投资、禁止对与伊贸易提供资助贷款和相关的金融服务、禁止所有与伊朗有生意往来的外国公司与美国进行贸易。继而在1996年8月出台了“达马托法”，禁止美国及外国石油公司在伊朗能源领域进行4000万美元以上（1997年8月改为2000万美元）的投资。2001年布什就任美国总统后，延续和强化了克林顿时期的对伊“遏制”政策。2001年3月，布什签署命令，延长对伊朗的贸易和投资禁令，伊朗除了在开心果、地毯和鱼子酱等领域，一直全方位遭受美国的经济制裁。随着伊朗核问题的升级，美国对伊朗的制裁还在不断升级。2006年4月26日，美

① 任毓骏 《美国与伊朗关系进一步紧张》，人民网2003年6月17日。

中国伊朗学论集

国众议院还以占压倒优势的表决结果通过一项有关加强对伊朗制裁的法案。法案称,“在没有证实伊朗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项目之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措施将继续生效”。任何“向伊朗出口或提供有助于其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物品或技术的个人都将受到制裁”。与此同时,任何在伊朗能源领域投资额超过 2000 万美元的国家、企业或个人的名字都将被美国公布在政府刊物上。^①

美国的制裁并没有使伊朗政府屈服,针对美国的封锁和制裁,伊朗也进行了多方面的反击。哈塔米政府时期伊朗首先在国内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为经济发展铺平道路。同时针对国内外的新局势,伊朗适时地采取了积极灵活的外交政策,以“能源外交”为主要手段,通过大打石油牌,逐步拓展和巩固了与欧盟、日本、俄罗斯等发达国家的经贸往来,力图冲破美国编织的经济制裁网。2002 年 12 月 12 日,经过多次部长级会谈,伊朗与欧盟在布鲁塞尔达成了经贸合作协议。欧洲公司纷纷进入伊朗能源领域,法国汽油润滑油公司、英荷壳牌公司等西方公司相继与伊朗就南法尔斯气田、里海钻井平台项目等 12 个大型油气田开发项目以回购方式签订合同,金额累计 150 亿美元。^②南美国家和澳大利亚也相继进入了美国农场主因制裁而被退出的伊朗农产品市场。由于伊朗多方面发展对外经贸关系,使得美国的经济制裁收效并不明显。

3. 军事方面,美国对伊朗构筑的军事威慑包围基本成型,伊朗以强硬的核计划对抗美国的军事威慑。

“9·11”事件后,“打击恐怖主义、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

① 徐伊伊《美国制裁将扩大到新领域 伊朗百姓准备“反制裁”》，新华网 2006 年 9 月 6 日。

② Iran Daily, April 19, 2001.

器的扩散”成为维护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任务。2002年9月20日，美国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美国“面临的最严重的威胁在于极端主义与技术的结合”，为了保护美国免遭恐怖分子有预谋的袭击，必要时美国将实施“先发制人”的进攻，“在威胁到达美国国界之前识别并摧毁它”。^①在美国看来，伊朗是培养、支持、输出恐怖主义的“邪恶轴心国家”，“全世界对恐怖主义最积极的支持者”和“十大恐怖主义国家”之首^②。因此，伊朗成了伊拉克战争后中东地区美国采取“先发制人防御性打击战略”的首选目标，在军事行动方面也针对伊朗进行了大量的调整和部署。

伊拉克战争之后，美国对伊朗构筑的军事威慑包围圈已经基本成型：美国推翻了塔利班政权、“改造”阿富汗，将伊朗原来的东面势力范围变成了封锁伊朗的东面铁墙；摧毁萨达姆政权、“改造”伊拉克，将对伊朗的包围圈推进到伊朗的西壁江山；与格鲁吉亚等国家加强军事联系，排挤俄罗斯，从北面切断伊朗向中亚的扩张之路，同时美国可以控制中亚的石油天然气和战略资源及其运输通道；增强美国海军在波斯湾的军事存在，将原来在沙特的美军基地移往波斯湾和北印度洋，压缩伊朗海军的活动和生存空间。

面对美国的军事威慑和包围，伊朗选择了发展核计划的强硬姿态来应对。自2003年2月伊朗官方宣布伊朗正在伊斯法罕和卡桑两个城市附近分别兴建两座铀提炼加工厂以来，伊朗的核计划立即引起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愈发成为美国的心病。伊朗认为，为和平利用核能而从事核活动是《不扩散核武

① The White House,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ca. September 2002, pp.1~2.

② 高祖贵《布什政府对伊朗政策分析》，刊《西亚非洲》2004年第3期。

中国伊朗学论集

器条约》赋予每一个缔约国的权利，而美国则担心，一旦伊朗拥有核武器，不仅意味着美国对伊朗进行民主改造的梦想要落空，而且“对地区稳定和全球防扩散机制构成了严重挑战”。因此，美国决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或完整的核燃料处理能力，即使民用核能力也不可以。2004年5月6日，美国众议院通过第398号决议，以376票赞成、3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一项决议，授权政府使用“一切手段”遏制、劝阻和防范伊朗获得核武器。^①今年8月31日，伊朗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表示，伊朗决不会在核问题上屈服于国际压力，更不会对受到威胁的情况下选择退避，伊朗“永远不会放弃和平核能”。而且，伊朗也没有遵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第1696号决议，该决议要求伊朗在8月31日之前暂停所有与铀浓缩相关的活动。

伊朗的核问题已经成为影响美国伊朗关系走向的关键性因素。伊朗核问题的最终解决结果，要么可能成为伊美敌对紧张关系走向缓和的契机，要么可能成为美国对伊朗进一步实施制裁、甚至对伊动武的导火索。

二、伊朗在中东地区的战略目标

伊朗的地缘外交政策目标缘于它所具有的特殊的地缘政治学理念和经济形势。伊朗地处扼守“三洲五海”的十字路口、东西方交通要冲的战略地理位置，历来是大国争夺中东控制权、实施全球战略的前沿地带，独特的地缘政治位置决定了伊朗具有渴望成为中东大国的政治诉求；伊朗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众多的人口、广阔的土地和悠久的历史文化，使得伊朗具有成为中东区域大国的坚实基础；而中东地区激烈的政治

^①108th Congress, 2nd Session, H. CON. RES. 398, Coi 6, 2004, <http://thomas.loc.gov/>.

冲突、民族宗教矛盾和动荡的局势，成为促成伊朗演变为中东区域性大国的客观外部条件。

纵观当前伊朗的外交思维及政策，我们可以探寻出其中东战略之目标大致可以概括为三个层次的基本内容。

1. 进一步发展和改善同周边国家的关系，争取建立周边地缘安全机制。

这是伊朗在中东地区的第一个层次的战略目标。当前伊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加强经济建设，增强伊朗的综合国力，使国家的安全得到保障并有能力抵制任何外来威胁，使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得到持续的繁荣和发展。为了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伊朗积极发展和改善同周边国家的关系，试图建立周边地缘安全环境。与周边国家的来往，伊朗的外交目标是非常明确的，即旨在消除误解、增强信心，加强地区安全合作，营造信任的环境，为巩固和加强与地区国家的关系而迈出了重要步伐，并因此日益受到周边国家的关注和信任。^①海湾地区是伊朗的经济重心、军事前沿和对外大门，事关伊朗的经济兴衰和社稷安危。虽然在波斯湾问题上与海湾六国之间存在着分歧，伊朗依然希望努力首先发展与海湾合作委员会（GCC, Cooperation Council for the Arab States of the Gulf）的睦邻合作友好关系，表示德黑兰愿意与所有海湾国家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与北部里海地区的邻国阿塞拜疆、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国家也以经济合作、文化交流为契机改善关系，致力于签订安全条约和解决里海归属问题。

2. 以能源外交为手段，拓展国际生存空间，抗衡美国的遏

① Mahallati, Mohammad. The Middle East: in search of transcendent idealism & practicalit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p. 119 ~ 141.

中国伊朗学 论 集

制和经济封锁。

伊朗第二个层次的战略目标就是要致力于发展同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拓展其国际生存空间。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吸引了许多外国企业的注意力，伊朗逐渐认识到如果能抓住这一契机，充分利用其丰富的油气资源，伊朗将有可能打开局面。伊朗在外交活动中开始打“能源牌”，能源成了伊朗发展对外关系的纽带，更是其区别不同对象、平衡对外关系的王牌。在美国仍对伊采取敌视政策的情况下，伊朗的外交政策和能源战略逐渐转向重视欧盟、俄罗斯等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有举足轻重作用的国家或政治实体。哈塔米政府期间，哈塔米成功地访问了法国、意大利、德国、日本、俄罗斯等国，并且出席了联合国首脑大会和伊斯兰会议组织最高首脑会议，这些都表明伊朗外交已取得了良好的开端。^①在与欧盟的外交政策上，伊朗的专家认为，“目前，我们与欧洲的合作还局限在经济协定、协议和贸易往来上。但是，我们将来的外交目标是要与欧洲建立更多的安全、持久的关系”^②。另一方面，欧盟从自身政治经济利益出发，也看重伊朗巨大的市场潜力、广阔的能源开发前景及其重要的战略地位，也乐意与伊朗发展关系。在对伊朗的政策上，欧盟注意与美国拉开距离，既不视伊朗为安全威胁，也反对制裁伊朗，主张实行“批评性接触”政策。同时，伊朗与俄罗斯的合作也逐渐由经济贸易向战略军事合作的方向发展。

显然伊朗有自己的如意算盘：一方面，通过与欧盟、日本等国的经贸往来，接近国际资本市场，获得外国直接投资或高

① Etella, Iran's Foreign Policy Gains After Islamic Deputy Foreign Minister), Persian Afternoon Daily, 20

② Norouz, President Khatami's Foreign Policy in an International, Social & Cultural Daily) 2001.5.3: 10.

新技术产品和服务，提高自己的经济地位和国际发言权；另一方面，可以挫败和抗衡美国的遏制政策，减少由美国经济制裁带来的负面效应。面对欧盟、俄罗斯在中东影响的扩大，美国对伊政策的外部压力也会越来越大。

3. 以和平温和的手段输出伊斯兰革命，扩大和巩固其地区大国的地位，最终致力于建立伊斯兰世界秩序。

从长远来看，伊朗输出伊斯兰革命，建立伊斯兰世界新秩序的长远目标一直没有改变。伊朗确信，“伊斯兰革命的浪潮将扩散到整个伊斯兰世界”，“伊朗毫无疑问将迅速去帮助世界上所有的穆斯林，将向世界上革命的伊斯兰政府伸出友谊之手，并且支持广大民众去推翻腐败的政权”。^①但是，在新的并不断变化着的国际形势下，来自外部的环境因素必将对伊朗的这一发展目标产生巨大的影响，促使伊朗伊斯兰政权在恪守伊斯兰价值标准的同时，还要采用灵活务实的态度来处理这一问题。在新时期，伊朗一改过去以暴力为主要输出手段的主要方式，更强调通过自身建设、树立伊斯兰典范来扩大影响，更注重以经济、文化和人道主义援助等和平的、温和的方式来发展相互间关系，逐渐渗透伊斯兰革命。特别是在中亚地区的穆斯林国家成为伊朗新时期输出伊斯兰革命的重点区域。通过与中亚国家之间在历史、文化、民族和宗教等联系为纽带，以经济合作为主导，努力发展友好关系，争取与这些国家逐步建立起更强大的伊斯兰经济共同体，同时提高伊朗在中东乃至整个穆斯林世界的影响力，巩固其地区大国的地位。其最终目标是致力于联合中东北非的穆斯林国家共同组成一个横跨欧、亚、非

① Ahmad Naghizadeh, Rectification of Iran's Foreign Policy Under Khatami's Presidency, Discourse Quarterly, Winter 100.

中国伊朗学 论 集

三洲的、具有强大影响力的伊斯兰世界。

三、伊美关系对伊朗中东地缘战略的影响

虽然与美国关系处于敌对紧张状态，但是对伊朗来说，处理美伊关系却是其外交政策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作为全球的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利益追求和影响力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更是不容轻视的。因此，伊朗与美国的外交关系对伊朗的对外政策和国际关系，特别是伊朗在中东的战略地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与影响。

1. 对伊朗谋求中东政治经济大国地位的影响

伊美关系紧张对伊朗谋求中东大国地位的确立、国际地位的提升而言是一枚双刃剑，既有弊、也有利。

首先，表现在不利影响方面。伊朗作为中东地区的石油大国，石油及其相关产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也是国民收入中最重要的收入来源。美国的遏制和孤立政策对伊朗首当其冲的影响就是石油收入。伊朗作为欧佩克第二大石油生产国，目前原油日平均产量约为 326 万桶，出口 225 万桶，石油收入高达 228 亿美元左右，约占出口总收入的 81%，可以说石油是伊朗的生命线。^①美国实施经济制裁对伊朗的石油出口以沉重的打击，外汇收入大幅度下降，进而影响到了整个经济的正常运转，对其综合国力的提高是极为不利的。尤其是 1996 年正是伊朗进入外债偿还的高峰期，有 360 亿美元的外债无力支付，经济制裁不啻雪上加霜，使得伊朗经济进入了 1979 年伊斯兰革命以来最困难的时期。伊朗社会普遍产生恐慌心理，老百姓抢购美元、黄金，致使里亚尔急剧贬值，同时物价上涨，通货

① E. Abadi, Is Oil a Reliable Backing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Import, No. 78, Jan. 2004, PP 20~23.

膨胀加剧。连官方报纸和议员们都不得不承认问题的严重性。正如伊朗经济分析人士赛义德·雷莱兹说：“我们尚未加入全球经济，因此也就不会在潜在制裁中死去”，但制裁会令“伊朗经济困难”，在美国制裁期间，“伊朗的经济损失已经达到每年 100 亿至 150 亿美元”。^①

其次，表现在有利影响方面。伊美关系全面敌对，使得伊朗成为中东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内敢于与美国针锋相对的国家之一，很大程度上扩大了伊朗谋求成为中东政治、经济大国的影响力，其言行在中东和国际上也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重视。伊朗作为中东大国的地位提升主要受到三个方面因素的作用：

第一，被周边阿拉伯国家的认同与友好往来。由于美国在中东问题处理上长期采取“双重标准”，一味地偏袒以色列，维护和帮助亲美势力，对持不同政见的国家和敌对国家经常采取各方面的报复和打击，引起了阿拉伯国家的强烈不满，为了对付以色列的强硬政策，阿拉伯国家之间加强了内部协调与合作，并开始对一直受美国打击遏制的伊朗表示了友好，逐步寻求与伊朗改善关系。这对伊朗而言，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和鼓舞，使其中东大国的地位得到了提升和巩固。

第二，与在国际事务中举足轻重的欧盟、俄罗斯、日本等大国间经贸关系的不断加深，使伊朗找到了开展全盘外交的重要突破口。欧盟、俄罗斯等国家从反对美国独霸全球上讲，是非常支持伊朗这支抗衡力量的，在与其进行经贸合作、核设施建设等问题上常常与美国貌合神离。伊朗核问题历近两年多的波折起伏，欧盟始终坚持在 IAEA 框架内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伊朗核问题，反对美国坚持的制裁或军事打击政策。与欧

^① 国际观察：《美国编织三重制裁封锁伊朗》，新浪网 2006 年 09 月 01 日。
<http://news.sina.com.cn/w/2006-09-01/182410897>



中国伊朗学 论 集

盟、俄罗斯以及日本等国家关系的发展,为伊朗抵制美国的封锁和制裁,从而进一步打破其在国际上的孤立的局面,对其综合国力的提升和中东大国影响力的扩大产生了积极的、卓有成效的推动作用。

第三,伊朗还在其他诸多领域的重大问题上凸现自己的独特作用。例如与海湾阿拉伯国家签订安全合作协议,寻求建立波斯湾地区安全机制;在中亚石油开采与外运的角逐中获得重要地位;大力打击毒品走私,切断阿富汗、巴基斯坦毒品运往欧洲的路线等。伊朗在中东重大问题上的外交政策与主张,意在突出其在本地区独特的、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在地区格局的分化与重组中立于不败之地。

2. 对伊朗追逐中东军事强国地位的影响

作为中东地区第三人口大国,伊朗拥有该地区数量最多的武装数量,达到 54.5 万人,其中陆军 35 万、海军 2 万,伊斯兰革命卫队 (IRGC) 12.5 万,空军 5 万人。^①其国防工业已具有生产导弹、潜艇、生物化学武器乃至核武器的能力,根据美国国防部的评估,“波斯铁骑”的实力在全球可排进前十位。^②

2003 年伊拉克战争后,伊朗取代伊拉克成为中东地区首屈一指的军事大国,但是其追逐成为中东军事强国的步伐被伊美间的紧张关系所拖累。具体负面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美国对伊朗实行武器禁运的影响。自 1979 年美国及其盟国以伊朗输出原教旨主义和伊斯兰革命、支持恐怖主义活动、谋求发展核武器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对伊朗实行

① Seyed Hossein Mousavi, Defense Politics of the Islamic Iran (Iranian Quarterly), Spring 2001, Vol. 2, No 4 P

② 伊朗军队真实实力揭秘:《全球十强 当仁不让》,搜狐军事网 2006 年 04 月 03 日。

武器禁运，伊朗就基本上无法采购西方现代化的武器装备，更没有机会获得西方国家的先进军事技术。就伊朗国内自身的军事科研来看，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长期封锁制裁严重干扰了科研能力的正常发展，军事科研的创新能力有限，其军事科研水平与世界军事大国相比还是有相当差距的。所以，美伊交恶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伊朗向中东军事大国迈进的步伐。

第二，美国禁止伊朗发展核武器的影响。在中东地区建立军备控制机制，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特别是防止核武器的扩散是美国实现其中东战略和全球利益的保证。在美国看来，伊朗是支持恐怖主义“最活跃”的国家，一旦伊朗拥有核武器，将对地区稳定和全球防扩散机制构成严重挑战。因此，美国决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或完整的核燃料处理能力，即使民用核能力也不可以。所以，对于核发展计划，伊朗要么选择停止浓缩铀的一些相关活动，并以此为筹码向美国和欧盟争取更大的政治经济利益空间；要么选择继续发展核计划，实现成为核大国的目标，代价可能就是美国对伊朗进一步实施制裁、甚至对伊朗动武。

当然，伊美关系交恶也对伊朗谋求中东军事大国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具体表现为：

第一，促使伊朗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国防工业体系。面对美国对伊朗的军事封锁和遏制，加之两伊战争的经验教训，使得伊朗开始注重自己研究和开发武器和军事准备。军事装备基本自给成为伊朗防卫政策追求的目标之一，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伊朗已经实现了这一目标。伊朗目前自己能制造 50 多种不同类型的军事装备，包括坦克、加农炮以及导弹等，基本上能满足伊朗在一场可能的地区性冲突中 50%~70% 的需要，而且相

中国伊朗学论集

对稳定的生产能力能不断加强伊朗的军用供给。^①

第二，促使伊朗自主研发了以中远程导弹为代表的现代化武器。伊朗政府宣称，从 1992 年起，伊朗就开始自行研制坦克、导弹和战斗机等多种武器。经过多年经营，伊朗已拥有号称中东地区最强大的导弹库，除了人们已经熟悉的“流星”、“飞毛腿”和“征服者”等系列导弹，还包括在今年举行的“神圣先知”等几次军事演习中亮相的号称“世界领先”的新式武器：“胜利-3”隐形多弹头导弹、“世界上速度最快”的新型潜射导弹、“弥撒克”新型肩扛式地对空导弹、“考萨尔”中程地对舰导弹、“诺尔”超视距空对舰导弹、“超现代化水上飞机”、“闪电”轰炸机等等。虽然舆论普遍认为这些宣传可能存在夸张的成分，但由于中东国家很少能够自主研发武器，大多是靠进口，而伊朗可以自主研发武器，已经开始显示出伊朗中东军事强国的端倪。

第三，引发伊朗坚持开发核技术的决心。伊朗核能源开发活动开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当时得到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支持。1980 年美伊断交后，美国开始指责伊朗以“和平利用核能”为掩护秘密发展核武器，并对其采取“遏制”政策。伊拉克战争以后，面对美国咄咄逼人的攻势，伊朗又抛出了新的撒手锏——研发核技术。近期法国《世界报》一篇文章直接指出，“伊朗希望拥有核武器而成为地区领袖”。^②目前，伊朗核计划已经发展到关键阶段，即核燃料循环系统建设阶段。该系统建成后，便可为伊朗的核电站和研究机构提供燃料，同时也可以进一步提高浓缩铀的丰度，使伊朗能够获得武器级高浓缩

① Seyed Hossein Mousavi, Defense Politics of the Islamic Iran (Iranian Quarterly), Spring 2001, Vol. 2, No 4 PP

② ④② 弗朗索瓦·埃斯堡《解决伊朗危机的钥匙在北京》，刊法国《世界报》2005 年 9 月 2 日。

铀。根据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情报，伊朗目前已经迈进了核门槛，但还未能获得制造核武器所需的武器级浓缩铀或钚。面对美国的制裁威胁，日前伊朗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曾表示，“伊朗将以武力捍卫自己发展核技术的权利”^①。

3. 对伊朗坚持输出原教旨主义，谋求意识形态大国地位的影响

原教旨主义的目标就是通过武力手段夺取政权，通过将宗教政治化进而将政治宗教化，建立反西方化、反世俗化的神权政体。伊朗被西方国家认为是世界各国原教旨主义组织的大本营，据称有 19 个在世界各地活动的原教旨主义组织受伊朗间接或直接的资助^②。目前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中东的活动越演越烈，以伊朗为中心，从中亚经伊朗至阿拉伯再到北非已经形成一条呈弧形的“原教旨主义动荡带”，并辐射整个中东地区。^③

伊朗支持原教旨主义有得也有失：一方面由于支持原教旨主义势力，扩大了伊朗在中东乃至整个世界政治中的影响，另一方面，原教旨主义往往又跟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由此引起有关国家的矛盾，限制和削弱了它作为地区大国的形象和作用。美国严重关注伊朗继续支持恐怖主义和资助暴力活动影响中东和平进程，尽管确信伊朗反对恐怖主义，但我们看到的是伊朗继续给予伊斯兰圣战组织、哈马斯等恐怖主义组织提供军事、资金、训练和安全避风港等事实，这也是为什么伊朗的邻国仍然保持担忧的原因。^④埃及对原教旨主义恐怖分子进行了

① 一扬 《伊朗将以武力捍卫核计划》，载《中国国防报》2006 年 8 月 29 日第 1 版。

② 陈德照 《海湾战争后中东战略格局的变化》，刊《西亚非洲》1994 年第 6 期。

③ 刘靖华 《冷战后的中东——战略格局变化与前景分析》，刊《西亚非洲》1993 年第 4 期。

④ Bruce O. Riedel, Preventing the Spread of Danger Foreign Policy Agenda, September 1999.

中国伊朗学 论 集

大规模的搜捕活动，阿尔及利亚取缔了阿伊斯兰拯救阵线的基层组织和数百个包括慈善机构在内的外围组织，突尼斯呼吁阿拉伯国家通力合作打击恐怖主义活动和势力等。特别是“9·11”事件后，伊朗更是被美国划为三个“邪恶轴心”国家之一，使得伊朗在国际社会中处处受限。美英等西方国家也一直在怀疑伊朗与巴以冲突中的多起自杀性爆炸案有关，强烈要求伊朗停止支持巴勒斯坦的激进组织。以色列方面还不停地谴责伊朗和叙利亚支持黎巴嫩真主党，该组织对以色列北部边界开展了一连串的攻击行动。由此，伊朗也陷入了一个两难境地：伊朗努力想要发挥一个地区大国的作用，希望改善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另一方面伊朗周边国家却又要求伊朗停止支持原教旨主义活动作为恢复关系的前提。

由于伊朗坚持大力输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这与美国所推崇的在全球范围极力推行的服务于美国全球战略目标美国式的自由和民主观念是格格不入的。而且，西方世界普遍认为，由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目标是通过武力夺取政权，通过讲宗教政治化，建立反西方、反世俗化的神权政体，因此，西方利益将受到以伊朗为中心的中东原教旨主义的打击。所以，由于支持原教旨主义势力，伊朗虽然扩大了他在中东乃至世界政治中的影响，却引起了其他意识形态社会的警惕和敌对态度，这无疑限制和削弱了它作为地区大国的形象和作用。近些年来，伊朗一直在不断采取多方面的措施发展经济，其中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完善长时期的经济，为输出伊斯兰革命创造条件。伊朗在这一问题上还要谨慎处理，以避免负面影响的扩大，为伊朗未来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进一步巩固已经取得的重大成果，提升其中东大国的影响力。

论当代日本伊朗非对称性依赖的关系

蔺焕萍 唐莉霞^①

1929年，日本在伊朗首都德黑兰设立公使馆，日本与伊朗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到二战前夕，两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二战后，在日本与中东国家的交往史上不难发现，日本与伊朗的关系颇为独特，两国在政治上、经济上一直存在着广泛的交流与合作，特别是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日本更是采取了一种不同于美欧的方式对待伊朗，日伊关系向着对彼此有利的方向朝纵深迈进。当代日伊交好的深层原因何在？两国关系发展的前景如何？遗憾的是当前学术界还未有人对这些问题作出一个较系统的阐释，本文拟就上述问题提出一点拙见。

一、以能源贸易为基石的日伊关系

1979年，霍梅尼领导伊朗人民推翻了亲美的巴列维王朝的腐败统治，并开始对外输出伊斯兰革命，但也正因如此，伊朗被一次次抛到国际政治的边缘：周边国家的恐慌，美国的仇视和敌对，欧盟也一度追随美国对其实行制裁禁运。而日本对于伊朗则采取了不完全与西方盟国的政策。近年来随着伊朗内外

^① 蔺焕萍（女），系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硕士；唐莉霞（女），系新疆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师。

中国伊朗学论集

环境的变化以及伊朗采取更为务实的外交政策调整对外关系，日本更是审时度势，抓住有利时机，双方关系进一步发展。

（一）政府外交层次提高

20 世纪 90 年代初，伊朗开始调整对外政策，当美欧仍陷于对伊斯兰潮的恐惧之中时，日本已经敞开国门笑迎伊朗客人：1990 年 7 月 4 日，伊朗大使到日本，与日本前外相进行亲切会谈；1998 年伊朗外交部长哈拉齐 (Kharrazi) 和日本外相在东京举行旨在加强双边合作的会晤；2000 年 11 月 31 日，哈塔米作为伊朗国家元首 42 年来首次访日，与日首相签署了“21 世纪伊日合作声明”，伊允诺给日本开发阿扎德甘油田的优先谈判权，支持日本以合作伙伴方式加入阿瓦士—巴格斯坦油田和南法尔斯气田的开发，日本同意从 2001 年起连续 3 年向伊朗提供 30 亿美元的能源开发资金和 5.5 亿美元的项目保险金，这标志着日伊关系进入新时代；2003 年 3 月 15 日，伊朗国家安全最高委员会秘书哈桑·鲁哈尼访问日本。2003 年 8 月 28 日，伊外长哈拉齐与日本首相小泉就双边关系、地区局势、伊拉克和阿富汗问题举行协商和谈判。而日本方面于 1993 年 5 月，政府决定恢复曾经停止 17 年的对伊日元贷款。当年，日本便向伊朗提供了 380 亿日元贷款以帮助建设水库。2003 年 12 月 1 日日本首相特使访问德黑兰。此外，日本政府还积极推动与伊朗的全方位宽领域合作。

（二）民间外交多种多样

经济交往始终是联结两国的纽带，贸易则起着催化剂的作用。日伊民间外交的表现首先是经济往来。现今有 25 家日本公司在伊朗的各个经济领域投资，从事经济活动。2001 年 6 月，日本几家石油公司联合体同英荷壳牌公司达成协议，共同投资世界上最大的阿扎德甘油田，该油田已探明石油储量达

260 亿桶。根据双方协议，对伊朗总投资达 82 亿美元，日方投资占 2/3，这是迄今为止日本对伊朗的最大投资。2003 年两国的贸易额达 80 亿美元，伊朗作为日本第二大原油保障国，伊朗对日本的石油出口达 70 亿美元。其次是伊朗在日本的劳工。据日本法务省调查，截至 1995 年 12 月，在日本登记的伊朗人有 8654 人，而过期滞留者中伊朗人有 14638 人，他们在日本各行业从事劳务，形成了日本外来劳务人口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第三是文化交流。2003 年 10 月 8 日，“伊斯兰世界与日本文明间对话”在东京召开，来自伊朗、沙特、埃及、阿曼、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学者与 15 名日本学者参加会议，日本东京大学教授研究伊斯兰教的著名学者山内冒之为会议主席。日本前外相，此次文明间对话会议的发起者河野洋平认为，不理解伊斯兰教就不可能理解世界。

二、日伊交好原因的多角度分析

日本和伊朗的关系呈现出的这种良性关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历史因素是日伊交好的基础

伊朗的近代史是一部为外国奴役侵略的屈辱史。1800 年以前的伊朗是个领土完整主权独立的中东大国。然而，随着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向外扩张，伊朗国门被迫打开，受到以英、俄为代表的列强的掠夺和压迫，他们掠夺伊朗的财富，控制它的经济，干涉其内政外交，丧失主权的伊朗面临亡国危机，广大伊朗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帝国主义把伊朗一步步地推向了殖民地的深渊，人民对列强有着强烈的民族仇恨，他们不断以各种形式反抗侵略，保卫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保存民族精神。同时，伊朗形成敏感性自尊型的民族情感，即：伊朗对伤



中国伊朗学论集

害过自己的国家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对没有伤害过自己的国家则容易交往。

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迅速崛起并很快走上侵略扩张的道路，但由于实力不济以及日本主要致力于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把侵略的魔掌首先伸向中国、朝鲜和其他东南亚国家，还无暇顾及中东，并且日本的侵略受到中国等国的有力牵制，所以在事实上日本并未作出什么伤害伊朗民族感情的事。而二战后日本标榜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并将其写进宪法。这点颇能迷惑诸如伊朗等对日本没有什么戒心的国家。于是二战后，战前已建立的伊日关系迅速恢复起来，并在美日同盟的背景下不断发展。

（二）美国因素是日伊交好的外因

战后美国凭借其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取英国而代之，插手伊朗事务。由于苏联支持伊朗人民党，以期将伊朗引入社会主义轨道，引起国王巴列维的恐慌，而美国通过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等方式使巴列维完全投入美国的怀抱。同时，苏联因视伊朗为其南下战略的重要突破口和打开海湾地区大门的钥匙而从未放弃过对伊朗的关注。日本基于美日同盟，在这种冷战格局下总是坚定地追随美国。受这种“一主二仆”格局的影响，日本和伊朗的关系有着一个良好的背景。再加之日本和伊朗在地理位置上较其他中东国家为近，因此，双方的经济关系大大发展。在巴列维国王时期，伊朗是日本在中东地区主要出口贸易对象国，以1975年为例，伊朗占日本对中东地区各国的出口贸易总额的28.7%^①。1976年8月，日本与伊朗签订日元贷款协定，用以建设波斯湾石油化学工业基地。这个名为

① 李凡著《战后日本对中东政策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9页。

“伊朗日本石油化学”的项目计划年产 30 万吨乙烯，需用资金 5500 亿日元，其中日方负担 3000 亿日元，日本方面由三井集团出资，伊朗方面是国营石油化学公司，这是日本在中东地区当时建立的最大的合资企业。^①此外，日本还在伊朗首都德黑兰设置了文化交流中心，这是日本在中东设置的两个文化交流中心之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在广大阿拉伯国家因日本名为中立实为追随美国的政策而纷纷削减对日石油供应的情况下，日本被迫采取“亲阿拉伯”政策，但同时日本答应向伊朗提供 10 亿美元贷款，占日本答应向中东国家贷款的三分之一。^②此举获得了伊朗的好感。日本高官频频出访伊朗等中东国家。1974 年 1 月中曾根通产相访问伊朗，1976 年 1 月通产相河本敏夫访问伊朗，1977 年 9 月石原环境厅长访问伊朗，1978 年 1 月园田直外相访问伊朗，1978 年 9 月福田赳夫首相出访伊朗。这是有史以来现任日本首相首次访问伊朗等中东各国。伊朗是日本在中东地区的第二大石油进口国，1978 年日本进口石油总额的 12.9% 来自伊朗^③。当时，在伊朗境内的日本专家就有 1000 人之多。在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前日本在中东地区关系最好的一直是伊朗。

1979 年霍梅尼领导伊朗人民推翻媚外腐败的巴列维王朝，使美国大为震惊，而发生于 1979 年 11 月的人质事件更使美伊关系急剧恶化，美国要求日欧等国一道对伊朗实施制裁。日本出于其经济利益等方面的考虑本不愿在这个事件上得罪伊朗，但迫于美方压力不得不把政治天平倾向于美国。两伊朗战争期

① 李凡著《战后日本对中东政策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71 页，后来爆发的伊朗伊斯兰革命使该项建设工程被迫长期停顿，日本三井集团每天要负担 1 亿日元的贷款利息。

② 李凡著《战后日本对中东政策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56 页。

③ 李凡著《战后日本对中东政策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09 页。

中国伊朗学论集

间日本仍面临着这种两难境地。但由于日本对伊朗的制裁不同于欧美的强硬手段而要温和得多，所以日伊的良好关系在实质上并未有所损伤。

(三) 日本是伊朗摆脱外交孤立谋求经贸利益的突破口

如果说在巴列维王朝时期，伊朗和日本交好的原因主要是美国因素存在的话，那么在霍梅尼时代，日本却是伊朗愿意或是不不得不交往的对象。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霍梅尼倡导“不要东方也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战略方针，同时输出伊斯兰革命。这个方针的实质实际上是反对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反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和霸权主义。两伊战争爆发，除叙利亚外，其他海湾国家因对伊朗输出革命的恐惧，都支持伊拉克对伊朗作战；而以美国为首的欧洲国家对两伊实行制裁和禁运。同时，霍梅尼把苏联也看作是“与美欧相同的“恶魔”，是伊朗北部的最大威胁，也由于苏联共产主义无神论与伊朗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格格不入，因此，伊朗也拒绝与苏联交往。但也正因为如此，伊朗陷入了政治经济双重孤立的境地。日本却以它独特的身份在伊朗的“两不要”政策中如鱼得水，日本并未因双方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差异以及伊美交恶而不与伊朗发展关系，同时日本这个位于东方的西方化国家，在伊朗这个民族情结十分严重的国家眼中，在与伊朗交往的过程中，以一种既非“东方”又非“西方”的身份出现，即日本帝国主义在历史上并未伤害过伊朗人民，在现实中并没有霸权主义的恶劣行径，又因为在两伊战争中，日本积极在双方展开斡旋，所以日本在此时以不同于他国的策略的灵活性与方式的独立性博得了倍感孤立的伊朗的好感。双方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也进一步扩大，在这种“非常时期”，日伊双方的高层都实现了互访。如1983年6月和1984年8月伊朗鲁迪比利副外

长访日，1985年7月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拉夫桑贾尼访问日本。1983年8月，安倍外相访问伊朗，1984年1月，中岛外务审议官访伊，日本外务省中近东非洲局局长波多野访问伊朗。1984年，日本占伊朗进口总额的17.5%，1986年日本占伊朗进口总额的17.3%，1989年日本占伊朗进口总额的10.5%，1991年日本占伊朗进口总额的16.1%，日本是仅次于联邦德国的伊朗第二大进口国。

经过14年的国内革命和8年的两伊战争后伊朗已是遍体鳞伤、精疲力尽，这个一向自我封闭的国家也随着苏联的解体，冷战的结束，霍梅尼的去世以及具有革新思想的拉夫桑贾尼、哈塔米的先后执政，在全球化的冲击下发生变化。今天，伊朗的对外政策中实用主义取代伊斯兰理想主义，伊朗更加明智地与西方国家交往。而日本在伊朗的外交政策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伊朗需要日本为伊朗和其他西方国家交往起一个中介作用，尤其需要日本在美伊关系的改善中起桥梁作用。早在1990年7月4日伊朗大使到日访问，与日本前外相会谈时就希望日本帮助伊朗改善与美国的关系，另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日本在伊美关系中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伊朗对日本的需要还体现在经济方面。目前，日本是伊朗的最大出口对象国，1992年日本占伊朗出口总额的12.7%，1993年占12.3%，1994年占14.4%，1995年占13.8%，1996年日本占伊朗出口总额的13.5%，1998年达15.7%，1999年达16.5%，2000年这一数值更达17.7%，远高于其他各国。近年来由于伊朗对外开放的步伐加快，进口对象多元化，日本对伊市场的占有率有所下降，1997年日本占伊朗进口总额的6.5%，仍居于第三位。

现在伊朗政府越发意识到单一地依靠石油经济并不能够带

中国伊朗学 论 集

动整个国家经济持续快速稳定的增长，反倒使经济发展缺乏后劲，而且还造成了对发达国家的严重依赖，况且由于各发达国家争相研发各种石油替代产品以及里海大型油田的发现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某些国家对中东石油的依赖，加之现今国际油价动荡，伊朗深受影响，仅 1998 年上半年的石油收入就减少了 30 亿美元。伊朗经济的困难还表现在其持续居高的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上。

伊朗必须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但其经济基础却十分薄弱，结构性弊病严重。从其三大产业来看：第一产业结构不合理，生产力低下，至今伊朗粮食都不能实现自给，每年仍需进口 30% 的食品；第二产业中，石油虽是其经济收入的支柱但关联作用弱，石油下游产品科技含量低，出口创汇能力弱；伊朗的第三产业也并不完善，更谈不上发达。此外，伊朗的技术由于遭遇美国制裁升级而直接影响了其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和产业升级换代。1991~1992 年度伊朗的人口达 5820 万，其中 15 岁以下的人口占 46%，文盲率达 25%。1991~1992 年度 1200 万学龄青年中，有 180 万人不能入学，90 万申请者中只有 15 万可以进入大学，人力资源未得到充分开发。

因此，伊朗不仅在政治上需要日本，而且在经济上也需要日本，伊朗需要日本雄厚的资金、先进的技术和科学的管理经验。众所周知，日本的重化工业技术一直处于世界领先水平，这对伊朗发展石油下游产品有着良好的示范作用。日本近年来国内经济呈现颓势，国内有相当一部分资金急于寻求海外投资。而伊朗国内需要日本的资金注入。另外，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伊朗急需高科技人才，但由于伊朗自身的弱势，这些问题的解决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鉴于日本和伊朗的良好关系，伊朗能相对容易地从日本获取本国经济发展所需的各项要素。

④ 能源利益和经贸利益是日本交好伊朗的根本原因

毋庸置疑，伊朗对日本的巨大吸引力主要在于伊朗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日本是个经济大国却是个资源小国，能源自给率极低，而许多以石油为主要原料和动力的电力、石油化工、机动车辆等工业是日本的支柱产业，同时，日本还是世界上液化天然气的最大进口国。尽管日本一直致力于调整其产业结构，减少对进口能源的依赖而发展替代产品，但进口仍是日本获取能源的主要方式。截止 2002 年 2 月，伊朗已探明石油储量为 1000 亿桶，占世界储量的 10%，居世界第五位。天然气储量为 26 万亿立方米，约占世界总储量的 16%，居世界第二位。这无疑对竭力谋求能源稳定供应的日本来说是极大的诱惑。而日本也抓住日伊友好的良机，将伊朗变成了它较稳定的石油供应地，日本每年进口的 12470 万桶石油中有 14% 都是从伊朗进口的，而且日本也需要借助于伊朗处于波斯湾入口这个重要位置保证从他国进口石油的航道畅通，因此从能源安全这个层面上看伊朗对于日本是不可或缺的。

其次，日本需要伊朗广阔的国内市场。早在 1973 年，日本对伊朗的出口额达 1315.48 亿日元，占日本对中东各国出口额的 25.9%，1974 年对伊朗的出口额达 2968.95 亿日元，占日本对中东各国出口额的 25.4%，1975 年对伊朗的出口额达 5497.24 亿日元，占日本对中东各国出口额的 28.7%。根据 2006 年 11 月 23 日的《文汇报》驻德黑兰记者张晓春报道伊朗人口已达 7000 万（外国学者早年估计到 2006 年年底伊朗人口可能超过 1 亿人），如此庞大的消费者对于日本来说，意味着巨大的购买力。此外，伊朗为了更好地吸引外资和调整经济结构，采取了在国内开辟“经济特区”和“经济自由区”的做法。从 1993 年至今伊朗已经开辟了 14 个“经济特区”和“3

中国伊朗学 论集

个经济自由区”。如，在这些地区投资的外商可享受5年的免税；国家对前来投资的外商担保，外商出入自由区无须签证，自由区内的企业享有商品进出口的充分自由——不仅原材料和商品可以从自由区随便进口，而且生产出的商品还可进入伊朗内地市场销售，并免收关税，甚至可以在这些区域内开办外国银行并自由换汇。总之，伊朗正为吸引外资营造一个全方位、多角度、宽领域的环境。这对在伊朗有事业基础的日本十分有利，日本可以进一步将国内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伊朗，一方面利用伊朗众多的廉价劳动力，一方面输出本国劳务；既进一步占领了伊朗的各级市场，又优化了本国产业结构；既节约了对外投资的成本，又缓解了本国的就业压力；既赢得了伊朗政府的好感，又能获得巨额财富，可谓名利双收。日本肯定会抢在其他西方国家前面，开拓伊朗这个巨大市场，并促成两国经济关系的升级。

再次，在日本看来，伊朗是一个对海湾地区局势拥有巨大影响力的国家。伊朗位于中东心脏地带，随着伊朗与周边国家关系的缓和，伊朗再次发挥了“欧亚陆桥”和“东西空中走廊”的作用，日本需要以伊朗为根据地，使之成为同周边国家更便捷的经济往来的集散地。第二，在争夺中亚能源的斗争中，伊朗的作用与地位将是决定性的；另外，由于在里海发现了蕴藏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而伊朗是运送这些油气的最佳途径。对于视油气为血液的日本来说，需要同伊朗保持并发展关系。而从政治上来看，日本的综合国力居世界第二，但日本在经济上是大国，政治上的作用和影响力却远不如其经济实力，日本竭力谋求政治地位与经济地位的平衡，谋求政治大国的地位。美欧势力影响遍及全球，但唯有中东却是日本能向美欧政治影响发起攻势的最有利的地区，而中东的注意力在海湾八

国，其焦点又是海湾三强——沙特阿拉伯、伊朗、伊拉克。相比之下，伊朗从其领土、人口、石油和战略地位等方面看，它在海湾地区的综合影响力首屈一指。因此，对日本而言则有基础和有望将伊朗作为它推出新的国际战略或是向美国独揽地区事务挑战的突破口。事实上，在 1995 年，克林顿政府加大对伊朗的制裁力度时，日本就不惜与美国唱反调，这里既有经济原因，还包含着深层次的政治原因。

三、日伊关系的特点与发展趋势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出伊朗这个独特的发展中国家与日本这个发达国家由于经济上的互补性，政治上的相互需要，文化上的相互交流而发展了较为密切的关系，但是伊朗对日本的依赖程度明显大于日本对伊朗的依赖，这种相互依赖属于非对称性的。这主要是由于双方实力对比、对外贸易结构和国际地位差异而造成的，日本在伊朗的外交中居于一个较重要的地位也是缘于此，而伊朗在日本的外交中不占首要地位，日本更看重美国、欧盟、中国、东南亚等国，但在中东地区，伊朗却是日本能源安全的保障、经贸往来的大市场和大国政治梦的起点。

同时，我们看到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等因素仍是日伊关系进一步发展的障碍，而且，尽管日本对伊朗的政策表现出很大的独立性，但“美国因素”仍在日伊关系中起一种阻碍作用，例如，在对待伊朗核问题上，日本有时追随美国的立场；2003 年 7 月，日本迫于美国的压力不得不放弃有着丰厚利润的高达 20 亿美元的开发伊朗阿扎德甘油田的合同。这使得日本与伊朗的交往步子有所放慢。伊朗对日本在发展与合作关系的过程中受美国政策影响的做法多次提出批评。伊朗认为只要双方本着真诚和不受制于他国的意愿独立行事，两国



中国伊朗学论集

就可以加强经贸领域的互惠互利合作关系。

日伊两国在经济和政治关系上既有互补性和依赖性，同时也存在着可替代性，但在目前的国际格局下两方都本着从国家利益出发，从现实主义出发，从双方相互需要出发，两国关系在宏观上是良好的。两国的经贸利益和两国所持的实现世界无威胁目标的共同立场是日伊发展全面关系的原则和基石。随着伊朗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相信两国关系会保持并不断得到加强。

参考文献

- [1] Shireen T. *Iran After Khomein* (M) i,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Inc, 1992.
- [2]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网站。
- [3] 日本的清真寺，刊《编译参考》1997年第2期。
- [4] 李凡著《战后日本对中东政策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 [5] 日本中东经济研究所编《石油和世界危机》，每日新闻社，1979年版。
- [6] Ali Rahnama and *The Secular Miracles* azendi Books Ltd, 1990, 人质危机：外交政策服务于国内政治的权宜之计。
- [7] Anoushirav *After Khomeini's Islamic Republic*, Routledge, 1995.
- [8] Country Profile Iran 1998-1999, The Economist Street, London SW14 4LR United Kingdom.
- [9] 中国外交部网站：伊朗国家概况。
- [10] 世界经济文化年鉴编委会编《世界经济文化年鉴1998~1999》，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 [11] Jahangir *Iran's Economy under the Islamic Republic* (M), I.B. Tauris & Co Ltd Publishers, 1993.
- [12] <http://www.irib.ir/worldservice/Chinese/sh>

中国伊朗学研究论著索引 (1911~2007年)

李 颖 蔡奕文 胡 婷 金 杰 整理^①

一、波斯语教学与研究论著索引

(一) 著作类

1. 张谦著《实用波华词典》，清真出版社1938年版。
2. 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波斯语教研室编《波斯语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1990997年版。
3. 李湘哈米提著《基础波斯语》，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
4. 李湘著《波斯语基础教程》（两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5. 曾延生主编《汉语波斯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6. 胡振华胡军编《回回馆译语》，中央民族大学东干学研究所2003年内部印本。
7. 曾延生编《波斯语汉语谚语·汉语波斯语成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二) 论文类

1. 林则飞《中世纪阿拉伯语与波斯语的相互影响和融合》，刊《阿拉伯世界研究》1990年第2期。
2. 苗焕德《议维吾尔语中的阿拉伯、波斯语借词》，刊《西北民族研究》1993年第1期。
3. 刘曙雄《谈波斯诗歌对乌尔都语古典诗歌创作的负面影响》，刊

^① 整理者分别是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2003006级硕士研究生。

中国伊朗学论丛

《南亚研究》1993年第4期。

4. 1970年以来吐鲁番波斯语文书的研究[J]《敦煌学辑刊》1994年第2期。

5. 张安生同心回民话中的阿拉伯语波斯语借词, 刊《回族研究》1994年第1期。

6. 李树俨吴忠回民使用的阿拉伯语波斯语借词, 刊《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95年第2期。

7. 阿拉伯语波斯语专业与穆斯林大学生, 刊《西北民族研究》1997年第2期。

8. 方龄贵元明戏曲中的波斯阿拉伯语, 刊《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3期。

9. 黄时鉴波斯语在元代中国, 刊《敦煌资料》1998年版。

10. 丁克毅波斯语苏非经典及其对中国穆斯林的影响, 刊《回族研究》1999年第4期。

11. 杨怀中波斯照明学派对十七世纪中国伊斯兰汉文著述的影响, 刊《回族研究》1999年第4期。

12. 艾赛提来曼《波斯文学与维吾尔文学交流史断想》, 刊《民族文学研究》2001年第3期。

13. 刘迎胜回语语言800年发展史简要回顾——从波斯语到“回族汉语”, 刊《文化研究》2003年第4期。

14. 马利章试析云南回族穆斯林语言中的波斯语词汇, 刊《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3期。

15. 王新青回语 tngri 与 qanqan 语源考谈波斯语对回鹘语之影响, 收《丝绸之路民族古文字与文化学术讨论会会议论文集》2005年版。

16. 丁克毅波斯语教学及经典在中国伊斯兰文化史上的地位及影响, 刊《回族研究》1999年第2期。

二、伊朗文学研究论著索引

(一) 论著类

1. 郭沫若著波斯诗人莪默伽亚谟, 上海泰东图书局1927年版。
2. 于凤瑞, 白月桥编希腊人大败波斯军, 河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3. 潘麟编 郁金香集: 古代波斯诗选, 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4. 潘茂著《波斯诗圣菲尔多西》，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
5. 王履辉著《情满波斯湾》，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6. 潘癸著《波斯诗圣菲尔多西》，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
7. 何乃英编《伊朗古今名诗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8. 张鸿年著《波斯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9. 何乃英，陶德臻编选《伊朗文学论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0. 张鸿年选《国学名著丛书编辑委员会编《波斯古代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
11. 薛克翘等主编《东方神话传说（第一卷：希伯来、波斯伊朗神话传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2. 魏庆征编《古代伊朗神话》，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13. 徐蔚立波著《波斯之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4. 孟昭毅著《塞驿花：阿拉伯波斯作家与中国文化》，宁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5. 张鸿年著《波斯文学史》，北京：昆仑出版社2003年版。
16. 穆宏燕著《凤凰再生：伊朗现代新诗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二) 译著类

1. 莪默伽亚谟著，郭沫若译《鲁拜集》，上海创造社出版部1927年版。
2. 章铁民译《波斯故事》，上海北新书局1928年版。
3. 章铁民译《波斯传说》，上海亚东图书馆1929年版。
4. 莪默伽亚谟著，郭沫若译《鲁拜集》，上海光华书局1930年3月33年版。
5. 章铁民译《波斯传说》，亚东图书馆1929年32年版。
6. 清野译《波斯民间趣事集》，儿童书局1930年32年版。
7. 默伽亚谟著，郭沫若译《鲁拜集》，大光书局1936年版。
8. 达年译《伊朗童话集》，中华书局1936年版。
9. 郑杰译《伊朗童话》，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
10. 萨地著，王静斋译《蔷薇园》，清真书报社1947年版。
11. 郑杰译《伊朗童话》，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
12. 拉胡蒂著，北京大学东方语言系波斯语专业学生集体译《伊朗人民的呼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中国伊朗学论集

13. 鲁达基著, 潘庆译 《鲁达基诗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年版。
14. 莪默伽亚谟著, 郭沫若译《鲁拜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1978 年版。
15. 鲁米著, 宋兆麟译《鲁米诗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年版。
16. 萨迪著, 水建馥译《蔷薇园》,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年 9 月 59 年版。
17. 赫达雅特等著, 潘庆等译 《波斯短篇小说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年版。
18. 姆·比扎利, 胡·扎姆什吉 (合著), 沈立中译 《异母兄弟》, 中国戏剧出版社 1959 年版。
19. 文远编译《玫瑰城堡: 波斯民间故事》, 香港中华书局 1959 年版。
20. 文远编译《巴哈的法官: 波斯民间故事》, 香港中华书局 1959 年版。
21. 文远编译《狮子兽: 波斯童话集》, 香港中华书局 1959 年版。
22. 《阿富汗》巴赫塔尼等著, 董望译《阿富汗伊朗和平战士诗选》,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59 年版。
23. 赫达雅特著, 潘庆译 《赫达雅特小说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 年 8 月 81 年版。
24. 穆罕默德·巴哈尔著, 邢秉顺译 《朝霞的信使》, 作家出版社 1965 年版。
25. 穆罕默德·巴列维著, 元文琪译 《我对祖国的职责》, 商务印书馆 1977 年版。
26. 志费尼著, 何高济译《世界征服者史 (两卷集)》,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27. 费雷兹·韦达著, 周仲贤译 《伊朗国王倒台始末记》,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28. 莫赫塔巴·布西编, 何根惠译 《起义的牛角—波斯民间故事》, 重庆出版社 1982 年版。
29. 阿布杜尔礼·尚格·马赫德维著, 元文琪译 《伊朗外交四百五十年》, 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
30. 哈穆德·拉玛扎尼编 《伊朗阿凡提的故事》, 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2 年版。

31. 潘牾译《仇亭宫：古代波斯故事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
32. 拉施特著，余大钧、建奇译《史集（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33. 阿什拉斐列维著，许博译《伊朗公主回忆录》，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
34. 扎赫拉拉里著，张鸿年译《波斯文学故事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35. 饶毅译《波斯民间故事12篇》江西少年儿童出版社1985年版。
36. 拉施特著，余大钧、建奇译《史集（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37. 饶毅译《少女的奇遇—波斯民间故事选》34篇》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38. 拉施特著，余大钧、建奇译《史集（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39. 穆罕默德·巴列维著，刘津坤、黄晓健译《对历史的回答》，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6年版。
40. 奥斯马诺夫编：饶毅译《少女的奇遇：波斯民间故事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41. 沈春、钟友文译《伊朗笑林》，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
42. 阿瓦克巴尔著，张至善、张铁伟、岳家明译《中国纪行》，三联书店1988年版。
43. 张晖译《波斯古代抒情诗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
44. 昂苏鄂阿里著，张晖译《卡布斯教诲录》，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45. 裴建涌著，柏丽译《怒涛译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46. 哈亚姆等著，张晖译《苏菲的恋歌—波斯柔巴依集》，漓江出版社1991年版。
47. 欧姆海亚姆著，张鸿年译《波斯哲理诗》，北京文津出版社1991年版。
48. 菲尔多西著，张鸿年译《列王纪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
49. 伊本·达兹比赫著，宋岷译《德里邦国志》，中华书局1991年版。
50. 埃赫桑尔沙泰尔著，元文琪译《波斯神话精选》，中国少年儿童

中国伊朗学论集

童出版社 1991 年版。

51. 元文琪译《波斯神话精选》，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1991 年版。
52. 萨迪著，张鸿年译《果园》，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0 年版。
53. 萨迪著，张鸿年译《蔷薇园》，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0 年版。
54. 菲尔多西著，张鸿年宋丕方译《列王纪全集》，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1 年版。
55. 鲁达基著，张晖译《鲁达基诗集》，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1 年版。
56. 海亚姆著，张鸿年译《鲁拜集》，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1 年版。
57. 哈菲兹著，邢秉顺译《哈菲兹抒情诗全集》，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1 年版。
58. 莫拉维（鲁米）著，穆宏燕译《莫拉维全集》，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2 年版。
59. 阿穆罕默德·萨贝基主编《伊朗当代文学》，华夏出版社，2003。
60. 内扎赫鲁兹依·撒马尔罕迪著，张鸿年译《四类英才》，商务印书馆 2005 年版。
61. 穆宏燕译《伊朗现代新诗精选》，北京华艺出版社 2005 年版。
62. 刘丽译《伊朗哲理寓言故事：克里莱和迪木乃》，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6 年版。
63. 法拉赫列维著；姜丽，彭修彬译《忠贞不渝的爱：我与伊朗国王巴列维的生活》，东方出版社 2006 年版。
64. 玛赞塔碧著，马爱农、左涛译《我在伊朗长大》（四卷），三联书店 2006 年版。

（三）论文类

1. O m a r K h a y y a n 著《鲁拜集》胡适译《新青年》1919 年第 6 卷第 4 号，尝试集，亚东图书馆 1922 年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年版。
2. 莪默伽亚谟著，郭沫若译《Rubaiyat, 之重译创造》1922 年第 1 卷第 3 期。
3. 闻一多著莪默伽亚谟之绝句，刊《创造》1923 年第 2 卷 1 号。
4. 莪默伽亚谟著，郭沫若译波斯诗人莪默伽亚谟（诗选），刊《小说月报》1923 年第 14 卷第 1 号。
5. 郭沫若著《鲁拜集》译者导言，上海泰东图书局 1924 年版。

6. 西谛著《中世纪的波斯诗人》，刊《一般》1926年第1卷10号、11号。
7. 郑振铎著《中世纪的波斯诗人》，收其《文学大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
8. 章铁民著《波斯故事》，上海北新书局1928年版。
9. 章铁民著《波斯传说》，上海亚东图书馆1929年版。
10. 费尔杜西著，伍实译《鲁德和曹亚克》，刊《文学》1934年第3号第5卷。
11. 伍实译《波斯诗人费尔杜西千年祭》，刊《文学》1934年第3卷5号。
12. 仲持著《伊朗的诗坛》，刊《文学》1935年第1卷5号。
13. 吴剑岚、王鑫甫著《哈亚姆“柔巴依”》，刊《西洋文学名著》之七，上海黎明书局1935年版。
14. 左若亚斯忒著，朱湘译《圣书》节译，收《番石榴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15. 阿剌漫著，朱湘译《茹拜迈忒选集》，《番石榴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16. 茹密著，朱湘译《一个美丽》，《番石榴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17. 萨第著，朱湘译《玫瑰园》（诗1首），《果园》（诗1首），《番石榴集》，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18. 哈菲士著，朱湘译《哈菲士》，《番石榴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19. 莪默伽亚谟著，郭沫若译《鲁拜诗》（101首），《郭沫若诗集》，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4年版。
20. 尼扎米著，林陵译《莱拉》（节选），《译文》1957年第8期。
21. 沙蒂著，兴华译《玫瑰园》（选译），《译文》1957年第8期。
22. 哈菲兹著，孙用译《歌集》（节选），《译文》1957年第8期。
23. 密努著，苗长春译《行政会议》，《波斯短篇小说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24. 赫达雅特著，潘梓译《哈吉老爷》，《波斯短篇小说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中国伊朗学论集

25. 赫达雅特著, 苗长春译《爱困者、无家之犬》, 《波斯短篇小说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26. 阿廖维著, 潘洪译《彗星、一个吉兰农民》, 《波斯短篇小说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27. 达里亚著, 潘洪译《骚动》, 《波斯短篇小说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28. 达里亚著, 卢永译《白鹿》, 《译文》1958年第9期。
29. 穆罕默德赫里雅尔著, 卢永译《沉思》, 《译文》1958年第9期。
30. 萨迪著, 水建馥译《蔷薇园》(选译), 《译文》1958年第9期。
31. 沙赫纳瓦兹拉米著, 卢永译《秋雨》, 《译文》1958年第9期。
32. 鲁达基著, 戈宝全译《鲁达基诗十章》, 《译文》1958年第10期。
33. 鲁达基著, 戈宝全译《鲁达基诗十章》, 《苏联塔吉克大诗人鲁达基诞辰一千一百周年纪念》, 中国作家协会, 北京图书馆, 北京市中苏友好协会1958年版。
34. 塔巴利著, 潘洪译《晴雨计》, 《波斯短篇小说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35. 奥密德著, 潘洪译《白色的地平线》, 《波斯短篇小说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36. 查瓦赫里著, 宋兆麟译《洪水》, 《世界文学》1960年第4期。
37. 潘洪著《后记》, 《赫达雅特短篇小说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
38. 穆赫一阿臻著, 闻苗译《剃刀的闪光》, 《世界文学》1962年7~8号。
39. 伊塞纳(阿维森纳)著, 北京大学哲学系译《论灵魂—论疗论》第6卷, 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40. 潘洪著《菲尔杜西和他的〈王书〉》(译者序), 《鲁斯塔姆与苏拉赫布》, 上海文艺出版社1964年版。
41. 菲尔杜西著, 潘洪译《鲁斯塔姆与苏赫拉布(王书节选)》, 上海文艺出版社1964年版, 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
42. 端木正译《伊朗宪法》, 《世界通史资料选辑》(近代史部分), 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

43. 崔连仲译《波斯教铭文》，《世界通史资料选辑》，商务印书馆 1974 年版。
44. 戈山著《亚述》，《外国名作家传》（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79 年版。
45. 王家瑛著《波斯诗人欧玛尔·海亚姆与四行诗的真伪》，《东方文学专集》（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79 年版。
46. 秦溪著《扎米》，《外国名作家传》（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79 年版。
47. 守仁著《菲兹》，《外国名作家传》（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79 年版。
48. 李育中著《鲁拜集》和《蔷薇园》，《随笔丛刊》第 3 辑，广东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
49. 戈山著《菲奈杜西》，《外国名作家传》（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79 年版。
50. 牟拉维著，张晖译《哲理故事诗》，《星星》1980 年第 2 期。
51. 杨宪益著《鲁拜集和唐代绝句》，《文汇报》1980 年第 2 期。
52. 宋生贵著《朴实的笔调，深刻的哲理——读《蔷薇园》中的九首哲理诗》，《文科教学》1980 年第 3 期。
53. 赫达雅特著：元文琪译《赫达雅特》，《亚非拉短篇小说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0 年版。
54. 索比依·莫达他编，刘寿康译《朋友和仇敌、乌鸦和狐狸》，《亚洲民间故事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 年版。
55. 葆荃著《达基》，《外国名作家传》（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0 年版。
56. 水建馥著《序言》，《蔷薇园》，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 年版。
57. 元文琪著《赫达雅特》，《外国名作家传》（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0 年版。
58. 张朝柯著《波斯诗歌对伊朗和世界的贡献》，《欣赏与评论》1981 年第 1~2 期。
59. 穆·贾茂扎德著，李玉琦译《熊姨的友谊》，《血谷》（西亚北非短篇小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

中国伊朗学论集

60. 塞义德非西著, 张鸿年译《昏礼》, 《血谷》(西亚北非短篇小说),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61. 穆贾奇著, 蒋樾初译《希林柯拉》, 《血谷》(西亚北非短篇小说),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62. 伯佐尔格拉维著, 元文琪译《骷髏之舞》, 《血谷》(西亚北非短篇小说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63. 欧加卜著, 李琼译《夜》, 《血谷》(西亚北非短篇小说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64. 邢秉顺译《前言》, 《哈菲兹抒情诗选》, 北京: 外国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65. 元文琪著《青春老翁》, 《外国文学作品提要》(第2册), 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
66. 蔡伟良著《棕色的夜莺 忠贞的歌声》, 《阿拉伯世界研究》1981年第04期。
67. 尼扎米著, 卢永译《雷雨与马杰农》(片断), 《外国文学》1982年第2期。
68. 萨杰赫达亚特著, 袁杰译《拉丽》, 《外国文学》1982年第2期。
69. 涅扎米著, 张晖译《抒情诗选》, 《春风译丛》1982年第2期。
70. 拉胡蒂著, 张晖译《画家和诗人、依靠自己的一双手》, 《春风译丛》1982年第2期。
71. 王志冲译《波斯趣闻6则》, 《山茶》1982年第2期。
72. 张晖译《伊朗语言故事二则》, 《译文选刊》1982年第2期。
73. 贾玛拉赫朗著, 张晖译《淌泪水的人》, 《译文选刊》1982年第2期。
74. 张鸿年著《波斯文学介绍》, 《外国文学》1982年第3、4期。
75. 纳杰埃勒拉希米著, 蓝汐译《献给我们幸福的未来》, 《外国小说》1982年第4期。
76. 刘桢著《追和〈蔷薇园〉》, 《书林》1982年第5期。
77. 海亚姆著, 胡毅译《鲁拜集》, 《英语世界》1982年第6期。
78. 哈穆罕默德·拉玛扎尼著, 元文琪译《伊朗阿凡提的故事》, 《光明日报》1982年6月6日。

79. 贾玛尔·萨迪吉著，元文琪译《伊朗现代小说一瞥》，《外国文学动态》1982年第12期。
80. 张鸿年著《波斯文学和中古波斯诗人词条》（3条），《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2年版。
81. 白君鹤著《中古波斯诗人词条》（4条），《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2年版。
82. 徐秉威著《中古波斯诗人和伊朗现代作家词条》（4条），《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2年版。
83. 邢秉顺著《伊朗古今诗人词条》（4条），《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2年版。
84. 张鸿年著《伊朗现代文学和作家词条》（7条），《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2年版。
85. 元文琪著《伊朗现代作家和诗人词条》（4条），《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2年版。
86. 张晖著《伊朗古今诗人作家词条》（5条），《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2年版。
87. 曾延生著《波斯古经〈阿维斯陀〉》，《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2年版。
88. 张晖著《鲁达基诗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89. 戴泉《译者前言》，《柔巴依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
90. 谷启珍著《萨迪的〈蔷薇园〉》，《外国文学名著欣赏》第2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91. 戈宝权著《伊朗的阿凡提——毛拉·纳斯尔丁的故事》，《伊朗阿凡提的故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2年版。
92. 潘庆著《译者序》，《九亭宫——古代波斯故事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
93. 徐秉威著《中古波斯诗人和伊朗现代作家词条》（4条），《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2年版。
94. 曾延生著《菲尔多西》，《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2年版。
95. 鸿年著《波斯文学介绍》，《国外文学》1982年02/03。

中国伊朗学论集

96. 张晖著：《塞拉与麦杰农：一部取材于阿拉伯民间故事的波斯文学名著》，《阿拉伯世界》1983年第1期。
97. 大力著：《萨迪的〈玫瑰园〉——纪念波斯大诗人诞生780周年》，《课外学习》1983年第2期。
98. 林之菲著：《人生旅途的探索——关于欧玛尔·海亚姆的〈鲁拜集〉》，《外国文学研究》1983年第3期。
99. 杨宪益著：《试论欧洲十四行诗及波斯诗人莪默伽延的鲁拜体与我国唐代诗歌的可能联系》，《文艺研究》1983年第4期。
100. 鲁达基著，戈宝全译：《鲁达基诗6首》，《郁金香集——波斯古典诗歌选》，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01. 鲁达基著，潘稼堂译：《鲁达基诗选》，《郁金香集——波斯古典诗歌选》，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02. 菲尔多西著，潘稼堂译：《鲁斯塔姆与苏赫拉布》（节选），《郁金香集——波斯古典诗歌选》，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03. 菲尔多西著，郭沫若译：《四行诗选》，《郁金香集——波斯古典诗歌选》，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04. 尼查米著，林陵译：《尼查米诗选》（节选），《郁金香集——波斯古代诗歌选》，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05. 鲁米著，宋兆麟译：《鲁米诗选》，《郁金香集——波斯古典诗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06. 萨迪著，水建馥译：《萨迪诗选》（节选），《郁金香集——波斯古典诗歌选》，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07. 贾米著，张许莘译：《贾米诗选》，《郁金香集——波斯古典诗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08. 哈菲兹著，孙用译：《哈菲兹诗选》，《郁金香集——波斯古典诗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09. 塞义德·纳尔加塞姆·安吉维·设拉子编，元文琪译：《蛇王》，《外国民间故事选》（2），春风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
110. 塞义德·纳尔加塞姆·安吉维·设拉子编，元文琪译：《秃子和法官》，《外国民间故事选》（2），春风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
111. 赵增泉译：《列克·贾姆希德的故事》，《外国民间故事选》

②), 春风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

112. 张钢, 张铁伟辑录、法官和大臣, 《外国民间故事选》②), 春风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

113. 忻俭忠, 宋东方整理, 《世界民间故事—伊朗篇》,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83年版。

114. 潘庆 绚丽多彩的波斯古典诗歌, 《郁金香集—波斯古典诗选》, 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15. 林亚光著主编域外文学, 《简明外国文学史》, 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

116. 张鸿年著古伊朗文学, 《外国文学简编》(亚非部分),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117. 张鸿年著现代伊朗文学, 《外国文学简编》(亚非部分),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118. 王家瑛著波斯古典文学奠基人鲁达基, 《中亚学刊》第1辑, 中华书局1983年版。

119. 林之森生旅程的探索——关于欧玛尔·海亚姆的《鲁拜集》, 《外国文学研究》1983年第3期。

120. 邹节成著《鲁拜集》的反宗教思想, 《吉安师专学报》1984年第1期。

121. 黎跃迅《探索·智慧·文采——评萨迪的《蔷薇园》》, 《岳阳师专学报》1984年第1~2期。

122. 黎跃迅《探索·智慧·文采——评萨迪的《蔷薇园》》, 《云梦学刊》1984年第1期。

123. 刘桢著波斯诗人萨迪和他的《蔷薇园》, 《中国穆斯林》1984年第4期。

124. 张会成著《蔷薇园》, 《外国文学》1984年第4期。

125. 哈穆德·拉马扎尼编, 元文琪译《毛拉·纳斯尔丁的故事》, 《外国机智人物故事选》, 重庆出版社1984年版。

126. 蒋玉明译《毛拉·纳斯尔丁的故事》, 《外国机智人物故事选》, 重庆出版社1984年版。

127. 塞义德·加塞姆·安吉维·设拉子编, 元文琪译《三王子与

中国伊朗学论集

大鹏鸟—伊朗民间故事，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

128. 张鸿年著者前言，《蔷薇与马杰农》，中国文艺联合出公司1984年版。

129. 刘登东著者的《蔷薇园》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外国文学》1984年。

130. 王家琪著者的抒情诗，《外国文学研究集刊》第8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131. 张鸿年著者前言，《波斯文学故事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32. 元文琪著者前言，《三王子和大鹏鸟——伊朗民间故事选》，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4年。

133. 元文琪著波斯文学，《外国文学函授教材》1985年第1期，中国外国文学函授中心。

134. 贾希斯特哈赫著，元文琪译《阿维斯塔》（节选），《外国文学作品选》，中国外国文学函授中心1985年第1期。

135. 邹节成著《拜集》的艺术特色，《吉安师专学报》1985年第2期。

136. 张鸿年著波斯诗坛上的真主——内扎米，《东方世界》1985年第2期。

137. 张效之著述不朽，蔷薇长青，《聊城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第2期。

138. 扎赫拉著，李琼译《九天宫的故事》，《丝路》1985年第2期。

139. 菲尔多西著，潘稼《鲁斯塔姆与苏赫拉布》（节选），《外国文学作品选》，中国外国文学编译中心1985年第3期。

140. 王家琪著世纪伊朗文学，《外国文学函授教材》1985年第3期，中国外国文学函授中心。

141. 萨迪著，水建馥著《蔷薇园》（节选），《外国文学作品选》，中国外国文学函授中心1985年第3期。

142. 哈菲兹著，元文琪译情诗4首，《外国文学作品选》，中国外国文学函授中心1985年第3期。

143. 阿赫默德著，高瑞英译《惜别》，《丝路》1985年第4期。
144. 张会成著《瑰传友谊——读伊朗大诗人萨地的〈真镜花园〉》，《宁夏艺术》1985年第4期。
145. 马鲁·科姆·汗著，元文琪译《朋友与大臣》（节选），《外国文学作品选》，中国外国文学函授中心1985年第5期。
146. 璩腊格依著，元文琪译《伊卜拉欣·拜格游记》（摘译），《外国文学作品选》，中国外国文学函授中心1985年第5期。
147. 阿齐克尔曼尼著，元文琪译《天国》（节选），《外国文学作品选》，中国外国文学函授中心1985年第5期。
148. 密尔扎著，元文琪译《伊斯兰教长的眼泪》，《外国文学作品选》，中国外国文学函授中心1985年第5期。
149. 塞巴哈尔著，元文琪译《达马万德峰》，《外国文学作品选》，中国外国文学函授中心1985年第5期。
150. 齐明山著《罗逸闻·死人桥》，《世界各国神话与传说》，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151. 陶德臻主编《波斯文学》，《东方文学简史》，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
152. 张效之主编《波斯文学》，《东方文学简编》，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
153. 王忠祥主编《波斯文学》，《外国文学教程》（下），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
154. 元文琪著《伊朗文学》，《外国文学函授教材》1985年第5期，中国外国文学函授中心。
155. 元文琪著《罗亚斯德如是说——阿维斯塔·伽萨》颂诗浅释，《外国文学研究集刊》第10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156. 王家琪著《扎米的社会观与文艺观》，《外国文学研究集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157. 赫达亚特著，高瑞英译《阿卡尔》，《外国文学》1986年第1~2期。
158. 元文琪著《波斯古经〈阿维斯塔〉》，《外国文学研究》1986年第1期。

中国伊朗学论集

159. 欧马维亚姆著, 张鸿年译《鲁拜诗选 79 首》《外国文学》1986 年第 3 期。

160. 萨迪著, 潘庆龄译《兀鹰》, 《东方文学作品选》(下),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161. 帕尔米著, 张鸿年译《孤儿的泪、窃贼与法官》, 《东方文学作品选》(下),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162. 穆睿清编《波斯文学》, 《亚非文学参考资料》,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 1986 年版。

163. 陈融著《道的赞歌·艺术的精华——简评萨迪的《蔷薇园》》, 《中文自修》1986 年第 5 期。

164. 穆睿清编《代伊朗文学》, 《亚非文学参考资料》,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 1986 年版。

165. 贾茂扎德著, 李玉琦译《黛娥的友谊》, 《东方文学作品选》(下),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166. 巴哈尔著, 张鸿年译《国满目疮痍》, 《东方文学作品选》(下),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167. 萨迪著, 张鸿年译《蔷薇园》(节选), 《东方文学作品选》(下) 1986 年版。

168. 内扎米著, 张鸿年译《期与西琳》(节选), 蕾丽与马杰农(节选), 《东方文学作品选》(下),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169. 欧马维亚姆著, 张鸿年译《四行诗选》(50 首), 《东方文学作品选》(下),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170. 菲尔多西著, 张鸿年译《书》(片断), 《东方文学作品选》(下),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171. 鲁达基著, 张鸿年译《书》, 《东方文学作品选》(下),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172. 贾利斯特哈赫著, 元文琪译《阿维斯塔》(节选), 《东方文学作品选》(下),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173. 霍兹法著, 元文琪译《怀扎里尔》(片段), 《东方文学作品选》(下), 中国外国文学函授中心 1986 年版。

174. 萨迪著, 水建馥译《蔷薇园》(节选), 《东方文学作品选》

(下),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175. 哈菲兹著, 张鸿年译《情诗 6 首》, 《东方文学作品选》

(下),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176. 帕尔图著, 高瑞英译《爱情的代价》, 《外国文学》1987 年第 9 期。

177. 张鸿年著《里波斯语文学兴起前的波斯文学》, 《简明东方文学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7

178. 张鸿年著《中古文学》, 《简明东方文学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

180. 张鸿年著《1905-1911 年的文学》, 《简明东方文学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

181. 元文琪著《阿维斯塔·亚什特》颂神诗, 《外国文学研究集刊》第 11 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年版。

182. 元文琪著《祥瑞·神权——波斯古经《扎姆亚德·亚什特》剖析》, 《外国文学评论》1987 年第 2 期。

183. 张鸿年著《同名的民族史诗——王书》, 《东方文化史话》, 黄山书社 1987 年版。

184. 王家瑛著《海亚姆四行诗》, 《中亚学刊》第 2 辑, 中华书局 1987 年版。

185. 张晖著《扎米诗选译者序言》,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186. 张鸿年著《杰出诗人内扎米及其爱情叙事长诗《蕾莉与马杰农》》, 《东方文学名著讲读》, 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187. 王伟力, 黄启贵著: 萨迪《蔷薇园》, 《东方文学 50 讲》,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188. 陈融著《不调谢的蔷薇——评萨迪的《蔷薇园》》, 《东方文学名著讲读》, 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189. 邢秉顺著《哈尔诗选译者前言》, 外国文学出版社 1987 年版。

190. 古莉娜著《李白与欧亚姆·海亚姆思想及生平》, 《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87 年第 2 期。

191. 王家瑛著《西东诗集》与波斯文学, 《外国文学研究集刊》1987 年第 11 辑。

中国伊朗学论集

192. 张鸿年《波斯文学与阿拉伯文学的关系初探》，《东方比较文学论文集》，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193. 张鸿年《波斯文学在中国》，《东方比较文学论文集》，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194. 郎樱著《霍斯罗与西林》到《帕尔哈德与西林》的演变看波斯与维吾尔的文化交流》，《东方比较文学论文集》，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195. 刘立天《波斯古典抒情大师哈菲兹》，《东方文学名著讲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196. 易继尧《维吾尔族古典诗歌与中古波斯文学》，《西北民族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

197. 昂苏尔阿里著，张晖译《卡布斯教诲录》（片断），《外国文学》1988年第1期。

198. 埃赫桑·沙泰尔著，元文琪译《阿尔达希尔·帕帕克的业绩》（节选），《外国文学》1988年第4期。

199. 费里敦·波尼著，董麟译《街女》，《外国小说》1988年第11期。

200. 郎樱《波斯神话及其在新疆的流传》，《新疆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

201. 萨纳伊著，张晖译4《首》《波斯古代抒情诗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

202. 阿迪格·别尔著，张晖译《诗2首》《波斯古代抒情诗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

203. 加伯里著，张晖译2《首》《波斯古代抒情诗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

204. 哈桑·纳维著，张晖译《诗3首》《波斯古代抒情诗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

205. 安瓦里著，张晖译4《首》《波斯古代抒情诗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

206. 哈冈尼著，张晖译3《首》《波斯古代抒情诗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

207. 阿塔爾著，張暉譯 6 首 《波斯古代抒情詩選》，上海譯文出版社 1988 年版。
208. 卡瑪勒丁著，張暉譯 1 首 《波斯古代抒情詩選》，上海譯文出版社 1988 年版。
209. 牟拉維著，張暉譯 5 首 《波斯古代抒情詩選》，上海譯文出版社 1988 年版。
210. 阿拉基著，張暉譯 2 首 《波斯古代抒情詩選》，上海譯文出版社 1988 年版。
211. 薩迪著，張暉譯 8 首 《波斯古代抒情詩選》，上海譯文出版社 1988 年版。
212. 霍爾塔維著，張暉譯 2 首 《波斯古代抒情詩選》，上海譯文出版社 1988 年版。
213. 哈爾拉維著，張暉譯 1 首 《波斯古代抒情詩選》，上海譯文出版社 1988 年版。
214. 哈爾曼尼著，張暉譯 3 首 《波斯古代抒情詩選》，上海譯文出版社 1988 年版。
215. 薩曼尼著，張暉譯 1 首 《波斯古代抒情詩選》，上海譯文出版社 1988 年版。
216. 哈非茲著，張暉譯 10 首 《波斯古代抒情詩選》，上海譯文出版社 1988 年版。
217. 薩迪亞達特著，沈春鴻譯 《兀鷹》，《東方短篇小說選》（下），中國青年出版社 1988 年版。
218. 歐加卜著，李琰璵譯，《東方短篇小說選》（下），中國青年出版社 1988 年版。
219. 張暉譯波斯古代抒情詩選譯者序，上海譯文出版社 1988 年版。
220. 傅加今著，波斯文學、伊朗現代文學，《東方文學名著寶庫》，工人出版社 1988 年版。
221. 張暉著，波斯文學家詞條 113 條，《世界文學大詞典》，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222. 溫祖蔭著，波斯文學簡史，《東方文學鑑賞》（上），福建教育出版社 1988 年版。

中国伊朗学论集

223. 元文琪著《斯塔》，《世界知识大词典》，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
224. 元文琪著《神话与君权神授——读 札姆亚特·亚什特 颂神诗》，《外国文学研究集刊》第1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225. 元文琪著《神话与神学唯心主义——(弗拉瓦希·亚什特) 探析》，《外国文学研究集刊》第13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226. 元文琪著《杜西》，《世界知识大辞典》，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
227. 张晖著《巴依诗集译者前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28. 王家琪著《行诗的源流、结构与海亚姆风格——兼论与唐代绝句有无事实联系》，《外国文学研究集刊》第12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229. 卢永著《序言》，《蕾莉与马杰农》，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
230. 王家琪著《苏菲哲理与寓言》，《外国文学研究集刊》第13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231. 艾木提著《波斯古典文学光辉的代表作《蕾莉园》》，《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
232. 唐孟生，孔菊芳译《纳斯尔丁与阿凡提》，《国外文学》1989年第3期。
233. 元文琪著《头鹰：图像的人生哲理》，《外国文学评论》1989年第3期。
234. 贾马尔扎德著，张晖译《译林》1989年第4期。
235. 张晖著《巴依与柔巴依》，《东方世界》1989年第6期。
236. 马哈茂德·阿巴迪著，龙淇译《噩梦的约束》，《报告文学》1989年第9期。
237. 元文琪著《古代著名诗人词条(16条)》，《外国名作家大词典》，漓江出版社1989年版。
238. 元文琪著《现代著名作家词条(7条)》，《外国名作家大词典》，漓江出版社1989年版。
239. 元文琪著《神化传说词条(370条)》，《外国神话传说大词

典》(伊朗部分),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年版。

240. 鲁刚主编《波斯》神话词条,《世界神话词典》,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241. 蔡荃著《达达》,《外国名作家大词典》,漓江出版社1989年版。

242. 秦溪著《扎》,《外国名作家大词典》,漓江出版社1989年版。

243. 张鸿年著《园译后记》,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244. 元文琪著《尔温·埃特萨米》,《外国妇女文学词典》,漓江出版社1989年版。

245. 元文琪著《罗赫扎德·弗鲁格》,《外国文学词典》,漓江出版社1989年版。

246. 海亚姆著,潘一合译《集选》,《世界名诗鉴赏辞典》,漓江出版社1989年版。

247. 哈菲兹著,飞白译《情诗4首》,《世界名诗鉴赏辞典》,漓江出版社1989年版。

248. 鲁达基著,王一丹译《歌颂纳塞尔国王并劝他返回布哈拉》,《世界名诗鉴赏辞典》,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249. 萨迪著,张鸿年译《园》(节选),《世界名诗鉴赏辞典》,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250. 萨迪著,水建馥译《园》(节选),《世界名诗鉴赏辞典》,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251. 哈菲兹著,邢秉顺译《酒歌:虔诚的道路,你在哪里》,《世界名诗鉴赏辞典》,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252. 哈菲兹著,孙用译《问我,我所忍受的痛苦的爱情》,《世界名诗鉴赏辞典》,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253. 王家瑞著《乐智慧》与波斯文学,《中亚学刊》,中华书局1990年第3辑。

254. 张晖著《新教海录译者序言》,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255. 元文琪著《迪克·赫达亚特》,《外国著名文学家评论》(第5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256. 麦永雄,梁潮著《理泰斗萨迪及其流芳千古的《蔷薇园》》,《新东方文学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中国伊朗学论集

257. 元文琪著《现代文学4个问题》《百万个为什么? 外国文学(下)》, 漓江出版社1990年版。

258. 元文琪著《维语和帕拉维语文学初探》, 《外国文学研究》1990年第1期。

259. 元文琪著《伊斯兰时期伊朗文学5个问题》《百万个为什么? 外国文学(下)》, 漓江出版社1990年版。

260. 陶德臻主编《波斯文学》, 《外国文学史纲》, 北京出版社1990年版。

261. 元文琪著《古典文学13个问题》《百万个为什么? 外国文学(下)》, 漓江出版社1990年版。

262. 卖永雄, 梁朝霞古波斯文学史纲, 《新东方文学史》,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263. 陈玮君译《波斯童话》, 《外国儿童文学选粹》(一),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264. (伊朗) 埃特索米著, 段宏燕译《儿的眼泪》, 《世界名诗鉴赏辞典》,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265. (伊朗) 拉胡蒂著, 穆宏燕译《约》, 《世界名诗鉴赏辞典》,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266. (伊朗) 巴哈尔著, 邢秉顺译《莫万德峰》, 《世界名诗鉴赏辞典》,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267. (伊朗) 德胡达著, 张鸿年译《念》, 《世界名诗鉴赏辞典》,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268. (伊朗) 鲁米著, 张鸿年译《的传说(《马斯纳维》片断)》, 《世界名诗鉴赏辞典》,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269. (伊朗) 内扎米著, 张鸿年译《到来和蕾莉之死》, 《世界名诗鉴赏辞典》,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270. (伊朗) 欧玛尔·亚姆著, 朱海波译《鲁拜集选(8首)》, 《世界名诗鉴赏辞典》,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271. (伊朗) 菲尔多西著, 张鸿年译《(节选)》, 《世界名诗鉴赏辞典》,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272. (伊朗) 欧玛尔·亚姆著, 俞灏东, 杨秀琴译《四行诗选》,

《外国文学》1991年第1期。

273. (伊朗) 伊拉兹尔扎著, 张晖译《解梦、欢迎、客套》, 《外国文学》1991年第1期。

274. (伊朗) 阿列什文尼著, 张晖译《即使阿列夫被判处死刑、傀儡》, 《外国文学》1991年第1期。

275. (伊朗) 巴哈尔著, 张晖译《德兰》, 《外国文学》1991年第1期。

276. (伊朗) 拉胡蒂著, 张晖译《团结一致, 组织斗争》, 《外国文学》1991年第1期。

277. (伊朗) 埃什基著, 张晖译《夜、浴血激战》, 《外国文学》1991年第1期。

278. (伊朗) 厄姆什赫著, 张晖译《天鹅、我的家是朵乌云》, 《外国文学》1991年第1期。

279. (伊朗) 帕尔温著, 张晖译《感》, 《外国文学》1991年第1期。

280. (伊朗) 纳塞德普尔著, 张晖译《感》, 《外国文学》1991年第1期。

281. (伊朗) 阿齐兹著, 沈春涛译《老同学》, 刊《外国文学》1991年第1期。

282. (伊朗) 穆赫米著, 沈春涛译《枯泉》, 刊《外国文学》1991年第1期。

283. 佚名著, 宋丕方译《蜡烛》, 刊《外国文学》1991年第1期。

284. (伊朗) 马哈茂德塔巴迪著, 李玉琦译《不白之冤》, 刊《外国文学》1991年第8期。

285. 元文琪著《伊朗伊斯兰文学11个问题》收《伊斯兰教文化面面观》, 齐鲁书社1991年版。

286. 胡敬署主编《文学词条14条》见《文学百科大辞典》, 北京华龄出版社1991年版。

287. 元文琪著《传奇中的神权观念——巴列维语名作《阿尔达希尔·帕帕克的功绩》主题探讨》, 刊《外国文学》1991年第1期。

288. 潘庆菲尔西英雄史诗早东西方的巨大影响——纪念波斯诗圣菲尔多西诞辰1050周年《外国文学》1991年第1期。

289. 乔丽娅斯塔姆和苏赫拉布《悲剧精神浅析》, 刊《外国文

中国伊朗学论集

学 1991 年第 1 期。

290. 李湘, 张鸿斌译菲尔多西《王书》中四个年轻主人公的悲剧, 刊《外国文学》1991 年第 1 期。

291. 张晖译“菲尔多西年”在世界, 刊《外国文学研究》1991 年第 3 期。

292. 施蛰存译·柔巴依·怒拜, 刊《读书》1991 年第 10 期。

293. 张鸿年译《王书》,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1 年版。

294. 张鸿年译《再认识》(译者序), 收《波斯哲理诗》, 北京文津出版社 1991 年版。

295. 何乃震译·海亚姆和他的诗歌, 收《伊朗古今名诗选译》,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296. 卢梭译·爱情诗歌管窥, 刊《外国文学》1991 年第 1 期。

297. 俞任远译·动人的爱情颂歌, 刊《外国文学》1991 年第 1 期。

298. 沈洪嘉译·西林·赏析, 刊《外国文学》1991 年第 1 期。

299. 张朝晖译·《蔷薇园》中萨迪的诗歌主张, 刊《国外文学》1991 年第 1 期。

300. 曲历谢·《保园》的主题思想, 刊《国外文学》1991 年第 1 期。

301. 何乃震译·永, 新颖别致——《蔷薇园》思想艺术简论, 刊《外国文学》1991 年第 1 期。

302. 张朝晖译·《保园》, 刊《外国文学研究》1991 年第 1 期。

303. 元文撰·赫达亚特和他的《哈吉老爷》, 见《当代世界文学名著鉴赏辞典》,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304. 元文撰·阿拉维及其《她的眼睛》, 收《当代世界文学名著鉴赏辞典》,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305. 元文撰·拉伯文和波斯文的由来、发展和相互将的关系是怎样的, 收《伊斯兰文化面面观》, 齐鲁书社 1991 年版。

306. 孟昭骥译·文学交流史断想, 刊《国外文学》1991 年第 1 期。

307. 愈久·菲兹和彭斯诗歌之比较——兼论前者对后者的影响, 刊《国外文学》1991 年第 1 期。

308. 黎跃·菲兹文化之春与秋——波斯古典诗歌中的人生哲理格言与中国的《增广贤文》比较, 《国外文学》1991 年第 1 期。

309. 潘庆榕：东西诗哲，千古绝唱——评阿诺德和菲尔多西同名英雄史诗，《外国文学评论》1991年第1期。

310. 陈融玛尔·海亚姆在中古波斯文学史上的地位》，刊《外国文学》1991年第1期。

311. 元文琪波斯神话精选》，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91年版。

312. 贾利斯特哈赫著，元文琪译《阿维斯塔（节选）》，收《伊朗古今名诗选评》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313. 扎比露法著，元文琪译《缅怀扎里尔（片段）》，刊《伊朗古今名诗选评》，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314. 鲁达基著，张鸿年译《鲁达基诗选》，收《伊朗古今名诗选评》，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

315. 法罗西著，张鸿年译《鲁达基赫穆德王》，收《伊朗古今名诗选评》，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316. 纳塞姆斯鲁著，张鸿年译《诗2首》，收《伊朗古今名诗选评》，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317. 欧姆兹亚姆著，张鸿年译《欧马尔·海亚姆诗选》，收《伊朗古今名诗选评》，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318. 萨纳伊著，张鸿年译《萨纳伊诗选》，收《伊朗古今名诗选评》，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319. 安瓦里著，张鸿年译《安瓦里诗选》，收《伊朗古今名诗选评》，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320. 内扎米著，张鸿年译《内扎米与马杰农（节选）》，收《伊朗古今名诗选评》，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321. 哈冈尼著，张鸿年译《哈冈尼的教堂》，收《伊朗古今名诗选评》，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322. 菲尔多西著，张鸿年译《菲尔多西（节选）》，收《伊朗古今名诗选评》，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323. 阿塔耳著，张鸿年译《阿塔耳与梧桐》，收《伊朗古今名诗选评》，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324. 莫拉维著，张鸿年译《莫拉维与宫女》，收《伊朗古今名诗选评》，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中国伊朗学论集

325. 萨迪著, 张鸿年译《果园》(节选), 《伊朗古今名诗选评》,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326. 萨迪著, 水建馥译《果园》(节选), 《伊朗古今名诗选评》,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327. 哈菲兹著, 邢秉顺译《菲兹诗选》, 《伊朗古今名诗选评》,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328. 贾米著, 张鸿年译《儿诗》, 《伊朗古今名诗选评》,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329. 贾米著, 张许萃译《素福与朱莱哈》(节选),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330. 阿什拉美尔丁著, 张鸿年译《病之病, 无医可药》, 收《伊朗古今名诗选评》,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331. 穆罕默德·巴哈尔著, 邢秉顺译《巴哈尔诗选》,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332. 何乃葵《伊朗诗歌发展史纲》(序言), 收《伊朗古今名诗选评》,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333. 叶舒宪《阿维斯塔》中的光明崇拜意象群, 收《东方丛刊》第1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334. 潘庆斐尔多西在中国, 刊《国外文学》1992年第1期。

335. 何乃葵《多西和他的〈列王纪〉》, 收《伊朗古今名诗选评》,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336. 元文璠《节译和赏析》, 收《世界长篇名著精华》, 漓江出版社1992年版。

337. 何乃葵《米和他的〈蕾莉与马杰农〉》, 收《伊朗古今名诗选评》,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338. 何乃葵《迪和他的〈果园〉〈蔷薇园〉》, 收《伊朗古今名诗选评》,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339. 何乃葵《菲兹和他的诗歌》, 收《伊朗古今名诗选评》,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340. 陈麟《菲兹与歌德——兼论波斯文学的总体美感特征》, 刊《外国文学研究》1992年第1期。

341. 张鸿年《露莉与马杰衣》与《罗密欧与朱莉叶》，刊《国外文学》1992年第1期。
342. 郎履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在《福乐智慧》中的地位，收《福乐智慧与东西方文化》，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343. 李文钟“为美好的时刻活着”——波斯文化与盛唐李白诗歌之关系，刊《昆明师专学报》1992年第4期。
344. 穆扎法·赫蒂亚尔著，黄璟译《萨迪在西方文学中的崇高地位》，刊《国外文学》1993年第1期。
345. 王隽朗杰出的穆斯林诗人萨迪和他的《蔷薇园》，《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2期。
346. 乔丽斌咏玛尔·海亚姆的哲理诗看波斯文学中人文主义思想的萌芽，刊《外国文学研究》1993年第3期。
347. 李文钟赋、中国文学中伦理观念比较谈》，刊《昆明师专学报》1994年第1期。
348. 李亚敏咏的李白——我默·伽亚谟及其《鲁拜集》，刊《外国文学研究》1994年第3期。
349. 宁必用民间文学探微》，刊《雁北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
350. 管三陪菲兹抒情诗的创作个性》，刊《河北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
351. 张顺翟发聩的训世警钟——萨迪《蔷薇园》欣赏》，刊《阅读与写作》1996年第5期。
352. 胡安·卡萨迪利亚、于凤川《胡安·卡萨迪利亚诗三首》，刊《译林》1997年第6期。
353. 张继吾尔族当代“柔巴依”创作漫议》，刊《民族文学研究》1998年第2期。
354. 刘清海融·离析·粘连·渗透——东方文学与宗教关系论纲》，刊《汉中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4期。
355. 刘树兰天才诗人萨迪与《果园》，刊《中国穆斯林》1998年第6期。
356. 王建被斯苏菲与中国塔利格的历史联系》，刊《回族研究》

中国伊朗学论丛

1999年第4期。

357. 聂继游《东方的精神之旅——歌德的抒情组诗〈东西合集〉的产生背景》，刊《国外文学》2000年第1期。

358. 邱紫华《中世纪波斯文学中的悲剧意识》，刊《江汉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

359. 邱紫华《古代波斯宗教哲学的二元本体论及原型意象的审美阐释》，刊《黄冈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

360. 吴舜奎《与死的终极畅想——海亚姆“鲁拜”诗生命主题论略》，刊《外国文学研究》2001年第2期。

361. 马骏骥《菲兹和他的诗歌》，刊《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362. 艾赛来曼《波斯文学与维吾尔文学交流史断想》，刊《民族文学研究》2001年第3期。

363. 何乃葵《朗古典文学与宗教》，刊《广西右江民族师专学报》2001年第3期。

364. 邢秉顺《“抒情诗大师”的中国情结》，刊《中外文化交流》2002年第1期。

365. 杨忠天《力性理》与苏菲神秘主义》，刊《新疆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

366. 刘淑莉《中世纪波斯诗歌的美学特征》，刊《江汉大学学报》2002年第22期。

367. 艾赛来曼《中世纪波斯文学中的“海米塞现象”——论“海米塞现象”的起源、发展和理论体系》，刊《外国文学评论》2002年第3期。

368. 吕大瓦拉和“君士坦丁赠礼”，刊《国外文学》2002年第4期。

369. 巴拉提《伊斯兰文化的丰碑》——浅谈萨迪散文诗集《蔷薇园》，刊《中国穆斯林》2002年第6期。

370. 巴拉提，刘隰《波斯文学精华——世界文明瑰宝》——读《波斯精典文苑》，刊《中国穆斯林》2003年第3期。

371. 乔秉巴依《波斯文学的奇珍，世界文学的瑰宝》，刊《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

372. 王妮娜从海亚姆现象看东西文化的相交汇流, 刊《西北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373. 黄杲菲从柔巴依是意译还是“形译”?——谈诗体移植及其他, 《中国翻译》2004年第5期。

374. 丁淑钰射与吸纳——考察“莱拉和马杰依”的故事在阿拉伯文学和波斯文学中的不同境遇, 刊《外国文学》2005年第5期。

375. 梁晓巍我的小名直呼我吧——读伊朗诗人埃姆朗·萨罗希, 刊《外国文学》2007年第1期。

376. 郭家蔚译, 《外国名作家传》(中),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377. 钟敬波聊故事略窥, 刊《民俗》第2122期。

三、伊朗政治研究论著索引

(一) 著作类

1. (日本) 宪藤原治著波斯问题, 公民书局民国十年七月版。
2. 谢兰著新波斯, 商务印书馆民国十九年四月(1930年)版。
3. Vincent S战后新波斯著 民智书局民国十九年四月(1930年)版。
4. 陈坤著新伊朗, 世界书局, 民国二十九年十一月(1940年)版。
5. 魏方艾著伊朗和埃及人民的正义斗争, 青年出版社1951版。
6. 章震骅编著伊朗人民的反帝斗争, 江南出版社1951版。
7. 汪源著伊朗人民的反帝斗争, 火星出版社1951版。
8. 都德著伊朗石油问题, 燃料工业出版社1951版。
9. (伊) 波佐格(A. Lavi Bozorg)著 译 伊朗, 世界知识出版1957版。
10. L. P. 艾尔威尔 - 伊朗石油——对强权政治的研究, 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版。
11. (伊朗) 拉胡蒂著伊朗人民的呼声,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版。
12. 张桂枢编伊朗巴布教徒起义, 商务印书馆1962版。
13. (伊朗) 巴哈尔著, 邢秉顺译朝霞的信使, 作家出版社上海编辑所1965版。

中国伊朗学论集

14. 《伊朗》巴列维著我对祖国的职责, 商务印书馆1977版。
15. W. B. 费舍尔著,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7版。
16. 华国锋主席访问伊朗, 人民出版社1978版。
17. 《伊朗》法尔基著伊朗革命: 柯梅尼革命内幕与伊朗巴勒维王朝崩溃覆灭记, 台北: 民国68年(1979)版。
19. 洪秀菊著柯梅尼和伊朗回教革命, 五南图书出版公司民国79年(1990)版。
20. 《伊朗》志费尼(Juvaini)著, 世宗新服录史,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版。
21. 李希滋明编《伊朗巴布教徒起义》, 商务印书馆1980版。
22. 《伊朗》胡韦达著, 周仲贤译伊朗国王倒台始末记, 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版。
23. 马赫德维, 阿布杜尔礼霸尚格著《伊朗外交四百五十年》, 商务印书馆1982版。
24. (美)沙利文(W. H. Sullivan)著, 美国等译, 知识出版社1984版。
25. (美)诺思著, 杨优明等译伊朗门内幕大曝光,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2年4月版。
26. 任国富著伊朗门事件与诺思旋涡, 化学工业出版社1989版。
27.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驻沪总领事馆编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1998)版。
28. 赵伟明著近世伊朗,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版。
29. 李春放著伊朗危机与冷战的起源: 1941-1947年,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版。
30. 杨兴福开运、陈俊华著《伊朗与美国关系研究》, 时事出版社2006版。
31. 范鸿达著美国与伊朗: 曾经的亲密,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版。
32. 刘强著伊朗国际战略地位论: 一种全球多视角的解析,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版。

(二) 论文类

1. 余孟如论英苏进军伊朗，刊《世界知识》1941年第12期。
2. 从朝鲜到伊朗，刊《世界知识》1945年第12期。
3. 伊朗和土耳其，刊《世界知识》1946年第1期。
4. 陶维大伊朗事变面面观，刊《世界知识》1946年第2期。
5. 寿平伊朗内幕，刊《世界知识》1946年第2期。
6. 张泉伊朗问题的真相，刊《世界知识》1946年第9期。
7. 希腊与伊朗，刊《世界知识》1946年第30期。
8. 一苇伊朗内幕，刊《世界知识》1947年第21期。
9. 殷宇美英侵略下的伊朗，刊《世界知识》1951年第14期。
10. 伊朗人民的反帝斗争，刊《世界知识》1951年第23期。
11. 王庆伊朗纪行，刊《世界知识》1952年第9期。
12. 殷学英美争夺下的伊朗，刊《世界知识》1953年第17期。
13. 杨学继帝国主义蹂躏下的伊朗，刊《世界知识》1954年第23期。
14. 王立亭美帝国主义控制下的伊朗，刊《世界知识》1960年第15期。
15. 柳门腐败不堪的伊朗政坛，刊《世界知识》1960年第18期。
16. 申珂斗争中的伊朗，刊《世界知识》1961年第10期。
17. 赵增荣伊朗，刊《世界知识》1963年第15期。
18. 魏杞尧伊朗远古文化的新研究，刊《世界历史》1979年第1期。
19. 渝人伊斯兰历和伊朗阳历，刊《世界知识》1979年第2期。
20. 徐普楠乱中的伊朗，刊《世界知识》1979年第2期。
21. 里萨伊朗的什叶派，刊《世界知识》1979年第4期。
22. 世境伊朗，刊《世界知识》1979年第6期。
23. 林海伊朗政局的演变，刊《世界知识》1979年第7期。
24. 王克勤霍梅尼与伊朗，刊《世界知识》1979年第13期。
25. 欧孙伊朗最大的威胁来自苏联，刊《世界知识》1980年第4期。
26. 李崇祿伊朗与伊拉克的争端，刊《世界知识》1980年第11期。
27. 李崇祿伊朗、伊拉克边界冲突纪事，刊《世界知识》1980年第20期。
28. 晨星伊朗国徽，刊《世界知识》1980年第24期。

中国伊朗学论集

29. 于超满中的伊朗政局, 刊《瞭望》1981年第4期。
30. 徐济哪伊朗的左派力量, 刊《西亚非洲》1981年第4期。
31. 谭树涛伊朗走向神权统治, 刊《瞭望》1981年第5期。
32. 袁世塘伊朗政局为何难以安定, 刊《世界知识》1981年第11期。
33. 钟友文马曼荪《西方报刊如何看伊朗政局》, 刊《世界知识》1981年第14期。
34. 耿成奎与伊朗的摩擦, 刊《世界知识》1981年第18期。
35. 康曙伊朗“人民圣战者组织”, 刊《西亚非洲》1982年第1期。
36. 阿伊明访问伊朗散记, 刊《中国穆斯林》1982年第2期。
37. 凌文慧伊朗马什哈德见闻, 刊《西亚非洲》1982年第5期。
38. 元吉之伊朗和苏联关系新动态, 刊《世界知识》1982年第8期。
39. 陈和书苏联加紧对伊朗渗透, 刊《国际展望》1982年第16期。
40. 高世同伊朗人民党被取缔, 刊《世界知识》1983年第12期。
41. 元吉之伊朗: 政策在调整中, 刊《世界知识》1983年第14期。
42. 辛义从伊朗外长出访说起, 刊《世界知识》1983年第20期。
43. 岳家哪伊朗圣城——库姆, 刊《西亚非洲》1984年第4期。
44. 于苏阔伊朗风情, 刊《世界知识》1984年第12期。
45. 张铁铮伊朗, 刊《西亚非洲》1985年第5期。
46. 许博渊战争对伊朗的影响, 刊《瞭望》1985年第38期。
47. 帅鹏伊朗宣布霍梅尼的接班人, 刊《瞭望》1985年第50期。
48. 孙培蒙伊朗朝伊朗述略, 刊《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
49. 许博渊伊朗的伊斯兰教士, 刊《国际展望》1986年第16期。
50. 许博渊在伊朗看里根秘密外交, 刊《瞭望》1986年第49期。
51. 伊朗的三个政治趋势, 刊《世界经济与政治》1987年第3期。
52. 陈江关于伊拉克和伊朗的战争, 刊《国际问题研究》1987年第4期。
53. 帅鹏伊朗的“最后攻势”, 刊《瞭望》1987年第7期。
54. 柯居翰《伊朗门》事件, 刊《世界经济与政治》1987年第8期。
55. 林喆法国与伊朗关系的恶化, 刊《世界知识》1987年第16期。
56. 郡静翎的追求, 刊《世界知识》1987年第19期。
57. 沈孝泉法国伊朗断交始末, 刊《瞭望》1987年第31期。

58. 许博渊伊朗不愿开辟第二战场，刊《瞭望》1987年第33期。
59. 安希盎伊朗历史上的萨珊王朝，刊《阿拉伯世界》1988年第2期。
60. 伊朗百万妇女受军训，刊《中国民兵》1988年第3期。
61. 瑞世康拉克轰炸伊朗核电厂，刊《国外核新闻》1988年第3期。
62. 孙百闾不如一见的伊朗，刊《世界知识》1988年第9期。
63. 晓谕国击落伊朗客机之后，刊《国际展望》1988年第14期。
64. 许林樾伊朗内阁危机说明了什么，刊《世界知识》1988年第21期。
65. 许博渊伊朗迈出勇敢的一步，刊《瞭望》1988年第31期。
66. 赵慧伊朗痛定思痛，刊《瞭望》1988年第34期。
67. 许博渊总理辞职风波，刊《瞭望》1988年第39期。
68. 刘慧玲令人瞩目的伊朗政策调整，刊《世界经济与政治》1989年第6期。
69. 张星岩伊朗的反毒品运动，刊《国际展望》1989年第6期。
70. 钟友耀梅尼谈伊朗战后重建，刊《世界知识》1989年第11期。
71. 晓谕伊朗近景，刊《国际展望》1989年第13期。
72. 陈振耀梅尼逝世后的伊朗，刊《世界知识》1989年第15期。
73. 玉瑞英、汉琛《硝烟散后看伊朗》，刊《世界知识》1989年第20期。
74. 王维周伊朗归来，刊《国际展望》1989年第23期。
75. 伟明伊朗现代化的历史考察，刊《世界经济与政治》1990年第3期。
76. 张国伟初访归来话伊朗，刊《国际展望》1990年第3期。
77. 张家山伊朗总统拉夫桑贾尼，刊《世界博览》1990年第7期。
78. 洪濯梅尼逝世后的伊朗，刊《世界知识》1990年第17期。
79. 伍书渊伊朗响起人口膨胀的警钟，刊《瞭望》1990年第19期。
80. 杨宝生伊朗的圣战建设组，刊《国际经济合作》1991年第3期。
81. 许博渊计划建立国家卫星系统，刊《中国航天》1991年第4期。
82. 许博渊自有精明的韬略，刊《世界知识》1991年第8期。
83. 叶美国阻止对伊朗核交易的行动激怒了伊朗人，刊《国外核新闻》1992年第2期。

中国伊朗学论集

84. 展翎伊朗悄然兴起妇女革命, 刊《中华女子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
85. 殷湘文伊朗的军事工业, 刊《现代兵器》1992年第7期。
86. 老笔伊朗的中亚战略, 刊《世界知识》1992年第9期。
87. 陈明伊朗门事件的实质, 刊《南通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
88. 吴强伊朗的中亚政策评析, 刊《西亚非洲》1993年第2期。
89. 葛相文伊朗议会通过计划生育法, 刊《瞭望》1993年第24期。
90. 张齐或伊朗革命与辛亥革命之比较, 刊《衡阳师范学院学报》1994年第01期。
91. 臧晓京伊朗—叙利亚研制巡航导弹, 刊《飞航导弹》1994年第3期。
92. 王菊如伊朗的民族与民族问题, 刊《西亚非洲》1994年第6期。
93. 龚方震所见到的伊朗妇女, 刊《国际展望》1994年第9期。
94. 丛德朗在推进导弹研制计划, 刊《飞航导弹》1995年第1期。
95. 王宇浩蕊赫——伊朗妇女的宗教集会, 刊《世界宗教文化》1995年第3期。
96. 安维伟伊朗非世俗化进程的性质与演化趋势, 刊《西亚非洲》1995年第4期。
97. 颜克美国谴责伊朗继续实施核武器计划, 刊《国外核新闻》1995年第4期。
98. 李春放 1945~1947年的伊朗危机, 刊《外交学院学报》1995年第4期。
99. 苏祖梅俄罗斯伊朗关系21世纪模式, 刊《国际观察》1995年第4期。
100. 叶巍穆伊朗核计划属和平利用性质, 刊《国外核新闻》1995年第5期。
101. 杨帆朗声称在生产新型主战坦克, 刊《国外坦克》1995年第5期。
102. 文德国公开宣布未向伊朗出售过核设备, 刊《国外核新闻》1995年第6期。
103. 伍书德国对伊朗的制裁不会奏效, 刊《当代世界》1995年

第7期。

104. 王湘信信息作战模拟：伊朗如何向欧美进攻，刊《中国科技信息》1995年第11期。

105. 何健甯非称与伊朗没有核交易，刊《国外核新闻》1995年第11期。

106. 陈贻顺顶得住美国的经济制裁吗？，刊《了望》1995年第21期。

107. 徐长美国制裁伊朗能够奏效吗？，刊《了望》1995年第21期。

108. 吴毅朝伊斯兰革命根源探析，刊《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3期。

109. 常虎萨克斯坦与土耳其和伊朗的关系，刊《国际观察》1996年第4期。

110. 杨兴孔十年代伊朗的对外战略，刊《西亚非洲》1996年第4期。

111. 王两佩战争后伊朗内外政策调整述评，刊《西亚非洲》1996年第4期。

112. 马寿麟朝人口政策与计划生育，刊《人口与经济》1996年第6期。

113. 李国藩国制裁伊朗、利比亚的意图及影响，刊《国际资料信息》1996年第11期。

114. 尧现代“灰姑娘”系列之一伊朗前王后法拉赫·巴列维，刊《世界博览》1997年第1期。

115. 马雷鑫建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外交政策：伊朗的观点》，刊《国外社会科学文摘》1997年第3期。

116. 丁衍朝医学教育和卫生保健管理体制的改革，刊《国外医学、医学教育分册》1997年第4期。

117. 季惠群朝外交政策：原则和目标，刊《国外社会科学文摘》1997年第4期。

118. 闫淑敏朝和巴基斯坦的核计划，刊《国外核新闻》1997年第4期。

119. 李荣昕《从总统选举看伊朗政治动向》，刊《现代国际关系》

中国伊朗学论集

1997 年第 7 期。

120. 田端慧《伊朗新任总统哈塔米施政取向初析》，刊《当代世界》

1997 年第 8 期。

121. 杨帆《伊朗的装甲工业》，刊《国外坦克》1997 年第 9 期。

122. 李树《伊朗哈塔米政府的内外政策》，刊《国际资料信息》1997 年第 11 期。

123. 谭树《伊朗新总统哈塔米》，刊《现代交际》1997 年第 11 期。

124. 文存《伊朗新总统及其内外政策走向》，刊《国际问题研究》

1998 年第 1 期。

125. 荣《伊朗缘何提出与美国人民对话》，刊《了望》1998 年第 1 期。

126. 田端慧《伊朗外交奏新歌》，刊《当代世界》1998 年第 2 期。

127. 杨永《美国对伊朗的政策面临重大调整》，刊《国际问题研究》

1998 年第 3 期。

128. 钱乘《伊朗现代化的失误及其原因》，刊《世界历史》1998 年第 3 期。

129. 杨翠《巴基斯坦与伊朗关系的演变》，刊《南亚研究季刊》

1998 年第 3 期。

130. 年轻人：伊朗社会的定时炸弹》，刊《中国青年研究》1998 年第 3 期。

131. 王哲《尼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刊《新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8 年第 3 期。

132. 曲《伊朗、中东和后冷战时代》，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8 年第 4 期。

133. 赵伟《里海开发与美国对伊朗政策》，刊《国际观察》1998 年第 5 期。

134. 雁《伊朗改革推出总统哈塔米》，刊《21 世纪》1998 年第 5 期。

135. 黄运《伊朗：改善形象，寻求发展》，刊《西亚非洲》1998 年第 6 期。

136. 刘世《伊朗推出两种新自行火炮》，刊《国外坦克》1998 年第 6 期。

137. 辛《伊朗的核力量》，刊《国外核新闻》1998 年第 6 期。

138. 李明伊发展弹道导弹美国如坐针毡, 刊《现代兵器》1998年第8期。
139. 袁长伟伊朗装甲力量透视, 刊《现代兵器》1998年第9期。
140. 伍书瀚 伊朗与塔利班交恶的由来和趋向, 刊《当代世界》1998年第11期。
141. 安国璋 伊朗与塔利班剑拔弩张, 刊《人民论坛》1998年第11期。
142. 李伟雄 伊朗与塔利班冲突的背后, 刊《国际展望》1998年第20期。
143. 李富伊 伊朗一个并不神秘的宗教国家, 刊《世界宗教文化》1999年第1期。
144. 李富伊 伊朗记略, 刊《世界宗教研究》1999年第4期。
145. 陈有 伊朗是在开发核武器吗, 刊《现代兵器》1999年第4期。
146. 郭宪钢 伊朗总统哈塔米开创外交新局面, 刊《国际问题研究》1999年第4期。
147. 冯宜璜 伊朗和美国关系的历史与现状, 刊《社科纵横》1999年第5期。
148. 野 伊朗情报部易帅内幕, 刊《国家安全通讯》1999年第5期。
149. 伊朗的伊斯兰基金组织, 刊《中国穆斯林》1999年第6期。
150. 李蔚 伊朗形势新动向及未来走势, 刊《现代国际关系》1999年第8期。
151. 荣松 伊朗外交日趋活跃, 刊《了望》2000年第21期。
152. 冀开途 伊朗的半殖民地化、西方化与现代化, 刊《商洛师范学院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第1期。
153. 樊正黄 伊朗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 刊《人口与计划生育》2000年第1期。
154. 冀开途 伊朗历史上的智力引进, 刊《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
155. 冀开途 伊朗伊斯兰化和现代化, 刊《西北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
156. 马丽群 巴列维王朝的世俗化改革, 刊《云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

中国伊朗学论丛

157. 靳海功《伊朗海军》，刊《当代海军》2000年第2期。
158. 张晓《议会大选后的伊朗政坛》，刊《西亚非洲》2000年第3期。
159. 唐志超《议会选举及伊未来走向》，刊《国际资料信息》2000年第4期。
160. 何康文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伊朗问题》，刊《复旦学报》2000年第4期。
161. 晨树刚《温和些，再温和些》，刊《中国新闻周刊》2000年第5期。
162. 杨鸿铨《伊朗改革大势已成众望所归》，刊《国际展望》2000年第5期。
163. 荣铨《伊朗政坛选择了改革派》，刊《瞭望》2000年第10期。
164. 冀开蕤、黄萍《论现代伊朗之父礼萨·汗的改革》，刊《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165. 冀开蕤《伊朗的“三下乡运动”与农村现代化》，刊《商洛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1年第1期。
166. 王品《俄罗斯发展与伊朗关系的动机及影响》，刊《俄罗斯研究》2001年第1期。
167. 黄萍《现代伊朗之父礼萨·汗的改革》，刊《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168. 何乃葵《伊朗古典文学与宗教》，刊《广西右江民族师专学报》2001年第3期。
169. 郑翠《伊朗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与伊斯兰革命》，刊《渝西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
170. 冯家骥《伊朗的面庞更漂亮——迈向新世纪的伊朗妇女》，刊《国际展望》2001年第6期。
171. 吴宝林《伊朗展示新型自行榴弹炮》，刊《国外坦克》2001年第9期。
172. 尤金·人到伊朗记得包头巾》，刊《东南亚纵横》2001年第10期。
173. 无树《伊朗研制新型反坦克制导导弹》，刊《轻兵器》2001年第11期。
174. 蒋晓《伊朗改革保守两派斗争激化》，刊《瞭望》2001年第33期。

175. 李春成《论伊朗巴列维王朝的覆灭》，刊《世界历史》2002年第1期。

176. 李骥《论什叶派在伊朗国教地位的确立》，刊《西北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

177. 冀开斌《论伊朗现代化过程的特点》，刊《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

178. 周健《伊朗散记》，刊《鸭绿江（上半月版）》2002年第2期。

179. 建霞《纱与解放，伊朗的情形》，刊《世界博览》2002年第3期。

180. 尤金《人到伊朗记得包头巾》，刊《社区》2002年第4期。

181. 方毓《伊朗不属阿拉伯》，刊《咬文嚼字》2002年第4期。

182. 范鸿《伊朗外交：宗教领袖与总统的作用》，刊《西亚非洲》2002年第5期。

183. 李阳卫《论伊斯兰教在伊朗传播的交往性特征》，刊《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

184. 唐志《登上“黑名单”，伊朗有些微妙》，刊《世界知识》2002年第8期。

185. 庄礼《伊朗表情：改革与警惕》，刊《新闻周刊》2002年第8期。

186. 王军《伊朗公布“拉德”2自行榴弹炮细节》，刊《国外坦克》2002年第9期。

187. 俄罗斯帮助伊朗建造核电站，刊《国外核新闻》2002年第9期。

188. 晓鸥《马观伊朗》，刊《世界博览》2002年第9期。

189. 吴锋《伊朗跟伊朗套近乎》，刊《环球军事》2002年第15期。

190. 冀开斌《伊朗的发展战略》，刊《商洛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1期。

191. 王麻《什政府对伊朗的政策与伊朗的回应》，刊《西亚非洲》2003年第1期。

192. 金之《波斯湾海上劲旅——伊朗海军》，刊《现代舰船》2003年第3期。

193. 阮宗《伊朗为何承认有核计划》，刊《世界知识》2003年第5期。

194. 李春《伊朗危机与冷战的起源》，刊《读书》2003年第6期。

195. 伍浩《俄罗斯将向伊朗提供核燃料》，刊《国外核新闻》2003

中国伊朗学论集

年第6期。

196. 杨国欣对伊朗怎么样》，刊《时事报告》2003年第7期。

197. 王正和伊朗与印度轻武器》，刊《轻兵器》2003年第7期。

198. 周晓穆伊朗改变开发里海的态度》，刊《中亚信息》2003年第8期。

199. 张伊朗油气资源及相关政策法规》，刊《国土资源》2003年第9期。

200. 王玉蓉伊朗核武器计划》，刊《国外核新闻》2003年第9期。

201. 聂国海海军最新实力分析》，刊《当代海军》2003年第10期。

202. 陈贻南中国开始“敲打”伊朗》，刊《环球军事》2003年第11期。

203. 顾国骥沱生、楚树龙、金一南《伊拉克、伊朗和朝鲜问题》，刊《世界知识》2003年第22期。

204. 苏锡朗最严重的政治危机背后》，刊《新闻周刊》2003年第23期。

205. 田伊朗核危机悬崖勒马》，刊《新闻周刊》2003年第39期。

206. 王伊朗核问题的走向》，刊《瞭望》2003年第44期。

207. 张伊朗《玩家还是无赖》，刊《国外核新闻》2004年第1期。

208. 王伊朗核问题及其走势》，刊《西亚非洲》2004年第1期。

209. 王冀祺卮生、吉利强《伊朗核问题与大国关系》，刊《美国研究》2004年第1期。

210. 朱明印度独立以来与伊朗的关系》，刊《南亚研究》2004年第2期。

211. IAEA通过制裁伊朗的决议》，刊《国外核新闻》2004年第3期。

212. 高祖贻什政府对伊朗政策分析》，刊《西亚非洲》2004年第3期。

213. 华黎历史见证伊》，刊《和平与发展》2004年第3期。

214. 姜英伊宗教力量的发展前景》，刊《西亚非洲》2004年第4期。

215. 禾伊朗妇女与西方奖项》，刊《世界知识》2004年第4期。

216. 金彩伊朗巴列维王朝覆灭根源探析》，刊《西亚非洲》2004年第5期。

217. 唐宝才《中国与伊朗经贸合作前景探讨》，刊《西亚非洲》2004年第5期。
218. 程彬《伊朗议会选举的力量角逐》，刊《世界知识》2004年第5期。
219. 唐志超《伊朗改革走上末路》，刊《南风窗》2004年第5期。
220. 张进《伊朗问伊朗》，刊《世界知识》2004年第6期。
221. 张俊《伊朗核计划》，刊《国外核新闻》2004年第6期。
222. 伍书《美国会对伊朗动武吗》，刊《当代世界》2004年第10期。
223. 杨卫群、王连成《伊朗和以色列：核阴影下的导弹竞赛》，刊《现代军事》2004年第11期。
224. 刘月《伊朗核问题风波迭起》，刊《党员干部之友》2004年第11期。
225. 唐志超《伊朗的改革运动》，刊《国际资料信息》2004年第11期。
226. 谢奕《伊朗的“核二重奏”》，刊《南风窗》2004年第13期。
227. 吴俊《伊朗的核武“演出”》，刊《世界知识》2004年第14期。
228. 众《伊朗核危机的背后》，刊《人民公安》2004年第23期。
229. 刘婉《美国为何讨伐伊朗》，刊《新闻周刊》2004年第30期。
230. 王《伊朗核问题的来龙去脉》，刊《瞭望》2004年第40期。
231. 伍书《伊朗当选后的伊朗政局》，刊《旅游时代》2005年第Z1期。
232. 陈文《伊朗核问题又到紧要关头》，刊《瞭望》2005年第Z1期。
233. 黎红《伊朗核问题的由来及走向》，刊《湘潭大学学报》2005年第S1期。
234. 范鸿建《伊朗伊拉克关系研究 1979~1991》，刊《邯郸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235. 于卫《伊斯兰教在伊朗的地方化和民族化》，刊《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236. 陈安《伊朗伊斯兰革命研究综述》，刊《历史教学问题》2005年第1期。
237. 曾《伊朗核问题及其对美伊关系的影响》，刊《西亚非洲》2005年第2期。
238. 唐志超《伊朗核问题的由来、发展及走向》，刊《思想理论教育

中国伊朗学论集

导刊》2005年第2期。

239. 王珏、蒋兴礼《论伊拉克战争后的伊朗与伊拉克关系》，刊《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240. 美国敲定2005年打伊朗制《才智》2005年第2期。

241. 伍浩毅首次公开承认存在地下浓缩厂》，刊《国外核新闻》2005年第3期。

242. 阮一扬处于对峙状态的伊朗核僵局》，刊《环球军事》2005年第3期。

243. 伊朗与俄罗斯签署核燃料供应合同》，刊《国外核新闻》2005年第3期。

244. 伍浩毅承认曾拥有秘密核计划》，刊《国外核新闻》2005年第3期。

245. 谢先滢《布什第二任期的伊朗政策走向》，刊《乌鲁木齐职业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246. 范鸿露《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美国伊朗关系》，刊《聊城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247. 王天伊的“风景”，刊《中国对外贸易》2005年第3期。

248. 席 鸢《国会会不会出兵伊朗》，刊《时事报告》2005年第3期。

249. 李卫华《核计划的动因及其影响》，刊《电子科技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250. 刘焕毅展示最新RPG-7火箭筒《轻兵器》2005年第4期。

251. 郭京穗《核问题中的大国因素》，刊《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5年第4期。

252. 谢晓黎《核问题凸现的美国计划》，刊《老年人》2005年第4期。

253. 夏立美国对伊朗政策的特点与未来走向》，刊《国际观察》2005年第4期。

254. 李兴刚《战争，纸上谈兵》，刊《南风窗》2005年第4期。

255. 赵振击《伊朗，以色列打头阵》，刊《世界知识》2005年第4期。

256. 石疆《“核问题”及其发展态势分析》，刊《黑龙江教育学

院学报》2005年第5期。

257. 伍浩棧俄罗斯将向伊朗提供核燃料，刊《国外核新闻》2005年第5期。

258. 姜英梅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政教关系，刊《西亚非洲》2005年第5期。

259. 吕筱斯铁骑——伊朗陆军装甲战车，刊《国外坦克》2005年第6期。

260. 施律东劲旅——伊朗陆上军力纵览，刊《国外坦克》2005年第6期。

261. 蒋蕤冠机下的美国和伊朗，刊《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

262. 谢丰美国巴西伊朗订购通信卫星，刊《卫星电视与宽带多媒体》2005年第6期。

263. 唐志趣前伊朗核危机透视，刊《现代国际关系》2005年第6期。

264. 黎美国伊朗情报大战揭秘，刊《环球军事》2005年第6期。

265. 赵青舞伊朗军力有多强，刊《世界知识》2005年第6期。

266. 伍浩棧伊朗核问题大事记，刊《国外核新闻》2005年第6期。

267. 唐志趣荣《总统选举后的伊朗内外政策走向》，刊《现代国际关系》2005年第7期。

268. 马钰居眼中的伊朗新总统，刊《共产党》2005年第8期。

269. 连鲁擎以“流星”弹道导弹家族，刊《国防科技》2005年第8期。

270. 朱丽梅伊朗核问题再起风波，刊《当代世界》2005年第9期。

271. 刘淑梅伊朗核问题背后，刊《百科知识》2005年第9期。

272. 尹怀鹏伊朗成功试验固体导弹发动机，刊《太空探索》2005年第10期。

273. 马越舞伊朗对美外交藏玄机，刊《时事报告》2005年第10期。

274. 虞卫群伊朗大选的启示，刊《社会观察》2005年第10期。

275. 谢晓群伊朗核问题的现状，刊《老年人》2005年第11期。

276. 沈一鹏多变伊朗妇女，刊《文明》2005年第11期。

中国伊朗学论集

277. 连鲁蒙斯长矛——伊朗流星弹道导弹家族，刊《国际展望》2005年第12期。
278. 唐志超教民主制：伊朗独创，刊《世界知识》2005年第13期。
279. 唐志超伊朗No.2江湖再现，刊《世界知识》2005年第13期。
280. 连鲁蒙斯政坛的黑马，刊《百科知识》2005年第15期。
281. 张胜滕文均《核问题与伊朗“能源外交”》，刊《瞭望》2005年第19期。
282. 刘婉媛伊朗大选中的美国因素，刊《中国新闻周刊》2005年第22期。
283. 张胜滕文均《伊朗新总统艰难开局》，刊《瞭望》2005年第33期。
284. 拱振喜伊朗核问题症结，刊《瞭望》2005年第33期。
285. 宋国城，吴黎明伊朗核问题再现缓和迹象，刊《瞭望》2005年第39期。
286. 冯亦雯伊朗经济外交下的能源牌，刊《中国新闻周刊》2005年第40期。
287. 胜平，陈文彬伊朗总统惊人之语惊了谁，刊《瞭望》2005年第52期。
288. 张毅国对伊朗动武的可能性，刊《瞭望》2006年第21期。
289. 唐继鑫悬崖边缘的伊朗，刊《瞭望》2006年第21期。
290. 杨曼教以色列与伊朗会发生冲突吗，刊《世界知识》2006年第1期。
291. 席鹏以色列动得了伊朗核设施吗，刊《时事报告》2006年第1期。
292. 安小巍兴礼、张超阳《新时期美国与伊朗关系前景分析》，刊《重庆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293. 王杨廷智《20世纪伊朗两次革命之比较》刊《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294. 袁胜鲁伊朗核问题与俄罗斯的政策，刊《俄罗斯研究》2006年第1期。
295. 赵可麟析美国的伊朗棋局，刊《学习月刊》2006年第1期。

296. 王万能《频现的伊朗核问题》，刊《时事报告》2006年第2期。
297. 朱伟《伊朗核问题剖析》，刊《和平与发展》2006年第2期。
298. 冀开彦《伊朗伊斯兰民族主义》，刊《商洛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第2期。
299. 李福翼、海超《对抗，还是缓和？——核危机下伊朗对美政策解读》，刊《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300. 李学聚、黎明、宋世益《伊朗核问题能否走出寒冬》，刊《思想工作》2006年第3期。
301. 周曼蓉《派伊斯兰教在伊朗的历史演变》，刊《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302. 伍书翥《解伊朗核危机的最佳选择》，刊《当代世界》2006年第3期。
303. 李曼婷《美国炒作伊朗核问题的真实意图》，刊《科教文汇》2006年第3期。
304. 黎建明《“核”面临战火》，刊《环球军事》2006年第3期。
305. 焦玉鑫《危机凸显伊朗的中东大国地位》，刊《西亚非洲》2006年第3期。
306. 木伊《伊朗核问题必须协商解决》，刊《世界》2006年第3期。
307. 张美国《将公开伊朗核弹设计》，刊《国外核新闻》2006年第3期。
308. 李格、耿盟《介入伊朗核问题政策评估》，刊《武汉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309. 张胜平、陈文莉《伊朗核问题走到危机边缘》，刊《瞭望》2006年第3期。
310. 李国霞《核问题的发展趋势》，刊《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6年第3期。
311. 吴斌《伊朗核问题的理论解读》，刊《西亚非洲》2006年第3期。
312. 张喻、傅明《与西方的斗争》，刊《社会观察》2006年第3期。
313. 王宇、褚明《宪法监护委员会浅析》，刊《西亚非洲》2006年第3期。
314. 刘月葵《美国真的要伊朗动手》，刊《党员干部之友》2006年

中国伊朗学论集

年第4期。

315. 王恩徽金平《伊朗的强硬“核外交”政策》，刊《现代国际关系》2006年第4期。

316. 张冠和廖何非要“核”，刊《党政干部学刊》2006年第4期。

317. 马越举世瞩目的伊朗核危机》，刊《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6年第4期。

318. 王艳铤伊朗核危机剖析》，刊《社会观察》2006年第4期。

319. 英勇克兰向伊朗出售“铠甲”无源雷达探测系统》，刊《电子工程信息》2006年第5期。

320. 容冀国为军事打击伊朗作准备》，刊《环球军事》2006年第5期。

321. 赵青漫获《伊朗美国何以如此敌视》，刊《世界知识》2006年第5期。

322. 青格藏国敢用核弹打伊朗吗》，刊《思想工作》2006年第5期。

323. 邵鹏景担忧的伊朗核问题》，刊《百科知识》2006年第5期。

324. 吴森巨川《伊朗的核步伐》，刊《世界知识》2006年第5期。

325. 范鸿鑑柯尼时期的伊朗外交分析》，刊《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

326. 廖百智伊朗核能力研发现状》，刊《国际资料信息》2006年第5期。

327. 胡献刚：孤独的圣战》，刊《现代军事》2006年第5期。

328. 侯红霄伊朗核问题解决前景》，刊《瞭望》2006年第5期。

329. 赵青舞伊朗的光荣与梦想》，刊《世界知识》2006年第5期。

330. 李铁庶代伊朗的王权观念》，刊《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

331. 周东桃胡武装力量严阵以待》，刊《环球军事》2006年第5期。

332. 韩清磨论二战前后美英在伊朗石油权益的博弈》，刊《绥化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

333. 范鸿达0《世纪阿拉伯人和伊朗人的思想冲突》刊《世界民族》2006年第6期。

334. 范鸿达前的伊朗国家安全：环境与对策》，刊《山西大学学

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

335. 尹怀德《伊朗成功试射隐形导弹》，刊《太空探索》2006年第6期。

336. 张发轲《伊朗核问题进入关键时期》，刊《思想政治课教学》2006年第6期。

337. 贾相德《“亮剑”波斯湾》，刊《现代舰船》2006年第6期。

338. 孙德利《利比亚与伊朗准联盟关系浅析》，刊《阿拉伯世界研究》2006年第6期。

339. 岳汉《伊朗核问题的本质探析》，刊《西亚非洲》2006年第6期。

340. 天《以色列卫星入轨监测伊朗》，刊《国际太空》2006年第6期。

341. 李毅《盟国打算援建伊朗核电厂》，刊《国外核新闻》2006年第6期。

342. 宋丽《伊朗路在何方》，刊《地图》2006年第6期。

343. 何志《伊朗视野中的以色列》，刊《国际论坛》2006年第6期。

344. 韦德《伊朗核问题何去何从》，刊《时事报告》2006年第6期。

45. 刘婉《伊朗核危机山雨欲来》，刊《中国新闻周刊》2006年第6期。

346. 蒙《伊朗门事件》，刊《今日南国（政版）》2006年第6期。

347. 魏道《美国为何爱拿铀浓缩与伊朗“说事”》，刊《东北之窗》2006年第7期。

348. 赵青《伊朗何以说“不”》，刊《世界知识》2006年第7期。

349. 杨诗《复兴礼：新世纪伊朗能源外交浅析》，刊《西亚非洲》2006年第7期。

350. 李国《伊朗核问题峰会回路转吗？》，刊《当代世界》2006年第8期。

351. 奔《陈伟、王珏：伊朗军演震慑美国》，刊《环球军事》2006年第8期。

352. 林利《美国为何害怕伊朗核武器》，刊《世界知识》2006年第8期。

353. 张清《伊朗黑袍女警察》，刊《跨世纪·时文博览》2006年第8期。

354. 王健《伊朗战争猜想》，刊《中国税务》2006年第8期。

355. 杜朝《乘风破浪快剑：扑朔迷离的伊朗反舰导弹》，刊《舰载武器》

中国伊朗学论集

2006 年第 9 期。

356. 桑碧桃《对美政策中的伊斯兰因素》，刊《甘肃农业》2006 年第 9 期。

357. 梁健《伊朗能否抗住美军空袭》，刊《环球军事》2006 年第 9 期。

358. 田文林《险棋又一步》，刊《世界知识》2006 年第 9 期。

359. 高广东、魏立英《透视伊朗“禁卫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刊《环球军事》2006 年第 9 期。

360. 李贻《国会打伊朗吗》，刊《世界知识》2006 年第 9 期。

361. 张少《伊朗的人质危机邮票》，刊《集邮博览》2006 年第 10 期。

362. 贝迪《走近伊朗》，刊《Women of China》第 10 期。

363. 张基《古利斯坦条约》看伊朗外交》，刊《社会科学论坛（学术研究卷）》2006 年第 11 期。

364. 任秋《伊朗组建“人体炸弹”部队》，刊《环球军事》2006 年第 11 期。

365. 于时《土耳其和伊朗，化敌为友》，刊《南风窗》2006 年第 11 期。

366. 尚绪《伊朗核问题依旧云谲波诡》，刊《瞭望》2006 年第 11 期。

367. 天《以色列卫星上天监测伊朗》，刊《卫星电视与宽带多媒体》2006 年第 12 期。

368. 吴《不仅仅是核危机》，刊《南风窗》2006 年第 15 期。

369. 伊朗《静悄悄的变化》，刊《世界知识》2006 年第 18 期。

370. 邵《伊朗核危机前景预测》，刊《百科知识》2006 年第 18 期。

371. 康磊、康正《伊朗问题“核”去“核”从》，刊《环球军事》2006 年第 19 期。

372. 田文林《咄咄逼人的崛起》，刊《世界知识》2006 年第 21 期。

373. 拱振《伊朗核问题出路何在》，刊《瞭望》2006 年第 25 期。

374. 康《从女性视角下的伊朗》，刊《中国新闻周刊》2006 年第 26 期。

375. 刘婉《伊朗，寻常生活》，刊《中国新闻周刊》2006 年第

28 期。

376. 梁有健:《伊朗核危机面临拐点》, 刊《瞭望》2006 年第30 期。

377. 刘建群:《伊朗抛出缓兵之计》, 刊《中国新闻周刊》2006 年第33 期。

378. 张珏:《伊朗核问题的困境和出路》, 刊《中国新闻周刊》2006 年第34 期。

379. 张晓霞:《女性教育中的传统性与现代性》, 刊《教育评论》2007 年第1 期。

380. 梁平:《论伊朗核问题对阿拉伯国家的辐射效应》, 刊《阿拉伯世界研究》2007 年第1 期。

381. 王平:《查尔迪朗之战》, 刊《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 年第1 期。

382. 李鹏:《默德·巴基·萨德尔与伊朗伊斯兰体制的创建》, 刊《西亚非洲》2007 年第2 期。

383. 赵青:《布什的“两难”》, 刊《对外大传播》2007 年第2 期。

384. 章兢:《两伊时期伊朗和以色列战略关系的成因》, 刊《西亚非洲》2007 年第2 期。

385. 王泽健:《左翼(社会主义)运动的产生和发展(上)——从“正义党”到“八一九”政变》, 刊《西亚非洲》2007 年第2 期。

386. 赵建明:《布什、战争与麻穆》, 刊《国际展望》2007 年第4 期。

387. 余秉:《神秘的伊朗“人弹”部队》, 刊《科学大观园》2007 年第5 期。

四、伊朗文化研究论著索引

1. 赵增泉:《伊朗》, 刊《世界知识》1963 年第15 期。

2. 世垠:《伊朗》, 刊《世界知识》1979 年第6 期。

3. 李玉琦:《伊朗人的姓名》, 刊《世界知识》1981 年第11 期。

4. 梁占华:《波斯宫廷和乡村部落的毛毯》, 刊《杭州工艺美术》1984 年第2 期。

5. 高瑞英:《白君鹤《七在伊朗》》, 刊《世界知识》1984 年第10 期。

6. 钱正坤:《早期伊斯兰建筑艺术概述》, 刊《世界美术》1986 年第3 期。

中国伊朗学论集

7. 孙培良《萨珊时期的伊朗艺术》，刊《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3期。
8. 孙毓百《闻不如一见的伊朗》，刊《世界知识》1988年第9期。
9. 王冀青《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88~1993年丝绸之路研究规划》《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89年第1期。
10. 杨子《伊朗纺织艺术四百年》，刊《世界博览》1989年第2期。
11. 杨子《伊朗的节假日有多少》，刊《国际经济合作》1990年第4期。
12. 杜义盛《安息与萨珊艺术》，刊《世界美术》1992年第3期。
13. 江浦《伊朗的博物馆》，刊《中国档案》1992年第5期。
14. 陈今楷《伊朗的清真寺》，刊《中国穆斯林》1993年第3期。
15. 王一丹《伊朗绘画一瞥》，刊《美术》1993年第5期。
16. 顾音海《古代伊朗的银器》，刊《上海工艺美术》1994年第1期。
17. 周建新《哈萨克族拜火尚白习俗新解》，刊《新疆大学学报（哲社版）》1995年第1期。
18. 冯娜《伊朗饮食生活见闻》，刊《食品与生活》1995年第2期。
19. 金文彦《伊朗的音乐》，刊《管乐研究》1998年第2期。
20. 王纳《伊朗电影在崛起》，刊《大众电影》1998年第3期。
21. 伊朗开始放映好莱坞电影》，刊《大众电影》1998年第6期。
22. 荣新江《敦煌学》自序，刊《敦煌学辑刊》，1999年第2期。
23. 吴树《伊朗的火文化风物》，刊《山东消防》2000年第7期。
24. 晓春《伊朗“驱鬼节”》，刊《世界博览》2000年第10期。
25. 张晓华《世纪前后国内外环境对景教传播中国的影响》，刊《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26. 立方《来自伊朗平原的一股清风》，刊《电影评介》2001年第5期。
27. 穆宏燕《从细密画看伊朗文化的顽强性》，刊《东疆学刊》2002年第1期。
28. 杜平《古欧亚大陆北部游牧民的宗教信仰》，刊《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29. 李振中《韦太的哲学家、科学家、医学家伊本·西那》，刊《回族研究》2002年第2期。
30. 王锋《伊朗人的饮食》，刊《世界宗教文化》2002年第2期。

31. 周雁来自伊朗的《黑板》，刊《中外文化交流》2002年第4期。
32. 张晖《伊朗古代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刊《辽宁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
33. 王文婷《生命里美丽的风景——逛伊朗茶室》，刊《海内与海外》2002年第6期。
34. 晓晴《伊朗茶馆》，刊《世界博览》2002年第11期。
35. 林更生《伊朗的茶文化》，刊《农业考古》2003年第2期。
36. 谢晓燕、郑鹏《全球化对伊朗电影的影响》，刊《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37. 王剑虹《波斯史家笔下的唆鲁禾帖尼》，刊《蒙古学信息》2003年第4期。
38. 王锋《走进伊朗清真寺》，刊《中国穆斯林》2003年第5期。
39. 罗友《伊朗历法》，刊《上海集邮》2003年第5期。
40. 杨子翔《伊朗旧铜币》，刊《有色金属再生与利用》2003年第9期。
41. 马寿春《伊朗的茶俗》，刊《华人时刊》2003年第9期。
42. 刘焱《解读“波斯文化”》，刊《中外文化交流》2004年第1期。
43. 朱祖威《缤纷的伊朗新年邮票》，刊《集邮博览》2004年第1期。
44. 姜岳斌《邱紫维波斯民族的美学思想与艺术特征》，刊《人文杂志》2004年第4期。
45. 黄献《伊朗电影巡礼》，刊《电影艺术》2004年第4期。
46. 哥拉瑞莉瓦尼、刘玉梅《以上帝的名义：伊朗文化精神》，刊《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
47. 万喙《从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的背景看文明的碰撞》，刊《阿拉伯世界》2005年第1期。
48. 刘今朝、杨兴礼、艾少伟、刘自亮《古代伊朗宗教文化特征初探》，刊《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49. 李文杰《文化视野下的伊朗茶俗》，刊《南宁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50. 俞敏武《新质朴的伊朗电影》，刊《世界电影》2006年第3期。
51. 马寿春《伊朗人的喝茶习俗》，刊《丝绸之路》2006年第4期。

中国伊朗学论集

52. 杨君波斯旧地钱币访古, 刊《中国钱币》2006年第4期。
53. 赵青海伊朗的光荣与梦想, 刊《世界知识》2006年第5期。
54. 王金彪孩子的眼里有天堂——掠影伊朗儿童电影, 刊《艺苑》2006年第11期。
55. Ru 伊朗菜——入迷的味道, 刊《Women of C(中文海a》外版》2006年第12期。
56. 崔玉峰认识伊朗电影, 刊《电影评介》2006年第16期。
57. 王乃毓毓的生活, 素朴的诗意——评《小鞋子》, 刊《电影评介》2006年第24期。
58. 王薇论伊朗现实主义电影中的诗意美, 刊《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 2007年第1期。

五、伊朗艺术研究论著索引

1. (苏) 叶弗列莫夫 (Г. К. Ефремов) 等著,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地理教研室等译《伊朗、阿富汗》, 三联书店1957版。
2. (匈) 刘智著《方至圣实录》, 中国伊斯兰教协会1984印。
3. 毛君炎著《古代伊朗艺术》, 美术史论1987版。
4. 孙培良著《中国画法的西渐与伊朗细画》, 敦煌资料1989版。
5. 金宜久著《伊斯兰教的苏菲神秘主义》(《伊斯兰文化丛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版。
6. 高永久著《西域古代民族宗教综论》, 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版。
7. 蔡鸿生著《唐代九姓胡和突厥文化》, 中华书局1998版。
8. 徐蔚著《波斯之父——居鲁士(世界征服者)》,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版。
9. 蔡德贵著《东方著名哲学家评传: 西亚北非卷》, 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版。
10. 布鲁斯著《出西域——沿着马可·波罗的足迹旅行》(《世界探险家手记》, 海潮出版社2000版。
11. 马通著《丝绸之路上的穆斯林文化》, 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版。
12. (伊朗) 菲尔多西著《王记——勇士鲁斯塔姆》(《世界英雄史

诗译丛》，译林出版 2000 版。

13. 李铁匠著《漠风流：波斯文明探秘》，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1 版。

14. 王锋、冬梅著《走进伊朗：波斯历史文化与伊朗穆斯林风情礼仪》，民族出版社 2002 版。

15. 唐孟生著《印度苏非派及其历史作用》（《东方文化集成：南亚文化编》），经济日报出版社 2002 版。

16. 邢秉顺著《伊朗文化》，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3 版。

17. 李铁匠著《古代伊朗文化史》，苏州大学出版社 2003 版。

18. 邢秉顺著《伊朗文化——世界各国文化概要》，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3 版。

19. 罗世平、齐东方著《波斯和伊斯兰美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版。

20. (英) 玛露伊斯著《伊朗琐罗亚斯德教村落》，中华书局 2005 版。

21. 法土葛兰著《苏菲思想——伊斯兰的心灵旅程》，希泉出版社（台湾）2005 版。

22. 杨峰著《邂逅的撒马尔罕》，新疆大学出版社 2006 版。

23. 王宇洁著《伊朗伊斯兰教史》，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6 版。

24. 陈之佛、山编绘《古代波斯图案》，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1960 版。

25. (苏) 彼得洛夫、D 著，郑敏雅译《伊朗》，商务印书馆 1963 版。

26. (英) W. B. 费舍尔主编，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经济地理专业译《伊朗》，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7 版。

27. 《伊朗绘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 1978 版。

28. 王志冲译《波斯趣闻》，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2 版。

29. (伊朗) 巴列维著，许博译《伊朗公主回忆录》，新华出版社 1984 版。

30. (美) 沙利文著，邱应觉等译《出使伊朗》，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4 版。

31. 马金鹏译《本·白图泰游记》，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 版。

32. 周廷栏编绘《波斯图案》，河南美术出版社 1992 版。

33. (伊朗) 法劳马勒齐著，叶奕良译《伊朗旅游指南》，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0 版。

中国伊朗学论丛

34. 赵国忠主编《简明西亚北非百科全书(中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本2000版。

35. 刘文鹏主编，刘温棚，曲天夫，李铁匠著《世界文明图库——西亚北非探源》，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版。

36. 《波斯》尼扎姆尔克著《治国策》(欧亚历史文化名著译丛)，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版。

37. (美)戴希朗(Dale Brown)主编，王淑芳译《波斯人：帝国的主人》，华夏出版社2002版。

38. (英)拜伦著，顾淑馨译《内陆亚洲——伊斯兰教建筑与人文之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版。

39. 滕磊编《域圣火：神秘的古波斯祆教》，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版。

40. (日)泽木耕太郎著，陈宝莲译《波斯之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版。

41. (英)玛露伊斯著，张小贵、殷小平译《伊朗琐罗亚斯德教村落》，中华书局2005版。

42. 张铁伟编著《伊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版。

43. 刘德义编《丝绸之路上的未解之谜》，甘肃文化出版社2005版。

44. (清)刘智著，马宝棠、三胜译《天方性理》(白话译丛)，新民书局2005年。

45. 艾萨法·伍奈米，潘世昌译《走进苏菲——伊斯兰苏菲概论》，内部资料2005版。

46. (伊朗)贾利赫斯特哈赫选编《阿维斯塔——琐罗亚斯德教圣书》，商务出版社版本2005版。

47. 李铁生编著《波斯币》，北京出版社2006版。

六、中伊关系研究论著索引

(一) 论著类

1.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外交部编《华波斯通好条约》，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外交部1937年版。

2. 向达著《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57年版。

3. 张一纯著《经行记》笺注，中华书局1963年版。
 4. 张星琅著《西交通史料汇编》，中华书局1978年版。
 5. 陈高华吴泰著《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6. 朱杰勤著《中国和伊朗关系史稿》，新疆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7. 何芳川万明著《古代中西文化交流》，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8. 姜伯勤著《敦煌吐鲁番文书和丝绸之路》，文物出版社1994年版。
 9. 林悟殊著《波斯拜火教与古代中国》，新文丰出版公司1995年版。
 10. 陈炎著《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11. 宋岷著《波斯医学与中国》，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
 12. 杨晓蕾著《瀚驼铃——丝绸之路的人物往来与文化交流》（陇文化丛书），甘肃教育出版社/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3. 《明》陈诚撰曰耿著《西域行程记·西域番国志·咸宾录》（中外交通史籍丛刊），中华书局2000年版。
 14. 陈垣著《西域人华化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15. 向达著《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16. 何高济著《屯行纪/鄂多立克东游录/沙哈鲁遣使中国记》（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中华书局2002年版。
 17. 孟昭毅著《丝路驿花——阿拉伯波斯作家与中国文化》，宁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8. 张云著《唐西藏与波斯文明》，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版。
 19. 庄景辉著《泉州港考古与海外交通史》（南强史学丛书），岳麓书社2006年版。
 20. 杨怀主主编《和与文明对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 (二) 译著类
1. 《美》劳费尔著，林筠因译《中国伊朗编——中国对古代伊朗文明史的贡献：着重于栽培植物及产品之历史》，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
 2. 《阿拉伯》伊本·赫勒达兹比赫著，宋岷译注《道里邦国志》，中华书局1991年版。
 3. 《法》阿里·札海里著，耿昇译《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中华书局1993年版。

中国伊朗学论集

4. (美) 谢弗著, 吴玉贵译《唐代的外来文明》,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年版。

5. (美) 劳费尔《中国伊朗编》, 商务印书馆 2001 年版。

6. (法) 阿里玛扎海里著, 耿昇译《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6 版。

(二) 论文类

1. 刘朝阳《中国与波斯》, 刊《语历所周刊》1928 年第 5 卷 55 期。

2. 黄文弼《波斯古史及中国文化之关系》, 刊《说文月刊》1943 年第 3 卷 10 期。

3. 姚鉴《唐通西域》, 刊《历史教学》1954 年第 10 期。

4. C. N. 柴登《中国与阿尔泰部落的古代关系》, 刊《考古学报》1957 年第 2 期。

5. 阎宗临《古代波斯及其与中国的关系》, 刊《山西师范学院学报》1958 年第 2 期。

6. 宋大仁《中国和阿拉伯的医药交流》, 刊《历史研究》1959 年第 1 期。

7. 武伯伦《唐代广州至波斯湾的海上交通》, 刊《文物》1972 年第 6 期。

8. 林志纯《古代中亚和伊朗》, 刊《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上古部分)》, 商务印书馆 1974 年版。

9. 朱杰勤《中国和伊朗历史上的友好关系》, 刊《历史研究》1978 年第 7 期。

10. 汶江评《唐代广州至波斯湾的海上交通》, 刊《文物》1978 年第 11 期。

11. 马坚《回天文学对于中国天文学的影响》, 刊《回族史论集》, 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12. 冯汉津《海药本草》作者李珣考, 刊《回族史论集》, 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13. 张铁伟《“丝路”沟通了古代中国伊朗友好关系》, 刊《丝路》1984 年第 3 期。

14. 赵儒《丝绸之路之上两大国——伊朗和中国历史的比较》, 刊《西北史地》1986 年第 1 期。

15. 蓝瑾《塞厥汗国与萨珊波斯的关系》, 刊《贵州师大学报》1986

年第2期。

16. 宋 时代扬州的大食商人, 刊《中华文史论丛》1987 年第 1 期。

17. 叶奕良《丝绸之路》丰硕之果——中国伊朗文化关系，刊《中外文化交流》，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18. 宋岷《古代泉州与大食商人》，刊《海交史研究》1988年第1期。

19. 马云福(中国穆斯林代表团访问伊朗), 刊《中国穆斯林》1988年第2期。

20. 李恩旭：《伊朗总统访问牛街礼拜寺》，刊《中国穆斯林》1989年第5期。

21. 马云福伊朗伊斯兰代表团应邀访华, 刊《中国穆斯林》1989年第6期。

22. 朱杰勤《中国和伊朗历史上的友好关系》，刊《丝绸之路文献叙录》，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23. 张铁伟《丝绸之路”与中国和伊朗历史上的友好往来》，刊《丝绸之路文献叙录》，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24. 赵俣生编之路上两大国——伊朗和中国历史的比较，刊《敦煌资料》1989年版。

25. 王继德:《王及其〈西域行程记〉与〈西域番国志〉研究》,刊《中亚学刊》第3辑,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

26. 皮路斯·平伯莉校勘本《完者都史》，刊《中亚学刊》，中华书局1990年版。

27. 言伊郎船员逛上海, 刊《航海》1990年第5期。

28. 陈达生论中国东南沿海古代阿拉伯、波斯文碑铭之研究, 刊《回族研究》1991年第1期。

29. 宋岷莉《对〈普济方〉和〈本草纲目〉中的回回药方的考证》，刊《回族研究》1992年第2期。

30. 陈静元《回天算家及其天文工作考证》，刊《回族研究》1992年第2期。

31. 宋峨《回回药方》与阿维森纳的《医典》的关系, 刊《中国回族研究》第2辑, 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32. 牙克甫·伊期总统访问喀什, 刊《中国穆斯林》1992年第6期

中国伊朗学论丛

33. 王炳华从新疆考古资料看中伊文化关系, 刊《敦煌资料》1993年版。
34. 王邦维安息僧与早期中国佛教, 刊《敦煌资料》1993年版。
35. 荣新江敦煌吐鲁番出土中古伊朗语文献研究概述, 刊《敦煌资料》1993年版。
36. (伊朗) 穆扎法里赫蒂亚尔《亦思替非》考, 刊《敦煌资料》1993年版。
37. 荣新江敦煌吐鲁番出土中古伊朗语文献研究概述, 刊《敦煌资料》1993年版。
38. 齐东方中国古代的金银器皿与波斯萨珊王朝, 刊《敦煌资料》1993年版。
39. 任荣康元初的元—伊联盟与中亚交通——兼考马可·波罗抵忽炭三地之年限, 刊《中亚学刊》第3辑, 中华书局1990年版。
40. 季羡林伊朗学在中国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序, 刊《敦煌资料》1993年版。
41. 黄方震丝绸之路上的可萨汗国, 刊《中外关系史论丛》第4辑, 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42. 吐蕃赞普思汗在西域的统治, 刊《喀什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4年第4期。
43. 介永疆代的外裔, 刊《晋阳学刊》1995年第1期。
44. 陈辛仁鸿爪遗踪(出使四国追忆)二: 在古丝绸之路上的伊朗, 刊《外交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
45. 郝贵坛唐朝时期中国波斯友好往来的见证, 刊《世界历史》1995年第3期。
46. 安宝铸伊朗经济现状及中、伊贸易关系, 刊《西亚非洲》1995年第4期。
47. 许晓光试论中国与伊朗关系的特殊性, 刊《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
48. 达夫塔里著, 余建华段丽萍译《中伊关系及“碰撞”: 历史和现状》, 刊《国外社会科学文摘》1996年第7期。
49. 曹旅宁丝绸之路与中亚文明——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

读后感》，刊《中国史研究动态》1995年第8期。

50. 徐晓洲《回巴布教徒起义与清同治年间西北回民起义的比较研究》，刊《西北史地》1997年第3期。

51. 伊阙蚕桑公司成立》，刊《四川蚕业》1997年第3期。

52. 黎徽斯宗教文化与东方戏剧》，刊《戏剧艺术》1997年第3期。

53. 何跃武论中伊关系的开端》，刊《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5期。

54. 张晓《景教东渐初探》，刊《史学月刊》1997年第6期。

55. 何跃武《唐宋元明时期的中国伊朗关系》，刊《云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97年第6期。

56. 蒲小《波斯国王父子为何客居长安》，刊《中学历史教学参考》1997年第12期。

57. 杜《伊朗和中国》，刊《西北史地》1998年第1期。

58. 雷雨田《孙中山与大同教》，刊《世界宗教文化》1998年第1期。

59. 彭援军《籍中的海外游记专著》，刊《旅游科学》1998年第2期。

60. 张云《佛教古史传说与波斯祆教的影响》，刊《中国藏学》1998年第4期。

61. 余建华《论中伊关系与伊朗对华政策动因》，刊《西亚非洲》，1998年第4期。

62. 王建平《“祢尼”和“大食”两词的由来》，刊《中国穆斯林》1998年第6期。

63. 宋庆文《民间外交别有一番新境界——交协代表团出访阿联酋和伊朗随笔》，刊《当代世界》1998年第11期。

64. 王进王《从敦煌文物看中西文化交流》，刊《西域研究》1999年第1期。

65. 玛利亚·越英塔瑞、王建平、王冬梅译《中国回族和伊朗穆斯林双方伊斯兰文化的主要共同点》，刊《回族研究》1999年第2期。

66. 邓禾颖《论波斯文化与唐代陶瓷的关系》，刊《陶瓷研究》1999年第3期。

67. 王建平《波斯苏菲与中国塔利格的历史联系》，刊《回族研究》1999年第4期。

中国伊朗学论集

68. 余振贵《七世纪伊朗与中国伊斯兰文化复兴运动的两位代表人物：穆拉·萨德拉与王岱舆》，刊《回族研究》1999年第4期。
69. 丁明俊《七世纪伊朗伊斯兰哲学思想东传及其对中国穆斯林的影响》，刊《回族研究》1999年第4期。
70. 常清亮《伊朗总检察长拜访中国伊协》，刊《中国穆斯林》1999年第6期。
71. 林英武《论唐代西域的可萨汗国——兼论其与犹太人入华的联系》，刊《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2000年第1期。
72. 肖芒《中伊交流源远流长——访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驻华大使馆文化参赞玛达维博士》，刊《思想战线》2000年第3期。
73. 叶玉梅《略论波斯文化对中国伊斯兰文化的影响》，刊《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科版）2000年第3期。
74. 苏生智《伊朗总统哈塔米会见中国伊协领导人》，刊《中国穆斯林》2000年第4期。
75. 易水《伊朗学者在西亚非洲所介绍伊朗》，刊《西亚非洲》2000年第5期。
76. 冀开运《波斯建筑文化对清真寺的影响》，刊《中国穆斯林》2001年第1期。
77. 季羨林《勒信仰在新疆的传布》，刊《文史哲》2001年第1期。
79. 于卫青《从历史交往看祆教的早期发展》，刊《滨州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80. 杨东晨《秦文化与当时世界诸国文化的对比研究》，刊《宁德师专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1期。
81. 张玉彪《近年新疆考古新收获》，刊《西域研究》2001年第3期。
82. 于卫青《从历史交往看大流士的历史地位》，刊《聊城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3期。
83. 张晓华《世纪前后国内外环境对景教传播中国的影响》，刊《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3期。
84. 黎虎《狮舞流沙万里来》，刊《西域研究》2001年第3期。
85. 赵志安《从阮咸类琵琶起源考》，刊《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

86. 心烈“伊朗文化周”在北京，刊《中外文化交流》2001年第5期。
87. 庆祝中国与伊朗建交30周年，刊《友声》2001年第6期。
88. 邢秉顺伊朗“抒情诗大师”的中国情结，刊《中外文化交流》2002年第1期。
89. 李学西夏时期的丝绸之路，刊《宁夏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90. 巴拉提伊朗诵经团访华，刊《中国穆斯林》2002年第2期。
91. 林文花刺子模钱币来到陕西，刊《西安金融》2002年第3期。
92. 赵维平亚洲的音乐史料及其历史研究状况，刊《音乐研究》2002年第4期。
93. 丁明俊马芳《元代回回人与中西文化交流》，刊《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02年第4期。
94. 杨蕴西外来商品小考，刊《宁夏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
95. 广林中国·伊朗《古兰经》文化艺术展在京举行，刊《中国穆斯林》2002年第6期。
96. 钮保国友谊不需要握手——伊朗印象，刊《中外文化交流》2002年第7期。
97. 马超长城饭店伊朗美食节，刊《中国食品》2002年第7期。
98. 王现来文明与文明对话中伊文化交流一瞥，刊《中外文化交流》2002年第9期。
99. 纪德祥中国产地铁客车“开入”伊朗邮票，刊《上海集邮》2002年第11期。
100. 蒋晓峰视伊朗市场开发，刊《瞭望》2002年第19期。
101. 任范果广才《安徽省承建合同额最大的海外工程在伊朗启动》，刊《中国建设信息》2002年第22期。
102. 贾炜外友协代表团访问叙利亚和伊朗，刊《友声》2003年第1期。
103. 陈攀朗希望中国成其最大LNG买家，刊《天然气工业》2003年第1期。
104. 高占福试上伊朗伊斯兰文化对中国穆斯林社会的影响，刊《回族研究》2003年第3期。
105. 苏菲国—伊朗联合发行邮票——《西安钟楼与伊斯法罕清真

中国伊朗学论丛

寺 邮票首发式在西安举行》，刊《中国穆斯林》2003年第3期。

106. 艾树西木《论新疆和田人的特殊性格之历史渊源》，刊《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

107. 胡耀身《伊朗闻天下——记武汉市政协委员马立良》，刊《武汉文史资料》2003年第7期。

108. 高雪松《伊朗中国友好协会代表团访华》，刊《友声》2004年第1期。

109. 王慧卿《之路与中伊双边关系研究》，刊《丝绸之路》2004年第1期。

110. 姜伯勤《国祚教画像石在艺术史上的意义》，刊《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年第1期。

111. 王翊广燕《芦林兽吼——以狮子为“贡献”之中西亚与明的交往》，刊《西北民族研究》2004年第1期。

112. 姚继德、赛典赤·赡思丁：中—伊关系史上的一座丰碑——首届赛典赤·赡思丁研究国际会议综述》，刊《回族研究》2004年第2期。

113. 葛聚中、强从《从急援伊朗看我外交应急机制——访外交部西亚北非司副司长潘伟芳》，刊《世界知识》2004年第2期。

114. 《伊朗》费雷德·迪内贾德《在首届赛典赤研究国际会议开幕式上的致辞》，刊《回族研究》2004年第2期。

115. 《伊朗》赛典赤·赡思丁撰，白志所译《赛典赤·赡思丁对中国伊斯兰教传播的巨大贡献》，刊《回族研究》2004年第2期。

116. 宋巍《文化官员与学者访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刊《世界历史》2004年第2期。

117. 《伊朗》赛典赤·赡思丁撰，白志所译《赛典赤·赡思丁对中国伊斯兰教传播的巨大贡献》，刊《回族研究》2004年第2期。

118. 《日本》松本耿一郎撰，姚继德译《赛典赤与云南回族的“万有单一论”哲学》，刊《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3期。

119. 李铁霞《赛典赤问题质疑——与蒋华先生商榷》，刊《常熟高专学报》2004年第3期。

120. 荣新《波斯与中国：两种文化在唐朝的交融》，刊《中国学术》2004年第4期。

121. 中国技术市场协会努力促进中国建筑技术和产品进入伊朗市场，刊《科技成果纵横》2004年第4期。
122. 马开能寓五车皓首译经——记马坚教授，刊《中国宗教》2004年第10期。
123. 唐宝中国伊朗经贸合作前景探讨，刊《西亚非洲》2004年第5期。
124. 杨晟能源联系看中国与中东国家的互利合作，刊《西亚非洲》2004年第5期。
125. 赛博里海大中亚与中国的西部开发，刊《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2004年第11期。
126. 戚明毅朝棋局牵动中国，刊《党员干部之友》2004年第12期。
127. 蔡鸿盛代社会的穆姓胡考，刊《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1期。
128. 夏雷西域薄饔的考古遗存及其文化意义——兼谈波斯饮食文化对我国食俗的影响，刊《新疆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1期。
129. 杨文楷鲁番发现的波斯银币，刊《中国钱币》2005年第1期。
130. 张超阳兴礼、艾少伟《新时期伊朗农业特征与中伊农业合作前景初探》，刊《世界地理研究》2005年第1期。
131. 张超阳兴礼、艾少伟《简论中国与伊朗的经贸关系》，刊《云南财贸学院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3期。
132. 熊小强兴礼、刘今朝、艾少伟、张超阳《大国因素对当今中国—伊朗关系的影响》，刊《世界地理研究》2005年第3期。
133. 文忠国征战伊朗大市场，刊《中国高新技术企业》2005年第4期。
134. 徐良籍伊利汗国乞合都汗仿中国元朝行钞法，刊《学习与探索》2005年第4期。
135. 彭金章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考古发现看古代文化交流，刊《敦煌研究》2005年第5期。
136. 杨诗瀚兴礼《新时期中国—伊朗油气合作风险分析》，刊《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5年第5期。
137. 肖赣国维吾尔族民族民间音乐中使用波斯—阿拉伯音乐体系之源流探析，刊《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6期。

中国伊朗学论丛

138. 周力军《国外并购的主要模式》，刊《经营》2005年第8期。
139. 成亚威《伊朗环保电影——中国环境文化代表团伊朗国际绿色电影节纪行》，刊《绿叶》，2005年第8期。
140. 伊朗加大吸引中国游客力度》，刊《文明》2005年第9期。
141. 石纹康《公民旅居伊朗须知》，刊《侨园》2006年第1期。
142. 李楠兴礼《简论中国—伊朗双边贸易特点及发展趋势》，刊《世界地理研究》2006年第1期。
143. 邵如麟、明明《荆棘铜驼话洛阳》，刊《丝绸之路》2006年第1期。
144. 霍巍《文明视野中的上古西藏——读张云《上古西藏与波斯文明》》，刊《西藏研究》2006年第3期。
145. 李楠兴礼《中伊（伊）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分析》，刊《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146. 王永健《核问题上的中国角色》，刊《南风窗》2006年第4期。
147. 杨诗鑫、伟《新时期中伊贸易现状与发展对策研究》，刊《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148. 宁娟、杨兴礼《中国与伊朗经贸关系及发展策略》，刊《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年第4期。
149. 金良群《伊朗核变局殃及中国》，刊《中国石油石化》2006年第5期。
150. 王猛《危机的中国含义》，刊《南风窗》2006年第9期。
151. 张群《父子来自伊朗》，刊《大科技》2006年第13期。

七、伊朗经济研究论著索引

(一) 著作类

1. 燃料工业出版社《伊朗石油问题》，北京燃料工业出版社1951年版。
2. (英) 艾尔威尔·萨顿著，郑道儒等译《伊朗石油：对强权政治的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版。
3. 陈云竹等《外贸协会市场调查报告：伊朗市场调查报告》，台北：中华民国对外贸易发展协会1989年版。

4. 香港贸易发展局研究部编《贸易动向：伊朗市场报告》，香港贸易发展局研究部1992年版。

5. (伊朗) 德勒克著，李保童等译《石油开发战略》，石油工业出版社1992年版。

6. 陈文蓉编著《伊朗出口指南》，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

7. 安维华主编《中东市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8. (英) Philip Dew 主编，郝海鹏译《生意》，中国海关出版社2004年版。

(二) 论文类

1. 扎图卡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航空公司》，刊《国际贸易》1984年第2期。

2. 王菊如《伊朗的土地问题》，刊《西亚非洲》1984年第2期。

3. 张振国《战后伊朗农业的发展道路》，刊《西亚非洲》1987年第4期。

4. 赵毅《伊朗痛定思痛》，刊《瞭望》1988年第34期。

5. 程勇《发挥优势开拓伊朗市场》，刊《国际经济合作》1990年第3期。

6. 许丹松《海湾战后话伊朗市场》，刊《国际经济合作》1991年第9期。

7. 马秀卿《伊朗经济开放政策研讨》，刊《西亚非洲》1992年第2期。

8. 乐智华《变革给伊朗经济带来转机》，刊《国际展望》1992年第3期。

9. 伍书湖《伊朗的经济危机与石油经济》，刊《当代世界》1994年第1期。

10. (伊朗) Pouran Behnia 侯明奇博士指导《Band - Chadorm 地区矿床勘查的地理空间数据建模》(博士论文)，国家图书馆博士论文库1995年收。

11. (伊朗) 阿里克加拉 (Seyed Ali Nikjalal) 著，邱竹贤指导《伊朗原铝生产技术和提高铝厂电流效率》(博士论文)，国家图书馆博士论文库1995年收。

12. 王树华《伊朗卡山探区综合研究及目标评价》(硕士论文)，国家图书馆博士论文库1995年收。

13. 李忠海著，彭树智指导《伊朗60~70年代经济发展研究》(博士论文)，国家图书馆博士论文库1995年收。

14. 何焱《都不可多得的专著——〈中东市场〉评介》，刊《西亚非洲》1995年第3期。



中国伊朗学论集

15. 王瑾《美国对伊朗又挥大棒——其盟友们对此好像并不热心》，刊《国际经济合作》1995年第5期。
16. 安维华《伊朗伊斯兰革命后的经济政策》，刊《世界经济》1995年第12期。
17. 陈键《伊朗顶得住美国的经济制裁吗》，刊《瞭望》1995年第21期。
18. 李长义《都是为了各自经济利益》，刊《瞭望》1995年第22期。
19. ASM SHOB EIR 祝蔚细《伊朗蚕桑发展史话》，刊《国外丝绸》1996年第5期。
20. 金平《伊朗的外资保护法及其执行规定》，刊《国际经济合作》1997年第4期。
21. 子毅《发展中国家八国集团名多实少》，刊《当代世界》1997年第9期。
22. 张国凤《俄罗斯、土耳其、伊朗在中亚市场》，刊《东欧中亚市场研究》1997年第9期。
23. 孟照《伊朗对认证工作的兴趣与日俱增》，刊《管理科学文摘》1997年第11期。
24. 乌米尔塞里塞塞诺夫、毛泽峰《里海石油可能引起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刊《国际石油经济》1998年第1期。
25. 陈明《里海资源之争》，刊《国际资料信息》1998年第1期。
26. 李文《石油经济大事记》，刊《国际石油经济》1998年第2期。
27.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生命科学部《伊斯兰地区生物技术发展现状》，刊《世界农业》1998年第4期。
28. 黄保林《圈对中亚地区的油气争夺及其影响》，刊《国际展望》1998年第13期。
29. 郑翠兰《浅析伊朗伊斯兰革命的经济根源》，刊《职大学报》1999年第1期。
30. 续建堂《论伊朗的瓦克夫——伊斯兰基金组织》，刊《世界宗教文化》1999年第2期。
31. 国家统计局《世界农业统计资料》，刊《世界农业》1999年第10期。
32. 徐宁《独特的管道政治——里海能源输出的管道之争》，刊《国际

展》1999年第18期。

33. 迈赫日德勒贝格,尹全洲《伊斯兰经济制度下的私有化改革——伊朗革命后的私营经济》,刊《农村金融与市场经济》2000年第1期。

34. 张宝玺《勘探发现大气田》,刊《大庆石油地质与开发》2000年第3期。

35. 张品先《伊朗石油工业的投资环境和对外合作》,刊《国际石油经济》2000年第3期。

36. 秦桑《国家主导的经济发展与民族宗教运动的复兴——伊朗和埃及二例的对比研究》,刊《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4期。

37. 外国公司参与伊朗矿产开发》,刊《国外金属矿选矿》2000年第9期。

38. 岳云华、清红《伊朗产业结构发展的问题、机制与启示》,刊《绵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年第1期。

39. 杨越、建宜《关于俄罗斯、土耳其、伊朗在中亚的发展战略的若干问题思考》,刊《民族研究》2001年第1期。

40. 王才《世界石油工业百年风云(之九)》,刊《国际石油经济》2001年第3期。

41. 岳云华、清红《伊朗20世纪90年代产业结构问题与转型思路探讨》,刊《世界地理研究》2001年第3期。

42. 郑翠兰《伊朗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与伊斯兰革命》,刊《渝西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

43. 马元珏《科威特计划用管道从伊朗调水》,刊《水利水电快报》2001年第21期。

44. 赵晓青《伊朗常渣不同加工方案技术经济对比》,刊《天然气与石油》2002年第1期。

45. 陈维荣、江涛《伊朗钻井工程服务市场现状及进入对策》,刊《国际石油经济》2002年第12期。

46. 刘明《经济全球化与中东国家石油战略调整(二)》,刊《阿拉伯世界》2002年第4期。

47. 王健《伊朗是否会走向战争?——从经济学的视角观之》,刊《欧亚观察》2002年第4期。

中国伊朗学论丛

48. 姜贵涛《伊朗的资源开发环境》，刊《国土资源情报》2002年第5期。
49. 何华春《世界石油市场：群雄逐鹿正酣》，刊《国际石油经济》2002年第10期。
50. 冀开运《伊朗的发展战略》，刊《商洛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1期。
51. 孙永祺《值得关注的伊朗石油和天然气工业》，刊《天然气地球科学》2003年第3期。
52. 雷捍韩《全球化对伊朗、沙特和俄罗斯油气发展战略的影响》，刊《国际石油经济》2003年第3期。
53. 张刚、刘克雨《伊朗局势变化及石油工业发展动向分析》，刊《国际石油经济》2003年第9期。
54. 张华《伊朗油气资源及相关政策法规》，刊《国土资源》2003年第9期。
55. 木村《伊朗机电产品市场巡礼》，刊《世界机电经贸信息》2003年第12期。
56. 冯《发展中的伊朗油气工业》，刊《中国石油企业》2004年第7期。
57. 闻《中国拖拉机市场分析》，刊《山东农机化》2004年第7期。
58. 王《伊朗经济环境与对外经济能源合作》，刊《国际石油经济》2004年第9期。
59. 伊朗塑料加工业扫描，刊《国外塑料》2005年第1期。
60. 国内外小水电资讯，刊《小水电》2005年第1期。
61. 贸易经济合作概况，刊《国外塑料》2005年第1期。
62. 王天灵《伊朗的“风景”》，刊《中国对外贸易》2005年第3期。
63. 金《发展中的伊朗坦克工业》，刊《国外坦克》2005年第6期。
64. 王博、张国政《欧亚经济合作的新机遇——首届欧亚经济论坛综述》，刊《新西部》2005年第12期。
65. 冯亦斐《伊朗经济外交下的能源牌》，刊《中国新闻周刊》2005年第40期。
66. 刘清、林乃菊、程燕《伊朗石油资源对外合作合同模式经济研究》，刊《内蒙古石油化工》2006年第4期。
67. 何世念《伊朗油气：全球最诱人的“奶酪”》，刊《中国石化》

2006年第4期。

68. 付庆涛气并重、上中下游兼顾地走发展油气经济之路——中东地区主要产油国油气资源政策走向，刊《国土资源情报》2006年第4期。

69. 杨诗源杨兴礼《新世纪伊朗能源外交浅析》，刊《西亚非洲》2006年第7期。

70. 顾尧臣伊朗有关粮食生产、贸易、加工、综合利用和消费情况，刊《粮食与饲料工业》2006年第8期。

71. 曾玉琰转伊朗石油部长马罕内赫：石油市场应该非政治化，刊《中国经济周刊》2006年第14期。

八、伊朗历史地理研究论著索引

(一) 论著类

1. 布哇著《木儿帝国》，北京：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2. 陈莹著《新伊朗》，上海：世界书局1940年版。
3. 张柱枢著《伊朗巴布教徒起义》，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
4. 任风阁张殿吉著《希波战争》（外国历史小丛书），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5. 贝达棣著《伊朗》，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
6. 冯承钧原编，陆峻岭增订《西域地名》，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增订二版。
7. 李希泌刘明著《伊朗巴布教徒起义》（外国历史小丛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8. 于凤瑞白月桥著《希腊人大败波斯军》（历史小故事丛书），河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9. 纳忠译《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10. 卢苇著《波斯帝国》，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11. 余太山著《秦史研究》，齐鲁书社1986年版。
12. 王治来著《亚史纲》，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
13. 刘竞编《素手册》，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4. 杜维善著《丝绸之路古国银币》，上海：卡特印刷有限公司1992年版。

中国伊朗学论集

15. 余太山著《塞种人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16. 罗旺扎布等著《蒙古族古代战争史》，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
17. 李铁匠著《伊朗古代历史与文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8. 叶奕良编《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19. 刘迎胜著《西北民族史与察合台汗国史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20. 余太山著《西域通史》，北京：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21. 叶奕良编《伊朗学在中国》（第二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2. 马大正著《西域考察与研究续编》，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23. 龚方震晏可佳著《天教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
24. 马达汉著《1906~1908年马达汉西域考察图志》，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5. 姚大学王泰主编《中东通史简编》，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2001年版。
26. 赵伟明著《近代伊朗》，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27. 许序雅著《亚萨曼王朝史研究》，贵州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28. 于卫青著《波斯帝国》，西安：三秦出版社2001年版。
29. 高永久著《西域古代伊斯兰教综论》，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
30. 冀开运、黄焕萍著《二十世纪伊朗史：现代伊朗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31. 彭树智主编，王新中、冀开运著《中东国家通史·伊朗卷》，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32. 叶奕良编《伊朗学在中国》（第三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33. 姜伯勤著《回鹘艺术史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版。
34. 于卫青著《波斯帝国》（世界帝国兴衰丛书），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年版。
35. 刘迎胜著《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36. 马军著《沉默的历史》，香港：蓝月出版社2006年版。

37. 王宇洁著《伊朗伊斯兰教史》，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38. 王嵘著《西域艺术史》，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39. 孙博编著《地球漫步·伊朗》，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6年版。

(二) 译著类

1. (法) 沙畹著，冯承钧译《西突厥史料》，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2. (苏) 罗斯托夫斯基著，中国人民大学世界通史教研室译《现代世界史：1918到1939年时期的苏联》中国人民大学1954年版。
3. (苏) 阿甫基耶夫著《古代东方史》，上海：三联出版社1957年版。
4. (苏) 叶弗列莫夫等著，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地理教研室等译：《伊朗·阿富汗》，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版。
5. (英) 赫罗兹尼《西亚细亚、印度和克里特上古史》，上海：三联书店1958年版。
6. (苏) 伊凡诺夫等著，文津等合译《伊朗现代史概要》，北京：三联书店1959年版。
7. (古希腊) 希罗多德著，王以铸译《希腊波斯战争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8. (瑞典) 多桑著《多桑蒙古史》，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
9. (英) 珀西·赛克斯著《阿富汗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
10. (苏) 伊凡诺夫著，李希泌等译《伊朗史纲》，北京：三联书店1973年版。
11. (法) 昂里赛著《伊斯兰教简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
12. (日) 羽田亨著《西域文化史》，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3. (苏) 伊凡诺夫著，李立、梁子勤译《20世纪60~70年代的伊朗》，云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1983年版。
14. (苏) 威廉托尔德著，罗致平译《中亚突厥史十二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15. (德) 卡塞罗克尔曼著《伊斯兰教各民族与国家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16. 杨兆钧译《拉维约东使记》，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中国伊朗学论集

17. (苏) Огтапев·С А 著 世界各民族历史上的宗教,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18. (波斯) 拉施特主编《史集》, 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19. (日) 江上波夫著, 张承志译《骑马民族国家》, 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
20. (法) 费琅辑注, 耿昇穆根来译《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注》, 中华书局1989年版。
21. 李铁匠选译《俄伊朗史料选辑》, 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22. (美) 希提著, 马坚译《阿拉伯通史》, 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23. (伊朗) 阿宝斯拉克巴尔·奥希梯扬尼著, 叶奕良译《伊朗通史》, 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
24. (伊朗) 法劳马勒齐著, 叶奕良译《伊朗旅游指南》,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
25. (伊朗) 穆罕默德塔米著, 马生贵、塔瓦纳译:《从城邦世界到世界城市》, 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版。
26. (美) 戴希朝主编, 王淑芳译《波斯人: 帝国的主人》, 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
27. (美) A. H. 丹尼, V. M. 马松主编,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译:《文明的曙光: 远古时代至公元前700年》徐文堪、芮传明译《第二卷 定居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发展: 公元前700年至公元250年》,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年版。
28. (美) W. M. 麦高文著, 章巽译《亚古国史》(世界汉学丛书), 中华书局2004年版。
29. (日) 羽田亨著《西域文明史概论》, 中华书局2005年版。
30. (伊朗) 内扎鲁兹依·撒马尔罕迪著《四类英才》, 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31. (伊朗) 志费尼著, 何高济译《世界征服者史》, 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32. 恰赫里亚阿德尔, 伊尔凡·哈比卜主编, 蓝琪译《中亚文明史·第五卷 对照鲜明的发展: 16世纪至19世纪中亚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6年版。

（二）论文类

1. 周谷城《萨珊朝波斯》，刊《历史教学》1956年第10期。
2. 夏鼐《中国最近发现的波斯萨珊朝银币》，刊《考古学报》1957年第2期。
3. 夏鼐《青海西宁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刊《考古学报》1958年第1期。
4. 冯汉庸关于“经西宁通西域路线”的一些补充——与《青海西宁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一文商榷，刊《考古通讯》1958年第7期。
5. 李遇春《新疆乌恰县发现金条和大量波斯银币》，刊《考古》1959年第7期。
6. 夏鼐《新疆新发现的古代丝织品——绮、锦和刺绣》，刊《考古学报》1963年第1期。
7. 许永璋《试论1848~1852年伊朗巴布教徒起义》，刊《徐州大学学报》1963年第1期。
8. 任玉《萨马尼王朝》，刊《历史教学》1965年第8期。
9. 夏鼐《新疆吐鲁番最近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刊《考古》1966年第4期。
10. 竺敏《吐鲁番新发现的古代丝织》，刊《考古》1972年第2期。
11. 夏鼐《综述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刊《考古学报》1974年第1期。
12. 朱捷《秦波《陕西长安和耀县发现的波斯萨珊朝银币》，刊《考古》1974年第2期。
13. 夏鼐《近年来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朝文物》，刊《考古》1978年第2期。
14. 余大锜《四世纪初伊朗史学家拉施特·哀丁主编的历史巨著——〈史集〉》，刊《内蒙古大学学报》1978年第2期。
15. 穆舜英《吐鲁番哈喇和卓墓群发掘简报》，刊《文物》1978年第6期。
16. 魏纪文《伊朗远古文化的新研究》，刊《世界历史》1979年第1期。
17. 吴继德《论沙皇俄国对伊朗的侵略扩张》，刊《思想战线》1979年第3期。
18. 吴继德《伊朗封建化的开始与早期封建国家的确立》，刊《世界中

中国伊朗学论集

世纪史研究通讯》1980年第1期。

19. 赵增泉《巴列维王朝的兴亡》，刊《西亚非洲》1980年第1期。

20. 方德琳《巴列维王朝的没落》，刊《东南亚资料》1980年第2期。

21. 余大钧《五世纪伊朗史学家费志尼和他的历史著作〈世界征服者史〉》，刊《内蒙古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合刊。

22. 吴继德《伊朗吉郎共和国的成立和失败》，刊《思想战线》1980年第4期。

23. 王子利拉·戴特·哀丁和他的《史集》，刊《世界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5期。

24. 梁英明《伊朗库尔德族问题的历史与现状》，刊《世界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7期。

25. 周谷城《低西亚的国际地位》，刊《史学与美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26. 周谷城《斯坦因〈古代中亚之遗迹〉》，刊《史学与美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27. 张润民《伊朗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刊《中东》1981年1~2期。

28. 刘隽《伊朗巴列维王朝是怎样建立的》，刊《外国史知识》1981年第2期。

29. 吴继德《伊朗封建的分期问题》，刊《思想战线》1981年第4期。

30. 孙培荣《于马资达克运动》，刊《世界历史》1982年第1期。

31. 李遵义《明〈伊朗1905~1911年革命〉》，刊《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

32. 王挺《波斯珍卷〈世界征服者史〉》，刊《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1982年第6期。

33. 洪征《沙皇俄国与1905~1911年伊朗革命》，刊《河南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4期。

34. 余大钧《斯特和他主编的历史巨著〈史集〉》，刊《民族研究》1983年第6期。

35. 赵秉新《波斯战争三个主要战役及希腊胜利的原因》，刊《历史教学》1983年第12期。

36. 于隽《伊朗巴布教徒起义》，刊《外国史知识》1984年第1期。

37. 张景润《大流士改革述议》，刊《天津师专学报》1984年第3期。
38. 彭树智《伊朗1905~1911年的资产阶级革命》，刊《外国史知识》1984年第4期。
39. 吴继德《二十年代伊朗民族解放运动三大革命基地的斗争》，刊《历史教学问题》1984年第4期。
40. 王树森《大流士改革》，刊《外国史知识》1984年第10期。
41. 孙培德《萨珊朝伊朗述略》，刊《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
42. 薛宗正《萨曼波斯王朝始末》，刊《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86年第10期。
43. 叶奕良《波斯帝国一代君主——大流士一世》，刊《东方文化史话》，合肥：黄山书社1987年版。
44. 李湘波《波斯文明与古代教育》，刊《东方文化史话》，合肥：黄山书社1987年版。
45. 张振国《论巴列维的“白色革命”》，刊《中东》1987年第1期。
46. 安希孟《萨珊历史上的萨珊王朝》，刊《阿拉伯世界》1988年第2期。
47. 张鸿年《伊朗古代文明》，刊《东方文化知识讲座》，合肥：黄山书社1989年版。
48. 李忠祿《波斯帝国的历史地位》，刊《金陵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
49. 段晴《顺博物馆藏于阗语〈出生无边门陀罗尼经〉残片的释读》，刊《敦煌资料》1993年版。
50. 张文德《秋罗《论伊利汗国的伊斯兰化》，刊《徐州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4年第4期。
51. 钱伯泉《大石、黑衣大石、喀喇汗王朝考实》，刊《民族研究》1995年第1期。
52. 哈全安《阿巴斯派运动新探》，刊《世界历史》1995年第2期。
53. 曹竞洲《帖木儿王朝时期中亚文化的巨大成就及其繁荣的原因》，刊《求索》1995年第2期。
54. 张文德《伊斯兰教对中亚帖木儿王朝的影响》，刊《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5年第2期。
55. 李忠祿《波斯帝国时代的文明大汇合》，刊《广西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3期。

中国伊朗学论集

56. 周启超试论波斯帝国的行省与总督, 刊《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1995 年第3期。
57. 李忠存试析波斯帝国时代的文明大汇合, 刊《广西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5 年第3期。
58. 谢玉瑜徐虎《大流士一世改革与波斯帝国的全盛》, 刊《天中学刊》1996 年第2期。
59. 徐良和波斯在蒙古人统治时期文化繁荣论, 刊《常德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7 年第1期。
60. 李希光尼雅——消失在沙漠中的王国, 刊《中国民族博览》1997 年第2期。
61. 徐晓萍伊朗巴布教徒起义与清同治年间西北回民起义的比较研究, 刊《西北史地》1997 年第3期。
62. 李希光尼雅: 消失在大漠中的千古之谜——世纪末的大探险, 刊《文化交流》1997 年第4期。
63. 徐良和波斯在蒙古人统治时期文化繁荣论, 刊《常德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 1997 年第7期。
64. 韩长利世界历史上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六大帝国, 刊《中学历史教学参考》1997 年第11期。
65. 张长利《18世纪至19世纪的中亚及有关该时期历史的穆斯林文献》, 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 年第1期。
66. 李忠存大流士世界中心观探析, 刊《嘉应大学学报》1998 年第1期。
67. 李铁匠古代伊朗的种姓制度, 刊《世界历史》1998 年第2期。
68. 冀开运论伊朗沙法维朝的定都和迁都, 刊《南通职业大学学报》1999 年第3期。
69. 倪学德希罗德对波斯的态度新论, 刊《聊城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 1999 年第4期。
70. 〔法〕格鲁塞著《塞琉帝国》, 刊《中亚史丛刊》第7期。
71. 〔美〕鲁克文顿著《游牧帝国》, 刊《中亚史丛刊》第2期。
72. 冀开运著, 彭树智指导《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研究》(博士论文), 国家图书馆博士论文库2000年收。

73. 冀开运《伊朗历史上的智力引进》，刊《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2000 年第1 期。
74. 杨群章《比较中西历史 弘扬中华文明——孙培良论著读后感》，刊《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00 年第5 期。
75. 倪学德《希腊文化传统与希罗多德对波斯的态度》，刊《历史教学》2000 年第10 期。
76. 彭树智《伊朗史中的文明交往与文明对话问题——〈中东国家通史·伊朗卷〉编后记》，刊《西北大学学报》(哲社版) 2001 年第3 期。
77. 于卫《波斯帝国的交往性特征》，刊《人文杂志》2001 年第6 期。
78. 泽马尔亚·塞尔齐《文化的十字路口和珍品荟萃之地》，刊《中国青年科技》2001 年第6 期。
79. 哈全安《从白色革命到伊斯兰革命——伊朗现代化的历史轨迹》，刊《历史研究》2001 年第6 期。
80. 盖双《历史的边角——伊本·赫勒敦历史 览后随感》，刊《阿拉伯世界》2002 年第2 期。
81. 王青《赵政权与西域文化》，刊《西域研究》2002 年第3 期。
82. 李传利《波斯帝国对希腊城邦政策的演变》，刊《柳州师专学报》2002 年第3 期。
83. 车效梅《文史交融、雅俗共赏的 波斯帝国》，刊《西亚非洲》，2002 年第4 期。
84. 陈震宇《中文版〈中亚文明史〉第一、二卷》，刊《新疆社会科学》2002 年第4 期。
85. 邢秉顺《玫瑰与夜莺的城市——伊朗历史名城设拉子》，刊《中外文化交流》2002 年第4 期。
86. 陈德正《流土与秦始皇治国方略辨异——兼论波斯帝国延祚和秦帝国速亡之原因》，刊《齐鲁学刊》，2002 年第6 期。
87. 金彩云《试论1977~1979 年伊斯兰革命在伊朗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地位》(硕士论文)，国家图书馆硕士论文库2003 年收。
88. 刘越英《中东史研究的新成果——〈中东通史简编〉评介》，刊《呼伦贝尔学院学报》2003 年第1 期。
89. 范进宇《走进伊朗》，刊《旅游》2003 年第9 期。

中国伊朗学论集

90. 曲六乙泉州打城戏的复兴与迷惘——从打城戏荣获伊朗金小丑奖说起, 刊《中国戏剧》2003年第12期。
91. 范鸿达著, 徐蓝指导巴列维国王时期的美国伊朗关系研究: 1941~19(博士论文), 国家图书馆博士论文库2004年收。
92. 马婷, 刘鸿武指导 1979年以来伊朗的伊斯兰文化与政治(硕士论文), 国家图书馆硕士论文库2004年收。
93. 曹玉峰, 刘中民指导伊斯兰革命以来的伊朗与美国关系研究(硕士论文), 国家图书馆硕士论文库2004年收。
94. 马通马海滨《巴布的理想》, 刊《世界宗教文化》2004年第1期。
95. 张铎伊朗归来——记参加伊朗第十一届国际《古兰经》展览, 刊《中国穆斯林》2004年第1期。
96. 杨会营陈元会长出席“伊斯兰世界机遇与挑战国际会议”, 刊《中国穆斯林》2004年第1期。
97. 郑翠兰站木儿对伊朗东部的军事征服, 刊《重庆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98. 党宝海蒙古察合台汗国的驿站交通, 刊《西域研究》2004年第4期。
99. 和著清源山宗教乐土寻踪游, 刊《风景名胜》2004年第9期。
100. 王建伊郎: 一个时代还没有过去, 刊《世界知识》2004年第10期。
101. 吴成进天国——读《二十世纪伊朗史》, 刊《西亚非洲》2005年第4期。
102. 华睿喇汗王朝祖先传说的历史解读, 刊《历史研究》2005年第6期。
103. 钱伯康曾发现的萨珊银币及其在高昌王国的物价价值, 刊《西域研究》2006年第1期。
104. 徐良翊伊儿汗合赞, 刊《史学月刊》2006年第5期。
105. 赵青舞伊朗的光荣与梦想, 刊《世界知识》2006年第5期。

九、伊朗宗教研究论著索引

(一) 著作类

1. 蒋斧著《摩尼残经卷一卷》(附《摩尼教流行中国考略》), 刊《敦煌石室遗书》1909年。
2. 罗振玉著《摩尼教残经跋》, 刊《敦煌石室遗书》1909年。
3. 冯承钧著《景教碑考》, 上海: 商务印书馆1931年。
4. 纳忠著《回教诸国文化史》, 昆明: 云南《民意日报》社1948年出版。
5. 李希泌、刘明著《伊朗巴布教徒起义》, 商务印书馆1980版。
6. 任继愈主编《古代伊朗宗教和琐罗亚斯特教词条49条》, 刊《宗教词典》, 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版。
7. 任继愈主编《摩尼教词条32条》, 刊《宗教词典》, 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版。
8. 任继愈主编《伊斯兰教词条701条》, 刊《宗教词典》, 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
9. 薛文波著《十叶派对中国伊斯兰逊尼派的影响》, 刊《清代中国伊斯兰教论集》, 宁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0. 吴云贵著《伊朗宗教概况》, 刊《各国宗教概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11. 江文汉著《景教》, 刊《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2年版。
12. 黄心川著《琐罗亚斯特教》, 刊《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2年版。
13. 薛容著《本·西那》, 刊《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2年版。
14. 林悟殊著《古代摩尼教》(外国历史小丛书), 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15. 世界宗教所伊斯兰教研究室编《什叶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16. 白寿彝《中国伊斯兰史存稿》, 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7. 费耐生、赵儒生著《伊朗的宗教与文化》, 1985版。

中国伊朗学论集

18. 龚方震著《西域宗教杂考》，刊《中华文史论丛》第2辑，中华书局1986年版。
19. 林悟殊著《摩尼教及其东渐》，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台北：淑馨出版1997年版。
20. 金宜久著《伊斯兰教与神秘主义》，刊《东方文化知识讲座》，合肥：黄山书社1987年版。
21. 黄心川著《琐罗亚斯德教》，刊《世界十大宗教》，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
22. 黄心川、陈斌城著《摩尼教》，刊《世界十大宗教》，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
23. 西德基著《伊本·西拿的哲学思想》，刊《东方文化集，刊》第1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
24. 金宜久著《米本体论》，刊《东方文化集，刊》第1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
25. 金宜久主编《伊斯兰教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26. 王建平著《伊斯兰教在波斯和中亚》，刊《伊斯兰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27. 朱吕颐著《琐罗亚斯德教》，刊罗竹风主编《宗教通史简编》第七编第一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28. 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伊斯兰教研究室编《伊斯兰教文化面面观》，济南：齐鲁书社1991年版。
29. 龚方震著《融合四方文化德智慧》，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30. 韩秉芳著《摩尼教》，刊《中国宗教纵览》，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31. 叶奕良编《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第一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版。
32. 林悟殊著《波斯拜火教与古代中国》，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5年版。
33. 元文琪著《无神论：古波斯宗教神话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34. 龚方震著《教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

35. 林悟殊著《火祆教在唐代中国社会地位之考察》，载蔡鸿生主编《戴裔煊教授九十诞辰纪念文集：澳门史与中西交通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36. 魏庆征著《古代伊朗神话》，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37. 王健、冬梅著《波斯历史文化与伊朗穆斯林风情礼仪》，民族出版社2002版。
38. 张文德著《中亚苏菲主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39. 叶奕良著《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第三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版。
40. 林悟殊著《唐代景教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41. 吴冰冰著《什叶派现代伊斯兰主义的兴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版。
42. 林悟殊著《古三夷教辨正》，中华书局2005年版。
43. 王宇洁著《伊斯兰教史》，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版。
44. 金宜久、吴云贵著《伊斯兰与国际热点》（十四章“伊朗”；二十三章“两伊战争”），东方出版社。
45. 周璠著《苏菲主义与道教》。
46. 〔苏〕盖·托卡列夫著，魏庆征译：《世界各民族历史上的宗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册《伊斯兰教（玛兹达教）》。
47. 元文琪译《波斯神话精选》，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91年版。
48. 〔德〕著，张小贵译《伊朗琐罗亚斯德教村落》，中华书局2005年版。
49. 〔美〕米尔·贾利拉德著，晏可佳、吴晓群、姚蓓琴译《宗教思想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

（二）论文类

1. 王国维《摩尼教流行中国考》，刊《亚洲学术杂志》1921年第11期，另刊《观堂集林》第四册。
2. 陈垣《火祆教入中国考》，刊《国学季刊》第1卷第1号（1923年1月）；收入《陈垣学论文集》第一集，中华书局1980版《陈垣史学论著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3. 许地山《摩尼之二宗三际论》，刊《燕京学报》1928年版第三卷。

中国伊朗学论丛

4. 刘铭恕元人杂剧中所刊之火祆教, 刊《金陵学报》第11卷1期(1941年); 又《新疆研究论丛》1942~1944年。
5. 马坚伊斯兰文化的光芒——庆祝伟大科学家阿维森纳诞生一千周年纪念, 刊《光明日报》1952年5月4日。
6. 李海阿维森纳的医典和他在世界医学上的影响, 刊《新华月报》1952年第5期。
7. 纳忠伊朗巴布农民运动及对“巴哈主义”的批判, 刊《云南大学学报》1956年第1期。
8. 宋大仁关于“西域”“回回”和“阿维森纳”问题, 刊《历史研究》1959年第12期。
9. 素兰摩尼教和火祆教在唐以前入中国的新考证, 刊香港《明报》1973年第12期。
10. 车文博论阿维森纳的心理学思想——评《论灵魂》, 刊《吉林大学学报》1978年第5~6期合刊。
11. 孙培德摩尼教及其东西传播, 刊《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4期。
12. 里摩尼的什叶派, 刊《世界知识》1979年第4期。
13. 金宜久试论苏菲派的哲学思想, 刊《东方哲学研究》1980年第2期。
14. 赵增泉伊斯兰什叶派在伊朗历史上的作用, 刊《西亚非洲》1980年第5期。
15. 李鹏增伊斯兰教什叶派, 刊《世界宗教研究》1980年第4期。
16. 柳存仁撰, 林悟殊译: 萨珊火祆教和摩尼教在中国之遗迹, 刊《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第3期。
17. 孙培德摩尼和摩尼教, 刊《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2期。
18. 李经纬: 古代维吾尔文献《摩尼教忏悔词》译释, 刊《世界宗教研究》1982年第3期。
19. 陈德成: 伊斯兰教伊斯马仪派的哲学思想初探, 刊《新疆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
20. 刘月琴: 伊斯兰教什叶派的形成, 刊《西亚非洲》1982年第5期。
21. 赵增泉: 伊斯兰教什叶派及其在西亚社会生活中的地位, 刊《西

亚非洲》1982年第6期。

22. 庄为琳《摩尼教初探》，刊《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第3期。

23. 李振中《哲学亚师“法拉比”》，刊《阿拉伯世界》1983年第3期。

24. 元文璠《波斯古经〈阿维斯塔〉》，刊《世界宗教资料》1983年第1期。

25. 黄汉卿《象教在广州的遗迹》，刊《广州日报》1983年1月28日第4版。

26. 杨湘漪《我国仅存的摩尼教寺》，刊《文物天地》1984年第2期。

27. 黄心川《琐罗亚斯德教简介》，刊《世界宗教资料》1984年第4期，收入作者主编《世界十大宗教》，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

28. 李振中《伊斯兰权威加扎利》，刊《阿拉伯世界》1984年第1期。

29. 刘铭恕《祆教杂考》，刊《世界宗教研究》1984年第4期。

30. 王怀德《祆派的演变与门制度形成的特点》，刊《世界宗教研究》1984年第2期。

31. 陈思《祆派与什叶派的主要区别》，刊《世界宗教资料》1984年第4期。

32. 林悟《本世纪来摩尼教资料的新发现及其研究概况》，刊《世界宗教资料》1984年第1期。

33. 王家瑞《琐罗亚斯德教的哲学思想》，刊《东方哲学研究》1985年第1期。

34. 金宜久《汉文伊斯兰教早期著述中的神光思想》，刊《世界宗教研究》1985年第4期。

35. 费佩群《祆教的兴衰》，刊《外国史知识》1985年第5期。

36. 元文璠《琐罗亚斯德如是说》，刊《外国文学研究集刊》第10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37. 元文璠《波斯古经〈阿维斯塔〉》，刊《外国文学研究》1986年第1期。

38. 王麓昌《祆教论稿》，刊《历史研究》1986年第3期。

39. 郭承真《祆派的道路》，刊《外国史知识》1986年第5期。

40. 李振中《法拉比哲学思想简介》，刊《外国哲学》第7期，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中国伊朗学论集

41. 元文瑛琐罗亚斯德教“灵体”说的哲学探讨, 刊《东方哲学研究》1987年第2期。
42. 元文瑛阿维斯塔神话与琐罗亚斯德教哲理, 刊《世界宗教研究》1987年第4期。
43. 林悟殊唐代长安火袄大秦寺考辨, 刊《西北史地》1987年第1期; 收林氏著《波斯拜火教与古代中国》。
44. 林悟殊袄教始通中国的再认识, 刊《世界宗教研究》1987年第4期; 收林氏著《波斯拜火教与古代中国》。
45. 吴云贵唐代伊斯兰复兴之浅析, 刊《世界宗教资料》1987年第2期。
46. 蔡德贵阿拉伯的哲学家法拉比, 刊《新疆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
47. 傅益瑛伊本·西拿的认识论, 刊《东方哲学研究》1987~1988年合刊。
48. 李振中中世纪阿拉伯哲学家伊本·西拿, 刊《东方哲学研究》1987~1988年合刊。
49. 王家瑞论鲁米的《玛斯纳维》, 刊《世界宗教研究》1988年第2期。
50. 陈思明什叶派起源初探, 刊《世界宗教研究》1988年第2期。
51. 陈德成伊斯兰教什叶派伊玛目学说略论, 刊《世界宗教研究》1988年第2期。
52. 林悟殊唐人奉火袄教考辨, 刊《文史》1988年第30辑。
53. 林悟殊袄教的原始经典《伽萨》, 刊《世界宗教资料》1989年第1期; 收林氏著《波斯拜火教与古代中国》。
54. 林悟殊阿维斯陀经及其研究概况, 刊《东南亚研究》1989年第1期。
55. 林悟殊唐代琐罗亚斯德教研究的滥觞, 刊《百科知识》1989年第4期; 收林氏著《波斯拜火教与古代中国》。
56. 殷浩强试论伊朗社会变化过程中宗教的作用, 刊《西亚非洲》1990年第2期。
57. 吴云贵战后伊斯兰教的基本趋势, 刊《宁夏社会科学》1991

年第1期。

58. 李一新合赞汗时期伊利汗国的伊斯兰化, 刊《西北民族研究》1991年第2期。

59. 王德怀逊尼派、十叶派与苏菲派, 刊《阿拉伯世界》1992年第1期。

60. 龚方震祆教: 四方宗教融合的一环, 刊《融合四方文化的智慧》(中国的智慧丛书,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61. 龚方震琐罗亚斯德教对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影响, 刊叶奕良编《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第一集,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62. 张广达祆教对唐代中国之影响三例, 刊李学勤、龙巴尔主编《法国汉学》第1辑, 清华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63. 李默祆教在中国流行, 刊《中华文明大博览》, 广东旅游出版社1997年第1版。

64. 元文瑛琐罗亚斯德教与摩尼教的比较研究, 刊《世界宗教研究》1997年第3期。

65. 李铁匠古代伊朗的种姓制度, 刊《世界历史》1998年第2期, 页67~74; 收入叶奕良编《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第二集,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66. 林悟弥祆教在唐代中国社会地位之考察, 刊蔡鸿生主编《戴裔煊教授九十诞辰纪念文集: 澳门史与中西交通研究》,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第169~194页; 见《戴裔煊教授九十诞辰纪念文集》, 第256~283页。

67. 张云本教古史传说与波斯祆教的影响, 刊《中国藏学》1998年第4期。

68. 世界宗教研究编辑部编《二元神论: 古波斯宗教神话研究》, 刊《世界宗教研究》1998年第4期。

69. 《伊朗》玛利亚达英塔瑞著, 王建平、王冬梅译《中国回族和伊朗穆斯林双方伊斯兰文化的主要共同点》, 刊《回族研究》1999年第2期。

70. 张广达吐鲁番出土汉语文书所刊伊朗语地区宗教的踪迹, 刊《敦煌吐鲁番研究》第4卷,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71. 李富华伊朗一个并不神秘的宗教国家, 刊《世界宗教文化》1999年第1期。

中国伊朗学论集

72. 李富华:《伊朗记略》, 刊《世界宗教研究》1999年第1期。
73. 莫开运:《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原教旨主义理论家——纳瓦布萨法维》, 刊《西亚非洲》1999年第4期。
74. 金正:《把“祆教”当“祆教”》, 刊《说文解字》2000年第5期。
75. 林悟殊:《世纪中国琐罗亚斯德教研究述评》, 刊余太山主编《欧亚学刊》第2辑, 中华书局2000年版。
76. (伊朗) 达乌德撰, 元文琪译:《阿维斯塔》研究小史, 刊《世界宗教文化》2000年第1期。
77. 希文:《神权政治压不住改革的呼声——伊朗议会选举结果解读》, 刊《世界宗教文化》2000年第2期。
78. 蔡源:《伊斯兰与苏菲主义(Sufism)的生死与爱》(台湾)《当代》2000年10月号。
79. 曲红:《伊斯兰革命后伊朗的派系权力之争》, 刊《世界宗教研究》2000年第4期。
80. 詹家峰:《梅尼提出“不要东方, 不要西方, 只要伊斯兰”政策的根源》, 刊《世界历史》2000年第2期。
81. 罗新:《曲所刊祆教资料》, 刊《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3期。
82. 李春城:《伊朗现代伊斯兰政治模式》, 刊《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
83. 葛承雍:《祆教东传长安及其在陕西的遗痕》, 刊《国学研究》第十卷, 北京大学国学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版。
84. 荣新江:《波斯与中国: 两种文化在唐朝的交融》, 刊《中国学术》2002年第4辑(总第12辑)。
85. 施安昌:《圣火祆教图像考》, 刊北京《故宫博物院院刊》2002年第1期; 收入《善本碑帖论集》第398~403页, 与蔡司鸟神》第130~138页。
86. 王宇:《巴布教派和早期巴哈伊信仰在伊朗的发展与传播》, 刊《巴哈伊教研究论文集》第一集2002年。
87. 蔡宗德:《伊斯兰苏菲主义之仪式与音乐关系初探》, 刊《台湾宗教学会通讯》(台湾)2002年第7期。

88. 蔡源林伊斯兰苏菲教团的探讨—以 Naqshbandiy 为例，《台湾宗教学会通讯》（台湾）2002 年第 7 期。

89. 荣新江《中亚宗教的传播·袄教》，收胡戟等主编《二十世纪唐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年版；收朱国中《古史研究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版。

90. 姜伯勤《袄教画像石——中国艺术史上的波斯风》，刊《文物天地》2002 年第 1 期。

91. 范鸿达《伊朗外交：宗教领袖与总统的作用》，刊《西亚非洲》2002 年第 5 期。

92. 程彤《从蒙古入侵到萨法维王朝建立》，2003 年。

93. 王峰《一个中国学者眼中的伊朗穆斯林婚俗礼仪》，刊《世界民族》2003 年第 4 月。

94. 陈文生《伊朗输出伊斯兰革命之分析与评估》，刊《新世纪宗教研究》（台湾）2003 年 9 月。

95. 张双《神秘面纱后面的伊朗》，刊《紫荆》（香港）2003 年 8 月号第 154 期。

96. 封长《伊朗变局可能引发伊斯兰世界动荡：神秘面纱后面的伊朗》，刊《紫荆》（香港）2003 年 8 月号第 154 期。

97. 马婷《1979 年以来伊朗的伊斯兰文化与政治》，2004 年。

98. 吴成《梅尼“毛拉治国”思想研究》，2004 年。

99. 马通《海滨·巴布的理想》，刊《世界宗教文化》2004 年第 1 期。

100. 韩望《世界上现存最完整的摩尼教遗址——泉州草庵》，刊《世界宗教文化》2004 年第 3 期。

101. 黎国楫《二郎神之袄教来源——兼论二郎神何以成为戏神》，刊《宗教学研究》2004 年第 2 期。

102. 王宇《叶尔派伊斯兰教两大教法学之争》，刊《世界宗教研究》2004 年第 1 期。

103. 周燮《叶尔派伊斯兰教在伊朗的历史演变》，刊《宗教哲学》（台湾）2004 年 6 月 30 卷。

104. 茉穆《穆斯林女性艾巴迪 (Shirin Ebadi) 获和平奖的意义》，刊《宗教哲学》（台湾）2004 年第 79 卷。

中国伊朗学论集.....

105. 陈立橧 伊朗革命的背景 (1963~1990) 刊《中华兴史学》(台湾) 2004 年10 月第10 期。
106. 陈立橧 伊朗革命与何梅尼 (1977~1990) 刊《中华兴史学》(台湾) 2005 年6 月11 期。
107. 陈安堡 伊朗伊斯兰革命及其世界影响, 2005 年。
108. 姜英橧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政教关系, 刊《西亚非洲》2005 年第5 期。
109. 林悟稼 罗亚斯德教的圣火崇拜, 收《波斯拜火教与古代中国》, 第51~60 页。
110. 姜英橧 伊斯兰宗教力量的发展前景, 刊中文伊斯兰学术城: www.islambook.net
111. 奴德烈 莱曼《科学宗教及其苏非与神秘主义》, 刊中文伊斯兰学术城: www.islambook.net